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十二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桦 主编

第十二卷

共和国篇目录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1)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4)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6)
一、全国大陆的解放、各级地方政权建立	(6)
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	(6)
和平解放西藏	(10)
二、中央着手采取措施稳定物价	(12)
三、没收官僚资本	(13)
四、镇压反革命开始	(15)
五、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	(16)
六、1950年的整风运动	(18)

第二章 民主改革与国民经济恢复

第一节 抗美援朝	(21)
----------------	------

第二节 土地改革	(28)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29)
一、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	(29)
二、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32)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	(36)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和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节 整党与思想改造运动	(43)
一、整党运动的开始	(43)
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47)
第二节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48)
一、毛泽东阐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	(48)
二、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48)
三、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同民主党派和工商 界部分代表谈话	(50)
四、实行粮棉统购统销	(50)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施	(53)
一、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53)
二、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	(54)
三、少数民族区域的民主改革	(55)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59)
一、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9)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70)
第五节 思想文化建设的发展	(78)

- 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 (78)
- 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79)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 (84)
- 一、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84)
- 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85)
- 三、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 (94)
- 四、1957年的整风运动 (99)
- 整风运动的过程 (99)
- 整风运动的初步总结 (111)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117)
-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117)
- 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23)
-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过 (123)
- 第一次郑州会议 (128)
- 第二次郑州会议 (130)
- 三、大跃进运动 (134)
- “大跃进”口号的提出 (134)
-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 (135)
- 北戴河会议 (137)
- “大跃进”运动的经过 (139)
- 第三节 庐山会议与“反右倾”运动 (145)

第四节 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与“八字”方针的制定	(153)
.....	(153)
一、1959年~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53)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58)
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	(162)
四、60年代初的甄别平反工作	(164)
第五节 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调整	(169)
一、七千人大会	(169)
二、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175)
第六节 “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177)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177)
二、对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错误批判	(184)
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8)
四、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	(194)
五、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	(199)
《刘志丹》事件	(199)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及文艺界的整风	(200)
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的扩大	(202)
第七节 国防建设及对外关系	(205)
一、国防建设	(205)
二、中苏两党公开论战	(211)
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216)
四、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220)

第五章 发展中严重曲折的十年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223)
一、“文化大革命”的酝酿	(223)
批判《海瑞罢官》	(223)
《二月提纲》	(226)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28)
“三家村反党集团”事件	(229)
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30)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30)
《五·一六通知》	(232)
《五·七指示》	(234)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和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错误改组	(236)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与改组北京市委、北大党委	(238)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240)
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	(241)
全国教育行政机构首先瘫痪	(242)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与《十六条》的通过	(243)
抄家运动	(247)
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党的民主集中制遭破坏	(248)
大串联	(250)

四、制止局势恶化的努力	(253)
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57)
六、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257)
七、公然鼓动打倒刘少奇	(259)
八、“文化大革命”动乱波及全国	(261)
九、全面夺权与大动乱升级	(263)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发表	(263)
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构被夺权或改组	(264)
二月抗争	(266)
十、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	(270)
十一、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271)
第二节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274)
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74)
二、“斗、批、改”阶段的整党建党	(280)
三、九大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	(284)
四、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与覆灭	(286)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286)
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分歧与斗争	(287)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288)
批陈整风运动	(292)
毛泽东南巡	(295)
九·一三事件	(297)
五、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中断	(300)
六、国民经济艰难举步	(304)

七、外交工作新局面	(308)
第三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321)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321)
二、“四人帮”的形成	(328)
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329)
四、一九七五年的整顿	(331)
一九七五年整顿	(331)
邓小平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337)
落实干部政策	(339)
邓小平抵制“反经验主义”	(340)
五、周恩来逝世与天安门事件	(342)
六、毛泽东逝世	(347)
七、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348)

第六章 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节 文革结束初期的徘徊	(361)
一、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361)
二、邓小平恢复工作	(366)
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370)
四、国民经济初步恢复	(375)
五、各项工作逐步转入正轨	(388)
六、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392)
七、平反冤假错案逐步开展	(397)
第二节 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	(402)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402)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02)
十一届三中召开及其意义	(408)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展	(411)
二、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	(414)
三、冤假错案的全面平反	(416)
四、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	(419)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	(419)
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和初步贯彻	(425)
五、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完成	(43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与修改	(434)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440)
第三节 改革开放起步	(448)
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试行	(448)
二、城市改革的试点: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453)
三、贯彻经济调整方针,解决重大比例失调	(458)
四、对外开放方针的制定与四个开放城市的建立	(465)
五、继续贯彻调整方针,探索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	(471)
六、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	(478)

第七章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纲领的制定	(485)
一、党的十二大	(485)
二、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504)
三、《邓小平文选》出版	(505)
四、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与全面整党的开始	(507)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	(520)
一、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520)
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521)
三、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	(530)
四、农村第二步改革	(536)
五、教育科学体制的改革	(542)
六、裁军百万,推进军队体制改革	(555)
七、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方针的提出	(557)
第三节 “六五”计划的完成与“七五”计划的制订	(561)
.....	(561)
一、“六五”计划的完成	(561)
二、“七五”计划的制定	(565)
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70)
1979年至1986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570)
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72)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576)
四、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酝酿及总体设想的研讨	(583)
五、两个基本点的提出	(587)
六、一九八七的改革、开放	(590)
七、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的召开	(598)
第四节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一国两制”构想	(599)

第八章 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610)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610)
党的十三大	(61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612)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615)
二、党的十三大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623)
三、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会议的召开	(629)
四、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与治理整顿的实施	(639)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	(639)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641)
五、1989年的政治风波	(649)
六、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确立	(654)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664)
一、邓小平南巡谈话	(664)
二、中共十四大召开	(681)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694)
四、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召开	(701)
第三节 迈向新世纪	(702)
一、党的十五大召开	(702)
二、为迎接新世纪而奋斗	(714)

共
和
國
篇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随着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全国性的革命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在北平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领导进行建国的准备工作。

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回答人们所关心的新中国的性质,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国家的内外政策及前途等。毛泽东在

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阐明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文章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要强化国家机器，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此文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爱国华侨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共662人。会议集中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行使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60条。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五种经济成份（即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份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全体国民的公德;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等方面政策。《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准则,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新中国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并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的地位、任务都作了具体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其后也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民主协商国家大事,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

会议选举了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都定于北平，改北平为北京，通过了国旗、国徽、国歌，还通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至此，建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同时，会议发表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点，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国歌、礼炮和群众欢呼声中，毛泽东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结束了100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史，使中国变成了真正独立、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劳动人民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社会从此进入

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它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使世界殖民体系遭到严重打击,推动了世界人民斗争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实践表明,只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走符合本国革命实际的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经济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样,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经验是:必须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建立一个由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参加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一、全国大陆的 解放、各级地方政权建立

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

开国大典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协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立即加速确定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组成人选，以尽快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机构。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还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副总参谋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委员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等。因此，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全部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拥有副部级以上人员500名。10月21日、22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先后组成。25日，政务院决定组织接收委员会，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的人员、档案、物资。11月1日政

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开始办公。

新中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是严格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首先建立过渡性的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自上而下地委任人员组成地方人民政府。然后，待条件成熟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民主选举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

按《共同纲领》规定，“凡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委员会都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参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地方政权机关。

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层次上，建国初期采取了大区制度，即保留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建制。与之相应建立大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委员会。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之。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政权机关。由军事首长、地方党政负责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接收旧权遗留下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设施。完成军事接管后，再由上级机关任命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条件成熟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选举各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以后，军政委员会即宣告结束。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选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代。由于新解放区还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成为人民参政的一种

过渡形式。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则是建国初期确立国家权力结构体制、民主建政的主要内容。

1949年7月底,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迅速召开各界人代表会议的指示。9月,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新华社《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社论指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和准备,是人民管理政权的初期组织形式,是团结各界人民的重要工具。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原则》和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原则。指出,凡能召开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即应代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如下职权:听取与审查省人民政府的作报告;决定省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与通过省人民政府的预决算;建议与决议有关省政兴革事宜;选举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又制定大行政区、省、市、县、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作为民主建政的法规。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国各地相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起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到1949年底,北京、天津、唐山等市已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人民政府。到1950年10月,全国已有13个省和3个行政区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10个省和两个行政区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市及省和相当于省的行署直辖市已全部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80%以上的县已召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原则下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

建国第一年,全国的行政区划的28个省(未包括台湾),

13 个直辖市,8 个行署区,1 个自治区(内蒙),一个地方(西藏),一个地区(昌都)。截止到 1950 年 10 月,全国已建立东北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28 个省人民政府;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苏南、苏北、皖南、皖北、旅大等 9 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12 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市人民政府,67 个省辖市人民政府,2087 个县人民政府。到 1952 年,全国 30 个省、两个省级行署区、160 个市、2174 个县(包括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单位)和约 28 万个乡,建立人民政府,并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不少乡是召开执行乡人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农民代表会议。有 19 个省、85 个市、436 个县和绝大部分乡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

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发展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成果,新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新型政治制度。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与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利益的各民主党派结成联盟。各党派既有彼此联系、发挥作用的统一的组织机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有各自独立的组织系统和单独发挥作用的形式和渠道。各民主党派不仅参与国家立法,还对行政过程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省、市政协委员和县党务委员会也普遍建立起来,为人民行使政权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形式。

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是人民行使权力管理国家政权的重要步骤,人民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主人,各党各

派长期并存,互相监督,共同为建设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这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渐趋完备,中国人民在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和平解放西藏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新中国成立之时,西藏等地还没有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始终在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以实现祖国的统一。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西藏及其他地区的藏族爱国力量迫切要求解放西藏并为和平解放西藏奔走呼吁。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在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但遭到西藏地方当局上层反动分子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拉萨的上层统治者与美国、英国、印度等有许多联系。美英帝国主义出于对新中国的敌意,一直插手西藏当局上层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报道,拉萨当局将派“亲善使团”访问美、英、印度等国。对此,1月18日,朱德副主席在民委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重了解放西藏的决心,重申了《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1月20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拉萨当局如果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中国将不能容忍。1月31日,留居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朱德,反对拉萨当局勾结美、英出卖西藏的举动,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2月初,西藏

地方当局曾派出代表团来北京谈判,但代表团4月初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后,在外国唆使阻挠下迟迟不肯来京。此时,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在西北军区配合下开始向西藏进发。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在昌都部署了藏军主力,妄图抗拒人民解放军进藏。10月,进行了昌都战役,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和继续进军奠定了基础。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迅速分化,西藏人民长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迅速增长,西藏和平解放已是人心所向不可抗拒。1950年11月16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严正声明对西藏领土的立场,驳斥了印度诬我军入藏是“侵入西藏”的谬论。同时诚恳呼吁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尽快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谈判。经过不懈的努力,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陆路来北京,原来滞留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也同时由海路到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20多天的协商谈判,终于圆满达成协议。

5月23日,由李维汉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阿沛·阿旺晋美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在《协议》上正式签字。《协议》共17条,主要内容有:西藏地方政府坚决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藏;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地方政府应按照人民的愿望对西藏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西藏的涉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实现西藏内部团结,即达赖和班禅双方的

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和文化教育事业,逐步改善西藏人民生活。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到达拉萨。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胜利进抵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拉萨各族各县人民的欢迎。

二、中央着手采取措施稳定物价

1949年11月中旬,中央着手稳定物价。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建国初期,国家财政赤字严重,加上投机资本乘机猖狂活动,致使物价连续猛涨。从10月开始,上海物价再次出现涨风。进入11月份,涨势更猛,至11月24日止,比10月上旬上涨32.6%。这次物价涨风之所以特别猛烈,除了财政赤字庞大、钞票发行量过多这一主要原因外,还由于投机商人在上海低价购进,向外地高价抛出,上海的私营金融业在汇集和调动投机资金中又起了恶劣的作用。据此,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3日发出指示,要求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行政措施,加强对外币、金银的管理,控制主要物资集中抛售,加强市场物价管理等,以防止物价猛涨。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16日致电邓子恢并华东、西北、华南财委,对控制市场物价作出了部署,总的方针是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提出目前各地国营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零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

成,预定 11 月底 12 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具体步骤是:(1)目前抢购风盛行,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售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2)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11 月 25 日,在根据中央财委布置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全国一致行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乘市场高价之际大量抛售,2 天之内,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 26 日起,上海和各地的物价从高峰上跌落下来。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物价猛涨的紧张局面,中央财委从 12 月起再次做出安排,从中南、西南、东北等地调 3.5 亿多公斤粮食到上海。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预料 1950 年春节上海市场物价一定要大涨,故事先调集资金,抢购和囤积物资,准备在春节后开市时与国营经济作一次大的较量。春节后开市的第一天,国营公司挂出牌价和春节前一样,粮食、纱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开供应。这时,投机资本家妄图背水一战,他们到处借钱,接连 3 天抢购粮食、纱布。到了第 4 天,已经力不从心,想组织退却,把抢购的东西吐出去,但又没有人要。在占压倒优势的国营经济面前,投机资本家失去操纵市场、左右物价的能力。国营经济通过与投机势力的反复较量,逐步取得商品市场的领导权。

三、没收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型产儿,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是近代中国官僚资本的主要特征。1927

年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后，逐步形成的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政治、经济特权，巧取豪夺，大量聚敛财富，成为全国最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 $2/3$ 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 80% 左右。官僚资本还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 44% 的轮船吨位，还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把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企业（包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的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在华的企业）、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所经营的企业（包括工矿、银行、商店、仓库、船舶和农牧场等），全部收归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

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在建国初已初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企业，并且经过改造，使之成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1951年1—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清理了隐藏在一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及上述各类分子的财产。至此，官僚资本被彻底剥夺。

在官僚资本基础上建立的国营经济，愈来愈得到充分的发展，到1952年，国营经济已发展到占整个国民收入总产值的 60% 左右。

四、镇压反革命开始

1950年3月，中央发出开展镇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建国初期，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约300余万。他们互相勾结，制造谣言，刺探情报，破坏厂矿，捣毁铁路，抢动物资，杀害干部，甚至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据统计，在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内，就有近40000多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杀害。

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剿匪。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10月，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判了在镇反工作中“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强调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同时，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打击敌人，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此前后，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镇反工作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作了不少有关镇反工作的指示，从而正确指导了镇反工作。到1951年5月，镇反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向和工作草率现象。于是，在中央指导下，1951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总结经验，纠正缺点，进一步贯彻严肃和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保证了镇反运动健康发展。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结束。

通过武装剿匪和镇反运动，基本肃清了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土地改革顺利进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五、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

1950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建国初期，党内一些人滋长了居功自傲情绪，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关门主义倾向，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安排民主人士代表在人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有意见；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强调斗争和限制，要求提早消灭资本主义。为了统一党内对新时期统战工作的认识，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3月21日，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任务是要在实现《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广大侨胞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人与我党合作，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任务而奋斗。报告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必须执行既团结又斗争、斗争为团结的方针。报告还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及我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政策作了阐述。在会议讨论中，一部分同志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作用及我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有错误的认识。毛泽东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关于挤垮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指出，(1)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

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2)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团结要为主，最终达到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3)对私营工商业应当限制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如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帮助它发展；(4)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关于民主党派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从整体上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强调要在党内广泛进行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3月25日，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学习《斯大林与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文件，指出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毛病，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克服缺点，加强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及广大非党群众的团结。

会议期间，周恩来于4月12日、13日两次到会讲话。13日的讲话题为《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他说，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不是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同他们合作。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民主党派，把上层政治活动分子组织起来，便于他们学习，便于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我们，从而使各党各派更密切地团结合作。民主党派在国际上有影响，有些事情他们做比共产党做更有效。何况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我们的帮助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吗？周恩来还讲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等问题。4

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建、民进、中华职业教育社部分领导人座谈,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多党合作的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但在今天,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它的任务,这就是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努力建设新中国。他告诉资产阶级的人们要自信,他们有光荣的历史任务,而且有光明的前途。

六、1950年的整风运动

1950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中指出,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

6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整风运动三人委员会主任胡乔木在会上就整党问题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党在政策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基本上是在1949年以来的伟大前进中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胜利来得太快太大,新党员新干部太多太杂,新任务太多太紧,某些政策方面的前进太快太远,来不及准备,来不及学习。为了继续前进,或者作某些必要的适当的后退,以便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整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他明确地指出,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

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展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责成各地党委负责人对于整党整干运动开始时应就当地党内偏向作一报告的指示》。《指示》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负责人在各地整党运动开始时,都能作一篇演讲或论文,分析该区领导机关与下级人员工作作风中的主要缺点,举出足为典型的实例,公开发表,作为该区整党的主要学习材料,以便学习者用来做学习一般性文件和反省自己工作的桥梁。通过动员,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端正对整风的态度。接着学习中央文件,以及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当时党中央规定的整党文件主要有:5月1日中央颁发的关于开展整党的指示、以及以前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同党外群众合作的决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等。通过学习,领会精神,树立标准,掌握武器。然后各级干部结合总结工作,个人进行反省,检查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进行整风总结,订出改进措施与健全制度,以巩固整风的成果。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同各项任务紧密结合,是建国初期领导整风运动的基本环节。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次整风,就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任务,进行查思想、查工作、查作

风,而主要的是在检查与总结工作中查思想、查作风。因为任何思想和作风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从各项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各中央局、省市市委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整风中,务必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各项工作,克服孤立和关门整风倾向。东北局关于整党指示中规定,此次“整风必须围绕当前主要工作,贯彻党的基本政策。”要求经过这次整风,使东北经济建设前进一步。工业部门贯彻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实行生产责任制,管理民主化,提高劳动纪律为中心;农村工作以贯彻普遍发展生产力,正确地进行组织起来,改良农业技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心。

第二章 民主改革 与国民经济恢复

第一节 抗美援朝

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二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发表广播演说,号召朝鲜人民为正义战争而奋斗,直到献出最后一滴血。朝鲜人民军奋起抗击,不到两个月时间,解放了汉城和南朝鲜大部分地区。趁朝鲜人民军主力南下,后方空虚之机,麦克阿瑟调集“联合国军”5万余人、300多艘军舰、500多架飞机,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10月1日,麦克阿瑟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投降。当晚,金日成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希望中国尽快派兵支援。金日成还派朴宪永前往北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当面提出上述请求。

美国出兵侵略朝鲜,公开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用飞机扫射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严重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周恩

来总理严正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美国侵略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经反复研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命令东北边防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军民向侵略者作战。随后，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支援，但临时有变，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和辑安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10月25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连续进行了5次大规模攻势作战。

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集中约30万兵力，继续疯狂地分兵冒进。10月25日晚，李承晚军一个多营在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与志愿军遭遇，被全歼，揭开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接着，志愿军主力分兵猛攻，11月2日攻克云山。同时，从侧翼迂回威胁敌军。敌被迫全线撤退。11月5日，第一战役结束。是役共歼美、李军1.5800万多名，迫使敌军退至清川江以南，挫败敌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美军遭第一次战役打击后，仍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力不足，只是

象征性出兵。美军总部广播称：“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麦克阿瑟调动 20 多万兵力，发出“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令。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定州、香积山、妙香山等预定战区时，西线中国人民志愿军 6 个军，突然发起反击。将敌分割包围，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翻马倒，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敌人向“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撤退。中国人民志愿军乘胜追歼敌人，12 月 5 日收复平壤，并继续向“三八线”追击。东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1 月 27 日黄昏开始向长津湖地区反击。12 月 1 日歼灭美军 1 个多陆军团及 1 个炮兵营。东线之敌向南突围。中国人民志愿军爬冰卧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予美陆战第一、第七师以歼灭性打击，收复咸兴、元山、兴南地区。残敌由海上狼狈逃窜。第二次战役共歼敌 3.6 万余人，收复“三八线”以北绝大部分地区，并解放了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 1950 年 12 月 31 日至 1951 年 1 月 10 日。美国侵略军被击退到“三八线”后，一面积极调整部署，一面抛出“停火建议”以图争取时间，伺机再行北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采取正面突破，穿插迂回，分割围歼的战法，12 月 31 日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附近。敌人调动兵力于洛东江预设防线，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 30 公里，企图诱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不利地形作战。彭德怀识破了敌人有计划退却的阴谋，加之运输线延长，供应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

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到达“三八线”及以南地区后，停止追击，休整待机。1951年1月10日第三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区歼敌1.9万余人，解放了汉城及“三七线”以北广大地区。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敌军引诱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成，为挽回败局，调集33万兵力，于1月27日发动全线进攻。敌人采取主力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等齐发展战术，企图乘中国人民志愿军疲惫之机，把中朝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动撤离汉城，在纵深100公里地带阻敌87天之久，歼敌达7.8万余人，完成防御任务，并成功地掩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入朝各兵团的集结。

美军在朝鲜战场一连串的失败，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吵。麦克阿瑟把战场上的失败归之于美国政府对他的种种限制，提出要封锁中国海岸，轰炸中国大陆，利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到朝鲜作战等来扩大战争。杜鲁门则认为麦克阿瑟鼓吹的方案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球出动的世界大战，甚至使用原子武器。4月5日，美国披露了麦克阿瑟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声称“把亚洲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私人信件。杜鲁门作出强硬反应，4月9日免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远东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统帅职务，任命李奇微继任麦克阿瑟的职务。李奇微受命之初的主要任务为：全面掌握和领会华盛顿赋予他的保卫日本的首要使命，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贯彻杜鲁门坚定而明确的方针，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这对朝鲜战局，有很大的影

响。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双方兵力都在百万以上。此役分三个阶段:4月22日至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北汉江以西、议政府地区猛攻,迫敌退至汉城、北汉江、昭阳江以南地区。5月16日至21日,志愿军以6个军兵力攻东线县里地区,激战5昼夜,歼敌2万余人。5月23日以后,志愿军主动北撤转移。机动歼敌,至6月10日撤到“三八线”附近。这次战役共歼敌8.2万余人。因中国人民志愿军技术装备落后,整个战役中“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营的建制六七处,一旦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天美军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就拼命救援出被围之敌。”

中国人民志愿军五战五捷,歼灭敌军23万余名,其中美军8.8万余名,把敌人由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局势。美军在遭受打击后,士气低落,兵力不足,加之远离后方,只得转攻为守,寻求政治解决朝鲜战争的途径。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交战双方谈判停火,军队撤离“三八线”的建议。7月10日,朝中人民军代表与“联合国军”代表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10月8日移至开城附近的板门店)举行停战谈判。朝鲜战争进入军事与外交斗争交织进行阶段。由于美方对谈判缺乏诚意,在军事分界线、战俘遣返等问题上提出许多无理要求,阻挠达成协议。并在停战谈判期间,于1951年7月至9月先后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采用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的“绞杀战”、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中朝人民军队艰苦作战,建立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作战中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采取“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消灭敌人,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使战线稳固在“三八线”附近。美国“细菌将军”李奇微在世界人民的声讨中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替其职务。

1952年10月,美军发动“金化攻势”,10月14日向中朝人民军队坚守的金化东北上甘岭阵地大规模进攻,企图分割中国人民志愿军防御体系。美军投入6万多兵力,动用18个炮兵营,300多架飞机和178辆坦克,轮番向上甘岭冲击。朝中人民军队依据以坑道为主体的防御阵地,打退敌人数百次进攻。经43天的激战,歼敌2.5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守的仅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被敌机投掷的重磅炸弹削低了2米,但阵地屹立不动。1953年5至7月,朝中人民军队发动了夏季反击战,歼敌12.3万余人,收复土地240多平方公里。

在两年多时间中,敌我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美国动员了它的1/3陆军、1/5的空军和近1/2的海军投入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利用地形,构筑坑道,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多次的小胜,大量消灭敌人,这两年中共歼敌72万余人。得到苏联支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也开始出战。朝中两国人民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促使朝鲜停战协定签订。

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时间),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美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

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当日 22 时完全停火，协定开始生效。随后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在协定上签字。“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时和他的属僚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历时 3 年的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军队共毙伤俘敌 109 万多人，其中美军 39.7 万多人，李承晚伪军 66.7 万多人，其他帮凶军 2.9 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 1.2 万余架，击毁击伤缴获敌坦克 3064 辆，击沉击伤敌舰 257 艘。

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志愿军先后投入兵力达 130 多万，中国消耗各种物资 560 多万吨，支出战费人民币（旧币制）60 万亿多。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达 36 万余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 200 多人。志愿军中涌现出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孙占元、杨根思等 30 多万战斗英雄、模范功臣。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国际主义颂歌。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朝中两国的独立和安全，粉碎了美国吞并朝鲜进而颠覆中国的狂妄计划。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勇气和信心，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武装侵华的尝试，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由各民主党派发起成立的抗美援朝总会通过多种

形式开展抗美援朝教育,提高全国人民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觉悟,扫除旧中国造成亲美、崇美的思想和“恐美病”,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志愿军勇士被誉为“最可爱的人”,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军,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工人、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广大人民推行爱国公约,支援前线。全国人民共捐献了相当于 3710 架战斗机价值的款项。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全国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社会改革和建设。

第二节 土地改革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命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建国之初,党领导群众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彻底解放农民的伟大革命。随着运动的开展,党的土改政策不断地充实、完善。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命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使土地改革工作沿着党引导的正确轨道顺利进行。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鉴于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土地改革法对地主和富农采取了宽大的政策。对地主,由过去没收其一切财产改变为只没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

中的多余房屋,其他财产(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对富农,由过去征收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孤立和分化地主阶级,团结全体人民有秩序地实现土地改革,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冬,华北、华东、中南等新解放区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的基础上,分期分批地开始了土地改革。党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封建势力。各地先后派工作队深入农村,通过组织阶级队伍,培养积极分子,带领群众同地主阶级斗争以取得土地。到1952年底,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解放的台湾以外,已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包括老解放区在内,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而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中国国情出发,制订了新中国经济建

设的方针和一整套战略策略。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起，新民主主义经济在革命根据地内萌生，经过22年的实践与探索，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识日臻完善。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划分为五种主要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思想被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在原料、市场、资金等方面调节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就土改、财政、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讲话时，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复杂斗争形势和严重困难，指出经过近一年来的努力，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国头三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进行。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创造这三个基本条件，必须做好土改、肃清反革命、整党建党、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等八项工作。“三个条件”、“八项工作”是完成恢复经济的中心任务的工作纲领。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措施，以推动生产的发展，把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联系起来，又把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同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从理论高度概括了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恢复经济的策略方针。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一策略方针的实质，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孤立打击主要的敌人，建立经济上的统一战线，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朋友”团结起来，有步骤、有分别地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这“三个敌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当时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使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暂时增多，农民负担还很重，工商资产阶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打击投机资本家斗争的开展，使中国共产党内有人误以为斗争对象已经主要是资产阶级。针对这种情况，全会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

义的不符合国情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七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恢复经济的方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对“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迅速恢复经济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经济政策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恢复经济的策略路线,新中国以恢复经济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人民政府打击市场投机,根绝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恢复农业生产,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面临着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1949年4月、6至7月、11月及1950年2月,社会上掀起四次物价大涨风。上海从1949年6月至1950年2月,批发物价上涨了约20倍。

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受中央委托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领导干部会议,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尽可能控制物价上涨幅度的方针。

8月至10月的物价,处于相对稳定状态。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挥师华南、西南,军费开支激增,全国军政公教人员超

过 700 万,秋季收购粮棉又进一步增加货币投放。11 月底人民币累计发行量比 7 月底增加 6 倍多。从 10 月中旬开始,华南商人北上套购纱布,引起纱布价格上升。10 月 27 日,京绥铁路因察北鼠疫流行暂时封闭,运粮渠道堵塞,北方粮价开始上涨。由中央财委统一部署,调集重要物资于主要抛售地点;紧缩通货,统一现金管理,地方经费的一部分推迟半月或 20 天发放,继续推广折实储蓄,并着重打击煽动暴涨、牟取暴利的奸商。北京市逮捕了 16 家粮店的投机商,审理“粮老虎”王振廷;上海也逮捕了庆丰等 7 家粮店的投机商。在各重要城市物资准备充足后,中央财委指示,于 11 月 25 日在各大城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抛售。投机商人错估形势,不惜高利拆借巨款抢购。国营公司实力雄厚,开始抛售后便逐步降价,投机商人叫苦连天,急于抛售积存货物还债,但越抛售物价则越下跌,几天之间,投机奸商折光了老本,又要偿付高息,反倒债台高筑。投机资本一蹶不振。

稳定物价,实质上是一场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投机资本家手中夺取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主要商品的货源;另一方面,选择有利时机和市场,集中全国经济力量,敞开抛售,给投机资本以歼灭性打击。同时,在市场有利时,不失时机购进,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回合的较量。通过这种市场吞吐政策,逐步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实力,进而取得主要商品市场的领导权。到 1950 年 3 月,终结了旧中国延续 12 年之久的通货膨胀。

为确保物价稳定,改革以前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分散管理

的现状,根绝通货膨胀,彻底扭转市场无政府状态,必须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保证国家所掌握的现金和物资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财政收支、信贷进出、物资供求的三大平衡。建国初仍旧沿用着战争年代形成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体制,便不利于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不利于战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资本主义投机活动,不利于尽快恢复经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审时度势,采取强有力措施,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研究解决财经困难的措施。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支,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共有10方面的内容。统一财政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为:(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收外,所有农业税(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等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仓库物资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统一调度,合理使用,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一切军政机关和国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为争取财政收支平衡,节约支出,政务院决定成立以薄一波、聂荣臻为正副主任的全国编制委员会,整编全国各级机构,紧缩军政公教人员的编制和开支。

国务院还颁布了《关于统一管理 1950 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心》、《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央金库条例》等文件，规定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具体方法。

全国各地认真执行中央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指示，立即整编机关、部队，紧缩财政开支，清仓查库，加强税收，减少盲目投资。华北、华东、中南区各大城市相继建立了贸易金库及专区县支库。重庆、兰州市政府机关，都抽出 20% 以上干部充实下层机构或转入生产。

由于统一了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现金管理和转账制度的实施，原来留在机关和国营企业中的现金和流通领域中的大批货币，源源流向国家银行，缩减了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国家能够运用和控制的资金，从根本上扭转了通货膨胀的局面。从 1950 年 3 月开始，物价呈现下跌趋势，6 月以后，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物价下跌趋势停止。基本上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并且建立了人民币的信誉，扭转建国初期极其险恶的经济形势，取得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第一个巨大的胜利。

在统一财政经济工作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中央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经济体制，一切由中央统下来。到 1951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比中央“统收统支”增加了一些灵活性。这种经济模式，是在模仿苏联、保留战争年代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模式。其特征是：由国家统一管理指挥调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逐步使国民经济纳入国家指令性计

划的轨道。这种经济模式对整顿旧中国混乱不堪的经济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五”计划后期,统得过多过死的缺点较多地显露出来,需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改革。

经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

经过 3 年的努力,中国人民战胜了严重困难,终于在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经济大改组的情况下,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各项生产在恢复中有所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解放后,人民政府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在国营工矿企业依靠工人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通过民主改革,彻底打碎官僚资本企业遗留下来的封建性的压迫和奴役工人的旧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改善职员和工人的关系,改革企业领导机构,建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通过生产改革和工资改革,整顿与废除旧的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建立起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并且初步整顿了旧的工资制度,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调整工资,开始推行劳动保险制度,提高职工福利,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这样,在国营企业内部初步完善了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普遍地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如东北工人的劳动生产率,1951

年即已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的 42%，1952 年又提高了 20%。

与此同时，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国家开始根据整个社会利益，有计划地指导各个国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财政支出可能的范围内，国家挤出一定资金，有重点地进行企业的改造扩建，并新建一些急需项目，使国营工业进一步扩大。1952 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已有 9500 多个，职员 510 多万人，资产总值由 1949 年的 68.9 亿元增长到 108.4 亿元。

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后，市场物价稳定下来，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昔日的虚假繁荣随之消形匿迹，投机资本将囤货吐到市场，一时出现部分物资供过于求，售路呆滞。一些过去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工商业，如迷信品、奢侈品工商业，失去了市场；一些机构臃肿，经营不善的企业亦减产、停业；同一行业内盲目竞争，造成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旧的经济秩序已被打得粉碎，新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产销脱节，不少工业品价格倒挂，许多私营企业陷于存货过多，负债累累和停工减产境地，部分私营银行和私营商业停止倒闭。上海、北京、天津等 10 个大中城市，1950 年第二季度开业的私营工商业 5903 家，歇业的 12750 家，歇业户超过开业户 6847 家。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被暂时困难所吓倒，他们消极经营，乃至解雇职工，关厂歇店。有些人把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归咎于人民政府的经济改组，主张用发展资本主义寻求出路。有的提出所谓“不要与民争利”，要求国营经济不要发展。在党内则有少数人产生“左”的倾向，认为既然工人阶级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

济,就不妨趁私营工商业困难之机,一举消灭资本主义。

人民政府认为过早消灭资本主义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1950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调整工商业的任务,指出:今后几个月内财经领导机构的重点,应放在调整公私企业之间及公私企业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5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7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研究物价稳定后出现的市场萧条等问题的原因及解放办法,制定调整工商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整私营工商业的工作。

(一)调整公私关系。这是调整的重点,即调整国营工商业与私营工商业的关系和负担。国家通过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使它们能够维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并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对私营商业,国家通过经销、代销等方式,使其有利可图,国营商业在扩大批发阵地的同时,减少零售商店的数量,把大量零售业务交给私营商店及小商小贩,除主要的大宗农产品和外销农副产品外,其余农产品则组织合作社和私商收购、贩运;调整税负,国家适当降低税率,以利休养生息,将原1136种货物税减为358种。调整公私关系的实质是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有利于国计民生得到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指导其转业转产。(二)调整劳资关系。坚持劳资两利原则,处理好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既保障工人的民主权利,又要资本家获得合理利润。从有利发展生产出发,用协商方式解决劳资问题,然后过渡到更固定的合同关系。调整劳资关系实质上是确立工人阶级在私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三)调整产销关系。主要在生产领域

调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方向；在流通领域通过召开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以销定产，减少生产的盲目性，逐步走上计划产销的轨道。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使濒临歇业、倒闭的许多私人工商业得以复苏。195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天津等10大城市开业的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调整后的1951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引导农民互助合作，促进了农业的恢复。

土地改革完成地区，农业互助合作初步开展起来。鉴于土改后广大农村出现的发展个体经济与发展互助合作两个积极性，人民政府积极而又谨慎地经过农业互助组、农业产互助合作社等形式，把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引导到互助合作的轨道上来。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发布各级党委执行。决议草案指出，共产党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又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鼓励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采取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提出实现农业合作化互相衔接稳步前进的三个步骤，即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

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的错误。

交通运输的恢复与发展。全国刚解放时，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的铁路。广大铁路工人克服种种困难，仅1949年，修复铁路8300多公里，桥梁2715座；到1950年底，中国原有铁路基本上畅通；1952年，新修来睦、成渝、天兰三条铁路线，总长度1277公里。是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接近解放前的最高年份，还加固了京汉铁路黄河大桥，铁路运输货物周转量逐年提高。公路通车里程由解放初的80768公里，1952年发展到126675公里。内河航运里程增加。民用航空解放初是空白，到1951年新辟航线13123公里。交通运输的恢复，沟通了城乡交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国内贸易的恢复。人民政府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国内市场渐趋稳定，195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70.6亿元，1952年达到276.8亿元，开始出现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局面。对外贸易于1950年实现了出超，贸易额构成发生了变化，生产资料的进口比重增大，消费资料进口缩减。人民政府外贸部门，在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下，采用以货易货的对外贸易方式，与众多国家的工商业家达成许多交易。

人民物质生活的初步改善。经过三年来的经济恢复，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农民收入比土地改革前一般增加30%左右，人均消费水平大约提高20%。工人工资总数不断提高，就业人数增加，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工矿部门于1951年开始试行。同年在陕北老根据地及其他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试行公费医疗预防制，并逐步扩大范围。1952年7月起，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

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总人数达 400 万。此外，职工的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新建住宅面积 1950 年为 251 万平方米，1951 年为 460 万平方米，1952 年为 751 万平方米。

短短 3 年中间，中国经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得“创造奇迹”的成就，主要原因是：

（一）稳妥地有步骤地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在安定的环境中搞生产。旧中国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必须打破，才能解放生产力。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变革生产关系中，力求稳妥。首先根据国际形势，采取区别对待，用多种形式接管了外资企业，没收官僚资本；接着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在条件成熟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少数民族等条件不成熟地区，留待以后进行。由于在变革生产关系中实行积极稳妥、减少社会震动的方式，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因生产关系急剧变革而下降，反而出现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的好局面。

（二）运用“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坚持建立经济上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土匪特务、地主阶级以及文化宗教界反动势力，都反对人民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也因经济大改组而惶惶不可终日，流露出不满情绪。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四面出击，而是团结一切力量，集中全力打击敌对势力。土地改革中，不动富农，团结农村中 90% 的人，重点孤立、打击地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协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各

种经济成分的关系,从而带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三)始终把恢复经济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恢复经济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接管城市、调整工商业中,始终以恢复生产为出发点;在完成土改的农村重点恢复农业生产;抗美援朝中坚持“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各个政治运动均服务于经济恢复。这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各项工作能否推开,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为防止党员干部蜕化变质,开展了“三反”、整风整党运动,对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不论职务多高,以往有多大功劳,都严厉惩处。对不合格的党员坚决清除或劝退。人民政府还明令禁止军队、机关办企业,严禁党政干部经商,杜绝以权谋私。人民政府吏治清明,廉洁奉公,联系群众,讲求效率,保证了各项经济活动顺利进行。

(五)经济理论上的充分准备是恢复经济的重要前提。建国前夕,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趋成熟,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制定了恢复发展经济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使恢复经济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

到1952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战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残余的破坏,医治好战争创伤,完成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为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和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节 整党与思想改造运动

一、整党运动的开始

由于 1950 年的整风运动时间较短,重点是解决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因此,近几年来由于党的组织的大发展所带来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改善党的组织状况,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共中央在 1951 年 2 月中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决定,对党的基层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决议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加以整理。为此,中央决定以 3 年时间进行整党。

为了贯彻和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整党的决议,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解决整顿党的基层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490人。大会主席团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21人组成。刘少奇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指出，必须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并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要求“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整党和建党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整党《决议》指出，我们的党现约有25万个基层组织——支部和580万党员。这样广大群众性的、全国性的党，就它的领导成分和骨干来说，无疑地是纯洁的、有战斗力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在过去，因为我们的党长期处于被敌分割的农村和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对于党员缺乏着充分的系统的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即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同时，在全国胜利后，一方面，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小部分人思想上发生堕落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在发展党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于又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为党员；并有一些坏分子钻进了党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洁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克服，党将很难顺利地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更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党必须认真地、谨慎地“对于我们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从1951年下半年起，全党范围的整党运动就开始了。

这次整党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地对共产党员进行一次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教育，着重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做一个共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以便继续提高那些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改造那些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并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从而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政治质量和战斗力。整党工作的重点，是放在老解放区和那些发展了党的组织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接收党员最多的地区。这次整党，由于党员数量众多，再加上全国各地解放时间有先后和工作水平不一致，所以，全国范围的整党，要用三年时间来完成。

整党运动全面开展之前，各级党组织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是训练整党的工作干部根据党中央确定的经过考验、对党完全忠实、作风正派、又有整党建党知识和能力的条件，从现有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方面人员中，挑选了10万名整党工作干部，进行训练，然后派遣他们到党的基层组织去进行整党工作。二是进行整党的典型试验，以便取得经验后，全面开展整党。县、市以上党委首先选择几个支部直接掌握，试行整党。通过试点，既取得了正面经验，也发现了偏差，如有些地方处分党员面太宽等等，有利于普遍开展整党时加以克服。

这次整党是通过每一个基层党支部来进行的。各支部的整党工作，一般要经过学习、登记、审查和组织处理4个阶段。

(1)学习阶段。组织党员学习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以及中共中央整党文件，听取专题报告，联系思想和工作的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每一个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2)登记阶段。通过学习,每个党员在提高知识的基础上,都要认真考虑是否能按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继续做一个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凡愿意继续作党员者,则自动进行登记,并向党组织详细说明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和思想作风。凡没有决心按党员条件来提高自己和改造自己或其它原因而自愿退党的,则不登记。

(3)审查阶段。党员登记以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党员进行审查和鉴定。支部大会对每个党员的历史和政治经历审查清楚,以及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的优缺点,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由支部大会通过。

(4)组织处理阶段。根据对党员的审查和鉴定,发动党员进行讨论,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思想检查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把党员划分为四部分,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报上级党委批准。对已具备条件的党员,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不断提高和改造自己;对于不完全具备条件,或有较严重毛病,但愿意提高和改造的党员,则给予帮助,提高觉悟,改正缺点和错误,使其达到标准;对不够条件的消极分子,经过教育仍确实不够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一律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9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市22所高等院校教师3000余人开展了以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学习方式是听报告、读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号召教师们努力改造自己,成为文化战线的革命战士。10月,京津高等学校学习委员会成立。10月25日,教育部介绍了京津教师的学习经验。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规定了运动的方针、办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地学校很快掀起学习改造运动。以后,这一运动又扩展到文艺界、民主党派中,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通过这个学习运动,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队伍。但由于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这一运动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

第二节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毛泽东阐述党在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是一场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革命。

二、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政务院各部门,各中央局、

分局及部省、市负责人。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大会总结报告。会议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1)进一步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3)总结了4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揭发和批判了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的某些错误。毛泽东在8月12日会议结束前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党的总路线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会议期间,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党中央及时纠正了在他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次会议取得

了预期的效果。

三、毛泽东就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 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进行了谈话。他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但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为此,需要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有计划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使之尽可能快些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国计民生服务,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对地主不同,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为此,一定要出于资本家自愿,不能强迫。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系统地说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方法,时间和利润分配等一系列具体政策,有效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者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四、实行粮棉统购统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国

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出现了一个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使亿万农民从土地的奴隶变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空前发挥,全国农村经济迅速恢复,粮食连年丰收。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088亿斤,比1949年增加926亿斤,增长42.8%,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贸易由解放前的大量进口,转变为停止进口并可少量出口,同时保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底子薄弱,人口众多,1952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只有500多市斤,基数是很低的。城市和工业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使粮食需要量不断增加。1953年夏季以后,全国粮食形势已变成国家“收进的少,销售的多”,该年7、8、9三个月,粮食销售超过计划19亿斤。加上1953年东北等一些主要粮食产区遇到水灾等自然灾害,仅东北地区减产粮食30亿斤,使国家粮食收购量减少24亿斤。粮食的自由交易,粮食投机商的囤积居奇,使农村中的余粮户贮存观望,等待高价,不愿迅速出售粮食。这些情况影响国家粮食收购计划的完成。据陈云在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上估计,从当时的情况看,不但粮食的收购计划将完不成,而且粮食销售量会突破1953年财经会议上定的480亿斤的计划,将达到600亿斤,这对全国粮食市场会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造成粮食市场的混乱,影响物价的稳定。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经政务院会议通过,于同年11月23日命令公布实施。这个《决议》所提出的主要

措施是：(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即实行适量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三)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四)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粮食供求紧张的矛盾，保证了物价的稳定，并且有利于粮食的节约。同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财委关于棉布计划供应、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据此，同年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通过这些具体的决定和命令，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以及糖料、烤烟、生猪、桐油、重要木材、茶叶等其他农产品实行了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供应。国家对粮食及其他重要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我国建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基本商品匮乏的情况下，起了有效保障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保证广大人民基本生活资料需要和稳定物价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上来，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来说，这个政策是必要的。此后，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它对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统购统销政策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它限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经营自主权，农民只能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从事生

产,农业产品的种类不能随着市场发展的需要而变化,影响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商品流通受到阻碍,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得不到调整。因此,当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紧张状况有了缓和之后,统购统销政策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施

一、宪法起草 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1954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在听取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陈伯达对宪法草案初稿所作的说明后,决定将这个宪法草案初稿分发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武装部队的领导机关进行讨论,广泛征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要求在最近2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和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为草案批准公布。上述各单位按会议的要求,组织了各方面人士进

行讨论,提出了近 5000 条修改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讨论,认为许多意见是应采用的。经反复修改,于 6 月 11 日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二、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

1954 年 9 月 15 日至 28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宪法草案起草的根据、宪法草案的性质和基本内容作了说明。他说,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 100 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我国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宪法草案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道路,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原则和各项制度。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建国 5 年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了各项工作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出今后各项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他强调说,我

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报告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报告号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用全力实现宪法所规定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等各项组织法,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 13 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等 10 人为副总理。会议决定设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任命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

三、少数民族区域的民主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祖国的大家庭里,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蒙、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等 50 多个兄弟民族。他们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6% 左右,大多居住在约占全国面积 60% 的边远地区。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贯彻《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认真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1950年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四个访问团,到西南、西北、中南、东华、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慰问。各少数民族也组织了许多参观团参观首都和祖国各地,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沟通民族间的联系,融洽民族感情。政务院发出指示,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姓名、匾联、碑碣等,都必须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

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创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了8个分院,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予以优先入学的照顾。1952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干部达10万人。人民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工作,恢复农牧业生产,发展文教、卫生事业。

为进一步实现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中共中央提出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在此原则下,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机关,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意愿,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施行,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同时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及各个民族内部的团结合作,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观念,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充分发挥了各少数民族参加祖国建设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实行民主

改革。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建国初,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极为复杂,云南边境的独龙、布朗、佤、怒、景颇、傈僳、崩龙等族,内蒙古的鄂温克、鄂伦春等族,黑龙江的赫哲族等,仍保持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刀耕火种”、“刻木为凭”,经济文化带有浓厚的原始色彩;川滇交界大、小凉山的彝族,处于奴隶社会;藏族、傣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持着封建农奴制;满、回、壮、维吾尔、朝鲜、布依等 30 多个民族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共约 3000 万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保持着封建制度。鉴于这些地区社会发展落后、民族关系复杂、革命力量尚待发展,以及各民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不同等特点,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1950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少数民族问题必须遇事向上级报告和请示”,不许下级擅自处理;“如遇紧急情况发生……不得采取进攻的步骤”;“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在回族的伊斯兰教民学校中及藏族的喇嘛教民学校中暂时亦不要教社会发展史中猴子变人的课程,以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在具体工作中,通过座谈会、联谊会、团结会等各种形式,向各阶层人民反复说明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宗教问题,直接影响着民主改革。人民政府采取慎重进行、区别对待的方针,严格把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封建剥削制度和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加以区别,把宗教职

业者的正当宗教活动与他们对教徒群众的勒索、虐待等非法行为加以区别。既坚决废除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制度，镇压披着宗教外衣破坏民主改革的反动分子；又要坚持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文物，继续团结宗教界一切爱国守法人士，不干涉宗教职业者的正当宗教活动。保证了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解放社会生产力。牧业地区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牧工牧主两利，帮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不没收分配牧主的牲畜，实行“不分配牛羊”的政策。农业地区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实行土地改革。人民政府采取了适合民族特点，利于民族团结，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把地主、领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废除地主、领主的一切特权和剥削，但不没收他们的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留给他们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内蒙古、广西壮族等与汉族社会发展水平相同地区，采取与汉族同样方式，在同一时期进行土地改革。这些地区大多在 1953 年，小部分也在 1954 年完成了民主改革。新疆、西北地区回族及其他民族关系复杂又有特点的少数民族农业区，民主改革的时间较晚。西藏及甘肃、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云南傣族地区等，暂不进行民主改革。1952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妥善处理了 1952 年春拉萨示威事件，努力争取和平地逐步改革西藏政治经济。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有力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一、对个体农业、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夏,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显露出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有到来之势。在这时刻,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并把局部地区的农业合作化的先进形势,估计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形势,积极地主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春应发展到130万个,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及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采取所谓“右倾保守”的态度,已落在农民群众的后面,看不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在全国兴起。

但是,邓子恢主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速度与计划,仍按中共中央原批准的计划进行。原因是,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要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农业合作化不能脱离工业化发展太快;现有的65万人合作社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巩固,才能打好基础。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的条件较好,有条件较差,要全面地发展

合作社,必然使有些地区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干部的领导水平,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所以他认为,到1956年春,全国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速度已是相当快了。

这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速度的争论,到1955年夏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确实反映了党内对农村形势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针的不同估计和认识。邓子恢认为应当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巩固已有合作社的基础上按中央计划进行,而不是大发展。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完全不同。毛泽东为了支持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兴起和农业合作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也为了进一步阐明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理论与政策,于1955年7月31日,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成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兴起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他一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遇到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应采取的正确的原则、方针、步骤、方法,这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把局部地区的农业合作化的先进形势估计为全国即将到来的形势,把党内坚持稳步前进方针、采取边巩固边发展合作社的同导志批评为“右倾保守”倾向,是“小脚女人”。这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开始滋长“左”倾错误,强迫命令,大轰大嗡、包办代替等急躁情绪和做法日益严重。

毛泽东报告的一开头就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就要到来。这是全国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对于这样

的群众运动,我们的方针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迎接和支持这场伟大的运动的到来。为此,必须巩固和整顿已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认真做好建社前的准备工作,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要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强,显示出合作社的优越性。同时在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所谓的“小脚女人”,说他们东摇西摆地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走得太快,以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对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共产党的热忱拥护估计不足,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据他认为,第一,现有的 65 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巩固,并且还可以发展到 130 万个;第二,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应当爱惜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第三,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的准备工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第四,在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而是批评右倾保守,应当相信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五,应当正确地接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关系,不要以苏联的经验作依据批评我国的合作化运动;第六,只有发展合作化劳动,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第七,对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必须采取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由于毛泽东在报告中以大量的篇幅批评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因而在会上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同志、对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对浙江省坚决收缩合作社问题进行

了批判。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后，各地根据会议精神重新研究了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回忆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伐。《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公开发表，在全国干部和农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开始组织和选编《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前言和大量的编者按语，进一步论述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必然性、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只有发展合作化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中国必须先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实现机械化等问题，同时也进一步批判了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

他的这种做法在党内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到来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还不是中央全会，要使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阐述的思想成为全党的行动，还必须召开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后才能实现。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3人出席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各地委书记、党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388人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一是讨论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二是讨论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全会对上述两项内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作了口头发言。大会还印发了187人的发言稿。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为会议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开始。因为，会议期间讨论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批判了“坚决收缩”的方针，批判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也批判了党内许多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调子越批越高，迫使不少人作了自我批评。这不仅损害了党内的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直接否定了党内中央原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方针、步骤、方法。毛泽东把这场讨论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党总路线是不是不完全正确的大辩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说邓子恢犯右倾性质的错误，也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可见，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把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当作右倾错误批判，必然助长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以及其它工作上的“左”倾错误的产生和滋长。特别是对来自于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更有大的影响。会议还错误地认为，主张实行“坚决收缩”方针的同志是对农民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看不到农村中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看不到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不了解党如何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工农联盟，所以提出这种方针的同志在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也明显地表现了党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方针政策的变化。决议这样写道：现

在农村中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村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在全国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但是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对合作化运动作了悲观主义的估计,认为对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改变领导落在群众运动后头的局面。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同时在决议中改变了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原有规划,提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先进的地方,到1957年春以前,70%到80%的农户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季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在边疆地区实现合作化需要更多的时间。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全国各地农业合作社迅速发展,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有500多万农户加入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到1955年底,全国已有60%的农户即7000多万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草案中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合作化基础

较好的地区在 1957 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同时要求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达到草案中规定的计划指标。

1956 年春夏，全国农村兴起了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5 亿农民积极地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为创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奋斗。可以说，到 1956 年底，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走过了三大步：一、入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96%，全国农民基本上加入了合作社；二、基本上完成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87.8%；三、普遍地扩大了合作社的规模，将 20—30 户的初级社合并为 200—300 户的高级社。这就是说，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上实现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比较成功的。它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完成了 5 亿农民从私有制的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任务。而且，在合作化运动中不仅没有破坏农村生产力，使农业产量下降，相反，促进了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为以后农业的提高创造了条件。我国农业合作化在当时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

（一）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及时地领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制止农村经济两级分化，正确解决国家工业化与小农经济之间矛盾的唯一正确办法，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先实现合作化后机械化的经验；

（二）根据我国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采取互助组、初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和形式，逐步地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走上公有制的道路，这既能避免农村生产力的破坏，又能使农民愿意接受，顺利地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

（三）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贯彻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中共中央始终站在群众运动前头，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但是，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底的第三阶段中，由于指导工作中产生了“左”的急躁情绪，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简单划一的缺点。更为严重的是，在 1956 年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脱离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实行了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一劳动评工记分、统一分配等体制和办法，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下，实行平均主义。这对日后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严重地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明显地暴露出在农业合作化后期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济体制的弊端。

1955 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推动下，我国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实现了 1954 年 12 月 8 日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的 1955 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即摸清楚手工业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分别轻重缓急，按行业拟定供、产、销计划和手工业者的劳动计划，以便实现有准备、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整顿、提高和巩固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和

小组,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为进一步开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计划在1955年合作社社员发展到190万人,重点放在对农民、城市居民和出口方面有重要意义与大业工矛盾较少的手工业的各行业上,实现产值20亿元。

到1955年下半年,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手工业的改造已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后面。如河北省到1955年11月底,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已发展到3489个,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占手工业总人数的33%。从手工业来说,全国各省中河北省是发展较快的,但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相比,它又是发展较慢的。所以,毛泽东在1955年12月27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序言中提出,中国手工业的改造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

在这种形势下,1955年12月21日至28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共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学习了党的第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研究和分析了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情况,总结了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以来一年中手工业改造的经验,制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当时提出,在1956年和1957年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即把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然后再用几年时间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和小组全部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逐步实行对手工业的技术改造。

1956年初,由于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提前到来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兴起,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大大地加快了步伐。仅在1月至2月内,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数目比1955年底增加一半以上,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达到300万人。3月5日,国务院有关部门向中共中央作了手工业工作情况的汇报。在汇报时,毛泽东认为,1955年底以前手工业者只组织了200万人,速度慢了一点;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到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全部完成合作化是很好的。同时,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要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要保护民间艺人。在改造中,国家要帮助手工业合作社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完成生产技术的改造,合作社在完成组织任务后应当主要解决技术改造的问题,应当迅速地发展生产。

3月16日至26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城市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研究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会议认为,应该按照有利于生产和有利于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结合行业的不同情况,有的是制造性的行业,有的是修理性的行业,分别采取集中和分散的形式组织生产。但是,有些地区不问具体条件,盲目地进行过大、过早的集中,造成生产下降,群众不便,这种情况应该坚决地进行纠正和防止。会议还研究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供产销问题、生产资料作价问题、保证特种工艺问题,并提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意见。

1956年3月4日,我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高潮。到4月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达450万人。到7月底,全国组织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小组共10.4363万个,参加的手工业者达470万人,基本上完成了手工业的合作化。

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一方面为扩大生产、提高技术、向机械化转变创造了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合作化速度过快,盲目地追求办大社,过早过急地实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划盈亏,因而使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减少,产量下降,影响了城乡居民的需要。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共中央于1956年7月批转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党组《关于当前手工业合作化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各省市的党委和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领导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和改造工作,必须根据社员的自愿、不影响社员经济收入和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为群众服务的原则,按照不同行业的特点,正确处理手工业的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问题。对手工业的生产和所需要的分配物资,应纳入地方计划,要允许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自己生产的产品可以进行自销,对其原料可以自购。对手工业者的工资,必须贯彻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和老师傅的工资不应低于原来的水平,要纠正合作化后工资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同时报告中还对手工业改造范围的划分、手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生产资料和股金处理、小业主入社、保护和提高特种工艺等问题也作了原则的规定。

为贯彻上述报告,8月10日至9月1日,中华全国手工

业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召开了全国手工业改造座谈会。各省市手工业管理局局长、手工业生产联社主任、中央有关部门代表 11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汇报了各地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研究了存在的问题,一致认为必须根据上述报告解决各地存在的问题。会议强调,发展生产、适应社会需要、增加社员收入,是办好手工业合作社的标志。为进一步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各省、市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对手工业的生产和改造工作必须加强领导,统一规划,使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改造健康地发展。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对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进行分类排队,首先要肯定集中生产和统一核算没有问题的合作社;对难以决定的暂时不要进行集中生产和统一核算;对集中生产和统一核算明显地错了的必须有计划地实行单独经营,分别核算。

到 1956 年底,全国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有 509 万人,保留个体经营的只有 43 万人。参加合作社的占全部从业人员的 92%。全国组织了 10 万个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其中 6.9 万个是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占 70%。可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 1956 年也跨入了高级合作社的阶段。这个发展速度也是十分快的。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 1955 年 10 月,全国由国家加工

订货、统购包销和收购的产品已占全部私营工业产品产值的90%以上,有不少工厂已实行了公私合营,并且已有个别企业的合营发展到合并改组、全行业合营。如北京的面粉等4个行业,天津的造纸等4个行业,上海的纺织等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商业中,私营批发商业基本上都已合营,零售商业中也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说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也即将兴起一个新的高潮。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召开了座谈会。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南汉宸、章乃器、许涤新、孟用潜、盛丕华、荣毅仁、胡子昂、黄长水、巩天民、陈经畲以及全体委员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方面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等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李维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政协副主席何香凝、章伯钧,以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各企业负责人等500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私营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前途,工商业者掌握自己的命运。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毛泽东再一次阐述了党的关于逐步地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对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实行赎买的政策,对培养工商界进步核心分子、统一战线的作用、肃清反革命等问题也发表了重要意见。在会上,周恩来、陈云、陈叔通、李烛尘、荣

毅仁、黄长水、胡子昂、巩天民等也作了讲话。周恩来详细地分析了当前国内形势，向资本家指明了出路。这次会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

会后，即11月1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集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委员举行座谈。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对统筹安排、全行业公私合营、设立专业公司、定息、经济改组和全面规划等方针政策问题作了说明。同日，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与会者纷纷表示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分析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资本主义企业发展道路，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每一个工商业者要坚定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指出，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采取突然的剥夺的办法，而是采取逐步的和平的转变的方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反复的协商和宣传教育，积极地创造条件，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草案》。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各省市按照决议草案的精神，积极领导了本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决议草案经过几个

月的实践,到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修改,并确定为正式决议。实践证明,决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而且从理论上阐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特点等基本问题。这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兴起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总结了建国以来工商业改造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等组织的影响下,工商界已经出现了一批爱国的进步分子,形成了工商界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核心力量。为促进工商业的改造,社论指出,党和政府应当做好如下工作:一、应该切实地统一党内和工人阶级的认识;二、应该切实地加强对于工商界的教育,消除他们的怀疑顾虑;三、加强培养工商界进步核心分子的工作;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作出全面规划。

上述会议后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有了较快的发展。11月21日,上海私营绒线、棉布两个行业的零售商店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庆市的棉胶业和电池业也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1月23日,上海永安公司实行公私合营。12月8日,北京市48家织袜工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2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进一步开展对城市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社论。据全国32个大中城市统计,已有半数的私营商业分别

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是,经销、代销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2月17日至24日,上海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报告中指出,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主要标志是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的改造和按行业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新形势。上海工商界人士认识有了提高,情绪大为振奋,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地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商业者日益增多。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情绪更为高涨,用实际行动创造条件,迎接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

1956年1月,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中兴起。1月1日,北京市的资本家首先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10月,北京市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和42个私营商业行业1.3973万户座商店,共1.7963万户全部批准实行公私合营。从此,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全部走上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道路。为庆贺第一个实现全市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北京市群众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不断。私营企业的职工和资本家欢欣鼓舞,上街游行,全市各厂店,都张灯结彩。15日,北京市各界20万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彭真市长作了讲话。他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北京市实现全市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伟大胜利,对全国各大城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7日,

南京、南昌完成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8日，合肥、天津、武汉等也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日，长沙、杭州、太原、济南、兰州、福州等城市也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20日，上海市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批准了全市尚未合营的205个行业10.6万户私营工商业户公私合营申请。同日，广州市人民委员会也批准了133个工业行业的4000多家工厂和商业、服务业、饮食业、交通业等132个行业的1.6万户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21日，上海50万人举行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22日，天津市90万人举行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到1956年1月底，全国的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已基本完成。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对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说，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所以能够这样踊跃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迅速发展，国家所采取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案，以及向他们进行的思想教育，这一切，都是帮助他们自觉地接受改造的必要因素。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有不少资本家表现了很高的爱国热情。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说，为了迎接公私合营，有不少工商业者自动地负责筹集了现款，给企业还清了对外欠帐，交清了税款和“五反”的退补款，也有许多工商业者对企业增加投资，表示他们接受改造的信心。为了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不但大户带小户，而且不少资力有余的

厂店自动地帮助困难的企业户，调剂资金，代还债款，共同搞好合并改组工作。特别是工商界的核心分子，他们积极带头，努力工作，是改造高潮中的骨干力量，也是促使提早实现公私合营的重要因素。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种创造。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适合民心。但要使这种创造真正地巩固下来，在高潮以后还要做许多政策性的工作。主要是三件工作：一、清产核资；二、定息；三、人事安排。为解决这些问题。1956年2月8日，国务院召开第2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在这些决定中规定，私营工商业在批准公私合营以后，一般在6个月左右时间内，仍应按照原有的生产经营制度或习惯进行生产经营，一般仍由原企业主继续负责，企业原有人员担负的职务一般也不要变动，对大小商店可以批准进行公私合营，但仍保持目前的代购、代销、经销和自营的形式，对摊贩和肩挑小贩如来不及组织，可暂缓进行。

关于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到1956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副总理作了《关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讲话。他说，到目前为止，除少数边疆地区以外，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实行了公私合营。用和平的方法使资本家兴高彩烈地将自己的企业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改

变,这是史无前例的。关于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可以不分工商,不分企业的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仍可以超过五厘,核实资产在 2000 元以下的私方,本人在生产期间工资及医疗费用,按本企业职工的规定处理。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定息办法的若干指示,规定各地一定要在 7 月或 8 月发息一次,把上半年的定息发出来。7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安排原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候的私方在职人员的指示,对安排私营企业私方人员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指示。7 月 9 日,国务院四、五、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座谈会,出席者有 310 人,陈云、李先念等都参加了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7 月 20 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指出,制止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中增资的现象,即在今年年初各地私营工商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高潮期间,不少私营工商业者主动增加投资,应当一律退还。对清产核资工作,各地虽按照 4 月 28 日国务院关于公私合营的清产核资进行复查的指示进行过复查,采取资本家自估、自报、同行业互评,但一般有偏低现象;对企业进行清理估价,应该实事求是,公平合理,需要调整的应加以调整。

到 1956 年 7 月底,基本上完成了公私合营高潮后所要执行和解决的政策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五节 思想 文化建设的发展

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 1951 年 10 月 12 日出版了,于同日由全国各新华书店发行。第一卷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的 16 篇著作,(1952 年,将《矛盾论》补入第一卷,为 17 篇)其中有 9 篇是过去出版的几种选集中没有编入的。1952 年 4 月 10 日和 1953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又相继出版发行。第二卷是毛泽东从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至 1941 年 5 月打退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的著作,共计 40 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是毛泽东从 1941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的著作,共计 31 篇。在《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出版发行的时候,《人民日报》分别登载了《毛泽东选集》的内容介绍,发表了一些领导同志的文章,以指导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宣传。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大事件,《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

括,是全党和全国从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奋斗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我们党的教育宣传工作和理论科学工作的重大事件,也标志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的第一天,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门前早已等待着许多购买选集的群众。各地党组织通过报刊的社论、评论和电台的广播等各种形式号召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求他们从精神实质上去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密切联系实际,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这样,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当时,《学习》、《新建设》、《中国青年》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介绍毛泽东著作内容和学习毛泽东著作心得体会的文章,很多文章都是密切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探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它大大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发展。

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在讨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他指出：“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而“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中央现有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陆定一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

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他指出:“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指出:“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他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批评工作来说,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现在的批评,有的令人害怕,应当纠正;对被批评的人来说,别人批评得对,应该虚心接受。他强调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的革命胜利是不能设想的,我国的各种建设,包括科学和文化的建设在内,要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迅速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对这个方针的系统阐述,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泼起来了。学术文化的各部门都比过去表现得活跃,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当然,在兴旺、活跃和自由讨论风气浓厚的同时,有某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术文化

领域内表现出来，这也不足为奇。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夸大这个方针提出后出现的消极现象的情况，又一次指出：“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1月27日，他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作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把《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批交《人民日报》转载，并给另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他在代《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语

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指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1961年、1962年，党中央先后批发了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纠正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错误，并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使情况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1964年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的发展，使这个方针又受到了干扰和损坏。“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更是受到极严重的破坏。1975年，毛泽东也曾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强调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要逐步扩大文艺节目，逐步活跃起来。但是，调整文艺政策的工作很快又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认真总结了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经验和教训，坚决清算了1957年以来在这方面的“左”的错误，更加自觉地、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第四章 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的开始

一、毛泽东作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年初中共中央领导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情况和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听取中央工业、农业、财政等34个部门工作汇报和中央政治局又进行多次讨论后形成的。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其主要内容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

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人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毛泽东说,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

107人，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有59个国家的共产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应邀派代表参加大会。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也应邀列席了大会。

毛泽东在8月30日的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讲话说明了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号召全党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9月15日，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词》。指出：“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他还说：“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他勉励全党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

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在大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 113 名代表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各兄弟党代表团在会上致了祝词。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推举代表向大会致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也向大会致词。

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年—1962 年）的建议》，大会选出 97 位中央委员和 73 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9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党的总书记。选举出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 17 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已经消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时候召开的。在这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作出新的分析和规定；中共八大召开时，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即将提前完成，八大也需要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方针和

任务；中共八大召开时，党的状况同中共七大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员数量比七大时增长了 8 倍，特别是党已处于执政的地位，执政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这就需要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方针；此外，还必须指出，中共八大召开时，正值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过半年之后，苏共二十大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在上述背景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任务是：全面总结七大以来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大会对七大以来 11 年间党的工作、特别是对建国以来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富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充分肯定了七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八大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方案。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的情况下，八大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大会在总结我国建设的经验并吸取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鉴于苏联建设的经验,会议指出,计划提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但重工业的建设,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它必须有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会议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计划规定1962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一倍左右,其中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产值各占一半;钢产量要求由1957年计划产量的412万吨,增长到1962年的1050—1200万吨;同期内,农业总产值增长35%,其中粮食产量由1957年计划产量的3631亿斤增至5000亿斤。

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会议坚持了5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在农业和工业相互配合发展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个方面综合平衡,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周恩来在报告中总结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四条经验:第一,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重点建

设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第三,适当增加后备力量,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第四,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积累和消费的正确比例。

会议根据苏联及东欧国家建设的经验,并按照毛泽东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充分地注意了妥善地安排国民经济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求做到既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同时又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在会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就这个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验提出:“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础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会议十分注意了薄一波的这个建议。

会议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50%,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25—30%;农民的全部收入增长25—30%。在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方面,会议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增长一倍(从38万增至85万),中学生也有相应的增长;要特别加强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学习掌握当代科学先进成就,争取在12年内,在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部门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中共八大考虑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全民的和集体的所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搞活国民经济,便利群

众生活和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根据陈云的建议,作了一些富有远见的、关于建立和健全国民经济体制的正确规定。

(1)在工商业生产和经营方面,建立以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工商业为主体,附有一定的个体经济的体制。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国营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容许那些为社会所需要或者经营合理的小型工业企业独立经营,以适应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允许在城市居民区和广大农村保存适当的小商小贩,以活跃城市市场、沟通物资交流;允许城乡手工业者独立经营和分散经营,以丰富和发展社会的产品;在农村,在以农业合作社集体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应适当地给社员必要的自由支配劳动的时间,允许农民经营各种农副业,以改善农民生活,进一步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副业的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以小型为主,反对盲目并大社,以免造成经营管理和生产组织上的困难。

(2)在生产计划方面,以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作补充。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计划生产的;同时,有一大部分日用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以满足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的不断增长和花色品种不断变化革新的要求。并提供国际市场的需要,赚取必需的外汇。

(3)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附以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必要补充。在国营企业中,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外,可以对一部分产品实行自产自销。国营商业对这部分产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的选购办法,以促进企业主动地改善经营,提高产品质

量。

陈云提出的这些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意见和方案,突破了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为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他的这些意见受到了中共八大的重视,并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中共八大根据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

关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中共八大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建立和健全完备的法制就完全必要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充实和发展人民民主权利,并保证所有公民的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才能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和人民中的犯罪分子,也只应采用法律的手段,依法予以制裁。

董必武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已经制定了宪法和一批重要的法律、法令和其他法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他分析了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他提出,为了健全法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必须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注重法制思想教育,同时,对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

追究责任，绳之以法。

八大分析了党执政以后的状况，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路线和方针。

中共八大分析党组织的基本情况是：党已经成为执政的党，党的组织空前地壮大了，已有 1073 万人，并且分布于全国城乡和各个民族。在全部党员中农民党员占 69.1%，知识分子党员占 11.7%，工人党员占 14%。大多数党员都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就是占 60% 以上的 1949 年入党的新党员，基本上也都是过去几年群众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积极分子。因此，整个说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党的工作经验也更加丰富了，党的团结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党已经真正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但是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情况和新的考验。就是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因此，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针对这种情况，八大强调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主义等。

党的八大是开得成功的。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

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还着重研究和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毛泽东根据1956年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悉心研究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195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势力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的同时,着重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并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学会正确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

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的形势和党内思想动向,分析了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内部存在着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2月28日和3月1日上午,全体与会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3月1日下午,进行了大会讨论,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等16人。

毛泽东的讲话共12部分,当时的小标题是:(一)两类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十)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的关系问题;(十二)中国有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根本改变面貌。这个讲话,于1957年3、4、5月间曾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间传达,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和毛泽东在3月中央

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1957年5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同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毛泽东讲话的修改、补充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主要内容是:

(1)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是相适应的,它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

地得到调整 and 解决,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2)提出了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在全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阐述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出:我国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处理这类矛盾的原则是对敌人实行专政。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来说,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处理这些矛盾的原则不是采取专政的方法,而是实行民主集中制,采取民主的方法。但是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由也是有领导的自由,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强调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一点成为以后党的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

(3)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也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派别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及勤俭建国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从经济上妥善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总之，要造成毛泽东在此以后提出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事业而服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内容十分丰富，如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重要思想和观点。

四、1957 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过程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强调了整风的必要性。《指示》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之中。我们的党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的任务。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制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2)规定了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各级党委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

(3)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针、方法和步骤。《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因此，在方法上，应开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小组会，不开批评大会，斗争大会。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无

则加勉”的原则。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煞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允许保留不同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指示》还说: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再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对这次整风运动的步骤,《指示》指出,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4)提出了结合整风解决领导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等问题。《指示》提出,为了加强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一种永久性的制度。《指示》又指出,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进行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中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整风运动就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从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到8月以前,主要是在省、市以上的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各种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大多数是中肯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提高威信,加强团结,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开展对我党错误的批评,不要停顿和间断,以利我党整风。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批评和不正确的观点,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采取各种形式,继续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

见。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赵超构鼓吹鸣放的意见颇为赞赏。但一些对党关于要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不满意的人，主张要“迅雷烈风”，用“大民主”搞“大鸣大放”。很快在一些机关，特别是院校中，大字报铺天盖地，造成了紧张的动乱气氛。

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共开会13次，有70多位党外人士发了言。大部分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很好的，有的批评切中时弊。如张奚若批评党风滋长了骄傲情绪，表现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打倒）。陈叔通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等等。但座谈会期间，也有极少数人乘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攻击说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居多，要为反革命“平反”；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提出共产党

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等。在“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言论出来后，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听到汇报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时，毛泽东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李维汉于6月3日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指出：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这后一句，是毛泽东在审阅发言稿时加上的。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报刊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对于一些反共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应立即加以纠正。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25次会议上，有108人发了言。会上，有人断言，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决不

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等。李维汉在6月8日作总结发言指出：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并指出，有些论调，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说，党外人士的批评，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要根据揭露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要求各地注意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说，在整风运动已经展开的北京、上海等地，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各地党报应在继续登载右翼分子言论的同时，特别注意登载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应该集中力量首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到处点火。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要加紧进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的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

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说，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败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随后，9日—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社论。北京、上海、沈阳、鞍山等地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民进、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纷纷召开会议，批判右派言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示》指出，深入揭发右派的斗争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城市向区级和大工厂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和《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

通知》。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指出,《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过去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章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批判了《文汇报》的为自己辩护的一些论点。并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文汇报》开始检讨。7月2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承认这几个月中确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7月2日和3日,《文汇报》连续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初步检查》,对前一时期的“反动言论和报纸版面的编排”,作了自我批判。在这前后,《光明日报》就“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举行社务委员会进行讨论和检查;《新民报》就“报道民盟司法座谈会”、“歪曲浙江鸣放真象”等问题进行检查,北京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北京、天津、南京等地高校的教师,学生也发动反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斗争,至此,反右派斗争进入高

潮。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会,进一步部署运动。毛泽东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要求再用几个月的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运动“一方面正在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斗争扩大化也就严重地发展起来。

扩大化,主要是在数量上。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右派的矛盾性质和对待方针上,以及在右派数量的估计上,都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

在数量上,开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想到要抓后来那样多的右派。可是一旦搞起来了大运动、大斗争,头脑就越来越热。6月26日,中央估计:“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6月29日,中央根据北京34所高校和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极右派”约有400人左右的数字,估计这种人“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7月7日,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高校斗争的情况报告,提出:“发现‘鲨鱼’一点很重要,请各地都注意”。省委的报告认为:“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报告并说吉林地区高校教师中(讲师以上,有的是老讲师以上)右派分子占7%和15%不等。7月9日,中央又通报说:“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8月17日,中央转发北京市的报告,报告说到

8月7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其中高校有4230人。9月2日,中央统计“已发现党内右派分子3000余人”。11月10日,中央批转的一份报告中说,至10月14日统计,中央国家机关中“共有右派分子4837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5%。”1958年1月2日,中央批转北京市的报告说:“到1957年10月25日,全市已经由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共6927人。”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万。后来不久,又说有40余万人。1959年的中央文件说“约45万人”。但是,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到1980年共改正了54万余(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余下的5000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和尚须陆续甄别的。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党对国内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两个会议上。1957年7月1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文章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政治建设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文章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

久。”文章还说，目前反右派斗争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文章表示赞成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并提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文章还说，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10年至15年。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10年至15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8个至10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次会议之后，将原来在省市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和新闻出版界、科技界、文化界的反右派斗争，很快扩展到省市以下机关、工商界和中小学教师中。

在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结束前，毛泽东讲了话。讲话肯定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认为：“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

“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坚决予以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混淆为敌我矛盾，并不适当地采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法，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更为错误地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结论，认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使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开始失误了。

整风运动的初步总结

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会议对前阶段的整风、反右派斗争进行了总结，并对继续深入进行这场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同时也开展了整风。到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运动证明了：在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中，在各级党、政府、人民团体、企业单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党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但是在群众的大鸣大放中，也揭露了我们的工作上和作风上的大量缺点，有些是很严重的，不改正是危险的。同时，在党员和团员中也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另一部

分人则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运动也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会议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作用。会议指出，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毛泽东说今后“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此后，“四大”广泛运用于各种斗争之中，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会议还部署了整风运动的具体工作，把整风运动分成四个阶段。邓小平指出：整风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展开，不能轻率收兵，不能前紧后松，务必争取全胜。在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机关，运动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进行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自省、提高自己阶段。邓小平强调，运动全胜不只决定于反右派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总体上说，各单位的整风运动先后转到了整改阶段和自我提高阶段。在这段时期里，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关于整改方面的文件和通知，要求各单位贯彻执行。

1957年11月1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机关都必须要有一个人领导人亲自掌管机关的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因为这是一件关系到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党政工作的大事,必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整风运动,采取具体措施,切实改进这一工作。

1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用个人名字作为地名、街名和企业等名字的通知》。《通知》指出: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禁止用个人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称。去年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又重申了这个决定,并且指出这个决定在我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近来仍有个别地方提议用个人的名字作企业和学校的名称。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重申前议,请各地党委注意。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接收党员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全国已经有了1272万余党员,党员的分布也较为普遍。今后主要应该是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更加提高党员的质量,而不是大量增加党员的数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应该不断地接收优秀分子入党,但是,中央不再提出接收党员的规划数字,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按年度制定接收党员的具体计划,报告中央组织部备案。在接收党员的时候,各地必须首先注意从有觉悟的老工人和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接受党员。《指示》强调,为了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有计划地接收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特别是接受那些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高

级知识分子入党。关于接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早在195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过《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要求吸收一批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接着在7月20日《关于知识分子工作中的三项组织措施的指示》中，又强调要从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广播、文化机关、卫生机关等各界知识分子中，挑选一批左派分子和政治上好的科学家发展入党。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占我们为数千多万人的宏大干部队伍大多数的年轻干部，一般都没有经过或基本上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的锻炼。为了建立起一支有阶级觉悟和业务才能的、经得起风险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干部需要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这是加强党的建设也是整改的一项重大措施。

3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要求反掉一切浪费现象，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把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要在全中国进一步普遍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和整改告一段落后，应及时地转

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方法,应当是在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党组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采取人人检讨、人人过关的方法。整风第四阶段,以揭发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揭发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的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在揭发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应当联系到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加以揭发和批判,以便提高全党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

在党的整风运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接近结束时,1958年5月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对整风运动,尤其是第三第四阶段的运动情况作了总结。他说:“党所领导的按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而开展的整风运动,已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战线上收到了伟大的成效。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有系统地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使它适合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整风这条总纲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的高潮。”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整风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一切矛盾,正在开始成为全民的新风俗、新习惯。依靠群众的揭发、批判、倡

议、监督和实践,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快地解决了。厂矿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开始经常地用一定的时间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许多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农民合作种试验田,大批国家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下乡上山,或者到企业的基层单位劳动。劳动群众也直接参加了一部分管理工作。在上级和下级之间,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关系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许多工作人员的命令主义作风,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国家生活的广大范围内,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在日益发展起来。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按照中央4月2日指示中提出的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任务和方法,抓紧时间进行第四阶段的整风学习,务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除有特殊情况者外)在本年7月底以前胜利地结束这一次整风运动。

这样,到1958年7月,建国后党的第二次整风运动就此胜利结束。但是由于整风第四阶段的任务其实质是检查右倾保守思想,这对党内“左”倾思想和错误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社会主义 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1958年5月5—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代表九百七十七人,列席代表三百八十九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是:(1)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工作报告;(2)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谭震林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次修正草案说明报告,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报告后,大会讨论发言,有一百一十七人作了口头发言,一百四十五人作了书面发言。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并且增选了二十五位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第一,会议肯定了八大一次会议所确定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提出要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任务,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些都反映了全国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它的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第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修改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会议宣布:“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方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的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在这里,把知识分子当作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早在 1955 年冬季,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

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群众性的生产建设的高潮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1955年12月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把各项工作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速度问题。他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的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在1956年1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同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在执行上述方针和各项政策的情况下,1956年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工业生产增长28.3%、基本建设增长62%。5月,针对

当时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中片面追求多、快的急躁冒进倾向，党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党中央反对冒进的精神写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对急躁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全面阐述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强调“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确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坚持了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指出：“应该根据需要与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根据八大的这一方针，党对1957年国民经济进行了小调整，从而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认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路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同时他又认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为了发动新的“大跃进”，必须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必须批判反冒进。1957年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公开对“反冒进”提出批评，说1956年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领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又正式宣布了毛

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用十五年时间,在钢铁和其他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同时,11月13日和12月2日,《人民日报》还先后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论证了高速度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正确性。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判进一步升级,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从而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在报刊上对急躁冒进思想的宣传大大升级。宣传“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题的社论,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强调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5月,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将其写入《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以上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和不断批判反冒进中形成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体现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表述上。它包括紧密联系的两个思想:一是强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从表面上看,多快好省是互相制约的,全面性的,但在实际上是只注意多快,不要好省。我们把建设速度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

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力争高速度》更明确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这种高速度具体化就是要求在1958年一年内使钢产量翻一番,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一种把高速发展作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二是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国经济落后,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工业技术水平低,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难以很快改变的,但又要高速度发展经济,就只好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1958年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和“条件论”。浮夸风的泛滥又给这种唯意志论的宣传以事实上的根据,实践证明,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

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形成过程和它的中心内容来看,正如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此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错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条总路线思想的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过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对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农村人民公社的准备阶段。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经开始萌芽。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就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居多。但是小社会人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

1956年完成的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比苏联的集体农庄大1倍以上),可是在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甚至联县办水利的

情况。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又感到需要办大社。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意见。同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并为大社的意见》,提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根据这一精神,各地先后开展了把小社合并为大社的工作。例如,辽宁省早在1956年就办了399个千户以上的大社,1958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并社的指示精神,开始进行一次并大社的工作,经过合并,全省由9600个社并成1461个大社,平均每社两千户左右,其中万户以上的社9个,最大的1.8万户。并大社的同时,调整了乡的规模。全省由2854个乡合并成1226个乡,其中一乡一社的占83%,基本上是一乡一社。在并社的同时,各地农民积极兴修水利、深翻土地。还大办工业,大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福利事业,并广泛开展生产大协作。

对于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不同的名称。在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称。接着在7月16日《红旗》杂志第4期《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文中又指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

(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

8月初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一个人民公社时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他当时认为,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可以加快农业的发展,并为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发表后,全国许多地方相继仿效,一些地区出现了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2.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1958年8月中、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公社的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在并社过程中对原有财产、债务不要采取算细帐、找平补齐的办法,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将逐步“自然地变为公有”。所有这些规定,都大大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决议虽然指出:“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还是“按劳分配”,但又认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甚至公开

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的下达，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接着中央报刊相继发表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在短短一个月内，不断地有省、自治区宣布实现了农村公社化。据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全面实现了农村公社化的省、市和自治区已有河南、辽宁、广西、青海、河北、北京、陕西、山东、黑龙江、吉林和上海；农村公社化已达90%以上的有山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苏、浙江和甘肃；85%左右的有江西、安徽、湖北、福建和内蒙古；贵州和宁夏月底也可实现或基本实现农村公社化。新疆农业区参加公社的家户已达80%，10月初可实现公社化。云南省农村已建成200多个人民公社，10月内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这个以《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为题的报道说：“现在，全国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3397个，参加的农户达总农户的90.4%，平均每社4797户。”

由于人民公社的建议，大大超越了农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加上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

第一，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所谓大，一是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二是经营范围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所谓公，一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

有制的成分，二是把自留地、家庭副业收归社有，消灭了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三是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推广“吃饭不要钱”，试行把全部或大部分人民生活包下来的供给制。这样，在所有制关系上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分配上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实行按需分配，超越了当时经济的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两个平均主义。同时，政社合一的制度，从组织上带来了侵犯集体所有制，助长了“瞎指挥”、“强迫命令”等问题。

第二，在这个期间所有的“大办”，在农村都由人民公社执行，这又进一步助长了“共产风”的泛滥。当时，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等群众运动，基本上都是通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依靠大规模地甚至无偿地调用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这样过多的搞义务劳动，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第三，对农业估产过高，引起了粮食高征购，超过了农村提供商品粮的可能。加上当时为了筹集资金，大办工业，对银行放给农村的一些贷款，不问是否到期，一律强制收回。这样“一平、二调、三民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

第一次郑州会议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后的三个月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及地方负责人相继到农村调查研究，察觉

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混淆两个过渡和平均主义等“左”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初，先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先后提出了划清两个过渡的界限，反对剥夺农民和纠正两个平均主义错误的正确思想。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着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多次讲话，主要明确了：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肯定说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两个过渡都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这是错误的。二、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在会上批驳了陈伯达等人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求消灭，而要大大发展。三、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的方针。毛泽东在论述

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提法。会议还研究了生产建设问题，强调工作要抓主要矛盾，要以钢为纲。毛泽东重申了他9月初最高国务会议上曾经提出的关于“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的意见。他说，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

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恩、列、斯对于商品和价值法则等经济理论问题的观点，以纠正一些错误认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11月9日）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说：“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他强调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亲自和与会同志一起，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这次郑州会议虽然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不切

实际的估计,曾经继续提出过一些高指标,对公社化的错误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它毕竟是我们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纠正错误的开端。

第二次郑州会议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按照中央的决议精神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公社内部管理规模偏大和平均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社员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与上面搞反瞒产的矛盾。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于1959年2月21日在同河南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负责干部座谈时,提出了反对平调和不赞成反瞒产的意见,并指出在积累上光搞国家和公社的积累不行,积累上真正的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与此同时,为了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公社体制和纠正“共产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到会中央委员20人。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指出了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以后说:“我们应当透过这些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回答问题。”

他说:“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

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有些地方叫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里指的是高级社——编者）。”“现在，我们的人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其中包括许多发放给农村还没有到期的贷款——编者），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矛盾，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他说：“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毛泽东又指出：“六中全会的决定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

他说,当我们批评下面的本位主义的时候(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首先应该检查和纠正自己的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这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

毛泽东强调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他说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他说,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批阅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在决议中提到批评本位主义的地方,写了一段批语:“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

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

毛泽东上述的分析和论述，触及了公社化错误的一些实质问题。由于毛泽东率先纠正我们党（包括毛泽东自己）前一段时期的一些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并且作了有理有据的说服工作，使党内许多同志开始从前一段一些“左”的思想框框中解脱出来。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形成并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记录》规定了14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的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规模相当于高级农业社的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

关于纠正“共产风”，毛泽东起先提出过去的旧账一般不算。3月30日，他在一个批示中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指出：旧账还是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会上还批评了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思想。

第二次郑州会议在纠正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上,比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又前进了一步,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导各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贯彻会议精神。会议的决定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欢迎。

三、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口号的提出

“大跃进”一词首先出自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1956 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毛泽东称赞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 64 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 15 年左右要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2 月 2 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这个对国外震动很大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区委书记、省辖市市委书记、企业或基层的党委书记等。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刘少奇作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即: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

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 20 年”的伟大时期，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 15 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高指标。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会议再次批判了 1956 年的反冒进，批判了所谓 1956 年至 1958 年生产战线上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在会上发言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他号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求干部扫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反对靠老资格吃饭，靠做大官吃饭，要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认为外行要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关于国内形势，他说：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不抓农民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反冒进的错误，原因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楚，忘记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关于阶级斗争，他赞成采用列宁的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不赞成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关于经济发展，他说如果 5 年达到 4000 万吨钢，可能 7 年赶上英国再加上 8 年就能赶上美国。他批评了一些不同意高指标的意见，认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

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并提出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北戴河会议

为了适应钢铁生产翻番和农村生产形势急剧变化的新情况，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兴起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将达到100斤左右。这要求工业战线迅速赶上去。因此，决定各省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对工业的领导。会议认为，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了钢铁生产的发展。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增加一倍而奋斗。会议于8月28日作出《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决定1959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机床、发电量、煤、棉等产量均有大幅度增长。基本建设投资将为500亿元。在此基础上，准备在1960年使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经过1958、1959、1960年的3年苦战，再加上此后两年，到1962年

完全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 15000 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 8000 万吨至 1 亿吨。即在“二五”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文件则说,到 1962 年,全国就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就能接近美国,在主要科学技术方面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会议认为,1959 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要求我国工业和农业继续用 1958 年的速度或者比 1958 年更高的速度前进。会议还作出其它关于计划和体制、农村、财贸、教育等方面的系列决议,共 37 个。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北戴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发展的新高峰,是 1958 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会前虽然对钢铁翻番和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已酝酿确定,但尚未形成全民运动,经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后,全党全民齐动员,一个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铸成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全面性的严重“左”倾错误。

“大跃进”运动的经过

关于“大跃进”的含义，周恩来在《关于调整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指出，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来看，应该说，工业每年增产 20% 以上就是跃进，增产 25% 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 30% 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 10% 以上就是跃进，增产 15% 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 20% 以上就是特大跃进。

1956 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 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的发动和发展有一个发展过程；

第一，从 1957 年 9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发动的准备阶段。1957 年 9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这实际上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重申了 1956 年党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错误地批判了 1956 年的反冒进，说它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批反冒进目的是为了发

动“大跃进”。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发动“大跃进”的会议。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部分省和自治区召开了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检查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的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指出，兴修农田水利，增加肥料，是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两项根本措施。中央号召今冬明春，集中全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决定》的公布是“大跃进”的起点。

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10月26日，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接着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中第一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大跃进”要达到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十五年时间赶超英国。这是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国今年有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万吨至1500万吨，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

1958年的1—3月份，党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过急的口号，

要求“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五年至十年内，使各省和自治区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当地的农业总产值。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第二，1958年5—8月，“大跃进”发动的初期。1958年5月5—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办地方工业高潮，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甚至要求有条件的省也应建立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共中央6月2日指示在十几天内就要把中央各部门绝大多数的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完毕。从6月初到6月15日止，中央工业部门就匆匆忙忙下放了880多个单位，中央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已有80%下放给地方管理。特别是像交通、邮电、航空、港口、电网等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而又不适宜地方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也都下放了。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大部分都由地方管理了。

另外，就是大刮浮夸风，各地虚报产量，报刊上也不断登载“高产卫星”的消息，如小麦亩产达7320斤，早稻亩产达到3.6万斤，中稻亩产达13万斤；并且公开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夸大主观意志的错误口号流行于全国。

第三,1958年9月到10月底,以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中心的“大跃进”高潮。1958年8月13—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国内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1958年农业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达1000斤。会议认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必须集中力量抓工业,要求全国省以上党委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的高指标,其中钢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9年达到8000—10000亿斤。北戴河会议的召开,成为“大跃进”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

北戴河会议后,一个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和实现全面“跃进”的中心任务。即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同时,交通、邮电、商业以至文教卫生事业为实现本部门的高指标,也都开展各自的“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动起来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

北戴河会议安排的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大大超过了实际可能,经过奋力工作,1958年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土铁达416万吨,占全年产量30.4%。绝大部分土钢土铁质量很差,难以加工使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浪费,许多矿产资源被破坏。

第四,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的经济调整。“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党中央和毛泽东有

所察觉,并从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武昌会议起,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2000万吨,生铁由4000万吨降为29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又进一步降低指标,钢由2000万吨降到1650万吨,后又降到1300万吨。基建投资由360亿元减为260—280亿元。同时,开始收回某些下放过头的经济管理权力,收回招收职工的权力,加强企业管理。

第五,1960年上半年的新跃进。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的“左”的错误,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由于在基本肯定“大跃进”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错误,所以庐山会议后期进行批判彭德怀等人 and “反右倾”以后,又中断了纠“左”的进程,1960年上半年又开始了新的跃进。表现为:1960年的钢产量定为1840万的高指标;指出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并且大搞全民公社,这些就构成了1960年上半年新跃进的主要特点。这样,又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发展到一个的新高峰。这次错误是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上的继续“跃进”,因而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更大。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表现为:形成了一大批生产能力,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大庆油田艰苦创业,使中国原油产量由1957年的146万吨,增加

到 520 万吨,原子尖端技术被突破等等。但是,它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十分严重,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使社会再生产陷入困难境地,由于浮夸风导致对农业形势判断失误,盲目认为中国农业已经能够充分满足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只顾高速度发展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忽视农业,造成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发生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由于轻率地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盲目追求脱离实际的钢产量高指标,造成工业内部、生产环节之间,以及工业和交通运输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调;“大跃进”造成社会总需求的膨胀,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严重失衡;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人民消费水平严重下降。上述情况表明,当时中国的社会再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正处在不断的恶化之中,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三年“大跃进”的结果是:重工业三年大跃进,两年大倒退;农业生产三年大减产;轻工业两年增长,三年下降。钢产量原计划 1962 年是 1200 万吨,经过“大跃进”,1962 年钢产量只有 667 万吨,到 1965 年达到 1223 万吨;粮食原计划 1962 年达到 5000 亿斤,结果 1962 年才达到 3200 亿斤,少了 1800 亿斤,1965 年才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浪费了八年的时间。

“二五”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只增长 0.6%,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3.8%(轻工业增长 1.1%,重工业 6.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 4.3%。这是建国以来所有五年计划中增长率最低的。不仅速度低,而且经济效益也最差。按每百元积累年平均新增国民收入计算,“一五”期间平均是 35 元,“二五”期间平均只有 1 元。从整个国民收入看,年平

均下降 3.1%。三年“大跃进”的教训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必然导致大起大落，欲速则不达。

第三节 庐山 会议与“反右倾”运动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16日，举行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从会议所讨论的主要内容来看，庐山会议又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从7月2—23日为庐山会议前期阶段，会议内容主要是，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继续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内容是正确的；从7月23日至8月16日为庐山会议后期阶段，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改变了会议的方向，使会议从纠正“左”转向“反右倾”斗争。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去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7月2日至8月2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

7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指

出,国内形势是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说,去年形势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在“大跃进”中出现了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盲目性减少了,形势将彻底好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虽然讲了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有几个并举,但实际上并没有兼顾。他指出,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他说,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了一条腿,抓了重工业,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商业。鉴于这些经验教训,他说,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毛泽东还肯定了陈云关于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要求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十九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于7月3—10日,按照大行政区划分为六个大组,围绕着毛泽东的讲话和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会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发了言。彭德怀在西北组先后作了七次发言(或插话)。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在对国内形势估计问题上,出现

了两种认识：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这是泼冷水，是右倾；另一部分同志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

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他认为，有人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它根本不会错，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15日结束。彭德怀担心会议结束后，还可能要犯过去的错误，于是在7月13日起草了一封信，14日晨送给毛泽东。彭德怀的信分甲乙两部分，他在肯定1958年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大炼钢铁运动，浪费了一部分资源，付出了一笔学费，是有失有得的。在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使党的威望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认为纠“左”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

彭德怀的信，体现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也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但是，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接着，会议便转入

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发言中出现了意见分歧,有许多人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者表示反对。7月19日,黄克诚、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教训的看法,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不同意有些人对这封信的非难。

在小组会上发言反对彭德怀意见的同志,认为他的信夸大了缺点,否定了成绩,不符合实际,有埋怨泄气情绪。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他说,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他说:有些同志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30公里,相当危险。他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判。并说,现在党内的右派在夹攻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家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由于对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由于毛泽东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极少数人的推波助澜,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对于这封信的评价上,形成一边倒的意见,集中批判彭德怀等的所谓右倾思想。

8月2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

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47 人，列席 15 人。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 1959 年经济计划指标。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7 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 9 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的讲话和接着印发的他的一系列批语，为全会错误地开展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基调。

8 月 3 日到 10 日，全会连续举行小组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会议除了围绕彭德怀 7 月 14 日的信和彭德怀等在政治局扩大会上的发言进行批判外，还要他们交代在庐山会议上彼此之间的交往和谈话，并且罗列他们几十年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缺点错误，逐条进行批判。毛泽东说历史上彭德怀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林彪恶毒攻击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

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错误一样，彭德怀在历史上有过某些过失，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况且，这些问题都早已得到正确解决。在庐山会议上又算这些历史旧账，

而且离开当时争论的问题的是非，实行所谓“老账新账一起算”。这样，既不能弄清是非，又必然伤害同志。

8月11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再次讲话。他把彭德怀等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他还说：彭德怀等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事实证明，彭德怀等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毛泽东对他们的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它对以后出现的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把“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8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以《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针对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的批评，指责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其实，彭德怀等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指出群众运动中的某些偏差，并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也不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相反这正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在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应该具有的正确态度。历史已经表明，群众运动并不是“天然合理”。把群众运动绝对化，拒绝对群众运动作具体分析，离开实践的标准判断是非，这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不许批评群众运动中的偏差，给批评者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这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是有害的。

8月16日，毛泽东又在一個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就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

伸到党内。这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提出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同时,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在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从而,把所谓“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

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再次调整了1959年的经济指标,钢产量调为1200万吨,煤产量调为3.35亿吨;粮食产量调为5500亿斤;棉花产量调为4620万担。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所谓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进而传达到党外。在“反右倾”的斗争中,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

倾”斗争,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严重困难,党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损失,部分地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破坏,主要地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的。

庐山会议后,为了贯彻执行“反右倾”斗争的精神,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1061人,另有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清查所谓“反党俱乐部”,清除其影响。会议的过程是:8月18日至21日,分14个小组分头传达和讨论中央庐山会议情况。22日起分组对彭德怀、黄克诚作背靠背的揭发。28日至9月4日,分两个小组对彭德怀、黄克诚面对面揭发和逼迫。9月5日至7日,分4个小组对受牵连的邓华、万毅、洪学智、钟伟4人揭发斗争。9月8日至12日,对彭、黄进行了大会发言批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到会作了报告。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会后,全军各大单位召开干部会议,批判彭、黄的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9月17日,国家主席

发布命令：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林彪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第四节 国民经济严重 困难与“八字”方针的制定

一、1959年～1961年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958年7月，苏联领导人向我国政府提出建立海军共同舰队等无理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这种要求遭到拒绝以后，苏联政府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单方面地决定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尚有201项正在建设中。这些苏联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这些苏联专家聘期未滿，合同没有到期，苏联方面

不顾中国方面的挽留,说撤就撤,使我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

“大跃进”期间,由于亿万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并且投入了千万计的基建资金和大量物资设备,所以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建成了一批重要项目,增强了生产能力。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来到1964年为止,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属于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约占2/3。根据1950年至1979年新增生产能力的统计,其中1958年至1960年这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矿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对我国经济有重要的贡献的大庆油田的开发,原子能技术的突破,以及北京十大建筑的落成,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和施工,也都在此期间。“大跃进”期间兴修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也使“二五”期间增加320万公顷灌溉面积。但是,这些不是“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功劳。因为如无“大跃进”和公社化,取得的成绩肯定会更大。正是“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折腾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才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如按“一五”期间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3%计算,这三年损失达1523.2亿元,并造成了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一)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1958—1960年平均积累率高达39.1% (“一五”期间平均积累率为24.2%),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

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 44%,而且积累效果极差;第二是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总产值从 1957 年到 1960 年增长 1.3 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 22.7%,工业与农业产值比例由 5.7 比 4.3 变为 8 比 2;第三是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1958—1960 年,生铁产量增长 3.5 倍,铁矿石产量增加 4.8 倍,煤产量增长 2 倍,而货运量仅增加 1.1 倍。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55% 下降到 33.4%,而重工业产值由 4.5% 上升到 66.4%;轻重工业之比,由“一五”期间的 3 比 2,到 1958 年至 1960 年变为 1 比 2;第四是供求比例严重失调,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的社会购买力,比 1957 年 488.2 亿元不断地大幅度增长,分别为 578.8 亿元、675.1 亿元、716.7 亿元,三年内增加了 46.8%。而市场商品可供量则严重不足,尤其吃和穿的商品缺口很大。1957 年至 1960 年,粮食和花纱布等主要消费品大约挖出库存 1/3,但货源仍然不足,到年终未实现的社会购买力达到 198 亿元。

(二)生产大幅度下降。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过急地改变生产关系,必然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

首先,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不仅连续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很大。均在 10% 以上。1960 年的粮食产量竟降到了 1951 年的水平,1962 年棉花产量降到了 1950 年的水平,农业生产大约倒退了 10 年时间。

其次,工业生产下降。由于轻工业生产大部分以农产品(尤其经济作物)为原料,所以 1959 年至 1961 年经济作物产量的下降导致 1960 年至 1962 年轻工业生产严重下降。1962

年与 1959 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下降 35.2%,棉布产量下降 66.6%,糖产量下降 69.1%,卷烟产量下降 55.8%。

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相继下降,重工业(包括钢铁工业)也难以继续增长,从 1961 年开始急剧下降,钢产量 1961 年下降为 870 万吨,比 1957 年仅多 132 万吨,基本上退到“大跃进”前的水平。

(三)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带来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和人民生活的恶化。

城市职工,由于“大跃进”以来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加之新职工的迅速增加,职工平均工资尤其平均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据统计 1957 年职工平均工资为 637 元,到 1961 年下降为 537 元,如果剔除 1958 年以来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平均工资为 399 元,比 1957 年下降 37.4%。更严重的是市场商品供应尤其是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城市粮食供应,京、津、沪三市和辽宁省的粮食库存挖空,几乎出现脱销危险。职工口粮,从 1957 年的人均 392 斤,降到 1962 年的 368 斤,下降 6.1%;食油从 1957 年人均 10.3 斤,降到 1962 年的 4.9 斤,下降 52.4%。猪肉供应,全国 1961 年比 1957 年减少 80.6%,1961 年人均肉类供应,北京 2.1 斤,上海 3.6 斤,武汉 2 斤,天津、广州 1.7 斤,西安 1.3 斤,沈阳 0.6 斤。棉布供应量也因棉花连年欠收而减少。1961 年 2 月,决定第二期(3 至 8 月)布票不发,并从 3 月起毛巾等 10 种棉制品实行凭布票供应。1961 年 9 月至 1964 年 8 月三个年度,每人每年基本定量只发 3 市尺布票,加上各种补助和奖售,人均只有 8 市尺棉布。由于市场供应不足,国家不得不扩大特需供应范围,增加凭票

供应商品,1961年北京凭票供应商品多达69种。

农民生活水平更是急剧下降。全国农民人均口粮从1957年407斤下降到1961年的307斤,淮河以北地区人均口粮仅300斤原粮,其中西北地区从1960至1963年连续四年人均口粮200多斤原粮,有些天灾人祸(“共产风”等)严重的地区,农民口粮每天在半斤以下。尽管上面号召实行“瓜菜代”、“粮食增量法”,也无法防止农民浮肿病的扩展和农村饥荒的蔓延。

由于收入减少、口粮下降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全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改变了“一五”期间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1.98‰和14.59‰,而1960年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过了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

上述三年经济困难,除了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左”倾错误是主要原因外,自然灾害和苏联的破坏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中国农田受灾面积,1959年为4463万公顷,1960年为6546万公顷,1961年为6175万公顷,分别比“一五”期间受灾面积最多的1957年(2915万公顷)超过53.1%、124.6%、111.8%,其中造成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少30%以上的重灾面积,1960年和1961年分别比1957年超过66.8%和92.5%。赫鲁晓夫也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施加压力,背信弃义地撕毁了600个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所有图纸和资料,逼还

抗美援朝时的军用物资折款等 14.06 亿新卢布。这些都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方针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 1961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恢复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

1961 年 1 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关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决定从 1961 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重点是调整。这就是说，要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新成果；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它标志着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已经由“全面大跃进”逐步转向调整。这是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是党为战胜经济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

60 年代经济调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61—1962 年，第二阶段是 1963—1965 年。

第一阶段中采取的主要调整措施有：

第一，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国民经济调整是从农业开始的。为了纠正“共产风”，党制定了若干新的政

策：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破除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方针，归还了自留地，鼓励社员经营各种家庭副业，并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坚决纠正由浮夸风导致的高征购，减少粮食征购量，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同时，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一是充实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到1962年，农业劳动力比1958年增加5786万人，总数达到21278万人，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二是尽可能地增加农村社队所需要的贷款和物资。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油料、生猪、家禽和蛋类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61、1962年两年内提高27.1%）以扶植社队恢复和扩大生产，增加农民的收益。

第二，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使之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是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键。1958—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累计996亿元，平均每年332亿元，比1957年的143亿元增长1.3倍。1961年和1962年大力削减基本建设投资，1962年比1960年下降80%左右（由388亿元减到71亿元）。积累率由1960年的39.6%下降到1962年10.4%。这样就有可能腾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加强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等薄弱环节，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失调的比例关系逐步协调起来。

第三，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1958—1960年连续三年的钢铁高指标，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重工业中主要的钢铁部门，严重地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因此，对于重工业生产，除了采掘、采伐工业等薄弱环节

得到进一步加强外,冶金、机械、煤炭、建材等工业部门的生产都有计划地降低了发展速度。1962年重工业产值比1960年下降58.6%,钢产量由1960年1866万吨,减到1962年的667万吨,煤的产量从1960年的3.97亿吨,减到2.2亿吨。

同时,对一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就是对那些没有原材料来源的企业,物资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成本很高、长期亏本、在短期内又不能改变的企业,区别不同情况,或者关闭,或者暂时停止生产,或者与别的企业合并,或者转产别的产品。

第四,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由于缩短基本建设和重工业战线,加上关停并转,城镇职工大批减下来没有事情干,而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又严重不足,城市粮食、副食品供应又很紧张。为此,陈云指出,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一件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上去。由于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1962年到1963年6月,全国精减职工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人,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人,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二千八百万人。由于大量减少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既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工资开支,又减少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充实轻工业,保住石油工业。1962年充实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仅1962年1—10月,以重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品的产值,就比1961年同期增加了近30%,同时保住了石油工业。还逐渐地发展了塑料、

化学纤维、合成洗涤剂等新兴工业，并保证了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

第六，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主要措施是：努力增产日用工业品，增加商品供应，增加财政收入；压缩基建投资，各项事业费和国防费，特别是压缩集团购买力，减少财政支出；在保持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稳定的同时，对针织品、自行车、钟表、茶叶、酒及某些糕点、糖果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共回笼货币 50 亿元。

由于领导正确，措施得力，工作扎实，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迅速地取得了明显效果。到 1962 年底，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许多方面都开始出现了迅速恢复的形势。

1963—1965 年是调整的第二阶段，主要是调整工业内部的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以促进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第一，着重加强现有工业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使它成龙配套，也就是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贯彻执行了“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的方针。第二，搞好全国加工工业中的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第三，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

经过 1961—1965 年的经济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了。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工业产品产量增加，各方面经济效果显著提高；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

平衡,对外贸易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我国实现了石油的完全自给,使用洋油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发出《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

我国国民经济在1960年前后发生了严重困难。在困难面前,中国共产党正视困难,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一方面,特别强调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怕难,不惧压,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去战胜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决定精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下放干部加强基层。到1960年11月底,全国已有1018000余名干部下放到基层,占干部总数的14.8%,其中80万下放到农村。中央机关在周恩来亲自领导和组织下,下放了8500余名干部。1962年,中央又决定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97名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干部下放到粮食高产地区任地、县级工作,以加强农业第一线。另外,在党员和干部的带动下,全国有2000余万城镇和家属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支援农业生产。

党中央在这段时间里,发出了一系列要求干部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规定和文件。1962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发出《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

在《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中，特别对党政机关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各级党委要动员党、团员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各级行政机关要带动所有工作人员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坚决同铺张浪费和不爱护公共财物的现象作斗争”，以保证中央规定的坚决执行。中央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1) 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力争开支少于财政预算中规定的购买金额。在今后三年内，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一律不许购买家俱和非生产性设备。破旧的应当进行修补、继续使用。日常办公所需的用品，也要力求节约，实行一物多用、废物利用，严格禁止多购、多占和囤积。

(2) 立即彻底清理机关仓库。全国各系统的机关仓库，在三四两月都要由本机关领导机构进行彻底清理，充分发掘潜力，变死物为活物。

(3) 全国各级(中央、省、地、县四级)招待部门库存备用的高级物品(如山珍海味、土特产、烟、酒、茶、糖、干果、地毯、沙发、古玩、丝棉织品等等)，从通知到达之日起，一律冻结，不许浪费私分，并且要开列清单，分报中央、省、市、自治区两级商业部门，听候调作国内外市场商品处理。从今以后，各级招待所一律不许再行购置和供应这种高级物品，以免特殊化。

(4) 全国所有撤销、停办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房屋、家俱、设备和物资，一律冻结。

(5) 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不准用公款请客、不准用公款送礼

的指示。各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一律不得随便请客，不得用公家的财物送礼。一切招待必须从俭。除全国和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可以招待茶水以外，其他一切办公、开会和接待来往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招待烟、茶，更不许招待糖果和水果。看戏、看电影，一律由个人买票，不准赠票。

(6)专业会议要尽量减少，这是一项有关人力、财力和时间上的最大节约。非开不可的会议，会议期间的生活招待标准一律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办理，不许铺张。

(7)大力压缩旅差费的开支。

(8)工作人员一律不许住到饭店写文章，看文件。各地轮训干部，也不许租用饭店，以后凡属这类开支，一律不许报销。

(9)所有办公用房、集体宿舍和个人宿舍，除因漏塌必须维修以外，一律不得扩建、改造、粉刷和油饰。

(10)彻底整顿刊物和资料，节约纸张。办公用纸也要节省使用，能用次纸的就不要用好纸，能用废纸的就不要用新纸。

(11)在拍发电报、打长途电话和用车、用水、用电、用煤等方面，必须精打细算，减少浪费，节约支出。

四、60年代初的甄别平反工作

党中央在纠正经济工作上失误的同时，也开始对1958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错误处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在1961年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即6月2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问题，以及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提出庐山会议原被整错的人都是要平反。毛泽东还讲到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接着,中央在6月15日发出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示》中,正式提出:“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凡“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决定为1958年以来反右倾斗争中错误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平反。”邓小平在讲话中具体地谈了甄别平反的问题,提出:过去,我们党历来对于干部问题处理是很慎重的。因此,我们党是团结的,上下通气的,全党一致的。但是,这几年确实不通气了,特别是几个大运动,有相当数量的干部是处理得不适当的。由于处理不慎重,损伤了一部分干部。“对于这几年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应该按照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的指示中所提出的原则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区别三种情况:一种是搞得对的,既然是对的,就不应该改。一种是部分错的,那就部分改,或叫部分平反。就是把过头了的那一部分取消。一种是完全错了的,那就要完全平反。总之,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甄别、平反工作,不要搞运动,要指定专门机关、专门人搞。比如,可以由监察委员会来搞。如果因为问题比较多,人

不够,可以再加一些人。党委要指定适当的领导同志来主持这件事。现在,我们工作很忙,任务很紧,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也不能把力量统统用到甄别、平反工作上面。而这样的事情,是很细致的工作,要花时间的,所以,要指定专人来搞。最好是谁搞错的由谁来平反,这对于团结比较有利。”甄别平反工作也写入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讲:“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必须按照 1961 年 6 月 15 日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规定,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妥善地加以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对于这项工作不够重视,进行得不够迅速和认真,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态度,必须立即改正。”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甄别平反工作。1962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自从 1961 年 6 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对此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凡是决心大、方法对的地方,进行就快,收效也大。经过甄别平反以后,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内团结大大加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工作和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头,因此,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

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通知》指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和干部,也应该采取上述办法平反。

上述办法,曾在军队中和有些地方采用过,它们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最简便最见效的方法。

《通知》强调,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头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便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了。

为了推动这一工作,邓小平在1962年5月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又作了专门的讲话。他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

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的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响群众，实际上影响了大量的群众。全国估计总有1000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最近军队搞得很好，就是一揽子解决。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的，比较主动，面貌也比较好一些。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在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刘少奇插话说：不要一个一个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左”倾到那个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除了个别严重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是对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他们承担责任。向群众当面宣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通过以上会议和中央文件的传达，甄别平反工作有了全面的进度，加快了速度。到1962年8月，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已甄别党员、干部365万人，当时认定，原结论错了和部分错了的占70%。也甄别了群众370多万人，都得到了平反。总共甄别平反了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尽管那次甄别平反还说不上很彻底，但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惜的是当时中央没有能为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平反，并且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所谓“平反风”和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使甄别平反

工作没能完全彻底地进行下去。

第五节 政治、 经济、文化的全面调整

一、七千人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纠正工作上的失误,贯彻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以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于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且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林彪等讲了话。

七千人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

第一,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在书面报告和讲话中,总结了建国十二年来,特别是近四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经验。主要的有以下几条:(1)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2)社会主义的两

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混淆,如果混淆两种所有制的界限,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反了客观可能条件和农民的自愿原则,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3)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在扩大再生产问题上,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积累的增加,必须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适当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础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4)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商业除国营商业外,还应当有集体所有制商业。在农村中还应该保持农村集市贸易作为补充。(5)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等价交换,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极端错误的。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必须对群众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这项工作,同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6)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7)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认真实行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与群众联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保证建设,增加生产的一个根本方针。(8)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

导与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

第二,会议分析了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会上许多同志要求弄清楚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在1月27日讲话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明确回答,他指出:“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借用湖南农民的话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缺点和错误:(1)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路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由于要求过高过急,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进行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2)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做了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3)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因地制宜,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4)对农业的增产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同

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

刘少奇指出,这几年工作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我们在工作中所以犯了错误,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健全党内、党外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民主,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不可能克服困难;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因此,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要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指出: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有一个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必须加强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

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周恩来以《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为题讲了话。他指出了这几年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分析了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主要办法，并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作了《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问题的讲话》。他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错误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他提出要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

陈云在陕西大组会上讲了话。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制定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从客观的可能出发。

第三，会议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指出，从农业开始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他强调指出，1962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至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报告提出了1962年经济建设必须做好下列工作：（1）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2）积极地增加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的生产指标。（3）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

工。(4)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不允许任意追加国家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5)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生产,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少和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尽可能增加生产。(6)认真地做好商业工作,改善市场状况,保证城市人民生活。(7)所有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当成首要任务,坚决扭转某些企业亏本赔钱的状况。他号召全党统一认识,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第四,会议发扬了党内民主,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团结。这次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发扬党内民主的精神。会议开始的时候,由刘少奇起草了一个报告,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讨论,提出意见,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这种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作法,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会议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号召大家畅所欲言,活跃党内的民主空气。

这次大会对于纠正“左”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可能彻底纠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的清理。

二、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经过 1961 年至 1965 年整整五年的努力,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工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

1965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 223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1957 年相比,增长 59.9%。

1965 年,主要农作物产量,粮食 19453 万吨,接近 1957 年的水平;棉花 209.8 万吨,比 1957 年增长 27.9%;油料 362.5 万吨,接近 1957 年水平;水果 323.9 万吨,接近 1957 年水平。猪、牛、羊肉产量达 551 万吨,比 1957 年增长 38.3%。水产品产量 298 万吨,接近于 1957 年水平。在农业生产中拥有的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1494 万马力,比 1957 年增加 805.5%;农业机耕面积达 1557.9 万公顷,比 1957 年增长 491%;灌溉面积达 3305.5 万公顷,比 1957 年增加 20.9%;化肥施用量达 194.2 万吨,比 1957 年增加 420.6%;农村用电量达 37.1 亿度,是 1957 年的 25.5 倍。

1965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 1957 年相比,原煤增长 77.1%,达 2.32 亿吨;原油增长 674.7%,达 1131 万吨;天然气增长 1471.4%,达 11 亿立方米;发电量增长 250.3%,达 676 亿度;生铁增长 81.3%,达 1077 万吨;钢增长 128.6%,达 1223 万吨;成品钢材增长 112.3%,达 881 万吨;水泥增长 138.2%,达 1634 万吨;平板玻璃增长 48.7%,达 687 万标准箱,木材增长 42.7%,达 3978 万立方米;农用化肥增长

1043%，达 172.6 万吨；汽车增长 412.7%，达 40500 辆；拖拉机 9600 台；布增长 24.4%，达 62.8 亿米；机制纸及纸板增长 90.1%，达 173 万吨；缝纫机增长 345.3%，达 123.8 万架，自行车增长 128%，达 183.8 辆；钟表增长 2708 倍，达 108.3 万只；化学药品增长 377.3%，达 10500 吨；糖增长 69.8%，达 146 万吨。

在交通运输方面，1965 年与 1957 年相比，铁路营业里程增加 36.3%，达 36400 公里；公路通车里程增加 102.1%，达 51.45 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增加 9.4%，达 15.77 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增加 49.2%，达 39400 公里；客运总量增长 50.9%，达 96334 万人；旅客周转量增长 40.5%，达 697.1 亿人公里；货运总量增长 50.7%，达 121083 万吨；货物周转量增长 91.3%，达 3463 亿吨公里。

在商业贸易方面，1965 年与 1957 年相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41.4%，达 670.3 亿元，其中消费品零售总额 590.1 亿元，农业生产资料零售总额 80.2 亿元；外贸部门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 13.3%，达 118.4 亿元。

国民收入总额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指数，以 1952 年为 100，1957 年为 153，1962 年只有 130.9，1963 年为 144.9，1964 年为 168.8，1965 年为 197.5，比 1957 年增加了 29.1%。1965 年国民收入总额达 1387 亿元，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国民收入 194 元，比 1957 年提高 52 元。1963 年至 1965 年的 3 年中，国民收入大于支出 10 亿元，而且全部还清了外债。

在人民生活方面，由于农业还没有完全恢复，1965 年全国人无均粮食、食油、棉布的消费量，还略低于 1957 年的水

平。但是,由于生产恢复,市场供应增加,全国零售物价和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回降,1965年只相当于1957年的109%和159%,而且许多农产品调高了收购价格,全国职工在1963年有40%提高了工资级别,生活有所改善。

还应当提出的是,大庆油田经过几年的努力,投入4万多人,7万多吨设备,已在196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开采;原子工业攻克了几千个技术难关,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研制了2万多台关键设备,终于在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总之,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工作,卓有成效。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国民经济各主要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相互比例关系已经趋向合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趋向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所有这些,都为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六节

“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是还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于1962年9月召开的。

从1961年以来,由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在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农业生产形势逐渐好转,1962年粮食生产取得了比较好的收成;在工业方面,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调整措施,已经产生明显的效果。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以及某些急需的重工业产品和不少的手工业产品,1962年1—8月的产量,都比上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其中化肥增长38%,铅增长28%,原油增长17%,硫酸增长5%,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日用品产值增长27%。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有了改进,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成本有所降低。在农业增产和工业调整的基础上,在多数城市里,副食品和若干日用工业品的供应也有所改善。

1962年1—8月,国家实发工资比上年同期减少26亿元。城镇商品粮销量,比上年同期少销32.8亿斤,全国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元。到8月底共回笼货币40.9亿元。

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力地证明,1962年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所规定的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是正确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

但是,这时经济形势还没有全面好转,还存在困难。在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虽已下放到生产小队,而经营管理和生产责任制,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党的农村的其他各项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落实。在工业方面,产品的品种质量,成龙配套,生产专业化协作,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继续大力解决。

在农业恢复过程中,1961年和1962年的春天,一部分省

区的生产队试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的管理办法,对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党中央还注意调整了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

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出现好转形势的同时,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却有激化的趋势,表现为:苏联领导人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我国施加种种压力,甚至搞颠覆活动;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乘机叫嚣反攻大陆等。国内由于严重经济困难,投机倒把活动有所发展等等。

综上所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总的形势是向好的方面转化,这是主流,阶级斗争的某些激化是支流。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争取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好转。

八届十中全会 1962 年 9 月 24—27 日在北京举行。会前,先后在北戴河和北京开了近两个月的工作会议,为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二人,中央候补委员八十八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三十三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全会还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会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在经济建设方面。全会指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

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就是说，我们要从发展农业着手，来开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是中央根据“六十条”草案发布后一年多的经验，将原修正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而写成。条例中的一些规定，在当时，对于稳定农民的情绪，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决定性作用。

十中全会认为，我国现在工业发展的方向，要以几亿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商业要根据“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这三条流通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供应工业更多的原料、材料，供应城乡人民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全会强调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同时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

有的作用。

十中全会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目前还存在困难,需要全党团结一致,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继续调整国民经济。

第二,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在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毛泽东在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期间,先后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把毛泽东讲话精神写进了公报。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

向。

这样，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这些论断，就发展了他在1957年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并且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而且说，这种阶级斗争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

为十中全会所接受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种提法，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看成是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它既违背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要消灭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第三，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1961年和1962年春，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和包产到户的作法。这是广大农民为了反对平均，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实行的一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自愿原则的生产管理责任制。但是，全会却错误地把这种合理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单干风”，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邓子恢为了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主张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被指责为“鼓吹单干”而遭到批判。这样就使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被废止了，伤害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会对所谓“翻案风”的批判也是错误的。1962年6月，彭德怀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接着又在8月写了一封短信，申诉他在党内没有搞“反党小集团”和“企图篡党的

野心”，也没有“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要求组织审查。这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党中央陈述个人意见的做法，是一个党员应有的民主权利。全会把他说成是为自己“翻案”，并立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完全是康生捏造的一起冤案。《刘志丹》这部小说是李建彤根据工人出版社的约请而创作的。在创作中，作者曾向熟悉陕甘苏区历史情况的习仲勋、刘景范等征求过意见。但全会在康生的策动下，把创作这部小说当做“进行反党活动”予以批判，并由此批判了习仲勋，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组，对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等进行审查。这一冤案，使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对“翻案风”的错误批判，使正在进行的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打击的同志的平反工作中断了，曾经提出的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基本没有开始进行。

在全会结束前，毛泽东提出，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把“反右倾”运动一直贯彻到群众中，干扰了经济调整的不适当作法的教训，在传达和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时，各地各部门要把做好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抓阶级斗争而干扰这项工作。这对于当时以主要力量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全会后，党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调整经济上。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当时并未能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对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错误批判

1962年8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批评的所谓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对此再一次进行了批判。

所谓“单干风”,一是指1961年至1962年我国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创造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按劳划片,包工、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二是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提倡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意见的一种指责。1961年春,中共安徽省委发现和提出进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管理方式的试验,由于这种方法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水平,迅速在全省80%以上的社队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广西、广东、湖南等灾情严重、集体生产难以维持地区,也自发出现了包工、包产和少数借地耕种、自种自收的现象。有的边远山区,也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撤销了办不下去的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引起了邓子恢等的重视。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在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肯定了“责任田”“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他说:“过去长期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把自发资本主义的危险,看得有点太夸大了。现在我们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小自由,并不会造成两极分化。”他指出:对单干要分析,像山区分散,“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只要按国家要求完成上调任务,实际还是社会主义。后来,邓子恢

又派人到安徽等地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了进一步调查,总结了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材料推荐给党中央。5月,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6月下旬,华东局向中央汇报说安徽的“责任田”实行是包产到户,是单干,要纠正这种方向错误。邓子恢当即指出: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搞好“五统一”(即生产计划、大农活安排、抗灾、用水和分配五个方面的统一),怎么能说成是方向性错误呢!生产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伟大创造,只要经过试行改进很有可能成为经济管理的好办法。邓小平表示支持邓子恢的这些意见。7月,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共青团中央、国家机关做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时,都宣传了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邓子恢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被指责为支持农民闹单干,刮“单干风”。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单干风”进行了批判,错误地把有些地区的农民和干部为了克服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生产责任制的正确意见,批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并且点名批评“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宣布为“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并于1962年11月9日决定撤销。1981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为邓子恢彻底平反。

是针对中央一些领导人在1961年和1962年间对当时国

内经济形势估计的批判。1962年2月“西楼会议”上，陈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五个方面的表现（见《陈云文稿选编》第190—197页），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刘少奇也指出，对困难要充分估计，“现在是非常时期”，为了解决天灾人祸，“要有紧急命令”，“要搞点紧急措施”。根据“西楼会议”精神，3月21日，刘少奇在第18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又指出：实事求是地讲，从经济上讲，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着严重困难的形势，“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提醒要充分估计困难，指出：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不大，但估计不够就危险了。周恩来也指出，我们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办法来克服困难，没有坏处，有好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好象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这个估计出发，会议提出了进行大幅度全面调整的措施。后来贯彻的结果证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形势好转之后，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错误地把党中央部分领导人对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估计，当作“黑暗风”批判，认为对形势的估计是“只讲一片黑暗”，“不讲一片光明”，是“思想混乱”，“丧失信心”，是“右倾”的表现。使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不但没有很好克服，反而有所发展。

对七千人大会后甄别平反工作的指责，主要针对三件事：
一是彭德怀给党中央的申诉信（即“八万言书”）。七千人

大会后，彭德怀对不但没有给他平反，反而说他“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等等，倍感冤屈。便于1962年6月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提出申诉，说明事实和情况，请求中央审查。8月23日，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再次请求中央审查。

二是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工人日报》连载了李建彤写的关于刘志丹生平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第二卷的第一部分，《中国青年》也发表了部分章节。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康生借此大作文章，指控小说《刘志丹》是“反党文艺”、为高岗“翻案”。并把提供过创作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所谓“习、贾、刘反党集团”。

三是七千人大会后各地抓紧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一些地区和单位甄别平反工作不彻底，有的留有尾巴，因此，不少受过错误批评和处分的干部、群众，纷纷向省委和中央写信进行申诉，要求复查。这种情况被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平反成风”、“闹翻案”，并以此对全党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提出了批评。由于开展了对所谓“翻案”的批判，严重影响了甄别工作的进行。

彭德怀按照党章规定向党中央如实说明自己的情况，请求审查，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与责任，把这说成是翻案，是错误的。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并对所谓“翻案风”进行批判，使七千人大会开始恢复起来的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再次受到损害。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的错误决定;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为“习、贾、刘反党集团”彻底平反。

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在以主要注意力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从1963年到1966年春,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单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开展了以传达贯彻十中全会决议精神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十中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文件。这时,怎样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成为重要课题。开始,河北省保定地区从抓1962年的年终分配入手,切实解决贯彻“六十条”和执行“双办”方针问题。经过试点,他们发现有的地方采取了“小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办法,收获很大。保定地委总结了定县“四清”的经验,在请示河北省委后,决定在全地区普遍开展“四清”运动。从1963年1月到3月底,整个保定地区的“四清”即告基本结束。保定“四清”运动,受到了河北省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湖南也在传达和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整社运动,揭发了阶级斗争方面一些问题。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的“黑风”刮得很

大,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这些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指导下,被夸大的所谓事实,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抓阶级斗争提供了根据。

毛泽东虽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不要使阶级斗争影响经济建设,但是他很少过问经济调整工作,而且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热衷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城市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上河北省委和湖南省委分别介绍了保定进行“小四清”和湖南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毛泽东根据河北,特别是湖南的报告,在讲话中不适当地得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结论。在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会议确定在全国城乡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级以上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物资部门、县以上文教部门,开展“五反”运动。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国各地都根据中央的部署以及保定和湖南的经验,进行“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期间,“四清”运动,主要是从改善干群关系,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着眼,主要是进行经济上的“四清”。

1963年5月2—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

“前十条”虽然肯定了整个农村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但是，它又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并且根据个别省分、个别地区的报告，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无限上纲，夸大为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并且列举了阶级斗争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九个方面的表现，作出了所谓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错误结论。并且断言，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前十条”最后引用了毛泽东对一个文件的批语中的话，认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样，党中央就把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要求各级党委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都普遍地学习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调整了运动的部署，重新训练干部，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

1963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试点和训练干部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政策,如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思想仍是沿袭“前十条”,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十条”同时下发到全国城市和乡村。通知下达后,四清运动才在较大范围内展开。

1964年,全国有百万以上干部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也逐渐由着重清经济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在四清中,各地向中央的报告普遍夸大敌情。有的报告说,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组织被篡夺以及“和平演变”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一些单位的主要干部,有的可能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已经蜕化变质,有的犯了严重的错误。基层组织已经被篡夺和已经变质的,即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有1/3。城市中的五反报告说,公私合营以后,一些企业中的资方人员利用吃吃喝喝,请客送礼的方式拉拢腐蚀干部和党员,篡夺企业的领导权。为此,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

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更加“左”的估计,提出在农村和城市,大约有 1/3 的基层组织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 1/3 还打不住,说城里有些工厂、机关的某些环节上也掌握在敌人手里。认为“后十条”草案,只反映了基层干部的意见,束缚了群众和工作队的手脚,要加以改正。同时还提出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要划阶级,要进行夺权斗争。对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做了新的安排,增加了阶级斗争和清查阶级成分等内容。

根据 5 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9 月 18 日,党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第二个“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为了总结两年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在讨论运动的性质和农村主要矛盾问题时,发生了分歧,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提出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认为这两种提法

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记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它的正确方面是：第一，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指出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那些犯有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有问题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规定，对于解放农村基层干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规定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要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之一。

但是，“二十三条”还包含着严重的错误：第一，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十几年来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全党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第二，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三，提出了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原来称为“五反”运动，也改为通称“四清”运动。

“二十三条”下达后，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先后召开会议，总结前一段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和缺点，并对以后的运动作了布置。全国部分城乡进行的“四清”运动继续开展，一直到1966年春天，

全国大约在 1/3 左右的县、社进行了“四清运动”。据 1965 年 7 月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统计,国营工交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企业、单位 1800 多个,占总数的 3.9%。

总之,1963 年至 1966 年初,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放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作风和经营管理混乱、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特别是 1964 年下半年以后,更加严重地夸大了敌对阶级的力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就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从而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不过,“四清”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还是局部性的,还没有发展成为全局错误。

四、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

为研究和总结社教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

在会议进行的第一阶段,即 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底,着重讨论了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等问题。12 月 20 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运动中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讨论中,在谈及运动的主要矛盾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经表面化

了。

发言中，毛泽东批评了前一阶段运动中“左”的错误。他指出，运动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 7% 至 8%，人数不能超过 10%，否则就太多了。他批评说，有那么多地方划成 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7 亿人口划成 20%，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强调，运动主要整“当权派”，要“整党”。他说：

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群众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

他又说：

不要管什么阶级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12 月 27 日，毛泽东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有一些刘少奇是赞成的。例如，要整当权派，中心是整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等等。但有一些内容，刘是不赞成或不甚明了的。例如，整共产党的当权派，这里有没有个限度或极限？中心是整党，应该依靠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整？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但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派？如果说已经形成派，人数是不是太多了？共产党内又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这在理论上

是不是讲得通？

在会议上，刘少奇没有正面对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异议，而是肯定了当时运动中一种比较流行的提法，即“两类矛盾交叉”。他认为，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刘少奇的这些不同意见，毛泽东不是赞同的。而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见解，也未能引起刘少奇的充分注意。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反映到这一阶段会议的结果中。

12月底，会议讨论制订出《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纪要》对运动的性质统一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于运动的名称，《纪要》统一规定城乡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与1963年上半年的“小四清”已相去甚远。关于运动的时间，《纪要》规定在7年内全国搞完，3年内搞完1/3的地区。

毛泽东对这一阶段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认为，会议对前一阶段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没有认识和研究，特别是没有反映1964年下半年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新的、重要的思想。根据他的意见，1965年1月初至1月4日，会议继续举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社教运动只靠工作队，脱离群众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问题。这些批评显然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谈，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

1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时说，去

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有听到反应。

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对“后十条”提出了批评。他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会议重新讨论了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在作了一些重要修正后,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重申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区别对待犯了错误但还可以教育的同志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对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快一点解放出来。“二十三条”改变了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由工作队单独领导运动的做法,提出“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领导运动的原则,反对工作队搞神秘化、冷冷清清,只在少数人中扎根串连;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严禁打人和变相体罚,等等。“二十三条”还要求把“四清”落实到建设上,运动自始至终要抓生产、抓分配(群众生活),等等。“二十三条”的这些规定,对于解脱大批基层干部,在一段时间里遏制“左”的错误,稳定农村形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二十三条”又在理论上,在指导思想发展了“左”的错误。它强调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断言“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二十三条”批评了党内对社教运动内部的不同看法，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走资派”的，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原稿中，“中央”后面并无“部门”二字，锋芒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周恩来在修改文件时，提出在“中央”后面加上“部门”二字，削弱了文件的锋芒和冲击力。当然，这种修改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毛泽东已经形成的认识。

不论是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对晚年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这次会议都具有一种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毛泽东已经形成了诸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类在他晚年扩大化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概念，并正式写进了党的文件，还在于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再次升级，毛泽东也因此开始失去了对刘少奇的信任。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曾有一段评说，他说，党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一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自此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裂痕再没有愈合过，分歧在令人忧虑地发展着。党中央一线的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却是由江青等人背着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另外的渠道和方法进行。一年半之后，“文化

大革命”爆发了。

“二十三条”下发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城乡社教运动重新作了部署。前一阶段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差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大批基层干部得到解脱,工作队也改变了过去包办一切、神秘主义等错误,农村的形势很快又有所好转。但是,由于,“走资派”理论的提出,运动的重点转向追查“走资派”及其在县、地以至省和中央的“后台”,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五、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

《刘志丹》事件

小说《刘志丹》是一部反映刘志丹一生革命活动,特别是他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光辉实践的传记文学作品。作者李建彤在创作过程中,曾向同刘志丹一起战斗过的习仲勋、刘景范等征求过意见。1962年8月至9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康生在会上首先提出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捕风捉影地硬把这部本来是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说成是替高岗翻案、向党进攻等等。并借此把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对他们立案审查。毛泽东根据会议提出的材料宣布说: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

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由此开始，对文艺界进行整顿。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 批评及文艺界的整风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1963年3月决定停演“鬼戏”。5月，在《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把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内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视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开始了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

1963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尤其是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2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提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不久，毛泽东作了第二次批示，进一步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两次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与批评，是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的。两个指示的下达，对文艺界震动很大。根据这两个批示，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整风，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

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文化部整风的同时，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对一批文化作品展开了相当规模的政治批判。后来，周扬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由于那时“未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估计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在进行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时不适当地采取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以致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个时期先后批判了《刘志丹》、《怒潮》、《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电影、戏剧和小说。这些受批判的作品多数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个别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等方面存在缺点，是应当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克服的。文艺工作（包括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例如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的某些缺陷，如戏剧界上演一些未加整理的、不够健康的传统剧目，一些文艺单位出现过某种不健康的倾向等等，也是应当而且可以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来解决的。但是，当时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文艺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在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许多优秀作品被“无限上纲”，戴上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是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来加以反对。比如，邵荃麟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浮夸风的偏向，在1962年前后，提出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这些思想被简单化地概括为写“中间人物”，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大加批判。在这场错误的批判中，邵荃麟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这方面，后来进一步发展成对所谓“黑八论”的批判。

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 过火的政治批判的扩大

从1964年夏季开始，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当时实际上是把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加以批判，而且把学术上的讨论和批评都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进行了政治围攻。而且以学术观点定罪，错误地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

1963年9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孙冶方针

对当时经济管理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提出要重视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要重视利润,扩大企业的权限等有创见性的经济思想,他的这个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当即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康生对他进行政治陷害,派“四清”工作队进驻该研究所,搞所谓孙冶方与张闻天(张当时是该所的特邀研究员)的“反党联盟问题”。把孙冶方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罢了孙的官,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不久,《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报道员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说杨献珍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是有意识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章断定,哲学战线上这场谁战胜谁的新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7月起,高级党校对杨献珍进行揭发批判。1965年5月9日,校委会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报告》列举的杨献珍的所谓错误是:一、反对毛泽东思想;二、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四、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五、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六、同彭德怀一道反党;七、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八、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九、把高级党校变

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十、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伸手到许多方面去。中央指示同意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批判。1961年以来,翦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提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等意见。戚本禹在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这些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把翦伯赞上述两篇文章当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进行批判,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在他们的煽动下,其他报刊也指名对翦伯赞进行了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终于被迫害致死。

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这种批判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妨碍了党的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伤害了知识分子。康生、江青等人在这种错误的发展过程中推波助澜,起了恶劣的作用。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批判主要是在报刊上和有关的文化团体、机关内进行,在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以前,还没有形成社会性的群众运动。

第七节 国防建设及对外关系

一、国防建设

国防,是保护国家门户的城垣,保障各项建设的柱石,维护和平安全的盾牌。在“一五”时期国防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从1957年起,到1966年,10年期间,党和国家注重国防建设的决策没有变。其间虽因政治运动、“左”的思潮及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致使国防建设受到一些挫折,但总的来说,成绩是主流,国防建设仍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和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以现代化、正规化为目标,加强武器装备和战备训练,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军事科学的研究和军事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素质,从而大大加强了国防建设。

军事院校是培养军队干部的主要途径。1957年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方强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海军军事学院的任务,主要是培养掌握现代海军诸兵种合同作战与训练知识的德才兼备的海军军政干部。1960年10月,该院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195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

治委员,1958年3月1日开学。该院培养高级军事人才。为加强军事科学的研究,1958年3月15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检查和总结建国八年来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工作,针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对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军事方针进行了讨论,并通过相应的决定。会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战绩是显著的,它完成了作战和训练任务,保卫并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军队本身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中也发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缺点。会议对训练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不适当的过火批判,使“大跃进”期间人民解放军的正规训练工作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并罢免了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在军队中揪所谓“彭党”人物之后,对军队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解放军恢复了正规训练。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批转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努力提高训练工作水平。6月,中央军委决定为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6、7、8月间,全军分18个区举行“比武”大会,参加表演的有1.3万多人,参观的达10万人。6月15、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对受检阅部队的奋发精神、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参加受阅的还有民兵队伍。通过全军“比武”活动,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

立了标兵,对部队的训练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50年代,在苏联援助下,进口了一批武器装备,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军工企业,仿制苏联的武器装备。军队陆续装备了自己生产的大口径火炮、坦克、飞机、舰艇、雷达及通信、工程、防化等武器装备和器材,向武器装备现代化迈出了良好的第一步。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从苏联进口现代化武器装备及其生产技术已不可能。1959年6月,苏联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反而激发了中国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的爱国主义热情及艰苦奋斗的精神,促进了核工业建设的进程。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1962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领导机构,领导核武器的试制和核工业建设工作。经过全国各地、各部门、各部队尤其参加核试验的广大指战员、科技人员、职工的辛勤努力,大力协作,共同奋斗,攻克了几千个技术难关,进行了上千次科学试验,研制了2万多台关键设备,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次核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阐明中国对核武器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打破核讹诈,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提高军队政治素质,保障军队执行党的路线、忠诚于人民、忠实于民族和国家的法宝。从1957年到1966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大力开展并日益强化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1960年10月、1961年9月,中央军委两次讨论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并先后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号召全军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63年3月21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这个《条例》总结了几十年来共产党领导军队开展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原则,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制订了准则。

这一时期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创造了一些活泼的形式和很有成效的方法。军队中先后开展了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学雷锋、做好事”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尤其是学雷锋活动,先后涌现出欧阳海、谢臣、王杰等一大批雷锋式的先进个人,军队中形成任劳任怨甘为人民做好事的新的精神风貌。

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左”的错误。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国防部长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实用主义和庸俗化的“方法”,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军队中开展所谓的“活学活用”,结果使学习毛泽东思想走向教条化。1965年11月18日,林彪提出所谓“突出政治”和“五项原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危

害。还应当指出,先后对军队中一批有威望、有功勋的将帅如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批判、免去军职并有所“株连”的错误,也对军队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

建设坚强的国防,不仅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军,还必须加强后备武装力量的建设。50年代,全国从农村到城市,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1960年4月18日至27日,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朱德、林彪、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罗荣桓元帅致开幕词,贺龙元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作了《关于民兵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民兵制度,是在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指导下武装人民的制度。革命战争年代,民兵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曾作出了伟大贡献;现在民兵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全国民兵必须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这次会议,对民兵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62年6月19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指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这个指示,对加强民兵建设有重要意义。民兵队伍空前壮大,人民战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大大加强了国防力量。

1964年5、6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由于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会议提出加快西南地区战略后方建设的设想,由此开始了加强“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8月21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会议。会议提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

大打、准备早打出发，坚决地快搬、早搬。9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同意“三五”计划方针“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构想。中共中央还发出了“要准备打仗”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强化国防建设，在当时有必要性，但这种准备大打早打，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大力建设战略后方的方针，势必影响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也打乱了国防建设本身的正规化、常规化。

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10年间受“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一些挫折，走了一段弯路。相比较而言，国防建设影响较小。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加强，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人民共和国的任务。此间，人民武装力量平定了西藏叛乱；粉碎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阴谋；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任务后，到1958年10月26日，全部撤回祖国。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鉴于美国在越南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1965年4月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越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应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派出了地空导弹、高炮、工程、扫雷、铁道、后勤等部队32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有4000多名中国战士的鲜血洒在了越南的土地上，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了运输线的畅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无偿地为越南人民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还为越军培养了军事、政治和技术人员6000余人。中国

政府从道义上、物资上、人力上给予越南人民以巨大支援，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苏两党公开论战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至1959年底，将近4年，这一阶段论战的特点是表面上团结一致，在内部进行争论。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和否定斯大林，并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中苏两党存在着重大分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不仅是苏共的领袖，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领袖，赫鲁晓夫批判和否定斯大林带有片面性，所以在国际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严重后果。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嚣张，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

在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重要文章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文章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性。分析了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根源，指出了正确消除个人崇拜的方法和途径。文章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全面的分析，肯定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内部讨论中，对和平过渡问题、苏波、苏匈关系问题交换

了意见,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党一起,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苏波关系、苏匈关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间,社会主义各国党的领导人互相访问、会谈,加强了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党之间的联系。

195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了一个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反党集团”的决议,7月间,中共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因此,1957年中苏两党关系有所缓和。10月,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资料。苏联这一行动,不过是赫鲁晓夫为了取得我党对他的支持,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中苏两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有过争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的提纲。经过争论,双方都有妥协,最后达成协议。

1958年2月间,苏共发表文章,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也于1958年5月发表文章批判南共。1958年初,苏联领导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苏联这两项建议实际上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拒绝。1958年秋,中国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我们宣传上曾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犯了“左”的错误。赫鲁晓夫从大国沙文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中国是在和苏联争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他在一些讲话

中攻击中国，提出要“对一对表”。

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贺词中肯定了苏联的七年计划，并重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团结一致。1959年6月，中苏矛盾又进一步尖锐化了，表现在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接着在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事件公开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声称苏联政府“对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件不能不表示遗憾”。把中苏分歧公开地揭露在敌人面前。1959年9月15日—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9月30日—10月4日赫鲁晓夫到中国参加建国10周年庆典，在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竟影射攻击中国“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10月2日会谈时，中国领导人向他说明中印边境冲突的真相和背景，但是赫鲁晓夫却不分是非曲直地说：“反正打死人就是错误的”。这样，中苏关系愈来愈恶化。

第二阶段，从1960年初至1963年初，经历了3年时间。这一阶段论战的特点是由内部论战发展为公开的不指名论战，双方都不直接指名道姓，中国指南斯拉夫批苏联，苏联指阿尔巴尼亚批中国。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在莫斯科开会，中国派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在保卫和平、裁军问题上中国与苏联有严重分歧。苏联鼓吹通过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中国不同意这一观点。中国认为保卫和平要靠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不能完全寄托在裁军上。赫鲁晓夫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和攻击中共领导，使中苏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指名批南斯拉夫,实际上是批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裁军等方面的观点。赫鲁晓夫大为恼怒。因此,他利用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代表大会时,搞突然袭击,抛出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攻击,并组织50多个党围攻中国共产党。6月26日,中共代表团发表书面声明,批评赫鲁晓夫采取的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表示坚决反对“任何个人的指挥棒”。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央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在华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签订的600多项合同。与此同时,苏方还挑起中苏边界纠纷。苏共领导为了压服中国,就这样不择手段地把中苏两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11月上旬至12月1日,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前,苏联散发了攻击中共的信。会上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1年10月,苏联召开二十二大,在会上,赫鲁晓夫再一次大肆攻击斯大林,并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赫鲁晓夫借着大会讲坛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现领导。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针对苏共领导这一违反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但苏共领导拒不接受。因此,周恩来愤然提前回国。

1962年中苏矛盾进一步升级,4月16日,由于苏联的长期策动和诱骗,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出走苏联。苏联企图使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

5月,苏联又制造伊犁暴乱事件。10月间苏共支持印度第二次反华。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3月间,苏共利用保、匈、意、捷、德五个党代表大会的讲坛公开批判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中国。

第三阶段,1963年3月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一年半时间。这一阶段是中苏两党公开大论战,论战的特点,是中苏两党公开点名道姓。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信中明确提出了苏共拟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原则问题的观点。实际上把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观点系统化了。为了回答苏共中央来信,中共中央于1963年6月14日给苏共中央复信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1963年7月14日,即中共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个月以后,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各级党委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为此,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展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批判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的观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这期间,苏共组织了世界上80多个共产党围攻中国共产党,只有少数几个党在中苏大论战中保持中立态度。

第四阶段,1964年10月至1965年底,时间1年多。这个阶段论战的特点,是从公开论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中苏之间断绝了党的关系，中共与追随苏共一起反华的一些党也中断了关系。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党还想努力改善中苏关系。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活动。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但是苏共新领导仍然坚持赫鲁晓夫的反华路线，继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加紧威胁中国，继续组织各兄弟党围攻中国共产党，并策划在1964年底召开新的莫斯科会议，准备对中国进行集体制裁。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抵制，会议被推迟到1965年3月1日至5日在莫斯科召开，即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有19个党参加，中共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拒绝参加。到1965年底，中国共产党被迫断绝了同苏共以及欧洲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从而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曾有过友好的睦邻关系。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申明：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现在和将来，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两国进行了友好合作。中国政府始终珍重和努力维护中印友好关系，但印度政

府在与中国友好的同时,却进行了一些不友好的活动,如纵容西藏逃亡分子在印度对中国西藏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特别是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以后,印度政府竟公然背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破坏1954年协定,公开支持西藏叛乱分子,掀起反华运动,这就大大损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全部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有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当然一直存在一些争议,并时有摩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方不断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一再挑起边境冲突,并无理地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

在中印东段边界上,即不丹以东的一段边界上,印度把传统习惯线以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境内。早在1945年前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就从印度陆续侵占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度军队大规模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推进。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之后,印度军队竟超越“麦克马洪线”,一度侵占朗久、兼则马尼等中国领土。1959年8月25日,侵入朗久的印军对中国驻马及敦(“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部队开火挑衅,造成中印边界上10年来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

在中印中段边界上,即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到西段的东南段的一段边界上,印度不但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香札、拉不底等地区“划入”印度版图,而且从1964年以后,陆续占据了这些

地区。

在中印西段边界上，即中国新疆和西藏同拉克拉壤的一段边界上，印度把 33000 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画入”印度版图。而且自 1958 年 9 月以来，多次派遣武装人员非法窜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勘查、扰乱和挑衅活动。

中国对印度的一系列挑衅和无理进季行动，据理抗议，一再忍让，努力寻求合理的和平解决办法。中国总理周恩来多次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竭尽全力，在中印两国之间创造一条最和平最安全的边境地带，以根本消除今后发生任何边境冲突事件。还提出双方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 20 公里、双方停止边境巡逻、对有争议的边境地点双方不派驻武装人员等项力避“摩擦冲突”的建议。195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申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为谋求和平解放中印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 1960 年 4 月访问印度，和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

但是，印度政府没有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诚意，而且不断地制造新的“摩擦冲突”，蚕食中国领土。在西段边界，1960 年至 1961 年 8 月，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达 17 起，并以它非法

占领的巴里加斯为据点，扩大巡逻范围，设立新哨所，企图占领桑格藏布河流域印度方面提出争议的 1900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1961 年 6 月，印军 50 余人侵入中国领土乌热地区，修筑了碉堡等工事。在东线，1962 年 9 月，印度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扯冬地区，并且连续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挑衅，制造严重流血事件。对此，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被迫采取自卫措施，还多次建议和平谈判解决冲突，遭到印度政府的无理拒绝。

1962 年 10 月 20 日，印军 10 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西段，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遭到严重伤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反击战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 10 月 20 日开始，在东段歼灭了入侵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的侵略据点。接着，中国政府于 10 月 24 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界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周恩来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呼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但是，印度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并扩大冲突。第二阶段作战：从 11 月 4 日起，印度军队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自 11 月 16 日起，坚决自卫反击，打退了印度军队的入侵，清除了印军设立的侵略据点，并把印军追击到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经过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全歼印军 2 个旅和 3 个旅的大部，共毙、伤、俘印度准将旅长豪尔·辛格和官兵 8700 余人。

中国政府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采取主动措

施,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军从1950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至次年2月完成全线后撤计划。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印军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给印方;并主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印边界纠纷上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保卫了中国领土,捍卫了祖国尊严。

四、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从1957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1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作为自己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持原则,求同存异,不畏强暴,平等待人。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不断发展同其他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中国大力加强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友好往来和友好合作有很大发展。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日益受到孤立,中国加强同受到苏联攻击的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两国的友好互助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大力援助受到美国侵略的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努力发展中越关系;加强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

在外交事务中,中国尤其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和友好合作关系。10年中,先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柬埔寨、伊

拉克、摩洛哥、苏丹、几内亚、加纳、古巴、马里、索马里、老挝、阿尔及利亚、乌干达、贝宁、肯尼亚、突尼斯、刚果(布拉柴维尔)、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中非、赞比亚、达荷美、毛里塔尼亚等国。中国领导人还进行了大量外访活动,并接待了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加强了中外联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民主运动给予无私的援助。对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排华活动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进行了坚决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还努力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1964年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日之间的民间往来,日益频繁,增强了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对待美国,在坚决反对其侵略扩张政策的同时,开始对话。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到1960年9月6日,两国大使级会谈举行了100多次,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毕竟开始谈了。

这一时期,中国先后与尼泊尔、缅甸、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边界。

中国政府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

中外关系,有分有合,总的趋势,合之多而分之少。中苏关系破裂,“一边倒”外交方针终结,中国更加务实地谋求对外关系的进展。本着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五项原则,中国在巩固了一部分已建立的外交关系的基础上,结交了一批新的外交、贸易伙伴,中国的对外关系,确实有了新的发展。当然,在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尤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

党及组织的无私援助上,往往只考虑受援者的政治态度,而忽视了“互利”“互惠”的原则,有时甚至不顾自己的国力而强为之;另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引进,仍处于保守状态。无疑,这些方面对中国的建设不无影响。

第五章 发展中严重 曲折的十年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 的发生与发展

一、“文化大革命”的酝酿

批判《海瑞罢官》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1960 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1 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整顿，到 1965 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党在调整国民经济、战胜严重经济困难期间，尤其是在四清运动前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进一步升级。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指导下,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责、批判,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采取政治斗争和群众斗争的方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伤害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代表人物和一些领导干部。更严重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错误、过火的批判、斗争的升级,则直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作了酝酿和准备。1965年冬和1966年春,在毛泽东支持相继开展的对《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陷害彭、罗、陆、杨等事件,实际上在舆论和组织上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响应毛泽东1959年4月提出的学习“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的号召,于1959年6月和9月,先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两篇文章,又应北京京剧团之邀,于1961年写就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吴晗写作有关海瑞的文章和剧本同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本毫不相干。但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未了还是被“说服”了。1964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更不用说别人了。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

……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也曾谈到：“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姚文元这篇点名批判的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由于中央书记处采取慎重态度，北京各报刊在十多天后才转载这篇文章。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此不满，由此更错误地确认北京市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出现大量不同意见。在江青的直接操纵下，张春桥、姚文元等利用《文汇报》，围绕姚文元的文章，发动了一次“大辩论”，他们暗中把这场“大辩论”称作“引蛇出洞”，通过各种手段收集京沪等地知识分子，特别是知名人士的反映。他们把“放”出来的各种论点分类排队，把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大量反对意见都列入“右派言论”，借此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进行打击。

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

《二月提纲》

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组开了一天会，讨论当前学术讨论问题。参加会议的人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11人。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成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认为，当前学术讨论和批判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对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提纲》要求“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学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

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对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还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问题。《二月提纲》只不过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批判略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中央领导之下。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康生在会上也表示同意。2月8日,彭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和康生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2月12日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批转前康生也画了圈。根据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3月28日至30日,他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向中央进攻。4月1日,张春桥拿出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随后,由陈伯达主持起草。毛泽东7次修改,在5月的中央政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撤

销和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五·一六通知》所附康生、王力编写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也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提出来的。这些都完全不符合事实。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 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苏州，同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22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指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2月2日到20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江青在座谈会上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17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会后，写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认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

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纪要》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地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修改三次,由林彪转中央军委批准,再报中共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开始。

《纪要》批转后,全国报刊对所谓“黑线”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本来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部门、单位,霎时间统统被说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三家村反党集团”事件

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是林彪、江青等人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制造的一个大冤案。1961年夏,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请吴晗、廖沫沙合作,三人轮流撰稿,将这个杂文栏目命名为《三家村札记》,署名则从每人的名字或笔名中各取一个字,称“吴南星”。吴晗

取“吴”字，邓拓取笔名马南屯的“南”字廖沫沙取笔名繁星的“星”字。1966年5月8日，江青策划的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分别在《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发表，批判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并同时刊载了《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加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编者按”。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批判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并同时刊载了《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加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编者按”。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杂志刊登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姚文元在制造罪名时还说，“将上有帅”，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市委。“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使邓拓、吴晗、廖沫沙等许多同志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1979年2月1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是个大冤案。1979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当时毛泽东在外地，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参加会议的成员共76人，包括“文化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分别受到了错误的批判。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以莫须有的“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同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林彪等人策动下，以强加的所谓“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的罪名，对罗瑞卿进行诬陷。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一指责主要是针对陆定一的。同年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如林彪所说，“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会议期间，林彪毫无根据地提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会议于5月23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上午，政治局

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问题。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各种政变事例，大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说什么“最近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制造恐怖气氛。同时，他又别有用心的竭力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经历的事比马克思、列宁多得多，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又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林彪这个讲话，把毛泽东进一步神化。经毛泽东批准，讲话于9月22日下发全国。

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五·七指示》，同样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想。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4月中旬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几次修改，于4月24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决定提交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五·一六通知》的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内容中：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主观臆断，使“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通知》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学术观点的矛盾同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提出要用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打倒、清洗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通知》主张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通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真理的阶级性；割裂“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主张以“破”代“立”。理论和政策上，《通知》混淆是非，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视为“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号召对他们“彻底揭露”、

“彻底批判”，直至夺取他们的“领导权”，“清洗这些人。”

这个《通知》是1957年以后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发展的集中表现，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一个标志。《通知》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基本思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

《五·七指示》

在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段时间，毛泽东看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并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回答了“砸烂旧世界”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的问题，被称为《五·七指示》。在1966年5月15日向全党转发这封信的通知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五·七指示》作了这样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

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发到全党之后,于1966年8月1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向全国作了公布。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把它推向全党全国,就是要使它成为党的纲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和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错误改组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根据《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后来,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分别提出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实际上他们并未参加活动。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陶铸不久受到迫害或打击。《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又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使它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在中央文革中形成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所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极大的祸害。

改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決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市委第二书记。由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组北大党委。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原中央宣传部、原文化

部和原北京市委，被称为“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统称“三旧”）。从而为全面地破坏党的建设，“砸烂旧世界”作了铺垫。

1966年8月12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决定》批准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同时认为，“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其结果是：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谢富治、刘宁一。改组最重要的结果，是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重选主席和副主席，但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而只提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 大字报”与改组北京市委、北大党委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在《五·一六通知》的影响下，在康生的怂恿策划下，在当时在北大的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负责人曹轶直接支持下，北京大学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勇、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7 人于 5 月 25 日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和攻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等传达上级组织提出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积极引导”等正确意见，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破坏文化革命”，“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字报还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并大肆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这份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北京大学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反对。而康生把它密报在外地的毛泽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6 月 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6 月 2 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出，并且发表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文章诬蔑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还说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并鼓动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6 月 2 日，毛泽东批准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

导“文化大革命”。并改组了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同时发表毛泽东批准的北京新市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在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是第一个被“文化大革命”冲垮的党组织。4日,《人民日报》发表《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一文,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煽动文化教育领域广大群众起来同所谓资产阶级“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6月7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共北京市委5月25日的决定和6月3日的决定: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组成;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整顿;撤销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把矛头指向各学校党委或党支部,批判专家、学者、权威,致使许多学校的党委被冲击,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

在这些事件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中一些人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这类“革命活动”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发生。与此同时,各地掀起了“踢开

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迅速泛滥，乱揪乱斗现象开始出现。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即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林彪、“四人帮”为迫害彭真等四位同志而罗织的罪名。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这四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批判。彭真的所谓“错误”，主要是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纲》，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罗瑞卿的所谓“错误”，一是抵制了林彪所宣扬的个人崇拜，二是抵制了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一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多次写匿名信，反对林彪、叶群，二是反对林彪的“活学活用”的提法，三是同彭真一起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杨尚昆的所谓“错误”，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陷。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罗、陆、杨四个人的决定。一时间，所谓“四家店反党集团”的提法，在“文化大革命”中传遍全国。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6月，1980年5月、10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

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

由于学校混乱局面的出现,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966年6月上旬,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中央各部派出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院校,由团中央派出工作组进入北京各中学,协助各学校搞好运动;同时作出了8条指示,提出“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8条没有形成成文指示,口头传达了下去。这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多次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北京先后派出近万名工作组员。此后,许多省、市也采取派工作组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既是惯常使用的办法,又是当时的客观要求。工作组同一部分响应《五·一六通知》的号召起来向党委造反的群众和基层组织之间发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事件。其中,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其中之一。

1966年6月1日以后,北大校园熙熙攘攘,一片混乱。6月7日,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北大校门口贴出公告,大意是:凡校外单位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请不要进入学校内部。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造反者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严厉批评。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揪斗干部、群众的“六

·一八事件”。一些人避开工作组，揪斗干部、群众 40 多人，出现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打人、侮辱妇女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对群众进行了教育，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20 日，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处理这一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这个文件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外地的毛泽东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陈伯达于 7 月 23 日，江青于 7 月 26 日，在北大群众大会上宣称：“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8 月 5 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 1966 年 6 月 20 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 9 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全国教育行政机构首先瘫痪

北京和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纷纷仿效北京大学的做法，开展“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揪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学校的党政干部被诬为“黑帮”、“三反分子”，一批教授专家、教师被诬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和迫害。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彭康，浙江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丹，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郑州大学副校长郭晓棠和各地一批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中等学校的支部书记，相继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或被停职反省。随后，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各级学校，也停课搞

运动。此后，各学校行政领导及党、团组织陷于瘫痪，多数由上级派来的工作组领导运动，有的由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领导运动。

接着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教育部部长何伟被批斗。一些副部长和司、局长陆续被批斗，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及其所属单位的业务工作陷于停顿。各地教育行政机关也出现类似情况，全国教育行政机构首先瘫痪。

党的八届十一中 全会与《十六条》的通过

五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始。针对在各地大中学校、党政文化机关掀起了“造反”浪潮，出现混乱现象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由于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挑动，工作组遭到轰赶。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京，当即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19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刘少奇等人则表示，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形式。工作组大多数

是好的。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7月24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明确指出要撤掉工作组。次日,毛泽东又对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此决定“也适应中等学校”。次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市委的决定,并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这个大会。

此后,全国都撤销了工作组。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普遍发生了揪斗工作组长的现象。全国各学校相继“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

为了再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使之合法化,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1~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到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原订会期为5天,议程共4项: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即5月23日

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等决定)。

刘少奇 8 月 1 日作报告,汇报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严厉指责了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从工作组问题及前一阶段运动形势入手,进而联系到 1962 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内的一些重大分歧,提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外,另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号召炮打司令部。此处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大字报大致勾划出中央领导层内分歧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制定《五·一六通知》直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现在终于达到了顶点。大字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进军的号角。”

8 月 8 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以后,从全局指导

“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还号召“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

《十六条》中虽然也提到了党的领导，也有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诸如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等等要求，但是，既然形势已经那样严重，既然已经确定了“大乱大治”的方针，确定了自上而下的炮打司令部的方向，那么，这些附带提到的规定则实在是太软弱无力了。它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恶性发展，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约束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刘少奇在常委的名次排列由原来的第2位被降至第8位，林彪的名次排列在毛泽东之后，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重新选举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在以后的文件及报刊上都不再被提及。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并结束。这次会议及其所通过的《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

抄家运动

1966年8月下旬至9月,林彪一伙启动支持的,以北京为起点,波及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等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活动。1966年8月18日,在庆祝“文革”大会上,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四旧”,号召支持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紧接着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要求民警给红卫兵提供情况,支持红卫兵行动。这样,北京开始了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以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为名义的打人抄家浪潮。根据派出所提供的情况,红卫兵冲到“黑五类”的家中,责令交出“变天帐”、“地契”,并四处搜查。在抄家过程中,发生大量打人事件。北京大兴县仅8月27日至9月1日6天内就有325名“五类”分子及家属被打死。北京某学校一个班级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抄家,遭受人身侮辱,财产严重破坏,很多人还被遣返回原籍。被抄家的人中除“五类分子”、“黑帮”、“走资派”外,还有像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的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这样的知名民主人士。8月30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赞扬了红卫兵杀向社会的行动。这样使抄家运动波及到全国各大、中、小城镇及农村,一些著名作家、画家等文艺工作者也都被抄家,受到残酷迫害。到1966年9月,随着全国大串联的兴起,抄家运动渐渐冷落下去。

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 崇拜，党的民主集中制遭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掀起，一个重要的舆论途径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行狂热鼓吹的是林彪，其中有两次影响最大。一是1966年5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是专讲政变问题，同时狂热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说：“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后六年就去世了。……中国人口比法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是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二是1966年8月13日，为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又作了

长篇讲话。他又重复宣传“主席是世界的天才”的观点，说：“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并提了干部工作上的三条标准“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他说，“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这样，林彪就把“左”倾方针和个人崇拜的原则，贯彻到了党的思想路线、思想建设和组织路线、组织建设方面来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认了林彪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鼓吹。在全会的公报中离开了党的七大所作的科学表述，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新作了评价：“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我国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报还说，林彪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党我国形成的个人崇拜的狂热，使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

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从而使林彪、江青一伙得以“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个人崇拜的发展，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领导原则和各项制度。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对于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的估计有不同意见时，不能得到充分的讨论，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而是贯彻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的意志。甚至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不经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讨论，也不经过中央全会决定。例如，1967年1月4日，没有经过党中央正式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突然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

大串联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所以有此想法。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

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他的讲话,可以认为是大串连的动员。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说: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个通知的内容是“史无前例”的。从9月5日起,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这种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为古今中外的奇观。中央还几次派出北京红卫兵到全国各地,散布“革命”火种。这种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了数以亿计的金钱,而且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而在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

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大串连的意图。支持大串连，就是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群众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地城市串连。交通十分拥挤，铁路运输不堪负担，车厢厕所内挤进了6、7个人，车厢下的弹簧到了要断裂的程度。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号召有准备有计划地“长征”。多数学生依然乘车，少数学生徒步，周游全国。大量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危及生活和生产。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时届严冬，已有上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上10万人挤到井冈山，还有上万人到韶山。天冷路塞粮缺，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委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而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12月间提出了在全国各地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者的主张，终因难以实行而告吹。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此后又几次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到了1968年，还有少数学生在各地串连。

四、制止局势恶化的努力

红卫兵运动掀起，大串联开始，给工农业生产以很大冲击。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几个文件试图对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加以限制。

1966年6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10条措施，主要是：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必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稿，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明了《通知》的基本点：“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通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下发。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

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这是当时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力图在一定范围内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对国家生产和建设事业的干扰和破坏，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做好以下工作：一、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单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三、各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的两个班子。职工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四、不论是中央直属的还是地方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该单位领导干部的撤换，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五、各单位必须抓好质量、品种、节约、安全等项工作。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出：1. 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2. 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

下来。3. 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批评错误、改正错误。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4. 县以下各级领导,已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这两个文件暂时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冲击,保证了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保持了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依据上述两个文件,周恩来在9月15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突出地讲了生产问题。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周恩来的讲话,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

上引讲话、社论、文件,都有正确的方面。这正确的方面,正说明毛泽东的头脑中还有正确的思想。按照这正确的一面,就不应该以“天下大乱”为指导方针,就不应该支持造反,就不应该批判什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但毛泽东要以“天下大乱”为指导方针,要支持造反,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毛泽东的头脑中既有正确的思想,也有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常常压倒正确的思想。既要“天下大乱”,既要支持造反,就不可能正确对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问题。正是在9月15日以后,毛泽东肯定了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的造反。

江青等人是根本不同意《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

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等文件的。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主张、意图受挫后，由江青、陈伯达等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于9月18日至20日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座谈。在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攻击“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污蔑周恩来“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还提出“中央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都印成材料，江青则把材料上送毛泽东。毛泽东稍稍向正确方面移动了一点，经挑动后又转了过去。

红卫兵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冲击，一直没有停止过。北京敢于冲击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少数派都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都成了闻名全国的“左派”，这对各地造反派来说太具有魅力了。于是，“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成为全国造反派的口号。湖南的造反者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9月9日，长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会上提出了“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九级”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张春桥10月29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说：“全国……到9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

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9月28日,关锋在北京地质学校学生座谈会上说:“对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

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庆祝大会上第四次接见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约1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称:“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的讲话经毛泽东审阅过。周恩来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曾提出不同意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又一个重大的失误,对全国的动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六、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

指示》。《紧急指示》说：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办”，“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文件经中央文革小组逐段逐句修改后定稿，取消党委领导的规定系中央文革小组所加）。中央批示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10月5日中央军委召开大会，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大会，公布《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明《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1966年11月16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也说明它适用于“各单位”。）此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军部队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军队院校和地方学校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引起无数纠纷，进一步加剧了干部、群众与领导的对立和群众之间的分裂。

七、公然鼓动打倒刘少奇

从12月18日下午开始，江青等人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指使蒯大富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竟称刘少奇为“赫鲁晓夫”。12月30日，江青到清华单独接见刘涛（刘少奇之女），说：“你爸爸、妈妈干了反革命的事”，“你应当和你爸爸妈妈划清界限，断绝关系。”1967年1月9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公、检、法来京人员时说：“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1月10日，康生在高级党校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公然煽动打倒刘少奇，不仅极其反常，而且是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践踏。

江青等人煽动，造反派积极响应。12月25日，蒯大富组织6000多人在北京大街上游行示威，出动广播车，贴出大标语和大字报，公然提出“打倒刘少奇”。主要口号有：“全国人民起来，彻底打垮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刘少奇是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广播车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

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还广播了“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一）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二）薄一波必须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三）王任重必须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还帐。”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小报《井冈山》，分别报道了这次行动的情况。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作题为《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她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大会上的发言中，突出地攻击了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全国造反派起而呼应，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澜。

在惊涛骇浪中，周恩来、陶铸等老革命家不随波逐流。12月28日，陶铸在中宣部说：“刘、邓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2月31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清华12名学生座谈，他说：“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过主席，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这样的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当学生问道：难道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

吗？周恩来说：“你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把看法强加于我呀！”

1967年1月23日深夜，刘少奇应召到人民大会堂见毛泽东，提出两项要求：第一，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刘少奇顾全大局，舍己为公，品格高尚。刘少奇的请求，是出自肺腑的规谏和肝胆与共的谋划，甚至可以理解为无可奈何的抗争。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两项请求。

八、“文化大革命”动乱波及全国

为了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13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提出组织上要来个全面调整。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说，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极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县委、地委呢！他还要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活动，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搞乱。

在会议期间，8月18日，组织了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林彪在大会讲：“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

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刊登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说，“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并且在重新发表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中，加进了毛泽东8月5日对这篇文章的批注中的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为了把局势搞乱，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11日、11月25—26日，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到北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总共达到1800万人次。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倡议修改宪法、废除国歌，毁坏重要历史文物，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乱揪乱斗“牛鬼蛇神”，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残、致死。党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遭到严重的破坏。

为了进一步把形势搞乱，1966年12月4日至6日，由林彪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否定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否定了中央有些领导同志的“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出乱子”的意见。林彪在会上说：工交战线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大搞。康生则说：经济基础方面的修正主义更值得重视，必须批判“唯生产力论”。于是，会议讨论制定了《中共中央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它的基本精神是：让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8小时以外的时间，除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由群众自己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有问题，必要的时候，可向上级机关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许厂矿领导打击报复，不准克扣工资，不许开除职工；工人和学生之间可以串连；等等。

同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个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坚持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社队之间、农民和学生之间，进行串连；对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克扣工分；等等。这两个文件，先后经毛泽东批准，发布执行。这样，就完全改变了中共中央关于工厂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扩及工厂和农村，波及全党全国各个角落。

九、全面夺权与大动乱升级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发表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

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消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1967年的政治任务是：工厂、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扬大民主；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个社论，实际上提出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将局势推向更加混乱的状态。

党的地方各级 领导机构被夺权或改组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经毛泽东审定，公开发表。社论说：“坚决接受和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坚决反对奴隶主义，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还说：“这个原则，为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所掌握，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被缴了械。”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还说明，大民主就是“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造反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死了张屠夫，不吃活毛猪。”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团体发去贺电。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肯定上海的夺权，说“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于是，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天下大乱”的局面形成。

经过了二十个月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实现了全面夺权，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此，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二月抗争

经过党的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左”倾方针已经确立，并且逐步贯彻执行。党、国家和人民群众遭受严重的灾难，广大党员、干部逐步由不理解、不满意到进行抵制和反对。

首先公开站出来同“左”倾错误作斗争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十万人大会。首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讲话。他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作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在会上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少数人我很愤恨！”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在大会上也讲了话。

1966年11月29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仍有10万人参加。陈毅在大会上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

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叶剑英说：“如果你们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

两次大会后，在江青等人煽动下，军内造反派批判了陈毅、叶剑英的讲话。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左”倾错误斗争最突出的事件是1967年的“二月抗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在军队召开的会议上，聂荣臻、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委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掌骨震裂。

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议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斗争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的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要扣押陈丕显？”

张春桥推说：“群众不答应。”

谭震林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

谭震林愈讲愈气愤，站起来，穿衣服，拿皮包便走，边走边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斗争的第二个问题是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陈毅揭露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诬陷干部。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斗争的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稳定军队。

叶剑英责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把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把谭震林等人的正确意见，整理成一份 16 日会议记录，说成“反党言论”，根据江青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

2 月 17 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信，斥责江青等人“手段毒辣

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争下去，拼下去。”

17日和18日，周恩来在三次接见干部、群众时，严厉批评对待干部的种种错误做法，号召领导干部坚持工作。

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指责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是搞复辟，搞翻案。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

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康生狂喊：“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他斥骂陈毅说：“你身兼两职，穿针引线，把文武两帮都串联起来了，在这次政变的预演中，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陈毅神情坦然而严肃地答复：“我从来没有搞过反革命串联，更没有策划过政变阴谋！”“难道政治局委员之间不能有来往？！”

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在全会公报中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8年的‘二月逆流’”。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然说：“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在“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中，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

十、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

在混乱局面难以控制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67年7月至9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发表有关谈话。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针对当时大批干部被打倒，他重申“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同时他还提出“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泽东的谈话，力图在全局上肯定和坚持“文化大革

命”的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正某些极左的错误做法。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又从中破坏,不可能有太大的实际效果。

十一、中国 共产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遭各种罪名诬陷的占71%,被剥夺了出席全会的权利。全会召开时,原九十七名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十人外,只有四十人到会,由候补中央委员里面挑选了十名,递补为中央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共七十四人。出席这次会议的共一百三十三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五十九人。而被扩大的人员有七十四人,占出席会议总人数的56%。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周恩来宣布了会议议程:(1)为九大作准备,拟定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2)修改党章;(3)讲讲形势;(4)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

全会在分组讨论中,康生、江青等人借口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的问题,又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遭到批判。朱德、陈云、邓子恢也受到错误的批判。谭震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全会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全会是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继续遭受诬陷和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对刘少奇作出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林彪、江青一伙在会上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被毛泽东制止了。

会议作出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时，陈少敏不畏林彪、江青的高压，拒不表示同意。刘少奇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权力，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从组织上完成了最后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受此案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叛刑的案件，就达二万六

千多件，二万八千多人。刘少奇本人早在1966年冬即被隔离审查、批斗，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在残酷迫害下，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与世长辞。许多老干部因长期受批判和审查，被剥夺了参加党的九大的权利，从而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九大上获得更大的权力提供了条件。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列数刘少奇的所谓“罪状”，是根本不成立的。江青操纵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指使他们用各种非法手段，通过刑讯逼供、制造大量伪证材料。江青得到这些“材料”后，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林彪见材料后写道：“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可见，林彪、江青勾结在一起打倒了刘少奇。

全会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通过了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产生办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这个章程草案极其错误地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全会于10月31日通过公报，公报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的错误论断，对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各项部署，给予了全面肯定，把林彪在会上向党、向老一辈革命家的攻击、诬蔑说成“是正确的”，并且将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制造混乱、冲击党和国家各级组织、打倒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等方面所起的极坏作用，说成是“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从他的“左”倾错误观点出

发,对历时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完全肯定的结论。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使“文化大革命”继续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下去。

第二节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一、中国共产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九大召开前,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的组织,都还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起来。绝大多数党员也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仍处在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

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说,关于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1967

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的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写成一份调查报告。他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同年10月21日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发了姚文元的报告。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作了直接的准备。全会通过了新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的办法。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对九大进行具体的筹备。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句话后来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代表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当时，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2日至13日，代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

委员会。大会共选出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 53 人，仅占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 19%。林彪、江青一伙的不少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4 月 28 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 21 人：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5 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4 月 28 日，党的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

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不复存在。

与以往历次党代表大会相比较，党的“九大”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保密措施，代表秘密进京，秘密进入会场，对外不公布开会日期；二是会议自始至终为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三是会议的基调是大赞大颂和大批，始终看不到认真研究讨论问题，更听不到任何不同意见。除了对毛泽东大赞大颂之外，对林彪和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大赞大颂，还有很多代表赞颂“样板戏”，热烈颂扬江青。“大批”的对象，最主要的是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时也批判

了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和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

“九大”政治报告包括 8 个问题：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③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④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⑤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⑥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⑦关于我国和外国关系；⑧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政治报告的总的意图，是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和既成事实，使全党“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以便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样，政治报告就把“左”倾理论系统化了。它主要表现在：

(1)把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讲的关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一段话，提到“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报告》说：“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报告》说：“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

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2)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提出“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任务。《报告》说:“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要“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强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宝贵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同时,《报告》还提出了“斗、批、改阶段”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又说,“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报告》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为此,提出要“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

(3)在党的整顿和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的“左”倾错误观点。《报告》首先提出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是:“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

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报告》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报告》还把党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历数了各次“路线斗争”之后,说:“我们党正是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报告》说:“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他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同时,他还讲了党的建设。他说:“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

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党的九大提出了进一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所以它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之意，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即所谓夺权阶段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将进入斗、批、改阶段。林彪、江青为了达到进一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必然要继续兴风作浪，因而党和国家、人民还要蒙受长期的灾难。

二、“斗、批、改”阶段的整党建党

1. 错误的“五十字建党方针”与整党方法

党的九大闭幕以后，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整党建党。如何进行整党建党？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建设的要求，后来就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并写入“九大”通过的党章。这个“五十字建党方针”的实质是什么？1970年4月18日康生作了具体解释。他说：“学习、理解‘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

路线联系起来。”“‘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当时的针对性的。”江青也对此作过解释，她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再加上要贯彻“吐故纳新”精神。所以，这次整党建党就是按照“左”倾错误理论重新建设党，并且继续对大批党的领导骨干和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排斥、打击和迫害。

整党建党的实际过程，从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的两个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报告强调：整党建党要“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搞好吐故纳新”，“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整党建党”。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报告中说：按照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整党建党，是不可能风平浪静的，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他们“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系厂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揭露了阶级敌人破坏建党的阴谋；而且还发动党内外群众狠批“有些人企图为旧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要把旧党委某些错误十分严重的人拉到新党委里来”的“右倾翻案妖风”。在整党中，上海国棉十七厂“组织党员大学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

正主义建党路线”；“进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育和党的根本任务（指搞阶级斗争——引者注）的教育”；“进行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和新党章的教育”，“豪迈地提出了‘多织一匹布就是多剥帝修反的一层皮，多纺一支纱就是多抽帝修反一根筋’的口号，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整党建党在组织上实行了“吐故纳新”，开除和劝退了一些党员，有些党员“挂”着，有些党员受到其他党纪处分，同时也发展了一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分子。在此基础上，建立基层党组织。这个报告说：“通过整顿，全厂 31 个支部，7 个总支和厂党委，共有委员 172 名，其中新的占 69%。在 38 个支部和总支书记中，有 28 名是新干部。”这样的整党建党，被作为样板，转发全党参考。

当时转发的另一个材料是北京大学的《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把整党建党同进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同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联系起来；同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文化教育阵地联系起来；同人人需要改造，彻底摧毁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联系起来。”密切联系“北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联系自己中的毒，掀起了‘火线’整党的高潮”。报告又说：“提倡斗争哲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没有斗争的的哲学。……就不能‘清除废料’”，为此贯彻“林副主席所指出的‘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报告强调指出，在整党建党中“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要从世界观上解决恨谁、爱

谁、跟谁走的问题”，经常检查自己，“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看自己站在哪一边，坚持什么方向，执行什么路线。

由此可见，在“斗批改”阶段全党进行的整党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试图对党进行一次“改造”和重建。由于“左”的指导方针、唯成分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扩大化等错误思想的影响，虽然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逐步得到了恢复，但是—些人的党籍被错误是开除，—些人的组织生活被错误地停止，相当—批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被吸收入党，造成党内思想、组织和作风的严重不纯。

2. 继续打击和迫害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些党内外同志，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在“斗批改”阶段中继续遭到残酷迫害而相继去世的。这里包括以下—些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1969年6月3日，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在北京被林彪、江青—伙迫害致死。

1969年6月9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含冤逝世。

1969年11月12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因遭诬陷和残酷的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去世。

1969年11月30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

义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因遭残酷迫害，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970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指挥员徐海东由于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在河南开封逝世。

……

三、九大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

在九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清查五一六”和“打击反革命”。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党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全国逐步开展“清队”活动。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错整了一大批人。

“清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清查“五一六”。1970年3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一方面提出纠正扩大化的倾向，一方面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1971年2月8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成立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提出在清查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事实上，只有北京一度存在人数极少的“五一六”反动小组织，在全国普遍地清查“五一六”，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而清查“五一六”又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出现极其混乱的情况。林

彪、江青等人则利用清查“五一六”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加上当时两派尖锐对立,产生了互揪对方的的所谓“五一六分子”的现象,致使数万计的干部群众遭到打击。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全国遂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由于当时还在贯彻执行《公安六条》,杀人权一度下放给省、市、自治区,而省、市、自治区有时量刑不准,所以不少案件属于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日坚决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被改判死刑就是典型的一个错案。

四、林彪反 革命集团的形成与覆灭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形成的、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标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出现、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林彪就开始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发展自己的势力，会后他取彭德怀而代之主持了中央军委的工作，并大肆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吹捧毛泽东说，之所以出现失误，是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造成的，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在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酝酿把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排列，刘少奇引人注目地由第二降到了第八，而林彪排到了第二，排在周恩来、陶铸、邓小平、朱德等的前面，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会后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此后，林彪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拉帮结派，安插亲信，逐渐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势力发展的高峰。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纲，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进入

了中央政治局，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在政治局占了 1/3，并且完全控制了中央军委办事组。

自党的九大以后，林彪一伙认为他们手中掌握了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权力，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他们在暗中加紧了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1969年10月，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指挥空军的大权私自交给林立果。1969年10月17日，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错误估计，借口“加强战备”，未经党中央、毛泽东同意，就擅自发布“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况。这项命令旋即被毛泽东制止。但林彪一伙却认为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向党进攻。

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分歧与斗争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9月，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阅批了这个请示。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4月11日，林彪提出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林彪的意见，多数人表示同意。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

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林彪仍然主张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7月，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8月初，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该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13日下午，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打电话告诉了黄永胜，黄即报告林彪，林彪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的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语录。林彪一伙坚持设国家主席，首次公然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暴露了他迫不及待要“接班”的野心。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面目开始暴露。

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会议的议程有，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全会的方

针：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会上借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又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其目的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林彪在开幕会上说：“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还用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观点来颂扬毛泽东，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他还别有用心地说：“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次日，陈伯达就草拟了“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又与叶群连夜选编称天才的语录。于是，根据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在西南组说：“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在中南组说：“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反林副主席的风。”邱会作在西北组说：“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他们的险恶

用心，到会的人绝大多数一时都没有察觉，小组会上有些人提出“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在了解了这些发言情况之后，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2号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全会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进行揭发和批判。同时，吴法宪等人也受到了批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对党的路线，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意见。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骨干也开始作检查。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写

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 200 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个借口。”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毛泽东针对吴法宪在检讨中提到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次日，毛泽东又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批示。他写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和以上批示，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1970 年 11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重申了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通知》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比过去更加重大的责任。重要的问题是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求“全

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通知》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6本马、恩、列著作和5本毛主席著作: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③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④恩格斯:《反杜林论》(选读)。⑤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⑥列宁:《国家和革命》(选读)。毛主席5本著作:①《实践论》。②《矛盾论》。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④《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⑤《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了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各单位应

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文件下达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为“批修整风”运动）。

关于“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一方面想把陈伯达同其他人分开，并对林彪作了保护，准备着重解决陈伯达的问题，教育挽救其他人；另一方深感问题之严重，教训之深刻，必须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他在审阅《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时，写了一个批语，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批语。

由于毛泽东亲自倡导和推动，随着“批陈整风”的深入，在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逐渐展开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对于恢复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进一步解决陈伯达问题方面，经过一些反复，逐步得到深入。1970年12月10日，陆军38军党委写了一个《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16日，毛泽东、林彪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毛泽东的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22日，召开了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同时解决北京军区和华北的问题。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宣布改组北京军

区,由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党委第三书记。

在召开华北会议的同时,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有143人参加。出席军委座谈会的人一开始就参加了华北会议。在军委座谈会期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这样,中央政治局于2月19日,邀集各地到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开会,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时期那样。”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的批评,于2月20日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又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为了解决军委办事组一伙人的问题,毛泽东亲自采取了一些措施。如1971年1月8日,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军队中开展了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又如,1971年毛泽东、中共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干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再如,中共中

央 1971 年 1 月 26 日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同年 2 月 21 日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1971 年 4 月 15 日至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 99 人，还有军委座谈会的 143 人，共计 242 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被迫写的书面检讨和毛泽东对他们的尖锐批评。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在总结讲话时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会议交流了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1971 年 4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毛泽东南巡

1971 年 7 月中旬，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毛泽东发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副部长不知道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发现黄、吴等人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情况，扣发了应当下发的有关中央文件。毛泽东恍然大悟，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很清楚，黄永胜等人的后台就是林彪。

于是，从 8 月中旬到 9 月 12 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毛泽东分别同湖北、湖南、广西、

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讲党的指导思想和世界观，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揭露和批评了林彪及其一伙。毛泽东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的。”毛泽东重点讲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他说“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就是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话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

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还不是搞颠倒了么？”毛泽东还提出要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还批评林彪让叶群当他的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并不指名地批评对林立果的吹捧，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成为全党的重要学习材料。

九·一三事件

1970年10月，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组成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取名“联合舰队”。1971年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即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泽东，实现抢班夺权的计划。

林彪集团对毛泽东巡视南方极为疑忌。9月5日深夜，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将毛泽东谈话内容密报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又密报林彪、叶群。刘丰（武汉军区政委）于9月6日密告李作鹏。李作鹏得出三点认识：一是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二是上纲更高了，三是矛头似乎指向林彪。李作鹏密告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又密告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北戴河经过紧张策划，认为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要解决他们的问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命令。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

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一伙决定实行两项反革命阴谋：(1)乘毛泽东外出巡视之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林彪以“接班人”的身分宣布“接班”；(2)如上一计不成，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8日夜，林立果同周宇驰、江腾蛟等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密谋：或用火焰喷射器和四〇火箭筒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或用一〇〇高炮平射打火车；或让王维国带手枪，乘毛泽东接见时，在车上动手；或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动手。9日和10日，林立果等继续具体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又提出了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通过时，炸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他们还提出了让陈励耘派飞机轰炸火车等办法。林立果等人估计毛泽东在25日前不会离开杭州，决定在上海动手。但是，完全出乎林立果一伙的意料，8月31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他听取了江西省负责人关于周宇驰在江西一些反常活动的汇报，提高了警惕。9月3日到杭州后，于8日深夜，专列转移到绍兴。10日下午3时，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并且不要陈励耘送行。10日下午6时，毛泽东到达上海，在专列上接见上海党政负责人，当晚在车上休息。11日下午提前离开了上海，安然地通过苏州硕放铁桥，打乱了林立果一伙的部署。12日，叶群、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后，惊慌失措，即私乘256专机飞去北戴河，准备南逃。

9月12日晚，毛泽东安抵北京。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将林彪、叶群之女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飞机叛逃的报告，转报北京。周恩来获悉后，立即查问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下达限制飞机起飞的命令，还通过李作鹏

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256号专机必须有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叶群、林立果等人眼见阴谋败露，惊恐万状，当晚深夜11点半左右，周恩来接到叶群电话。叶群说：林彪想动一动，需要调几架飞机。周恩来问：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群答：还没有调，林彪让报告总理后再调。周恩来说：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叶群以为这样既可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试探情况，又可通过周恩来之手调动飞机。周恩来机智的问答，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周恩来的警惕，而且使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惶恐。他们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13日零点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人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在途中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秘书。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在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断然发出全国禁空令。雷达发现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行，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他去吧”。林立果在北戴河逃跑前，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周宇驰，告以南逃不成，迅速北上。9月13日凌晨3点多钟，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向蒙古方向逃跑。吴法宪迅即报告。周恩来等下令派战斗机拦截，绝不能让它飞出国境。后来直升飞机飞回，周恩来又下令迫降，如飞进城区就坚决打掉。9月13日凌晨3点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通报了夜间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明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13日上午，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被

迫降在怀柔县境内。被骗去驾驶直升飞机的陈修文，在机上与叛徒搏斗，光荣牺牲。直升飞机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和另一驾驶员陈士印被擒。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他们叛党叛国的大量罪证。14日下午，周恩来得到外交部转来我驻蒙使馆的报告：9月13日凌晨3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乘员9人，8男1女，全部死亡。叛党叛国者自取灭亡。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的“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五、纠正“左”倾 错误的努力及其中断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于9月18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随后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10人组成。9月29日，中共中央通知，决定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

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干、刘贤权 10 人组成”。

1971 年 10 月下旬,《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了全国人民。在全党全国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共中央陆续向全党印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各项罪行材料。1971 年 11 月 14 日印发了《“571 工程”纪要》,使全党了解“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1971 年 12 月 11 日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72 年 1 月 13 日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1972 年 7 月 2 日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这样,就使全党全国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了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于是,逐步在全党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先是 1972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5 月 21 日至 6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 312 人参加。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对于林彪在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了揭露,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及会后毛泽东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中央的有关文件,党同林彪集团的斗争过程系统地作了传达说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比较系统的批判,使人们认清林彪一伙的真面目;但是,又把粉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从而回避了应该吸取的根本教训。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党逐步传达了批林整风的有关文件,全党逐步深入地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克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造成的恶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作了种种努力，使党的建设也出现了转机。

首先，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使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领导干部部分地恢复名誉，安排了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成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遭受打击和迫害，冤案、假案、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指出：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现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篇社论对于重新使用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扫除政治思想障碍的作用。当时，陈正人和曾山在一星期内相继去世。周恩来多次指示，对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普遍进行体检，同时改善医疗条件。同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又抓了彻底清查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和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以及虐待殴打行为。1973年春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抱病主持政治局开会，逐个研究。江青、张春桥等人对此设置种种障碍，百般阻挠。在这期间，周恩来不断排除干扰，使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一大批下放劳动和“靠边站”的原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1973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毛

泽东、周恩来的提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其次，提出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恢复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问题。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就表达了周恩来的这个意图。社论说：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同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极“左”思潮。这3篇文章是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组织写成的。1971年底至1972年，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性。周恩来还批评《人民日报》等几个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他指出：“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纠正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30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1973年3月8日，周恩来在中联部、外交部举行的在京外国女专家招待会上，严厉批判了“左”倾错误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致以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反映了1967年以来中央许多领导干部和党内许多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

强烈愿望,因而在当时得到党内许多干部和党员的热烈拥护。

但是,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主张,当时就受到江青一伙的抵制,而且,也很快就遭到毛泽东的否定。对于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的报告,虽然周恩来批示了“拟同意”,张春桥却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而江青则进一步说:“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大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一个同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表示,这个看法不对,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极右。毛泽东在12月17日的一次谈话中还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传达到了全党、全国。此后,全国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不许再批判极“左”。

六、国民经济艰难举步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爆发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走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党中央和周恩来等积极领导,全国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仍然有一定的发展。

1966年下半年党中央以极大的力量抓生产,尽管“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全国兴起,仍然完成了国家经济发展计划。196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3.4%,其中工业增长15.5%,农业增长9.2%。主要产品产量:粮为4280亿斤,比1965年增加390亿斤;棉花为3674万担,比1965年增长479万担;钢为1532万吨,比1965年增长309万吨;煤为2.52亿吨,比1965年增加1700万吨。国家财政收入558.7亿元,支出541.6亿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88亿元,加上地方筹集的资金共达209亿元,新增职工196万人。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这是我国核工业的一个新成果,极大地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

但是,1967年的工农业生产与1966年不同。由于全国动乱加剧,生产秩序被打乱,武斗频繁,生产中断,运输阻塞,整个国民经济处在半无政府状态,结果是:工业生产下降,财政赤字22.5亿元。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减少9.6%。其中工业减少13.8%,农业增长1.6%。主要产品产量:粮为4356亿斤,比上年增长76亿斤;棉为4708万担,比上年增长34万担;钢为1029万吨,比上年减少503万吨;煤为2.06亿吨,比上年减少4600万吨;原油1388万吨,比上年减少67万吨。国家财政收入419.4亿元,支出441.9亿元。

在1967年6月17日,我国西部地区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绩。

1968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进一步下

降,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动荡不安。工农业总产值只有 2015 亿元,比 1967 年下降 4.2%。其中工业下降 5%,农业下降 2.5%。主要产品产量:粮为 4181 亿斤,比上年减少 175 亿斤;棉为 4709 万担,比上年增加 1 万担;钢为 904 万吨,比上年减少 125 万吨;煤为 2.2 亿吨,增加 1400 万吨。国家财政收入 361.3 亿元,比上年减少 13.9%,支出 359.8 亿元。可见“文化大革命”使 1967 年、1968 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

1968 年 12 月 29 日,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一座现代化桥梁。它是继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之后的第三座长江大桥。这座大桥的建成使津浦和沪宁两条铁路连接了起来,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东部地区铁路运输的面貌。

1969 年,党中央十分重视工农业的生产和经济工作,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抓计划、抓措施,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彬彬的支持下,提出了搞所谓“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不管“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 年的国防费用比 1968 年猛增 34%,严重地冲击了国民经济。但是由于全国工人、农民和干部的努力,改变了 1967、1968 两年生产下降的局面。工农业总产值比 1968 年增长 23.8%。其中工业增长 34.3%、农业增长 1.1%。主要产品产量:粮为 4219 亿斤,棉为 4159 万担,钢为 1333 万吨,煤为 2.66 亿吨。财政收入 526.8 亿元,支出 525.9 亿元,做到收支平衡。

在这一年内,由于苏联四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这一事件加重了党内对国际形势的严重估计,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应当充分作好打仗的准备。对此,1969—1971年间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大为增加,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平均高达11%。

1970年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工农业总产值为3137亿元,比1969年增长25.7%。主要产品产量:粮为4799亿斤,比1969年增产580亿斤;棉为4554万担,比1969年增产395万担;钢为1779万吨,比1969年增加446万吨;煤为3.54亿吨,比1969年增加8800万吨。其它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662.9亿元,比1969年增加136.1亿元,支出649.4亿元,比1969年增加123.5亿元,收支相抵余13.5亿元。但是重工业增长过快,钢铁生产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也过大,造成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同时还过急地扩大内地建设,把大量的资金投在内地,而又形不成生产能力。

1971年工农业生产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工业增长14.9%,农业增长3.1%。主要产品产量:粮为5003亿斤,棉为4210万担,钢为2123万吨,煤为3.92亿吨。财政收入744.7亿元,支出732.2亿元。这主要是从1971年下半年起,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工农业生产有了转机。当时在工业上提出了整顿的方针,在农业上纠正了许多过左的政策,使1971、1972、1973年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

展。

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3640亿元,比1971年增长4.5%。主要产品产量:粮为4810亿斤,棉为3196万担,钢为2338万吨,煤为4.1亿吨。财政收入766.6亿元,支出766.4亿元。

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967亿元,比1972年增长9.2%。工农业的主要产品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粮为5299亿斤,棉为5124万担,钢为2522万吨,煤为4.17亿吨,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财政收入809.7亿元,支出809.3亿元。

在取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努力,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外交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七、外交工作新局面

1972年是中国外交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也是取得成绩最显著的一年。

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奉行着独立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任何国家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各国间的关系和问题。在新中国的外交中,中苏、中美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建交的国家,并在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政府也明确地提出“一边倒”政策。但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由于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功过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到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从友好

走向了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使中苏关系极度恶化。中国政府不得不起来开展反霸斗争。

美国对新中国的成立持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它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和扼杀的政策。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曾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但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召回了它的大使司徒雷登，走上了与中国为敌的道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企图借机再次侵占中国，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中国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使美国的计划遭到失败。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中美关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从对抗走向缓和，同时也促使新中国开始走向另一个世界，与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打交道了。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会议。从此，新中国把以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为原则的独特外交方针和风格，带向世界、征服世界各国。

1955年中美之间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也达成了一项协议。中美会谈从是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长达15年，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可是，这种会谈实属罕见，中美之间互不承认又互相对立，但却有大使级会谈。可是，在这15年中，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与亚非拉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进入70年代，世界形势又有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国

政府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及时地察觉到了这一形势对中国有利的方面。于是采取了果断的决策,发展了6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些外交政策。为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打开中美、中日之间大门而努力。同时,毛泽东在正确分析世界形势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致电联合国,申明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让他所指派的代表参加联合国机构的工作,立即取消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但是,从1950年后的20年中,由于美国的阻挠,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不断扩大,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在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上,表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时,51票赞成,47票反对,第一次赢得了多数。这表明美国政府把中国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的政策已走到了尽头。

1971年10月25日,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一天,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消息传到中国,神州大地为之振奋。

当时正在中国谈判打开中美大门的基辛格博士在和前去

送行的乔冠华的谈笑中，他预言中国当年不会加入联合国。他估计“明年（1972年）差不多，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他上了飞机之后就后悔自己的预言了，因为联大刚刚表决的结果是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驱逐台湾的国民党集团。面对着局势的迅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作出了决定，在大家还议论着要不要去联大的情况下，毛泽东说：“要去，不去，我们就脱离群众了，让乔老爷当团长，组团到纽约去。”

11月，中国代表团顺利抵达美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以致把世界裁军的议程变成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演说。乔冠华铿锵有力的声音震动了联合国大厦。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我国外交战线上的重大胜利，显示了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为中国走向世界，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国际讲坛上，能不断听到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声音。

在中国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中国要真正地进入世界，发展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也最终认识到，没有中国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对美国来说，发展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的中国的关系，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一点，如果说杜勒斯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承认的话，到了70年代，尼克松认识到了。1969年入主白宫的尼克松在对外报告中表示：“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他上台伊始，就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方针和

任务。于是，中美之间跳了一段谨慎的、互相试探的小步舞。

早在 1959 年 3 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东湖边上会见斯特朗和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伊斯夫妇时，他曾经和斯特朗谈了他著名的“纸老虎”的论点。在谈笑风声中，毛泽东说：“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的其他的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容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1970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上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在毛泽东的身边，很显眼地站着两位外国人，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这一次斯诺夫妇访华是在中美大使级第 137 次会谈夭折后，中美两国的沟通渠道阻断了，毛泽东指示“寻找我们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于是，斯诺夫妇便荣幸地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和中国领导人一起庆祝中国的国庆节。但不论是对于当时的斯诺先生还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中国的信息都太微妙了。基辛格后来回忆到，毛泽东、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感地观察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来的信息是那样的拐弯抹角，以至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对于邀请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基辛格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什么？”但当时的美国没有反应过来。尽管如此，美国也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传递着信息。就在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的前两天，尼克松在对美国的《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时，重点谈了刚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在其中有意识地插了一

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讲话。他说：“也许在5年时间里，或甚至10年的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样的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于是，中美之间有了罗马尼亚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

同年10月下旬，尼克松在白宫为齐奥塞斯库举行晚宴。在祝酒词中，尼克松给北京发出了公开的信号：“有这样一个国家，她既同美国又同苏联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这是罕见的。”美国现任总统在白宫的公开场合把中国政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小步舞依然在跳，但毛泽东不耐烦了。他再一次把斯诺请进丰泽园，对他说：“他（尼克松）如果想来北京，你给他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能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他又接着说：“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别的我们不做自我批评。”

也许，基辛格说得对：他们不太了解中国人的表达方式，没有尽早地明白他们的意思。毛泽东邀请斯诺参加国庆大典——美国没有意识到。不论美国政府是不是真的不明白，但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是中国人为了走向世界而做了不懈努力。既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立就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终于看出了美国的直肠子。他直接与斯诺说：“尼

克松可以来中国的任何地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好，不吵架也好……”这一次，斯诺听明白了，美国也听明白了。

就中美互相试探地往前走的时候，一个小球转动了大球。这是戏剧性的，一场历史性的转折开始了。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让世界着实地吃了一惊。乒乓球外交把隔绝敌对了20年，又同枕着太平洋波涛的两个泱泱大国带到了一起。历史选择了这些生龙活虎的乒乓球运动员来承担历史转折的重任。在他们乒乒乓乓的旋律中，奏响了一段雄浑壮阔的大时代变化进程的序曲。

当世界乒坛名将庄则栋与美国青年队员互赠礼物以示友好时，当中美两国的运动员一起外出游览时，当周恩来亲切会见美国代表团成员时，当这一切消息传到美国时，也许在美国只有两个人充分理解这一切的全部意义——尼克松和基辛格。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传来的秘密信件，只有他们两人了解。当大家把乒乓外交作为不同寻常的热门话题谈论了一阵子后，大家又去谈论别的热点之时，中美关系却在迅速的发展着。尼克松决定与中国人进行直接的接触，在前思后想后，他决定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前往北京，他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被觉察”。这位哈佛大学教授为了他的秘密的中国之行做了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经由巴基斯坦飞往中国，同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谈，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月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用三分钟的时间宣读的公告”成了本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当震惊的人们清醒过来问尼克松“是否感到了他的意义”时,尼克松回答到:“只有历史才能说明它确实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美之间的交往,尽管世界上的反映各不相同,有赞成也有反对,但历史总是按它自己的方式前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势不可挡。1972年2月21日,一架蓝白色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缓缓降落,舱门打开,尼克松和夫人出现在舱门口,走下舷梯伸手走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和我们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尼克松在会见毛泽东时也说:“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尼克松的“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历史性的访问期间,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并对他到中国来表示了欢迎。在这次原定15分钟,结果却持续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的会谈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挥洒自如、诙谐幽默、富于哲理又高瞻远瞩的谈吐,向尼克松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为中美历史性对话定下了基调。实质性会谈在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进

行,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作了认真、坦率的交谈,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表述方法: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问题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联合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也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虽然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不断进行磋商,但进程是缓慢的,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他的前期倾向于与苏联搞关系,但是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前,他转而寻求同中国发展关系,就任不久他就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政策目标是“关系正常化”。1977年8月,卡特派国务卿万斯到北京,探索中美关系

进一步正常化的途径,1978年又派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并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建交问题作了努力,双方于7月开始会谈。到1978年底,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12月16日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同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美两国的建交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也是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在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用三分钟的时间向世界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以总统身份即将访华。这个消息震惊了日本岛,以至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佐藤荣作愤怒得青筋暴跳。战后的日本一直追随美国,实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现在,美国在没有和日本商量的情况下,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把日本扔在了一边。难怪日本人惊呼美国搞“越顶外交”,也难怪记者在问佐藤关于中美两国发展关系的感想时,怒气冲冲的佐藤吼道:“他(尼克松)自己不是说了吗?这是本世纪的伟大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恼怒的佐藤被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淹没了。1972年7月,佐藤政府下台。“庶民宰相”田中角荣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担负起考虑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重任。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田中于9月25日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田中首相,双方就邦交正常化举行了会谈。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9月29日,签署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声明指出: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双方决定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派大使。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不正常状态,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也迅速地发展起来,70年代成为中国的一个建交的高峰期。截止1975年,西方国家,包括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自中苏关系交恶后日渐疏远。到了70年代后,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开始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并加深了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友谊。此时的中国依然站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一边,并同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7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50个增加到120个。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也有了更加广阔的外交天地,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和平力量。

正确地认识70年代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是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外交工作作出的又一个巨大贡献。首先,由于美苏两国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科学技术力量、国内经济力量的发展变化,出现了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现出苏联取攻势,美国处于守势的状态。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方向发展。1974年苏联战略核武器已赶上美国,并在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已处于优势地位。苏联的近海防御海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增强,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政策,以试图取代美国,称霸世界。为此,苏联凭借其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利用美国深陷侵越战争泥潭之机,加紧对外扩张,向美国展开全球攻势,争夺世界霸权,致使美国从70年代一开始便处于同苏联争夺霸权的被动地位。苏联的这一对外政策,不仅对美国是如此,对中国也极力推行扩张主义,使中苏关系更加紧张。苏联不但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加强军事部署,而且支持越南侵柬反华,并出兵占领阿富汗,形成了从北面、南面和西面包围中国的军事形势,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其次,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了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中心。使美国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逐渐由原来的“盟主关系”变成平起平坐的“伙伴”关系,帝国主义阵营出现了分化。东欧各民主主义国家也较明显地表现了对苏联的离心倾向。苏联对它们的控制能力也在下降。再次,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他们不仅成为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作为重要的经济力量而兴起,要求建立以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

根据上述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又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向外宾阐明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同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新战略思想。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是第二世界。”从此，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推向了国际社会，引起了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理论，揭示了进入70年代后世界局势的基本格局和国际斗争的战略态势，让人看清了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是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它明确指出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谁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依据这一理论，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依靠第三世界，争取同第二世界的联合，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苏美霸权主义，重点是反对在争霸中处于攻势的苏联霸权主义。从而形成了中国70年代的对外战略路线。即从中国、日本、欧洲，一直到美国结成一

条线,加上抛弃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基本观点和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决定各种关系的态度,从而转到推动世界反霸斗争和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国际活动的出发点上。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70年代中国的外交工作有了大踏步前进,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第三节 江青 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一、中国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部分准备在会上宣布解放的老干部也应邀到会。共计246人出席了会议。

关于党的“十大”的主题,会议确定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会议并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的办法和修改党章的原则等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认为,产生代表的指导思想要以中国共产党“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

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以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为依据。即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为指导。“十大”代表的条件是：“一、所有代表都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员。二、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第10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三、本人历史清楚。”这里，虽然规定可以选举受到打击、迫害的而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中的少数人当代表，但只是作为陪衬。而且继续歧视、排斥知识分子。关于修改党章的原则和方法问题，与会同志同意经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所作的规定。确定党章修改的重点是总纲部分，其条文个别地方也需要改动；原总纲中讲林彪的一段话全部删去；在修改中，要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还决定，党章的修改，由王洪文负责的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在政治局领导下进行工作。

5月2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5月25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他说，各级领导回去不能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生产当然要抓，但要注意路线问题。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生产就搞不好。毛泽东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毛泽东还引用《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一段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

徒”，提出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等 13 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毛泽东的讲话有些好的思想，如主张解放老干部，对老干部的功过要全面地历史地进行分析评价等。但是，他在总的指导思想继续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也是“左”倾的。

1973 年 8 月 12 日至 19 日，“十大”代表按所在地区、单位分成 34 个组分别在各省市区党委所在地举行预备会议。为了保密，按照中央规定，预备会议一律以办“学习班”的名义秘密进行。在预备会议上，大多数代表除在文字措词方面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表示同意中央认可的以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为基调和前提的三份“十大”文件草稿。在“十大”文件准备就绪后，中央于 8 月 20 日晚在北京召开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着手进行“十大”组织工作的准备。选举准备委员会由 104 名委员组成，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选举准备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商“十大”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8 月 22 日至 23 日，选举准备委员会分成 4 个组进行小组讨论。讨论中，委员们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大”主席团名单草案、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赞成由张春桥担任大会秘书长，拥护中央关于开除林彪等人党籍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73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开幕，到 8 月 28 日闭幕。鉴于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等人叛

党叛国，中央领导机构已不健全，这次大会是提前召开的。“十大”代表共 1249 人，代表全国 2800 万党员。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的议程是：①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②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③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大会选举了 148 个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政治报告》说：“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关于林彪集团，《报告》说：“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会有一个认识过程。”“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说：“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务是：在国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坚持无产阶

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说,修改党章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删去了有关林彪的话。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增写了:①“这样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编者),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②“三要三不要”,“批判修正主义”;③“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④“老、中、青三结合”;⑤“党的一元化领导”;⑥“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等。

28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上述两个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95人当选为中央委员,124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批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在组织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30日,举行了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

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总的说来，“十大”的筹备和召开是十分仓促和草率的。“十大”的所有代表是通过所谓“民主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的，而且“十大”一反常规，既不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也不对代表逐个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在王洪文、张春桥一伙的操纵把持下，把河北省一个还未入党的“造反派”头头封为“十大”代表，说这个人“在组织上虽未入党，但在思想上却早已入党”。同时，在“十大”召开之前，并未举行九届三中全会，仅以中央工作会议来研究筹备工作。而且，从筹备到“十大”开幕，仅3个月的时间。筹备工作的组织领导，大会的文件起草，又主要为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把持。代表们在预备会议期间，曾对“文化大革命”中揪斗“走资派”的许多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有的不同意把经常运用“四大”武器写入党章；有的建议从党章中删去造反组织“红卫兵”、“红小兵”等词汇，有的认为，“实际生活中没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建议党章中删去这一提法，等等。对这些正确意见，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以中央党章修改小组的名义印发“通报”，对代表施加压力。在这种条件下，“十大”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延续“九大”的“左”倾错误。

表现在政治指导方针上，“十大”仍然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

基本路线,坚持“文化大革命”。并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当作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且预言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表现在组织建设上,“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九大”党章的继续,在基本内容、基本精神方面都是一致的。正如王洪文所承认的:“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如,用毛泽东论述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取代“八大”党章的党员 10 条义务;取消党员权利的条文;取消新党员预备期的规定;取消设置中央书记处的规定;取消设置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规定;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只抓“阶级斗争”,而对党员的教育、监督、管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学习科学、文化、业务,或讲得很少,或只字不提。所有这些,“十大”党章都沿袭了“九大”党章的错误。而且,“十大”党章在“左”倾错误方面还有发展,如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提出“反潮流”原则,要求党员具有“敢于反潮流”的精神。这些是“九大”党章中所没有的。

同时,在“九大”时,毛泽东选择林彪当自己的接班人,这本来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错误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作法。”但是,“十大”关于接班人问题又是毛泽东个人一槌定音,选中王洪文作接班人,毛泽东赞扬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年纪轻,经过工农兵三条战线的考验,一个人就决定让他参加

政治局的工作，然后又通过“十大”让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并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一度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二、“四人帮”的形成

党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又一个严重危害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集团。

江、张、姚、王“四人帮”是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开始，是怀有个人野心的江青和张春桥的勾结。1963年12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批示说，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许多共产党人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江青就此打起搞“文艺革命”、“戏剧改革”的旗号，开始活动。她在北京的活动受到北京市委的抵制，于是跑到上海得到了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柯庆施让张春桥给江青当助手。1965年，江青到上海组织写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同张春桥、姚文元进一步勾结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逐渐成为一个小帮派的核心。他们利用中英文革小组的名义，趁着全国大乱的局势，进行拉帮结派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帮派体系。于是，江青的野心就日益膨胀起来，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党的九大前夕，她

又提议,党中央多设几位副主席。1972年9月,王洪文由上海调中央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1973年8月,党的十大之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从而完全形成了“四人帮”,在中央机构取得了更多的权力。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作自己实现“女皇梦”的军师和闯将,张、姚、王则把江青当作靠山和领导。

江青一伙为了最终达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收罗了一批野心很大的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他们的骨干分子以上海为“基地”,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都有一批。江青一伙,以提拔新生力量为名,把这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头头封为“十大”代表,塞进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还把王秀珍、徐景贤、马天水、于会泳、金祖敏、周宏宝、祝家耀、唐岐山、夏邦银、谢静宜等一批亲信和骨干拉入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帮派体系。这些帮派分子也把江青奉为领袖,表示要对她效忠到底。在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变本加厉地继续制造动乱,危害党,祸国殃民,给党的建设以严重破坏。

三、第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864名。这些代表并不是自下而上由人民群众民主选举,而是通过所谓“民主协商”产生的。有的人就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

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名义参加大会的。

1月5日至2日大会举行预备会,讨论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13日大会正式开幕。会议议程是:修改宪法,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大会由朱德委员长主持。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张春桥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把所谓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作为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这就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宪法又把“四大”即“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规定下来,这就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权提供了合法手段。这次制定的新宪法,对人民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的规定,与以前的宪法相比大大地退步了。

周恩来抱病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报告还指出:为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极性。

17日,全体代表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²²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¹²人为副总理。虽然张春桥及其帮派人物钻进了国家领导人行列,窃据了部分重要职位,但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没有得逞。

四、一九七五年的整顿

一九七五年整顿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按照四届人大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任务,在许多同志的协助下,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10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就完全打破了江青一伙阴谋夺权的

计划。1975年1月13—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十二人为副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彻底挫败了“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四届人大之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了中央工作，批判极“左”思潮，整顿国民经济，纠正“左”倾错误，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以及毛泽东也认为林彪是“极右”，因此使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再遭破坏。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骤然下降，全国形势再度恶化。

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后，面临着各方面的困难，但他毫不犹豫地开展了各方面行之有效的工作。他提出当时党的各项工作要按毛泽东的三条指示办事。这就是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召开了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学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对各条战线上的工作进行了整顿。1975年3月5日，邓小平接见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代表时说：“抓革命，主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这是对思想领域讲的，在组织上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好的表扬，不好的要批评，屡教不改的要处理，严字当头，矫枉必须过正。”他强调，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经过几

个月的努力,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开始有了好转。主要表现在:

长期堵塞不畅的铁路运输面貌大有改变,运输量节节上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特别是“四人帮”帮派分子的干扰,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运输长期堵塞、事故不断,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1975年3月,为了整顿铁路运输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根据邓小平在工业书记代表会议上讲话精神和该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第9号文件),明确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健全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坚决的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徐州铁路局比较混乱,首先进行了整顿,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逮捕了破坏铁路运输的造反派坏头头,对一小撮犯罪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经过努力,运输状况明显好转。过去二十一个月中没有完成运输计划,4月份就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并创造了全国铁路日装车数历史最好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大大提高。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了装车计划,全年铁路货物运输量由上年的下降5.3%变为增长12.7%。

工业生产停滞与下降局面有了改变,并开始迅速回升。1975年5月,邓小平主持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任务,限期扭转下降局势,要求从冶金工业部到各个厂都要建立一个好的,也就是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

落实对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等方面的政策,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和规章制度。6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中共中央1975年第13号文件),要求欠产较多的几个大型钢铁企业限期扭转生产下降的局势。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不仅不再欠帐,而且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量。钢铁生产开始回升。接着邓小平抓了整个工业的整顿。8月18日,他谈了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国务院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这个稿子虽然并未形成正式文件,但对实际工作却产生了积极影响。工业生产迅速上升。1975年比1974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完全扭转了1974年工业下降的局面。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受到很大破坏的情况,国务院决定对农业进行整顿。在9月中旬开幕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并且提出要落实农村政策等正确的主张。中央还专门发出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全国抽调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进行整顿,落实政策,鼓励社员搞正当的家庭副业,调动社员积极性,使1975年的农业产量比1974年增长4.6%。

经过短短时间的整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975年的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11.9%。主要产品产量:粮为5690亿斤,比1974年增长185亿斤;棉为4762万担,比1974年减少160万担;钢为2390万吨,比1974年增加278万吨;煤为

48200万吨,比1974年增长6900万吨。国家财政收入815.6亿元,支出820.9亿元,收支基本平衡。1975年11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返回地面。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回收技术,也是宇航技术研究上的新成果。

在军队工作整顿和建设方面,为了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一伙对军队工作的恶劣影响,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叶剑英、邓小平作重要讲话,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和要求。邓小平强调军队必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军队本身的团结。军队建设中要克服“肿、散、骄、奢、惰”的缺点,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为军队的整顿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军委确定将几十万超编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把压缩定额而省出的经费用到军工生产上,以利于改善军事设备。在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上,邓小平重新提出学习雷锋的问题。会议作出了对军队进行整顿的决定,要求自上而下地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加强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改善武器装备,搞好战备训练。这次会议,对于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军队中的流毒,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对江青集团的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经中共中央转发后,对全国各条战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科技、教育、文艺等方面,1975年7月,中央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尽快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胡耀邦等到职后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对

科学院的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展科学事业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9月26日,胡耀邦向国务院作了汇报。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所提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所、室领导班子的意见;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对有水平的人要爱护和赞扬,发挥其作用;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技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他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邓小平还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邓小平还强调要办好教育。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为了纠正江青一伙肆意破坏党的文艺政策导致的后果,邓小平还强调文艺政策要调整,并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作为“毒草”而禁锢的电影。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科学、教育、文艺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工作,使长期受到精神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使不少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

邓小平还强调党的整顿的重要性。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以后,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党、政、军各级组织软弱、涣散,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派性膨胀、生产下降的严重混乱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他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央政治局内对“四人帮”进行了多次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但“四人帮”竭力进行干扰和破坏，并伺机进行疯狂的反击。1975年3月，“四人帮”借批判所谓“经验主义”，攻击周恩来、邓小平，8月又借此所谓“投降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虽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但不可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况且，邓小平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从而着手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底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政治开始走向安定团结、经济刚刚回升的较好局面又遭到破坏，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邓小平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整顿的指示。他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针对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这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从2月到10月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邓小平在这些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

想。主要内容是：(一)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国内也有许多事想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二)全国各方面存在着整顿问题。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班子“软”、“懒”、“散”。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三)要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弄得不得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四)在整顿中要落实政策。快些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中年干部有比较多的经验,要发挥他们的作用。青年干部的提拔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来,否则不是爱护他们。对劳模、老工人,要注意落实政策。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臭老九。(五)要抓规章制度。这是保证产品质量所必要的,不能叫管、卡、压。工业整顿后,利润还是要抓。既要抓政治,又要抓利润。(六)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不能把整个现代化教育水平拉低。要提高教师地位。(七)要搞好科学技术。科技是生产力,科学落后要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八)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九)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精神实质。

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邓小平的讲话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落实干部政策

1975年4月底,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的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实政策的一次重大行动。邓小平又将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他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贺诚的任职报告上作了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治

病。”这又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邓小平抵制“反经验主义”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称:“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21日,《人民日报》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中,根据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的口径,再次引用毛泽东1959年关于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语录,并说:“1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4月4日,江青接见工人时讲话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讲话中又提出:“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3、4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张春桥等人提出“反经验主义”,是攻击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在造成“反经验主义”的声势以后,为了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姚文元指使新华社向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4月,他就“反经验主义”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4月23日在对新华社的上述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并要求将“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再次作了批评。他强调要坚持“三要三不要”(按: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按:指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然而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又于5月27日、6月3日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发言中,主要就江青等人说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

题三件事,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质问。政治局其他一些委员也作了批评发言。王洪文作了一点检讨(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也就此结束),江青等人不作检讨。会后,毛泽东在同邓小平一次谈话中,肯定了会议“有成绩”。

五、周恩来逝世与天安门事件

周恩来长期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建国后,一直任政府总理,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了心血,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伟大的人格,使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声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1976年1月10日、11日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5日下午4时45分,周恩来的遗体送八宝山火化。百万人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伫立在寒风中向周恩来告别,几十里长街上发出一片悲泣声。遵照周恩来生前遗言,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12日至14日,首都群众4万人,在北京的外国朋友2000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40多个国家、政党发来了唁电和唁函。14日,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无数的花圈、千万朵白花。15日,首都举行追悼会,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悼念活动的问题。当天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并且提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2日,要求北京各单位传达这个通知,并派出民兵、警察干预、制止人们的悼念活动,派出便衣人员跟踪、逮捕参加悼念人员。3日凌晨,又将放置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品撤走。这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更明显地转向对“四人帮”的批判、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4日(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数十万。广场放满了精制的花圈,灯柱上吊满了条幅、花篮、花圈。人们从早到晚举行宣誓、默哀、讲演、朗诵、抄诗等活动。4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问题。有人在会上说:“在纪念碑前送花圈 2073 个,单位 1400 多个单位次……诗词、悼词、小字报,有 48 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 1974—1975 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天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政治局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像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

花圈转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错误地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调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在报告毛泽东后,5日凌晨撤走并销毁了广场上所有花圈,逮捕了一些人。群众更加愤怒,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群众又听说值勤人员中有人污辱周总理,有人污蔑群众,义愤填膺,砸毁和烧毁了汽车,烧毁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群众和民兵、警察都有被打伤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下午6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他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上9时半,1万名民兵,5个营的卫戍部队,3000名公安人员带着木棍包围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并且逮捕了38人(前天逮捕39人)。天安门抗议运动被镇压下去了。6日凌晨,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准备“更大事件发生”,决定继续组织3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4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后,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7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时,指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

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1)首都,(2)天安门,(3)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第一个决议全文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全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把人们对“四人帮”的声讨和对“左”倾错误的抗议说成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人们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根据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向中央打电报表示支持中央的两个决议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全国各地组

织了拥护中央决议、声讨邓小平的游行集会，并且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北京市公安局立案追查的共 1984 件，北京前后共拘捕 388 人。各地也采取了类似的镇压措施。10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污蔑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4 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诬称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总后台”，说“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为后来粉粹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这次运动是人民群众自发的行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怀疑、不满，对“四人帮”的义愤的总爆发。一方面出于对周恩来伟大人格的景仰和对周恩来的哀悼，另一方面以悼念周恩来和杨开慧等烈士的形式表示对“四人帮”的愤怒和对“左”倾错误的抑制。许多诗词、悼词和讲演指出江青、张春桥等人是祸国殃民的“野心家”、“阴谋家”，提出“打倒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广场上出现了许多如“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之类的诗词，表示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决心。这些诗词迅速传遍全国。这次运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他们提出了反对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要求，尖锐地指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强烈要求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明确提出：“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六、毛泽东逝世

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1943 年 3 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从 1945 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1976 年 9 月 9 日 0 时 10 分在北京逝世。9 月 9 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11 日至 17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 7 天隆重的吊唁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吊唁和守灵。首都 30 多万机关干部和其他各界群众，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参加了吊唁仪式并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北京的国际友人也参加了悼念活动。60 多个国家、政党送来了花圈。200 多个国家、政党、组织以及著名人士发来了唁电或唁函。9 月 18 日，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同是停止一切娱乐活动，首都百万群众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会后，全国县以上地区也开了追悼大会。朝鲜等 30 多个国家和政党也先后举行了追悼大会。

七、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毛泽东刚逝世，王洪文就背着中央政治局，布置他身边工作人员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吊唁期间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王洪文报告。9月11日晚和12日上午，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王洪文此举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从12日起，迟群等人动员人们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12日，迟群、谢静宜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了“效忠信”。23日，姚文元布置新华社给江青写信。江青多次要看毛泽东的文稿和手迹，还骗取了毛泽东同杨得志、王六生的两次谈话记录稿，并加以篡改。江青一伙还四处游说，煽动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毛泽东逝世的当天，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家要坚定、镇静，要特别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9月9日和10日，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和省知识青年办公室讲话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

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张铁生的讲话记录送给毛远新。9月末,江青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江青离开大兴分校时,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王洪文在10月2日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标准像”,3日又到北京市平谷县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把眼睛睁的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9月16日,“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写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17日起,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临终嘱咐。中央报刊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连篇累牍地加以宣传。江青一伙把自己标榜成毛泽东的忠实继承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夺取最高领导权。这时,“四人帮”加紧了与上海的亲密的秘密串连,企图以上海为据点反对党中央。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了8月间丁盛(南京军区司令员)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张春桥对徐景贤说,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件事情总是要牵连你们的。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23日,王

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28日，张春桥又派他的秘书肖木去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话：“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现在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真正受过严重考验”。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把原稿“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删掉，并且指出，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6个字错了3个。张春桥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上述批语的下达。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宣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说明他们加快了夺权步伐。

在毛泽东病重之际，“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已于8月15日至25日突击向上海民兵发枪7.42万支，大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又发各种子弹600多万发，炮弹1.5万多发。9月11日，王洪文不通过党中央和中央办公厅，擅自在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组成与各省、市、自治区联系的电话网，并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要求重大问题都要直接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9月19日，江青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说要讨论“重大问题”，并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也要参加常委会。9月21日和28日张春桥两次要上海死党加紧为武装

叛乱做准备。9月29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梁效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声称谁要改这条“遗言”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绝然没有好下场。文章影射攻击中央领导是“修正主义头子”。“四人帮”已拟定了政变后党和政府部长以上的人选名单,并照了标准相,还到处散布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

在党和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的情况下,9月下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研究了粉碎“四人帮”问题。10月6日晚8时,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果断行动,欢庆这一伟大胜利。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我国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7日,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了消息,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从1976年10月上旬开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通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

1976年10月8日至15日,中央政治局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粉碎了“四人

帮”，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8日，华国锋在会上说，这一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帐。搞“四人帮”，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列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宣布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通知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中央号召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热切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通知强调：要注意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反对王、张、江、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采取有力措施消除派性，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通知还说：“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通知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会。24日，首都10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吴德在大会上讲了话。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外的在京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以及在京的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高度评价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与此同时，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党羽准备制造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保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会议期间，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叶剑英在会上指出，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只是“初

战的胜利”，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得长时期努力。

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企图进行垂死挣扎，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为了稳定上海局势，党中央先在南京部队和江苏省的一些地方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人民立即起来响应，工人、民兵纷纷宣布脱离“四人帮”及其余党所把持的“工会”、“民兵指挥部”的控制，拥护党中央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阴谋宣告破产。

10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上海市委的工作。10月7日，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并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纷纷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从10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中，全国3个直辖市、21个省座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集会和游行的人数达5000多万。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解决保定问题的布告,指出:保定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根子就是“四人帮”。布告重申要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在此之前,中央已成立了由秦基伟负责的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规定了解决保定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按照中央的部署,从11月16日起,党、政、军、民密切配合,着手解决保定地区长期武斗的“老大难”问题,共扫除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了数以万计的枪枝弹药,逮捕了21名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和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夺回了被“四人帮”一伙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开始恢复。

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初步揭批了“四人帮”在宣传理论战线上的罪行,并部署了继续揭批“四人帮”的任务。由于华国锋等所犯“左”的错误的影响,会议只提“批右”,不提批“左”。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宣传口五人领导小组由耿飏负责。

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指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对于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同时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

12月10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发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国迅速掀起了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反革命罪行的斗争。此后,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三也相继下达,对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恶历史及其反革命罪行在各方面的表现,并清查其帮派体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汪东兴负责。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社论指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全部反革命的要害,是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建立法西斯的帮天下”。

197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乘胜前进》。社论指出:1976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中心任务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

1月10日至25日,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唯生产力论”,把人们思想搞乱,破坏国民经济的罪行,提出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叶剑英在会上讲话时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和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6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文章:《彻底埋葬“四人帮”,打倒辽宁太上皇》。文章指出:“‘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是骑在辽宁3600万人民头上的一霸,是辽宁太上皇。‘四人帮’通过他大搞反党帮派,把辽宁变成他们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7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关于辽宁省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斗争情况的报告》。《报告》揭发了毛远新及其亲信在辽宁的大量罪行,并认为从今年2月中央采取措施解决辽宁问题以后,辽宁形势已有了好转。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在邓小平讲话后,《人民日报》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揭发和控诉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和残酷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罪行。11月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章指出,“四人帮”在1971年利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文教大权,强制推行“两个估计”,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文章说,1972年周恩来着手解决教育战线的混乱现象,被“四人帮”攻击为所谓“复

辟”、“回潮”。1975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整顿,也同样被攻击为“反对两个估计”、“篡改教育革命方向”。“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它仍然束缚着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教育革命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材、多出人材的进程”。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必须彻底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文章发表后,教育战线掀起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

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一些文艺界同志举行座谈,控诉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扼杀“文化大革命”前一切优秀作品,残酷迫害优秀文艺工作者,篡夺文艺界领导权的罪行,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党的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11月28日至12月20日,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批了“四人帮”诬陷、迫害和歧视侨眷、归侨、歪曲篡改党的侨务政策的罪行;肯定了广大华侨心向祖国、热爱祖国,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重申和明确了党的侨务政策。

11月30日,中共河南省南阳地委召开有三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愤怒控诉“四人帮”在1974年制造“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罪行,为受害干部、教师平反。《人民日报》12月9日刊登这一消息的同时,发表了中共河南省委、南阳地委、唐河县委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揭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并在评论员文章中指出,“这一事件,是继‘两个估计’后一个强加在广大教师身上的精神枷锁”。

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在

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了新时期公安战线的方针任务。

12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在京的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党内外知名人士举行小范围的座谈会，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25至26日会议扩大举行，出席者达300多人。与会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对宣传工作的破坏和对宣传工作者的摧残，围绕着加强理论工作、制订各项宣传工作计划、整顿和建设宣传队伍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中，各级党委多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敢于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把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以及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左路线的人，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出来。同时，又注意掌握政策，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使清查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

在揭批查斗争胜利进行的过程中，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依照党章的规定，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组织处理。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王、张、江、姚是一伙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全会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到 1978 年底,历时两年多的揭批查“四人帮”运动胜利结束。通过揭示和批判,广大党员和群众基本上分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初步肃清了其流毒和影响。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活动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基本查清。

第六章 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节 文革结束初期的徘徊

一、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一个极宝贵的历史契机,也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抉择:是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顺应民心,集中精力和智慧,着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延续“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方针,仍以“阶级斗争为纲”,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更趋落后?

在历史抉择面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及国家领导人之间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共产党员认为,要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不但要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摧毁其帮派体系,而且要彻底纠正党和毛泽东一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而当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等少数领导人,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和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为口号,赞成揭批“四人帮”,但反对纠正“左”倾错误,准备继续沿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口号和理论,阻碍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些分歧,不仅是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而且是思想路线上的分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分歧在思想认识、具体实践和重大原则问题上日益显露出来。这样,华国锋等人的错误成为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使得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徘徊不定、步履艰难。

党内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坚持实事求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上。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其后领导揭批查斗争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工作。然而,华国锋坚持“左”倾错误。华国锋的这种错误集中表现在粉碎“四人帮”不久,他提出和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6

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了当时中央宣传工作的汇报后,针对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况,提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这里,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基本思想。在12月25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在报告中,继续坚持毛泽东的错误理论。他在讲话中,为揭批“四人帮”定下了一些框框,指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强调“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1977年1月21日,在华国锋的讲话稿中,已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他强调“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

1977年1月8日前后,为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全国人民自发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纪念活动中,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出来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通过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在首都和其他一些地区反映出来。对此,华国锋背离了全国人民的愿望,竭力设置障碍,压制人民群众的要求。

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经汪东兴决定并由

华国锋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这篇社论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继续下来。这就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这篇社论一发表，立即遭到党内一些同志的反对。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态度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对。”以后还当面向汪东兴等指出：“两个凡是”提得不对，马恩列斯没有讲过“凡是”，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讲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我们要高举这个旗帜，就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为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2月8日，华国锋根据“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新的形势下向我们党进攻的一种手段”。对于攻击华国锋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要予以覆盖。对于攻击和分裂党中央的政治谣言，要予以驳斥，对这类大字报和政治谣言要由公安部门进行追查。”《通知》要求：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

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由华国锋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任编委会委员。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从4月15日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首批发行2800万册。第五卷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八年的一些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前,文件起草人在为华国锋准备报告的过程中,华国锋亲自召集他们很有系统地讲了对这个报告的想法,从内容和结构都做了布置,中心意思就是要按“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企图扭转人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注意力,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报告起草时,叶剑英曾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华国锋表面上接受叶剑英的意见,但在会上却仍然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他甚至还把邓小平的问题同“四人帮”余党的反革命翻案联系在一起。中央三月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贯穿“两个凡是”的方针,坚持“以阶级斗

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要求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要求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达到天下大治的八项要求；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并说，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经中央反复考虑的。他在会上还再次强调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这样，中央三月会议成为一次继续“左”倾错误的会议，为拨乱反正设置障碍的会议。

二、邓小平恢复工作

“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贯彻和实行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对此，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极为焦虑和不安，他们纷纷起来对“两个凡是”展开批评。它有力地限制了华国锋错误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影响力，使党的工作在徘徊中有所前进。

在“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气氛中，邓小平在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的方针。1977年4月，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坚持努力下，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都对，一个人绝对

正确,没有这回事。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尔后,在7月16日至21日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华国锋在会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又对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还谈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他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邓小平提出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在说到实事求是目前在为什么重要时,他说,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

实话，弄虚作假。他提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达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全党行动，这一科学判断的提出，把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和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明确地划清了4个界限：

(1)划清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同林彪、“四人帮”对它的歪曲的界限，推动了当时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2)划清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同“两个凡是”的界限，为人们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3)划清了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界限，指导了当时的拨乱反正工作；

(4)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从本本出发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的界限，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导，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人们抵制这个错误方针的信心与力量。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邓小平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块试金石。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对华国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

批评。尽管这次会议一开始，华国锋就对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但是陈云、王震从党的利益出发，顶住这种压力，分别在自己的小组里公开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说，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这些义正辞严的发言，虽然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让登会议简报，却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陈云、王震的提议虽然没有成功，但揭开了拨乱反正的真正序幕。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职务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十分强烈。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所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有条件的，华国锋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

经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长达九个月的斗争，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

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决定体现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恢复马克思主义路线,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恢复工作,对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业绩,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领导职务的恢复,给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极大鼓舞,人们继续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而呼吁、斗争。终于在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反对“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388人,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8年4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于是为这些无辜者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以后,各地对同类事件也分别作了决定,郑重宣布平反。

三、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是:(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3)选举中央委

员会。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有：

(一)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报告》总结了我们党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的反革命谬论，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阴谋，揭露了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面目，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报告》重申必须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报告》的这些内容都是正确的。

(2)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报告》错误地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高度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被载入史册。《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报告》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的任务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提出“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报告》没有提到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左”倾错误，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党面临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反“左”。这表明华国锋不仅没有克服“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反而在新的

历史时期,将这种“左”倾错误更加系统化了。

(3)要求干部“三个正确对待”。《报告》在干部问题上,强调三个正确对待,即“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实际上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阻挠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种以党员自身修养要求出现的“三个正确对待”,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实际的危害。

(4)提出了“抓纲治国”的8项任务。这包括:①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②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③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④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⑤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⑥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⑦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⑧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报告》还提出,要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并把这些工作继续纳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

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分8个部分:(1)关于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2)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3)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4)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5)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6)关于党的干部路线;(7)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8)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

《报告》指出,我们党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还指出,“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党的重要任务。《报告》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这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报告在某些方面也沿袭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提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提交大会的新党章,虽然对“十大”党章作了不少修改,但未能从根本上否定党的九大和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在关于党的性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上都沿袭了“九大”党章的错误规定。关于“文化大革命”,在“十一大”党章总纲中,仍认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

邓小平在会上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群众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夺取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

一种政治局面。

邓小平还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国面目一新，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还有不少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真正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新胜利。邓小平的讲话给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拨乱反正的“十一大”透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鲜空气。

党的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初步成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为动员全党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就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因而，从根本上说，党的十一大未能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党的十一大之所以没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反而加以延续，在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召开时，粉碎“四人帮”仅十个月，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虽然较早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及其严重后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正确意见对中央的决策还难以发挥作用。从主观上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和推行“两个凡是”，在指导思想上继承和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理论；同时，在中央的集体领导班子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央起着主导作用，大会进行过

程中虽然有些代表对报告的一些提法,包括阶级斗争问题,上层建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等等,提出不同意见和修改的要求,但华国锋并没有采纳。然而,这次大会上邓小平作的闭幕词以及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党的优良传统等方面的重要思想,给正在徘徊中的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启发和指引了广大党员为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 201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2 人。

8 月 19 日,举行了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飏、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政治局候补委员有: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政治局常委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四、国民经济初步恢复

1976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冻结各单位存款的紧急通知》,指出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唐山地震自然灾害的重大影响,全年财政出现了较大的亏空,如果不立即改变这种情况,就会严重地影响国家建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冻结各单位的存款。这项措施作为权宜

之计,起到了延缓财政赤字扩大,缓和商品供应紧张的作用。

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会议号召广大农村揭批“四人帮”,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这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看到江青一伙对农业破坏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到长期阻碍农业发展的“左”的错误,因而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要求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等,把农业政策继续推向“左”的方向。

1976年,是“四人帮”对生产建设破坏最严重的一年,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长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增长7%到7.5%的指标;其中农业增长2.5%,比计划要求的4%低1.5%;工业增长1.3%,比计划要求的8.2%到9%低6.9%到7.7%;钢产量2046万吨只完成计划的79%,倒退到五年前的生产水平;财政收入完成776.6亿元,比上年减收39亿元,还比不上1974年的水平;企业管理普遍混乱,大量工厂停工停产;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粮食由调出变为调进,浙江作为全国第一个粮食上《纲要》的省,由鱼米之乡变为吃大量返销粮。在这种形势下,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尽快摆脱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在最短的时期内,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

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1980年

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当时,发展农业的当务之急,本应是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使广大农民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积极性。但是报告却脱离这种实际情况,提出用最大的努力来加快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并要求到1980年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这样的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

2月2日至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破坏铁路工作的罪行,明确指出,197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九号文件)是正确的,它在当时推动了全国铁路形势的好转,对工业交通生产建设起了促进作用。会议确定了当前铁路运输的任务,要求五、六月平均日装车达到5.5万车;上半年客车正点率达到95%以上,货车正点率达到85%以上,都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会议还研究了铁路管理体制问题,重申铁路运输仍按1975年九号文件规定,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3月1日至13日,公安部、铁道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代表们总结交流了铁路治安工作的经验,讨论了整顿铁路秩序的措施。经过整顿,铁路管理混乱的状况逐步有所改善。到4月份,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提前超过了5.5万车,平均日卸车和煤炭运量也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3月3日至1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抓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

主义积累,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起了积极作用。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对1977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作了安排: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8%。粮食产量5950亿到6000亿斤;钢2300万到24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250亿元,比上年减少23%。3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将《汇报提纲》转发给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3月28日,国务院将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坚决压缩和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请示报告》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执行。经过努力,基本上控制了几年来社会集团购买力持续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3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冶金工业会议。会议主要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破坏冶金工业生产建设的罪行,讨论了冶金企业整顿问题。会议要求,各个冶金企业都要迅速把生产指挥系统和岗位责任制等各项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在年内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会议以后,经过大量整顿工作,鞍钢、武钢、本钢、太钢、马钢、重钢、攀钢等重点钢铁企业的“老大难”面貌有所改变。全国钢铁生产逐步回升,到10月份钢铁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月水平。

4月18日,在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各地区和各部门负责同志的会议上,华国锋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他在设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料的情况下,还贸然地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

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当时,不少部门和地区把这称作“新的大跃进的动员令”。

4月20日至5月13日,中共中央在大庆、北京两地连续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提出要狠抓企业整顿要求。1977年先把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整顿好。会议还提出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增产节约的高潮,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

7月6日至8月5日,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先后在昔阳和北京召开。近几年来,在没有因地制宜地做好科学规划的情况下,全国每年冬春都有上百万干部、上亿农民参加农田基本建设,规模越搞越大,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不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破坏了农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可是这次会议不但没有纠正这一情况,反而还继续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要求各地区来一个比赛,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会议以后,许多地区搞了大批建设工程,投入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到10月底,全国已经铺开的工程达到39万多处,到11月中旬,全国投入的劳动力已经达到8000万人。这些工程大多数没有什么实际效益,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7月8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开展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的工作。1977年1至5月,累计工业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5%。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国务院决定成立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要求,亏损企业必须制定具体措施,限期转亏为盈。

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一个今后八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国家计委提出,在“五五”计划后三年和“六五”计划期间,除抓紧把1973年批准的43亿美元进口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拟围绕着长远规划的目标和任务,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需要四百亿元。这样的建设规模超过了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

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改变了过去那种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回升,并且在生产总量上有了新的发展。工业总产值3月份以来逐月增加,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8%。80种主要工业产品5、6月份的产量,绝大多数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29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有24个上半年超过了上年同期水平。工业生产这样迅速的好转,带有很大的恢复性,然而《报告》却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形势,认为这样标志着“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使3000多万职工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时,批评国家计委原先制定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在他的影响下,一些部门制定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10月29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煤炭工业长远规划设想。对于今后23年煤炭工业的发展,煤炭部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到1985年煤炭总产量要搞到8.8亿吨,到1987年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到本世纪末搞到20亿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今后八年,要建设10个年产5000万吨和10个年产2000万吨的大型煤炭基地。

11月9日,冶金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规划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到1980年钢产量搞到3500万吨,力争达到3800万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求今后三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铁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第二阶段,到1985年钢产量搞到6000万吨,力争搞到7000万吨。第三阶段,到1990年钢产量搞到1亿吨。第四阶段,到本世纪末,要拿下20几个鞍钢,使全国钢产量达到1.6亿吨以上,超过美国。显然,煤炭部和冶金部的规划都是脱离了客观实际的高指标。

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提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这种过分宣传高速度的气氛,助长了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

1月2日,新华社报道:遭受强烈地震破坏的开滦煤矿,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恢复建设,1977年12月平均日产煤7万吨,达到了地震前的水平,3日,国务院为此向开滦煤矿发了贺电。华国锋在贺电中提出了“把开滦煤炭产量搞到五、六千万吨的奋斗目标”。

1月4日至26日,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有的同志已经看到并正式提出,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但是,在华国锋的“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会议仍脱离实际地提出了“全党动员,决战3年,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的口号,并且号召各省、市、自治区来一个比赛,看谁化得快,化得好。

2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6月13日,又报道了四川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实验。安徽省委和四川省委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在1977年11月和1978年2月制订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坚持按劳分配,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发展多种经营;慎重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两省农民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农业生产,有很明显的效果。在这些政策精神的鼓舞下,一些地区大胆冲破多年来“左”的一套束缚,开始了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的探索。

2月26日至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做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四届人大以来的工作,号召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仍然坚持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理论,提出“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无疑是一次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报告》中重申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并把它作为我国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华国锋概述了国务院《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奋斗目标,作为新时期总任务的具体内容。这些目标是: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从1978年到1985年的8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8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矿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华国锋还向大会宣告,“我国国民经济已经走向了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这个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的《十年规划》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

3月6日至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为了逐步解决28年来城市建设方面积累的大量问题,会议决定:除京、津、沪外,全国47个大中城市,试行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成5%,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控制

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认真抓好城市规划工作;加速住宅及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9月7日至13日,国家建委召开城市住宅建设会议,提出今后为了加快城市住宅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群众各方面的积极性。到年底,城市住宅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全年竣工的住宅面积为3752万平方米,比上年的2828万平方米增长32.7%。

3月2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精神鼓励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

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这个文件对整顿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对企业的任务、基本制度以及工作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如何搞好工业管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是当时指导工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深入开展新时期总任务的宣传学习运动的通知》。由于当时是把《十年规划》中的一系列高指标作为新时期总任务的实际内容,这就使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的倾向愈加严重地表现出来。6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基本建设汇报提纲》,

再一次强调了要实现五届人大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二〇〇〇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显然，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提纲》还提出：1978年至1985年的8年内，初步安排的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为4000亿元，平均每年500亿元以上，高峰年度将达到800亿元以上。这样的投资规模大大超过了我国的财政负担能力。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小平指导下写的，并由李先念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驳斥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对按劳分配原则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文章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决不是什么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奖金、计件工资同计时工资一样，都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行之有效的报酬形式。我国当前的问题不是按劳分配原则实行的“过了头”，而是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实现。我们应当坚决地有效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这篇文章澄清了“四人帮”在商品货币理论上制造的一些混乱，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从本质上说，都不能提供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并不能产生资本主

义。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发展的很不够,必须大大发展。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一方面认为,近两年国民经济迅速好转,很快就可以消除“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因而笼统地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飞跃,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实验教训的基础上,又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比如: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在经济管理工作中,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要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保障工农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等等。李先念在会上就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根据过去二十八年的经验,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还必须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决不能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9月30日,中央转发了这个讲话。

9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在当时华国锋的“左”的组织新的跃进、加快实

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的思想指导下,会议最后拟定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都存在着过高过急的毛病。计划要求:1979、1980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到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到12%;1979年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57亿元,比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1978年又增长15.7%。由于生产建设任务安排得大了,1979年计划中,物资、财政、外汇都留了相当大的缺口。燃料缺1500万吨;财政收入指标,有20多亿元地方部门不接受,没有落实;外汇支出大于收入100亿美元。同时,会议又正确地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上来。

9月10日,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1978年当年再追加4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以来,由于工农业生产恢复得比较快,财政收入比原定计划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全局看,这部分收入应较多地用于解决人民生活方面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大部分用到了基本建设上。1至8月,国家共追加基建投资35亿元,使本来已经很大的基建计划更加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委又提出再追加48亿元基建投资,而这时国家手中掌握的机动资金只有10亿元,远远不敷再次追加大量投资的需要。国务院批准这一方案后,使

全年共追加的基建投资,总数达 83 亿元。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总规模由年初计划的 332 亿元,增加为 415 亿元。全年实际完成 395 亿元,比 1977 年增加 100 多亿元,增长 34.6%。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由 1977 年的 1400 多增加到 1700 多个。由于基建投资大量增加,加上其它一些因素,1978 年的积累率由 1977 年的 32.3% 提高到 36.6%。

11 月 25 日,国务院同意财政部的报告,决定从 1978 年起,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恢复奖金制度。改变企业办好办坏一个样的现象,把企业经营成果同企业和职工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五、各项工作逐步转入正轨

1977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党校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举办高级干部读书班、中级干部读书班和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10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10 月 9 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办好党校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党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集中到一点,就是有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出党的干部都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和

失败教训,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胡耀邦在讲话中回顾了党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要求来党校学习的同志要刻苦钻研,互相促进,继续探索还没有被认识的真理,时时意识到时代赋予的重任。

8月23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了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问题。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考验干部、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要从教育训练着手。一方面要提倡苦学苦练,一方面要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军委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为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8月29日,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12月12日至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肯定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讨论制定了继续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叶剑英在会上讲话,强调部队要抓好十项任务: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的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四、加强党的建设;五、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六、加速装备现代化;七、搞好精简整编;八、加强后勤战备建设;九、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在会上着重讲了关于揭批“四人帮”和整顿领导班子、国内国外形势、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整顿纪律和加强团结等五个大问题。他还提出了部队要培养“两用”人才的著名观点,即: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后,既能打仗,又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

部,使我们的战士成为一兵多能的战士。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等文件。

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访问我国,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共产党重新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重大步骤。

9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十一大党章的规定,决定中央一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改称党组。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也要按照上述原则办理。党中央各部委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要建立党委。

9月27日至10月7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召开全国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有关问题。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加强我们党对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领导,发展统一战线,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现在全国共有8个爱国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共有成员约7万人。

10月23日至24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1978年召开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并规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是: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听取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宣传部。中宣部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中宣部部长由张平化担任。

12月27日至29日,全国政协四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1978年春在北京召开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在讲话中回顾了统一战线的历史及其作用,重申我们要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社会主义服务。强调要彻底批判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等。方毅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事业情况的报告》。

1977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粮食产量达到5655亿斤,比上年减产71亿斤;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3728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收支相抵,结余31亿元,扭转了过去连续三年收入完不成计划,支大于收的状况。市场情况开始有所好转,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7%。但这些较快的增长,带有恢复性质。1977年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没完成计划;煤炭、电力供应紧张;许多企业管理仍然混乱,大约有30%的企业还没有扭转亏损;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差;对改善人民生活

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当时本来应该针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提出调整的任务，但是却不适当的提出了国民经济大发展的要求。这是战略决策的严重失误。

六、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至 1978 年间，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围绕“两个凡是”的争论以及局部拨乱反正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日益感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关键所在。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有一个逐步展开、为人们认识的过程。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到 1977 年底是第一阶段。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从 1977 年底到 1978 年 11 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第二阶段。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1977 年底，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1000 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难题。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么！根据他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

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备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绝大多数学员都同意这两条原则。学术讨论时思想相当活跃。

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内部发表文章，论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人民日报》等报刊开始出现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但有人设置禁区、下禁令，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已在相当范围内展开，批评与抵制“两个凡是”，程度不同地涉及真理标准问题。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文章认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有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一部分赞成，一部分提出问题，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一重要文章。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对一段时期内在检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混乱，进行了有力的拨乱反正。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

(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文章认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

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践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

(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文章认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为新的理论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

(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文章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序言和宣言本身的某些修改、毛泽东对自己文章的修改说明,“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文章提出“科学无禁区”,要敢于去触及“四人帮”为禁锢人们思想而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弄清是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

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这篇文章从思想路线和基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在全党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拥护。然而华国锋却采取了压制的态度，他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中共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说它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汪东兴还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并批评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负责同志“没有党性”，汪东兴针对当时全党要求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潮流，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180度的转变。他还责令《红旗》杂志编辑部不要表态，授意一些省、市和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此也不要表态和介入，批评了已表态支持讨论的同志，企图压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对这一讨论仍采取压制的态度。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由罗瑞卿主持起草和修改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又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回答了“两个凡是”论者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种种责难。文章认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不但在于马克思科学地形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这些学说为以后斗争的实践所证明的时候。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不但要看它形成时是否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文章认为,革命导师从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也从不认为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一些根据个别情况而作出的个别论断。这些论述,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把被颠倒了了的真理标准重新颠倒了过来,得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普遍赞同。

7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再次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从6月到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理论、宣传工作

者组织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阐述真理标准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650余篇。一个理论问题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和讨论,这是建国以来所空前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思想建设上的一大进步和转变。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七、平反冤假错案逐步开展

反对“两个凡是”以及以后大规模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人们的思想枷锁,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党的组织建设,为平反冤假错案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指导,具体认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们党在“两个凡是”未被完全冲破的情况下,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写的《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指导下写成的。文章指出,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是好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对于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要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而不能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

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此文带头为平反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

这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文章刊发以后,全国各地反响强烈。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中,广大干部群众给《人民日报》和中央其他有关部门寄来了一万多封感谢信。来信表示赞同文章的观点,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有人在来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一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一下子有了希望。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强调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人民日报》10月7日和11月27日的这两篇文章,为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的准备。

同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与此同时,党中央在组织上采取措施,加强党的组织系统的领导工作,推进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的开展。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中组部立即召开小整风会议,整顿了中央组织部机关,成立了干部分组、干部接待组、老干部生活组,开展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许多老干部到了中组部,看到部里出现的新气象,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我们这些十几年没有家的人,现在又有家了。”中组部首先抓组织路线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作为组织路线方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冲破“两个凡是”的

束缚和以前“左”的办案思想与方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新局面。

这以后，中组部连续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落实干部政策。1978年1月28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又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每次到会讲话都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党的大问题。他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做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由于我们党在思想上、舆论上和组织上作了大量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党的组织战线的党员和干部敢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枷锁，在当时仍然受“左”的思想影响的情况下，迈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步子，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带头作用。

中央组织部的几次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以后，各地区、各部门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种种干扰，推进了落实干部政策、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到1978年7月,只经历短短的三四个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到年底,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受审查未作结论的190人,其中已结案的130人;原没有安排工作的261人,有189人安排了工作。并对一些疑难案件的处理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1978年8月10日,《组工通讯》第10期发表《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文章,提出在落实干部政策、复查、审理积案中,需要认真清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指控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案件。决不能把一般性错误搞成政治错误,把政治性错误搞成“恶攻”言论。必须合情合理地分清是非,划清敌我,万万不可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冤假错案,必须平反、改正。同月17日,《组工通讯》刊登《“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一文,指出,“四清”运动中有些地区和单位,在一段时间里,把干部队伍中的问题看得过重,对有些定性不当,处理偏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些同志,当时有的作了纠正,有的没有来得及纠正,现在应当实事求是地纠正。

然而,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种种思想顾虑,怕弄得不好会被扣上“为坏人翻案”的帽子,再犯错误,有的则怕平反多了会“否定文化大革命”。针对这些思想顾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

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两个不管”的正确方针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尖锐对立的。胡耀邦的这一讲话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组织战线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和信心,推进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到1978年底,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受迫害的干部和各条战线的专家、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工作。在此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也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反革命案件。如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定为反革命的案件28000多件,到1978年底,已复查的占24%。在此期间,各级组织在落实干部政策中,还开展了清理干部和职工档案材料的工作,把打击迫害干部职工的诬陷材料、派性材料和其它不应收入档案的材料清理出来,销毁掉,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978年1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还发出关于侨眷、归侨入党、提干等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正确看待海外亲属关系问题,对侨眷、归侨入党、提干应和国内其他人民一样,不要因为“海外关系问题”,把他们拒之党门之外。

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对我国的文化教育等部门的诬陷不实之词,也开始进行平反的工作。

与此同时,根据实事求是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过去反右派斗争中的案件,进行了平反改正。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

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规定，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第二节 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底，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基本结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一度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然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还严重存在。由于十年内乱，我国本来已经落后的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以至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拉大了；我们本来较有战斗力、威信很高的党，因为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搞得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国家急需摆脱政治运动不断的状况，集中力量搞四化建设；党急需加强思想、作风、组织建设，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任务。正是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面临战略抉择的历史关键时刻，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张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必须尽快结束粉碎“四人帮”两

年多来徘徊不前的局面,全面展开了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党的建设,把社会主义事业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历时36天(闭幕式之前开了34天,之后开了2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出席218人),分6个组讨论。11月10日下午举行开幕会,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2)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根据邓小平会前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要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华国锋代表中央常委提出,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并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他在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全党关心的大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

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为陶铸、王鹤寿的问题平反；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等等。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 6 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11 月 25 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并决定撤销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包括原中央专案二办）、“五·一六”专案联合办公室，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中央的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

在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与会同志首先分析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进展情况。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重要决策，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与会同志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在讨论农业方针问题时，揭露和批评了农业战线上的一

些“左”倾错误的表现,对《关于加快发展农业速度的决定》作了重大修改,提交三中全会审议。

在讨论 1979、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时,与会同志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等问题。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就经济工作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要重视八亿农民这个大头,把农业搞上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会议对犯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和中央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并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的意见。

12月13日,会议闭幕,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发表了讲话。

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主要内容有:

(1)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而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分析了思想僵化的四

个原因：一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使人们不敢动脑筋，想问题；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这就使人们不愿去动脑筋，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邓小平接着列举了思想僵化的危害，即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2)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

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他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千万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指出,纠正一批重大的冤、错、假案,目的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邓小平还谈了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大革命”,他认为不必匆忙去做总结。

(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认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对此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叶剑英讲了三点意见:(1)领导班子问题;(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勤奋学习,解放思想。华国锋在讲话中,总结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并表示关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问题,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闭幕式后,各组讨论了两天,工作会议胜利结束。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全面准备。

十一届三中召开及其意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坚决地拨乱反正，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第一，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全会重申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强调应当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指出，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现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全会决定永远废止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这些决定，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的否定，从而促使党的政治路线更好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全会深入讨论并一致认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三，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组织路线。

全会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崇拜，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全会指出，任何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党纪党规党法面前，都是平等的。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予以追认。在全会结束后三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长，并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上述决定标志着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

第四，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全会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试行。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系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四化建设所必须的科学教育工作。上述思想，是中国共

产党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第五,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全会鉴于过去由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不够健全的严重教训,强调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国家各级机构的建设,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和国家工作两年徘徊、步履艰难的局面,在领导工作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从此,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重又走上正轨。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和搞好党风的问题。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告》。陈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以帮助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3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告》。《通告》指出,当前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定要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把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通告》还规定了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各项重要原则。它们是:①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②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④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态度;⑤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⑥敢于斗争,刚直不阿;⑦认真走群众路线;⑧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1979年7月9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关于纪律检查工作的汇报并交流经验,分析了当前党风、党纪的基本状况,研究了进一步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坚决而有步骤地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问题。会上,胡耀邦作《关于搞好

党风,严肃党纪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对当前如何搞好党的建设提出下述要求:

- (1)教育党员干部坚决执行和维护党中央所确定的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一整套政策;
- (2)认真地坚决地同派性作斗争;
- (3)把各级党的组织生活搞正常;
- (4)努力克服一部分党员,特别是党的某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腐蚀党的肌体的歪风邪气;
- (5)恢复党内斗争的优良传统;
- (6)有步骤地改革党的干部制度。

这次会议之后,新华社曾报道全国党的纪检工作的开展情况。报道指出,中央和各地方纪律检查机构恢复以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边建立组织边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党多数地方和多数组织建立了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已在全党发生重大影响;中纪委查处或批转了15万多封党员和群众来信;中纪委用很大力量,正在直接调查审理几个重大案件和党的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据1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这些地区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配合党委组织部和公、检、法部门,共计受理了“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申诉案件385万多件,已经调查处理了3268000多件,约占受理案件总数的85%。福建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收到信和接待来访49万多件(次),已处理和正在处理的约占总数的90%。在查处的党员违反党纪的34400多起案件中,包括7个省、市、自治区的县以上党员干

部的案件 590 起。这些情况反映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正有力地促进着党纪党风的好转。

1980 年 1 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了当年纪检工作的中心任务。黄克诚在会上指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抓党风、党纪,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贯彻执行,保证全党按照中央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胜利前进,这比抓一般的违法乱纪、官僚主义、特殊化、破坏财经纪律更为重要。在这次会议后,中央为加强对党的纪检工作的领导,又批转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及以下各级党委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同意将各级党的纪委会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

这样,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审查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

1979 年初,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了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参加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于“两案”牵连人数众多,清查工作极其复杂,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党中央决定对“两案”有牵连的人员实行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政策。审理、复查这些

重大案件得到公、检、法，总政、空军、海军和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中央纪委在“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参加单位的积极协作下，一年来，审查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审定了“两案”中受审人员“依法判处”和“纪律处分”的两个名单；提出了对两个集团起诉意见书的草稿。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供了可靠的起诉材料。

中央纪委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对于直接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康生、谢富治进行了审查。

1980年9月，中央纪委对康生问题审查结论证明：康生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

1980年9月，中央纪委对谢富治问题审查结论：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他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蜕化成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林彪、江青两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要成员。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谢富治的“悼词”，开除其党籍。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

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人的“悼词”，并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

中央纪委还审查核实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追随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大搞阴谋活动的罪行，根据他们的罪行分别给予了党纪处分，并建议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和追究其法律责任。

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委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提供的直接的、确凿的罪行证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决定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两案主犯。其他同案罪犯，将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军事法院陆续分别审判。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起诉，指控和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8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以上7名罪犯均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鉴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主犯在叛逃中摔死，特别检察厅按照刑法条文规定，不予起诉。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拥护这一正义判决。

三、冤假错案的全面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华国锋

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虽然有了突破性的开展，但还是阻力重重，只能在局部较缓慢地进行。据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 1700 多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约占 17%，党中央、国务院副部长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总人数的 75%，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和连累受害的亲属等，有将近 1 亿人口。这是一个繁重的任务。但是，从不少地区的情况来分析，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展还很缓慢。比如，浙江省受迫害的干部 11 万人，当时纠正的还不到一半。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到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在三年多时间里，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文革”前的冤假错案。

其中主要有：

(1)为刘少奇冤案平反。刘少奇案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由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最大的冤假错案。中央在 1979 年 2 月决定，由中纪委、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经过一年的工作，复查结果提交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全会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直接控制的专案组所作的审查报告，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罪名，均属蓄意陷害，应将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同时，也为因刘少奇冤案而受株连的数万人平反。

(2)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政治事件和一大批干部平反。1979 年 1 月 4 日，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

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以及一大批由此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2月17日，中央发出为彭真平反的通知。3月5日，中央为肖劲光平反。3月21日，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3月28日，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4月18日，为因“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三家村”、“黑线”、“黑面”、“黑会”、“黑线回潮”等受审、被批判和被株连的人们平反。6月8日，中央为陆定一平反。9月5日，中央组织部为陶铸平反昭雪。12月6日，中央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1980年1月10日，中央为谭震林平反。5月20日，中央为罗瑞卿平反。7月15日，中央批准中组部报告，为1966年前的中组部平反。7月24日，中央为肖华平反。8月4日，中央为杨献珍平反。8月21日，中组部为受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而迫害的同志平反。8月26日，中央为李德生平反。

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3)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中央许多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不实之词。1979年1月，中央同意并转发中宣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2月28日，中央批准文化部党组为文化部彻底平反。3月9日，中央撤销了所谓中央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3月16日，中央批准为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同月，中央作出撤销1971年8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推翻了“两个估计”。5月，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因此而受批判的人员和作品平反。同月 12 日,中央批准国家体委的报告,推翻体委系统“独立王国”的罪名,为荣高棠、李达平反。与此同时,各地也为“文革”中定为“保守派”、“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平反。

除此之外,其他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都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平反和改正。

从 1977 年底到 1982 年,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 300 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为 47 万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籍,给 12 万党员撤销了原来的处分,解脱了数以千万计无辜遭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这样不仅分清一大批人的历史功过是非,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四、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

党的理论工作

务虚会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顺利进行,中央对党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1979 年 1 月 7 日至 11 日,中共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

工作的根本任务。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在会上作了讲话。他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

为了讨论研究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理论工作如何开展,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作会议引言,讲了召开这个会议的由来和开会的方法。他说,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关于形势和任务。邓小平说: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说已经可以胜利结束,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便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两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在三中全会

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他指出:“对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全面的估计”。“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总之,从各方面看,我们国家的面貌比之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重新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谁要是不充分估计这一切,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困难,而且有些困难是比较严重的。不看到这一点,也会犯大错误”。现在“还存在着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帐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

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此外,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他强调,“我们完全有信心克服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现代化的胜利”。

(2)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他说,从思想方面来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还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尽管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两种思潮

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需要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邓小平特别指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的事业”。同时,邓小平还强调了搞好党风的重要性,“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3)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邓小平对此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对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些要求”。邓小平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

小平还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第二，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邓小平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的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等。邓小平强调：“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

最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来作出的“巨大的成绩”，“希望这次重要的会议能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并且通过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这次会议认为，宣传和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会议对“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继续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和“左”倾指导思想歪曲了的重大理论问题，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观

点予以纠正。会议要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这次会议,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促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贯彻。邓小平在这次会上首次提出了对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有重大意义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概念。以后,邓小平又在1980年1月1日举行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茶话会上,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国民经济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和初步贯彻

1月1日,5日,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有很大缺口的问题,陈云作了两次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查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3月3日至25日,为了贯彻落实中央调整的方针,国家建委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基建战线调整问题。大家总结了建国以来基本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表示一定要在三年内把基本建设的调整工作做好,坚决扭转长期以来存在的“长、散、乱”的局面,努力提高投资效果,保证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根据会议的讨论,国家建委起草了《关于

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文件,并且指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发展带有很大的恢复性质,一些主要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的和不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会后,各地各有关部门相继成立了清理在建项目领导小组,截止10月底,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对未列入今年计划的大中型项目,停缓建了222项。

3月8日,陈云在一份讲话提纲中谈计划与市场问题。主要内容是:(一)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理论是来之于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二)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所以,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三)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四)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

3月14日,陈云、李先念就财经工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以下意见:1、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2、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3、现在

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4、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5、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6、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所有这些,都对国家计委正在进行的调整 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起了指导作用。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经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陈云和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云讲了四点意见:(1)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我国有9亿人口,80%在农村,现在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2)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不能认为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下来是修正主义。在一定情况下,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3)用三年时间来调整。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调整的目的,是要达到比较按比例地前进。(4)到2000年钢的产量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并准备将这一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这

次政治局会议,是在经济建设上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形成“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总结讲话时再次强调:我国底子薄,技术落后,有9亿人口,而农民占80%。搞四化建设必须从这些特点出发,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中央任命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央的这一决定,经7月1日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议题是讨论修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目前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后,只是着重解决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文化大革命”中及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对经济计划没来得及充分讨论。会后,李先念等有关同志对经济计划、特别是一九七九年计划进行了研究,发现国民经济要做较大调整。原来计划安排偏大,有缺口,财政有赤字。国务院研究后,提交政治局,决定再召开一次工作会议。认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必须在前两年经济恢复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李先念在这次

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燃料动力工业和其他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比例关系失调的严重状况认识得很不够,发展经济的步子迈得不稳,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工作搞急了。1979年计划,基本建设规模、生产指标、利用外资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财力上留了不小的缺口。因此,从1979年起要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大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工业和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更好地按规律办事。在管理体制上,要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讲话提出:要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突出地加强煤、电、油、运和建筑材料工业的生产建设;认真调整工业企业,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引进要循序渐进,扩大出口,多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要切实解决好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坚决控制人口的增长,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讨论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讨论了《关于扩大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几点意见》、《关于大

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征税试行办法》等。5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讲话,指出:这个讲话全面地分析了当前经济战线的形势,充分阐述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和方针任务,是当前一个时期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来经济恢复工作的重大成就,把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决定性战役,是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会后,各经济部门虽然做了大量工作,清理过去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开始纠正前两年这方面的错误,但由于党内认识还不一致,贯彻很不得力,进展缓慢。

4月13日至5月6日,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会议安排了1979年调整后的预算,研究了加强财政管理,实现今年财政任务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增收、节支、堵口三个方面的措施,初步讨论了财政体制的改革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一个是“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办法。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要求全党统一思想,正视当前已经出现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立即扭转那种光想办好事、开口子,减收增支主意多,增收节支措施少的现象。

5月14日,国务院将经过调整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正式下达。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由原订的5—6%,调整为4%左

右,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由 10—12%,调整为 8%,其中轻工业增长 8.3%,重工业增长 7.67%。粮食由 6395 亿斤,调整为 6250 亿斤;棉花由 4834 万担,调整为 4800 万担;煤炭由 65800 万吨,调整为 62000 万吨;原油由 11500 万吨,调整为 11000 万吨;钢由 3400 万吨,调整为 3200 万吨;财政收支由 1260 亿元,调整为 1120 亿元;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由 457 亿元,调整为 360 亿元,加上利用外汇贷款安排的基建投资,总规模为 400 亿元,保持上年的实际水平。外汇收入由 128 亿美元,调整为 14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6%;外汇支出由 176 亿美元调整为 17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7%。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当时对国家积聚财力的可能以及财力分配的变化仍然没有作出全盘的估量,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原油、统配煤等的生产指标安排仍然过高。这表明全党对调整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6 月 16 日至 29 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根据陈云、李先念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第一个特大项目。对于这样一个大项目,本应用更多一点时间,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考虑决定。现在看来决定得匆促了,这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经验不足所致。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快的,成绩是很大的。现在既已决定建设,就应当统一全党认识,同心协力,勇往直前,一干到底。

6 月 18 日至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并同意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部提出的《1979年国家预算》。《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我国，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他们经过近三十年的斗争和教育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今后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要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报告指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近两三年内，就是要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搞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7月26日至8月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物价工资会议。会议讨论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后，合理调整销价，同时给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并适当增加工资的问题。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实行提价，对职工实行补贴，同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

10月4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讨论了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几点意见，主要是：明后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基本建设投资按200亿元左右定下来。大中

型项目坚决再减掉几百个,但不能推平头,22个引进项目该减则减,不要犹豫。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按6%定下来,争取达到7%到8%。这次会议确定了明年计划的总盘子,为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作了准备。

11月20日至12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讨论拟定了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讨论确定了财政体制的改革。1980年计划安排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8%;工业总产值增长6%。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241亿元,比上年减少110亿元;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785个,比上年计划减少202个。为确保计划完成,会议提出:要抓广开生产门路,多方开辟财源;抓降低消耗、减少积压、节约开支;抓工业改组;抓技术改造;抓管理体制的改革,把经济搞活。会议确定:全国财政体制,除京、津、沪三市外,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照顾办法,江苏按原定办法实行,广西、云南、内蒙、新疆、宁夏、青海、西藏和贵州八个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体制,其余十五个省实行“四川式”体制,即“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实行中央、地方“分灶吃饭”以后,当年财政赤字的绝大部分由中央承担了。经过1979年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开始向协调合理的方向发展,整个经济比过去活了,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但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基本上没有压下来,调整工作仍进展缓慢。

五、指导思想上 的拨乱反正的完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与修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否定，对建国以后十七年的一些历史问题重新评价，党内和党外有些同志就对社会主义和我们党产生了一些疑惑。这一过程中，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党内外有些同志对毛泽东的一生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也有种种不正确的思想。所以，如何看待建国以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当时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起草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

(1)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邓小平认为，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这样几个重要思想：

首先,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这是一个全局问题。“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思想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

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

其次,文件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

邓小平指出:“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的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再次,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

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个人品质上。”“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提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

(2)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

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邓小平认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

“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1961年搞了工业七十条、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时候毛泽东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就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总之,“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绩,

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同时,还要指出,“‘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合法”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3)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认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并且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决议》,就是根据这些指导思想起草而成的。

《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曾经过全党高级干部四千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第七次讨论和修改,反复征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最后定稿。其中,陈云对修改决议稿提出过重要意见,主要有:

(1)“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

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2)“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这些意见对《决议》稿的起草修改也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许多同志鉴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头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要求中央调整他的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广大高级干部的意见，讨论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重要错误。指出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阻碍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他热衷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他有重要责任。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华国锋在会上提出辞去他现任职务的要求。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决议：

(1)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2)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3)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同时,会议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会议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这次政治局会议为六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95人,候补中央委员有114人,列席会议的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会议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并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

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共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伟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8个部分。其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部分,集中表述了党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有:

(1)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对毛泽东思想总的阐述。

《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

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3)关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党的建设,《决议》作了这样的阐述: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

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

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决议》并具体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各自所包涵的丰富内容和特点,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5)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指出,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决议》批评了

那种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那种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同志言论的两种错误态度,指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决议》的最后部分强调了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决议》还根据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初步确立了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作了基本的总结。这条道路的主要点是:

(1)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

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5)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6)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7)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8)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

(9)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0)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既对多年来“左”的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样做,既分清是非,又加强了团结,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第三节 改革开放起步

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试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拨乱反正中探索改革之路，并首先开始在广大农村实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

1978年秋，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在借地的基础上，有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群众的这些创造得到了省委支持，并在滁县、六安地区和凤阳县进行了试点。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实行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这是我国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初试验。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给各地方农村社队讨论试行，要求各地于10月底以前将修改意见报中央。这两个文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状况同人民的需要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认真地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认真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切实保护农村中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文件明确规定

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 25 项政策措施(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 强调指出: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 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 任何领导机关、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再搞“一平二调”和瞎指挥; 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 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 决不能任意改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决不允许搞所谓“穷过渡”。文件还对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林牧业的区域规划、实现农业机械化、建立现代化的商品粮基地林牧副渔基地, 积极发展农村以及林牧副渔基地, 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 规定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措施。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试行以后, 受到全国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 被称赞为“抢救农业, 富国裕民的文件”, “多年来最好的文件”。各地对于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坚持“大集体、小自由”等项政策, 反映强烈, 同声叫好。

3 月 1 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 国务院决定从 3 月份起, 陆续提高粮、棉、油、猪等十八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按此规定, 1979 年全国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总指数, 平均提高 22.1%, 由于提价, 当年农民收入增加 108 亿元。

3 月 12 日至 24 日, 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的负责同志, 就当前农村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会上经过讨论, 大体取得了一致意见: 1、充分发挥

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这是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根本出发点。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绝不可强求整齐划一,搞“一刀切”。2、各地实行的联系产量责任制,具体办法多种多样,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除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以外,都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3、必须注意保持人民公社体制的稳定。4、搞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应当许可。5、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都必须加强领导,不能放任自流。6、我们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经验还很不够,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前提下,不断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多方面进行试验,不断总结经验。7、要坚持群众路线,体谅农民的苦衷,和他们一起探讨有效的办法。热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搞好春耕生产。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这次会议肯定和支持了广大农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创造和实行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虽然文件继续重申“不许包产到户”、“稳定人民公社体制”,但却允许具有特殊情况的一些地区可以例外,强调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这就在实际上推动并引导了农村的改革。

8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指出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各级党组织和一切有关部门,都要认真检查执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两个文件的情况,总结两年多来农村形势好转的经验,继续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已经落

实的要坚持下去,没有落实的要尽快落实;在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方面行之有效,得到干部和社员拥护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要肯定下来。党中央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长期政策,要持续地、稳定地贯彻下去。9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央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这对巩固和发展农业的大好形势,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政策问题时,肯定了安徽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的作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要发展生产力。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

9月14日至9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指出,两年来,各地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一类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其后又出现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的包产,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分别到组、到劳力、到户;生产过程的各项作业,生产队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分别奖罚;以合

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村的形势越来越好。会议提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当前,应当把改善经营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当作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抓紧抓好;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各地应当加以引导,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广;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放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这次会议。对于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会议制定的各项方针原则,动员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做好工作。于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其中家庭联产承包(即大包干)责任制形式最受农民欢迎,效果最好。

二、城市改革的试点： 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城市改革处于试点阶段。城市改革是从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

作为城市经济改革先行者的四川省，早在1978年10月就在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试点。在总结这些企业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该省于1979年1月制订了14条试点办法。试点办法规定：试点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承接来料加工；可以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实行利润留成和提取企业基金；可以提拔中层干部，不需经上级批准；可以销售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试销新产品等等。四川省对企业采取这些放权让利措施，是考虑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改掉“一个哨子”（指克服农业生产经营权集中到生产队长，农户无权的情况），城市经济改革就应先行解开“一条绳子”（指解开捆绑企业手脚的绳索），让企业有经营自主权，调动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在经济领域要冲破“凡是论”的观点，即“凡是过去形成的体制都不能动，凡是延续多年的运行机制都照搬”，改变对企业“怕活不怕死”，对商品“烦多（仓库不足，不知往那里销售）不烦少（发票证，手到擒来）”的现象，放开手脚搞改革。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该省到1979年8月，迅速将扩权试点企业发展到84个，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据该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这84个试点企业

的考察,1979 年头 8 个月的产值和实现利润,分别比 1978 年同期增长了 14.1%和 21.8%。这同全省非试点企业相比,平均增长幅度高出 39.3%和 1 倍以上。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增加都比一般企业好。四川省这些试点,为党中央决策和在全国推行企业扩权试点提供了经验。

继四川省的企业扩权试点之后,1979 年 5 月,国家经济委员会等 6 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 8 个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也收到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增产增收的效果。在这些先行单位的带动下,许多地方和部门管辖的企业,也仿照 8 个试点企业和四川省的经验自定办法进行试点。为了加强和统一领导各地的试点,1979 年 7 月 13 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金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 5 个文件发给各地区各部门,指导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年 9 月,黑龙江省在 42 个国营工业企业中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到年底就取得了明显效果。试点企业的生产普遍上升,质量提高,收入增加。但是,试点工作遇到了阻力。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存在的“凡是”禁区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诸如,由上而下形成的阻碍生产发展的条条、框框不敢破,有“上顾之忧”;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不合理的传统做法不敢改,怕“改乱了”。黑龙江省的领导认为,“凡是”的禁区必须打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应在经

济领域进一步落实,以便让那些促进生产发展的“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这样,在各地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企业扩权试点便进一步开展起来。到1979年底,全国试点企业发展到4200个,到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这6600个大中型试点企业,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通过扩权试点,企业有了部分的自主计划权,部分的产品销售权,部分的资金使用权,部分的干部任免权等等。这样改革的结果,是初步改变了企业只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不关心盈利亏损的情况,增强了企业经营观念和市场观念,使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部分改革。在这期间,为了打破中央在财政上对地方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全国从1980年起实行了“分灶吃饭”的新的财政体制。这是改革国家预算制度的一种试验。这种新财政体制的特点是“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基本做法是:对大部分省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和支出的范围,再按照各省的情况确定地方上交比例或中央定额补助,一定5年不变。地方在这个范围内安排自己的财政收支,多收多支、少收少支,促使地方增收节支;同时,财政支出由“条条”下达改为地方统筹使用,地方能主动规划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必事事报批。此外还对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针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情况,对两省在财政上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广东)和定额补助(福建)”的体制。只有对北京、天津、上海3大直辖市仍实行中央“统收

统支”的体制。这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打破了过去那种“统收统支、收支脱节”的状况,扩大了地方的财权,极大的调动了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

在城市,长期以来工业品的购销形式主要是统购包销。这很不适应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的购销关系。因此,在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同时,对城市商品流通体制也进行了“一少三多”的改革。即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的品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采用多种购销方式,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建立城乡互相开放的新流通体制。这一改革为多渠道地加快城乡商品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商业系统改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商业企业内部体制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自主权和实行经营责任制。为了增强商业企业内部的活力,从1979年开始,商业系统实行全行业利润留成制度,使各商业企业有了一定的财力,初步改变了国家对商业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局面。1980年又在8900个国营商业企业、粮食企业和供销社扩大了自主权,使这些企业拥有了部分业务经营权、部分财权、部分商品的削价处理权等等。随之,1981年又在商业系统推行经营责任制,实行这种责任制的商业企业共47750个,占独立核算单位35%。这些改革措施,有力地冲击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推动商业企业的领导者改善经营管理,多渠道地争取货源,力求产销对路,满足群众需要;也使企业增加了“动力”和“活力”,主动扩大经营范围,提高了经济效益。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

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作为吸收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当时称“出口特区”。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会议形成的《纪要》指出:“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主要是吸收侨资、外资进行建设。同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并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198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了办好经济特区的10条政策措施。1982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指明了特区的发展方向。其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特区工作又陆续批转了一系列会议纪要和文件,从而保证了特区工作的顺利开展,加速了特区经济建设的步伐。此外,中央人民政府对贸易体制也进行了部分改革,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

上述诸项改革措施就构成了城市改革的第一阶段。

三、贯彻经济调整 方针,解决重大比例失调

1980年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和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文件充分肯定了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成绩,同时指出,调整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因为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还不得不用很大精力处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经济调整的许多工作实际上是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后才展开的,认识调整的方针要有个过程,贯彻这个方针更要有个过程。1979年,工业企业的调整和改组工作进展不快,缺乏全面的规划和有力的政策措施。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有些该停缓的工程还在建设,投资效果差的状况改变还不大。财政收入完不成计划,减收增支方面开的口子太多,出现很大的赤字。对于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要总结经验,采取措施,把调整工作搞好。文件提出1980、1981两年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1、争取农林牧副渔五业有一个新的全面的生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左右。2、争取轻纺工业和其他消费品生产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轻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8%。3、逐步缓和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的紧张情况。4、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减少建设项目,加强基建管理,使建设规模同国家当前的财力、物力可能相适应,使战线长、效果差的状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变,1980年基建预算内国家投资为241.5亿元,比

1979年减少110亿元。5、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设备。6、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使农民的收入和职工工资继续有所提高。7、加强科技、教育卫生、环保、城市建设等薄弱环节。李先念的讲话强调,我们一定要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持续发展的速度,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避免瞎指挥、大呼隆的错误,保证在政治、经济上不再乱折腾。这要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全党同志和所有做经济工作同志的思想中牢固地确立起来,在调整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认为,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贯彻了调整的方针,是积极的、稳妥的。李先念的讲话论述了经济调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反对浪费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财政经济上还存在不少困难,许多地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严重浪费现象,很多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很低,有些地方和单位无视国家规定和财经纪律,滥支滥用,任意铺张浪费。因此,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节约是我们勤俭建国的长期方针,没有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没有扎扎实实把生产搞上去的思想和劲头,当前调整国民经济和逐步实现四化都无从谈起。

2月10日,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再次阐述了1980、1981两年经济调整的方针和任务。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

3月3日和6日,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上,鉴于各地对调整方针贯彻很不得力,国家出现170亿元财政赤字的情况,李先念指出:财政赤字很大,这是一个潜伏的危险,如果掩盖矛盾、盲目乐观,不认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以致连续几年出现比较大的赤字,潜伏着的危险就会爆发,就会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市场混乱的严重后果。解决当前的赤字,根本出路在于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全国基本建设的规模要进一步压缩。

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撤销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8月12日,为加强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织了“经济研究中心”。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个研究单位对发展国民经济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远性问题有计划地展开研究,深入讨论,提出研究报告,供财经领导小组参考。

3月21日至4月14日,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建设项目仍然过多,总规模过大;要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展以提高投资效果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多快好省地完成基本建设计划。6月2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全国基本建设会议汇报提纲》。中央指出,我们要坚决贯彻调整方针,下决心压缩建设规模,调整投资方向。4月至6月底,《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五篇社论,反复阐述了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以引起全党重视。

3月30日至4月24日,国家计委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会前和会议期间,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对拟订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讲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主要有：1、降低积累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确定25%的积累率为好，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3、工业生产速度每年增长7%到8%，如果有困难，5%或6%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二十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4、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更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5、在农村和城市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6、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益的比较，这要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7、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承认不平衡；8、要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会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国家计委用了三个月时间初步拟定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汇报提纲）》，并于8月21日，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计委讨论，征求意见。这个文件初步总结了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和主要经验教训，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现代化建设应当遵循的方针，提出了今后十年国力的预测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4月9日至19日，为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克服当前财政困难，国家经委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和认真讨论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的重要指示，初步落实了1980年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任务；总结交流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展市场调节，贯彻按劳分配、搞好奖励制度，以及整顿企业，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研究讨论了有关的经济政策和措施。5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经委党组

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中央强调,要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增加收入,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现在尤其要把工交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

8月2日至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多年来,由于压制乃至取消个体经济,加上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了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造成了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预计1980年至1985年全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数将达3700万人,而目前在职职工已经超过一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会议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要逐步推行公开招工,择优录用的办法;要使企业有可能根据生产的需要增加或减少劳动力,劳动者也有可能把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专长、志向结合起来选择工作岗位。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要打破劳动力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的文件。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各地安置行业人员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据统计,1980年全国城镇新安置的就业人员有900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572.2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278万人,从事个体职业的49.8万人。

10月11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就1980年冬和1981年经济工作作了安排。主要是:进一步抓调整;制定长远规划;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立法;逐步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

11月15日至12月2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

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这两个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调整了1981年计划。赵紫阳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是大好的,但是有潜在的危险。一是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货币投放量增加,如不采取措施,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二是基本建设很大地超出国家经济的可能,这两年没有压缩下来。必须下决心狠抓调整,关键是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关、停、并、转,根本改变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条速度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的路子。会议期间,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对调整1981年计划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是:明年基本建设要退够;为克服困难,权是要集中的,不是分散的,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明年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把生产搞得扎实一些。速度5%有困难,4%也可以。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经过充分讨论,重新调整了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情况是: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增长3.7%。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年预计减少40%。其他方面也都做了相应的调整。经过这次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已比较切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

12月16日至25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充分肯定了建国31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形势;同时也分析并指出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经济建设中“左”倾

错误是主体错误，决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陈云、李先念、邓小平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云的讲话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他说，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李先念在讲话中强调，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作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财政要做到收支平衡，产品要适销对路，要在保证粮食稳步增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指出：去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调整的方针以来，因党内认识很不一致，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绝不是对它的改变。调整中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他在讲话中第一次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概括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强调要把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坚持贯彻下去。同时指出，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

和保证人民民主。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 30 多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了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整，稳定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关于经济调整的方针，得到了较顺利的贯彻落实。

四、对外开放方针的 制定与四个开放城市的建立

鉴于建国 30 多年中有许多年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以至于我国经济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警醒起来。1978 年 11 月到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向与会代表印发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度发展》、《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专题材料，供大家学习讨论。紧跟其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标志着我国长期闭关自守和半闭关自守状态的彻底结束。其后，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了实际步骤，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扩大、发展的过程。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开放。邓小平概括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多方位开放的格局。

(2)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多形式的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扩大对外贸易、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发展国际旅游，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向多形式、多样化方向发展。

(3)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逐次推进的多层次的开放。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我国的开放和改革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四个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滚动式地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外向内，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在不同层次上实行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

这就构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框架。

对外开放首先是由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而逐渐起步的。经济特区构成开放的第一个层次。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

上去。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同时决定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醒全党,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开展,势必带来资本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影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和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

1981年3月24日至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的指示。会议肯定了两省省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试办出口特区等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指出,这一重大改革,受到了两省广大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港澳,反映非常强烈,海外侨胞纷纷表示愿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建设。1980年广东、福建两省外贸出口收汇创历史最好水平,比1978年分别增长32%和30%。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两省分别完成205000万(广东)和35000万(福建)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32%和21.5%。深圳、珠海两个出口特区正在积极筹建。其中1979年即筹办的深圳蛇口工业区进度较快。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会议也指出,当前两省的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有关方面在一些问题上认识还不够一致,领导工作也跟不上。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进一步统一了认识,确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针和办法。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发《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并作出批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它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两省的有利条件,加快两省的经济的发展,成绩是显著的。根据两省的有利条件,中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及时地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措施是可行的,要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12月16日至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广东、福建两省及经济特区的工作,再一次给予了明确支持。陈云指出:“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

进。”这些指示，为广东、福建两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搞好对外开放工作，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使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发言。他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他还着重谈到：（1）为了有效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起上，当前以中小为主。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要有胆有识地放手干，又要谨慎。（2）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路子宽广，不要理解得太狭窄。向科学要本领，拜行家作老师，这两句话应当成为一个行动口号。（3）面向全世界，积极发展国际劳务合作。（4）正确认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要服从政治的提法不全面。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对外国一切先进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知识，一定要努力学习和钻研；而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

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新形势下，要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发挥沿海地区优势》。社论说，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对四

个现代化建设大有好处,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我国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优势是:有同国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悠久历史,发展进料加工大有可为;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约占全国工业企业的45%,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社论指出,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使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不仅仅是为了建设沿海地区,也是为了带动内地建设。

1982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在坚定不移地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继续办好特区。胡耀邦的讲话和中央的两个通知,对于清除一些人对特区的误解,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对外开放,起了有益的作用。

1982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并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指出:为了加强对经济特区的领导,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具体负责。《纪要》回顾了自1979年7月中央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以后三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当前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是:特区要有更多的自主权;各特区的总体发展规划由国务院审批;各特区建设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吸收利用港澳资金、侨资和外资;特区的各种税收应实行优惠待遇;加速制订和完善经济立法。

五、继续贯彻调整方针， 探索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

1981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新年茶话会，赵紫阳就国民经济调整问题讲了话。他说，当前国民经济形势是好的，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是积极的，已经取得了成绩。希望大家为1981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陈云、赵紫阳、李先念、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扎扎实实地完成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随后，国务院各部委派出400多个组、2241人到基层调查，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要求，帮助解决经济调整中和当前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1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决定》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国家财政连续发生赤字，银行增发了不少票子，市场物价上涨。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牵动全局，影响安定团结。为了确保1981年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国务院认为，必须对财力的分配和使用采取集中统一的原则，严格财政管理和财经纪律，力求迅速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经济的稳定。为了弥补今明两年中央财政的赤字，已经确定发行国库券和借用地方财力的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必

须保证完成,不能短少。1981年调整后的财政收支计划,必须逐级落实到基层,收入要力争超过,支出要力求节减。

1月29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市场物价、保证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月31日,国务院下达国家计委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调整意见》并发出通知。指出:要实现这一调整任务,做到财政、信贷、物资平衡、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完成或超额完成各项调整任务。2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向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作《关于调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收支的报告》。报告列举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潜在危险和对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概算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提出了压缩基建总规模等九项重大的调整政策措施。报告强调,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调整,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消除潜在的危险,而且有更积极更深刻的意义。这就是要使我们的整个经济工作,从此摆脱急于求成的积弊,真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办各项事业都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使经济的发展同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上协调的稳定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3月3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强调国家对全国基建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加强自上而下的统筹、指导、协调和监督。4月2日,新华社报道,国家计委等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制

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几项规定》。4月3日至16日，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继续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的问题。会议期间，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国家建委党组的汇报。会议认为，要严格控制基建规模，关键在于全党思想认识的统一。只有对“左”的思想进行认真清理，真正做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能自觉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切实做好控制基建规模的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基建规模的意见和措施。经过努力，1981年停缓建大中型项目120多个，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现象逐步有所控制。

4月14日，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就今后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他说：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工作受“左”的错误影响，急于求成，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结构畸形发展。过去走的这条路子投资大，消耗高，增加社会财富少，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今后不能再走，也走不下去了。出路何在？国务院讨论多次，认为出路就在于提高经济效果。“如何提高经济效果呢？还是这样两句话：一是调整；二是改革。通过调整和改革，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经济体制合理化，企业组织合理化，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来，使国民经济能够协调发展，稳步增长，实现良性循环。走这条路子，投资比较少，积累率不那么高，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赵紫阳从九个方面论述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道

路：一、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二、抓好能源的节约和开发；三、依靠现有企业；四、搞好机械工业的改组和改造；五、沿海与内地合理分工，发挥优势；六、发挥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七、节约资金，用好外资；八、开辟就业的新门路；九、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5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赵紫阳的这个讲话。

10月6日，国家计委党组汇报：由于全党今年以来认真贯彻执行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部署，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取得了新的进展。轻工业总产值预计可以比去年增长11%以上，重工业总产值预计比去年下降5%左右。重工业为轻工市场服务的部分有了增加。整个工业总产值有可能实现计划的要求，比去年增长3%左右。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下来了，投资结构有所改进。全年投资比去年减少近180亿元。各项财政开支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财政收支有可能实现基本平衡的要求。预计全年财政赤字将由去年的120多亿元降为20到30亿。实践证明，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要继续抓紧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我国就有可能基本实现今年2月向全国人民宣布的1981年的计划任务和主要目标。这对于提高全国人民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信任，提高全国人民进一步搞好国民经济的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当前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主要是：一、今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是在收入下降、支出大副度削减的条件下实现的，这种平衡是不巩固的；二、能源生产这两年有所下降；三、消费品供应还赶不上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市场货币流通量偏多；四、工业生产经济

效益差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变。这些情况说明，财政经济中的困难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0月27日至11月1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确定，1982年的计划要继续贯彻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搞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工作，继续保持财政、信贷收支基本平衡，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在努力提高经济效果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保持一定速度向前发展。赵紫阳在会上提出，1982年和今后几年，要在继续巩固稳定经济成果的基础上稳步前进；要在强调产品质量和适销对路的基础上求速度；要把整顿企业放到重要位置上，继续调整企业结构；要重视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问题。

11月30日和12月1日，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根据前11个月的成绩，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向大会报告，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财政赤字从1979年的170亿元，1980年的120亿元，预计降低到今年的27亿元。在很短的时间内，财政收支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事实充分说明，这次进一步的调整，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发展过程是健康的，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中潜在的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要继续保持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和作出艰苦的努力。因此，国务院认为，有必要从今年起再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这样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打好基础,更好地前进。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下列十条方针: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六、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十条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的经验积累,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经验积累。它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已开始初步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的道路。赵紫阳在报告中展望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时指出: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把主要的力量用于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现有企业,对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所以,“六五”期间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我们要争取的速度,必须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扎扎实实的速度。只要我们在这个期间能够打好基础,消除经济

中现存的各种弊端,比例关系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就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后劲就会越来越大。“七五”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比“六五”高,再后十年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更高一些。这就是说,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将很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12月2日,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最近决定,海南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待遇。

12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陈云在会上讲了《对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他说:一、农业经济是全国经济重要的一部分,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二、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不能吃得太差,也不能吃得太好,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三、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再增多;四、国家建设必须是全国一盘棋,必须按计划办事。胡耀邦在讲话中指出,1981年我们全党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政治局面更加安定,经济上继续好转,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理出了一套稳妥的方针。1982年的奋斗目标:第一,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使这两方面都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的新成就;第二,在

经济上,要努力争取一个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一定的发展速度;第三,在政治上,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要努力争取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我们的党风有一个决定性的好转。

六、社会主义民主 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判处罪大恶极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其它主犯也分别判刑,给予法律制裁。这次从1980年11月20日开始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使我国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3月2日,民政部长程子华向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报告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情况:这项工作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分期分批陆续展开,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通过这次选举,广大选民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认识,干部经受了一次群众性的考核和评议,选出了较好的领导班子、密切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7月10日至17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总结会议,讨论了选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9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并在批评中指出,这届县级直接选举工作搞得是比较好的。它对于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

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政权建设,改进干部管理制度,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搞好四化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3月7日,彭真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讲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任务、职权;各级人大常委会之间的联系;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以及民主集中制等问题。4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的讲话,并指出,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是我国地方政权组织的一项重要改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搞好,对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地方各级政权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月中下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讨论了当前整顿治安的任务和措施,彭真、彭冲在会上讲了话。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座谈会纪要和彭真、彭冲的讲话。文件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先后召开会议对整顿城市治安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组织力量侦破了一批案件,破案率比五月有所提高。其中天津、南京、杭州、郑州、重庆、西安、南宁七个城市6月份的大案当月破案率达到了85%。各地公检法部门密切配合,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了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6月23日至30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铁道部党组

召开了整顿铁路治安座谈会，有十个省区、十个路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分析了当时铁路的治安情况，讨论了整顿铁路治安秩序的任务和措施。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不能乱，更不能断。必须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否则将严重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将影响国家建设的全局，影响国际信誉。

7月6日至15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前一段反走私斗争的经验，认为前一段的反走私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不能估计过高，距离国务院的要求还很远，存在问题还很多，大量事例说明，当前三省沿海地区的走私、贩私活动仍然相当严重。港澳100多个走私集团随时都在窥测方向，伺机而动。会议根据当前反私斗争的形势，提出了三省联合打击走私的行动部署，计划从8月初开始到今年年底，刹住走私泛滥之风，基本恢复正常状态，夺取反走私斗争的决定性胜利。8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纪要》，并指出，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以后，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8月18日至26日，第一次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调解工作的经验，讨论了在新时期做好调解工作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调解组织81万多个，调解人员575万多人，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重要力

量。

9月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关于加强经济立法工作的几点建议》,国务院批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重视经济立法工作,加强领导,建立和健全本部门的法规机构,学会运用经济法规来指导和管理经济。要加强有关经济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普及这方面的知识。要积极配合和支持司法部门的工作,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加强,经济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仅据国务院的50个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以来,就颁发了各种经济法规200多个。还有30多个过去颁发的法规正在修订中。

11月30日至12月13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近年以来,国家在经济立法、司法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相当一批经济法规正在草拟之中,各级法院的经济审判庭多数已经建立起来。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大大加强。所有国家机构和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员,都必须学会在运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运用必要的法律手段来维护经济秩序。通过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和全体人民的密切合作,我们完全有力量、有办法同各种犯罪分子和经济领域中各种不正之风进行斗争,保卫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不受破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日益发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原则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社会治安情况没有根本好转的原因,指出为了争取治安情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务使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在1982年内有个明显的好转,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为了根本长治久安,要切实整顿和加强基层组织,完善治安管理制度,等等。

4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决定公布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通过全民讨论,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广泛吸收人民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使宪法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同时,全体人民参加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国家根本大法的讨论,也是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的一次极好机会。

7月10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指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必须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切实抓好政法队伍的整顿和训练,并规定了当前政法工作的各项具体任务。彭真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当前政法工作的突出任务是坚决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同时还要同危害精神文明建设的犯罪活动作坚决的斗争。8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和《彭真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8月24日,据有关材料统计,我国已颁发新法律、法令和

行政法规约 300 个,其中近 250 个是经济法规,尚有 140 多项经济法规正在制订中。全国已有 200 多个法律顾问处,有专职、兼职律师近 10000 名和 1000 个县、市级公证处。这表明我国法制建设已取得可喜成绩。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彭真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赵紫阳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王丙乾关于 1982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83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杨尚昆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等。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六个五年计划》,通过了本届人大常委会职权和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决议,等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指出,大会通过的宪法,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的公布和实施,一定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战略部署,积极进取,埋头苦干,全面实现六五计划。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时候,这部宪法的通过和实施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各族人民的安居乐业,对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

1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香港一些报纸发表社论或评论,欢呼我国新宪法的诞生,指出,这部充满民主与法制精神,引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新宪法,必将受到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的拥护。

12月14日、15日,中国法学会召开学习、宣传新宪法座谈会,首都法学界30多人欢聚一堂,畅谈新宪法。他们说,新宪法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合乎国情、顺乎民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本大法。他们表示,作为法学工作者,一定要带头学习新宪法,宣传新宪法,遵守新宪法,为开创社会主义宪法的新局面而努力。

与此同时,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也都纷纷学习新宪法,表示要为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宪法实施,自觉遵守宪法而努力。

第七章 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的开创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纲领的制定

一、党的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1545名,候补代表149名,代表了39657212名党员。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作了重要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①审议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②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③按照新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还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邓小平的开幕词，是这次大会总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的报告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的重大成就，宣告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的历史性转变已经胜利实现。报告分析了我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势，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这个总任务，报告规定了各方面的战斗任务：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坚强核心。报告根据中央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报告强调指出,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就是共产主义思想。报告批判了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错误观点,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虽然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这个进程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

报告特别强调,“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如果

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

报告还阐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认为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并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报告要求全党和全社会的先进分子,要以模范行为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党的思想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共产党员一定要统一认识,统一步调,以便组织有战斗力,有说服力的、有吸引力的思想工作的宏大

队伍。今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检查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除了检查物质文明建设的情况以外,一定要检查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

另外,报告还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特别指出,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全党必须严格遵守;强调要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提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既要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要看到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

报告对“十一大”党章的修改作了说明,并从实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根据党的现状和新党章

的精神，提出了当前在党的自身建设上必须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1)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报告指出，历史的严重曲折告诉我们，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首先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报告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努力，现在党内的政治生活，首先是党中央的政治生活，已经由过去长期不正常的严重状态逐步恢复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现在的党中央，是团结的和谐的领导集体，是能够驾驭复杂局势的坚强核心。许多地方党组织的政治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进。但是，就全党来说，在党的许多组织中，不民主现象、家长制作风没有消除，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现象也比较严重。这些都妨碍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民主集中制观念，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努力发展党内民主，同时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

报告强调，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加强党的纪律。现在，在不少组织中，纪律松弛、是非不分，赏罚不明，该批评的不敢批评，该处分的不敢处分，是相当严重的现象。这种情况过去就有，经过十年内乱更为严重，目前在有的地方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中央和地方党委以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为维护党纪和端正党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工作中还遇到不少阻力，有些情况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动员起来，为维护党纪进行坚决的斗争。

(2)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报告分析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这是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要政治保证。目前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的第一步已经基本完成,各省、市、自治区准备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展开。报告指出,正确解决党对政府机构的领导和对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问题,是机构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于干部的选拔、分配、考核和监督。党不应当包办代替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今后,各级党委要集中精力经常讨论和研究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的政策方针,讨论和研究干部、党员、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和教育问题,干部的倾向问题和纪律问题,党的组织的改善和发展问题,等等。当然有关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重大问题仍然必须由党作出决策,一切在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和执行党的政策。

报告同时还指出,要结合机构改革,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使许多年事已高的老干部既能解脱第一线工作的繁重任务,又能以他们丰富的领导经验在党、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使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能够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新老合作和交替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实际有效的锻炼,并使各

级领导层不断吸收新的活力和智慧,保持旺盛的生机。要大力加强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工作,今后使用和提拔干部必须把学历、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重要依据。各级党校、政府和企业的干部学校等,要担负起对干部进行正规化培训的任务。所有在编制内的工作人员,都要分批分期参加轮训。普遍轮训干部是提高干部素质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充分认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加强学习。

(3)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报告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活动同广大人民的利害得失关系极大,而这种地位又很容易使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这就要求党员更自觉地去保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加强与各阶层人民的密切联系。报告还分别对党如何加强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和妇女的工作,作了具体的阐述。

(4)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报告指出,经过这几年的恢复整顿,党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党的威信正在恢复和提高。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和强有力的,这是我们党的状况的主导方面。但是,由于十年内乱的流毒至今还没有完全肃清,也由于在新的情况下各种剥削阶段思想的腐蚀作用有所增长,目前我们党确实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为使党风根本好转,党中央决定从明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无疑是我们党

的一件头等大事，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十分周到地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报告对如何抓住在党内普遍地、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这一中心环节，搞好整党工作，作了扼要的说明。并强调，通过这次整党，要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切实纠正不正之风，大大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报告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指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并指出，一个国家革命成功，要靠这个国家本身条件的成熟，要靠这个国家共产党路线和政策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各国党之间当然也要互相帮助，但决不允许外来的强制和包办代替。强调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是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并总结说，我们党吃过自封的老子党企图控制我们的苦头。我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胜利，就是抵制了这种控制的结果。

报告最后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把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这个事业的许多课题，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的。在这个事业中，我们队伍内部可能出现思想上、政治上和工作上这样那样的偏差，这是不足为怪的，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重要的是，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

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有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善于针对错误倾向，正确地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我们长期地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过程中，叶剑英、陈云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说，经过这次大会，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他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他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一定要更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原则”，“把这个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坚持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

陈云在会上说，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陈云对提拔中青年干部强调了两点：一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而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二是“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此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陈云说，总

之，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侧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

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这个章程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210 人，候补委员 138 人；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72 人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32 人。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9 月 12、13 日，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全会选举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壮族）、乌兰夫（蒙古族）、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女）、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德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女）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政治局常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会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邓小平为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

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在会上,胡耀邦代表新产生的中央书记处,就今后工作主要是1983年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

9月1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分别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陈云分别在两个会上作重要讲话。

党的十二大对我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对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和更为完备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总路线,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而且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它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同时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首创。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为进一步整顿党的组织和转变党风,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指针。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更新,为全党各级机构的改革提供了榜样。党的十二大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就,它表明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成熟了。“十二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显示党的无限生命力的大会,一个给人以信心、希望和巨大鼓舞力量,动员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实现新的伟大目标的大会,它将作为在政治上确定党在新

时期的方针任务,在组织上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大会,作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党的十二大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是党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的重要保证。新党章对“十一大”党章作了许多有根本意义的修改。这次修改党章的总的原则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对党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重新修改党章的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时,为作好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专门成立了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具体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党章修改工作是从1979年冬开始的。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曾从中央各有关单位抽调很多同志,举行了多次座谈;后来还曾派出相当多的同志到全国许多地方和基层进行调查,征求意见。1980年春,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党章草案第一稿。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以后,又作了一次修改,在4月印发全党讨论,同时也发了一部分给党外人士征求意见。1982年5、6月作了第二次较大修改,6月5日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党组织和“十二大”部分代表,征求意见。以后,又根据收集到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形成了提请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审议的党章草案。七中全会审议了这个草案,一致决定原则通过,授权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全会讨论中的意见进行修改后,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1982年9月6日,“十二大”

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修改过程说明：新党章是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集中了全党的经验和智慧。

新党章的内容和特点有：

(1)在党章的总纲部分，新党章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规定，并充分体现了党在新时期发展的根本要求。

关于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新党章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等内容，重新规定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新党章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的错误内容，重新明确地表述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

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同时把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规定“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并规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战斗力,坚决实现以下三项基本要求:

“第一,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

关于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新党章第一次作出了科学明确的表述:“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在一切工作和社会活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的工作。”并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2)在关于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规定中,新党章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出了比过去历次党章都更为严格的要求。

新党章对党员的要求,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指出“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在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部分，还作了如下规定：共产党员除了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外，“绝对不得假公济私，损公利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反对派性，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要求党员要“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新党章专门新列了“党的干部”一章。其中规定了四方面的内容：①“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且力求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党的干部必须接受党的培训，接受党的考察和考核。党应当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模范地履行党员的各项义务，并且必须具备六项基本条件，其中，特别强调“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同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认真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具有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反对官僚主义”；“正确地运

用自己的职权,遵守和维护党和国家的制度,同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作斗争”等。③规定了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的关系处理原则,要求“党员干部要善于同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发现和推荐有真才实学的非党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保证他们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④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

以上关于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这些规定,大都为过去的党章所没有,是这次新增加的内容。

另外,新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作了比过去更为详尽的规定,其中特别增写了关于教育和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等内容。

(3)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新党章对改善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体制,对加强党的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作了许多新的规定。

一是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总书记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党全部经常工作的领导核心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除了总书记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外,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也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这些规定,是为了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二是在中央和省一级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两级顾问委员会

由各自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两级顾问委员会分别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在同级党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新党章并对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成员的条件作了相应规定。

三是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产生,由“十一大”党章规定的“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改为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中央以下的同级党委及其成员实行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对中央委员会成员违反党纪的行为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检举。

四是专门列款规定:“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经常讨论和检查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组织工作、纪律检查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注意研究党内的思想政治状况。”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4)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新党章都作了比过去更加充分、更加具体的规定。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新党章强调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遇紧急情况,必须由个人作出决定时,事后要迅速向党组织报告。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同时,新党章还增写了“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

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等内容。对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组织的职责权限和互相关系,对于党员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也都作了许多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的规定,使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得到比过去更为严格的保证。

新党章把加强党的纪律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了一些严格的规定:①实行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②要求每一个党员除了遵守党纪外,还必须遵守政纪国法。党员如果在违犯党纪的同时违犯政纪国法,那就要同时受到政纪国法的制裁。凡是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一律开除党籍。③对于严重违犯党纪、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上一级党委会,在得到再上级党委会的批准后,可以加以改组直至解散。④规定在执行纪律时要遵守党章、尊重党员权利。这些规定,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健全党内民主,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是十分必要的。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的“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对解决党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组织方面的新问题、新任务,对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的规定,它比过去的党章更加充实和完善,是建党以来最好的一部党章。它是党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新党章和“十二大”报告中关于党的建设部分的论述,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纲领,是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的重要保证。它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科学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二、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1983年6月6日至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900多名,有76.5%是新选出的。代表中知识分子701名,占代表总数的23.5%;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543名,占代表总数的12.8%。会上,彭真致开幕词。赵紫阳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是我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克服种种困难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五年,是人民心情舒畅、国家蒸蒸日上的五年。在这期间,我国取得很大成就,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国民经济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农业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实现了持续的全面高涨;消费品工业扭转了长期落后的局面,重工业逐步端正服务方向,整个工业在调整中持续增长;城乡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经济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有益的经验;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逐步得到纠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有了新的加强,保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取得了外交工作的新成就。《报告》同时提出今后五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

人民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 198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报告》、《关于 1982 年国家决算的报告》;大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6 个委员会(民族、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等)组成人员;大会批准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选举彭真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陈丕显、韦国清、耿飆、胡厥文、许德珩、王任重、史良等 20 人为副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决定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主任、审计长和秘书长人选。

三、《邓小平文选》出版

1983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文选收入邓小平 1975 年至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期间的 47 篇重要论著。这些论著不仅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是指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变和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辉文献。

7月7日至17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邓小平文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会议确定,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是今后一个时期宣传工作的重点。各地各部门要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通读,领会精神实质,为今年秋冬开始的整党做好思想准备。会议强调,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建设一定要先行,要统帅文化建设,统帅物质文明建设,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指导共产党员的言行。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通知指出,《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这个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通知要求,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各种错误认识,进一步提高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自觉性,提高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要结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着重学习和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思想,在今年下半年重点解决以下几方面的认识问题:第一是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第二是关于改革的必要性和方针政策(包括各级机构的

改革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第三是坚持同时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第四是搞好党的建设和整顿。通过学习,使全党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把各方面工作推向前进,保证即将到来的全面整党工作顺利开展。

四、党的十二届二中 全会与全面整党的开始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用三年时间对党进行一次全面整顿的任务,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整党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整党,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把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为了保证整党工作的日常领导,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任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为副主任,王震、杨尚昆、胡乔木、习仲勋、宋任穷为顾问。

会上,邓小平、陈云就整党问题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集中讲了整党要防止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问题。他说,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他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陈云集中讲了清理“三种人”和共产党员不能以权谋私等问题。为了确保整党工作的

领导,全会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以胡耀邦为主任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央于今冬明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提出加强思想路线工作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10月24日,中央发出通知,把邓小平、陈云在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发到县团级,进行认真的传达和学习。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体现了党的十二大的精神,分析了党内状况,阐明了整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整党的基本方针、任务、政策、步骤和方法,是这次整党的指导性文件。《决定》的主要内容有:

(1)关于党内状况的分析,整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决定》指出: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尽管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了严重损害,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机构改革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开展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及纠正各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进行了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和斗争,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得到了初步整顿,党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健康力量在党内已占强大优势。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

但是,几年来我们党在紧张地进行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的过程中,还来不及针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各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对党员的教育还进行得不普遍、不充分。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我们为抵制、克服这种侵蚀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还不够有力。由于这些原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有些党员对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还没有站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立场上来,有些党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认识模糊,思想混乱。在思想战线上,有些党员对违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熟视无睹,有的甚至公然传播这些思想。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个人主义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为谋求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上犯罪道路。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精神不振,无所作为,不起先锋模范作用。有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丧失战斗堡垒作用。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

《决定》还指出,我们党除了存在着上述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外,还在许多方面同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所以还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

鉴于以上对党的现状和党的任务的分析,《决定》提出了

这次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全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2) 整党的任务。

《决定》规定：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关于统一思想，《决定》指出，“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决定》强调，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衡量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政治和纪律状况的主要标志。《决定》认为，目前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另一种是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这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容的。文件提出，属思想认识问

题的要通过批评教育,提高认识,坚持错误政治立场而拒绝改正的,不但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思想斗争,还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关于整顿作风,《决定》指出,“整顿作风,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决定》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党的一举一动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党如果脱离了群众而不坚决改正,就必然会由于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失败。《决定》列举了党员和党的干部中存在的种种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的现象,指出,这些不正之风和腐朽现象,对社会主义建设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中的形象,削弱了党内外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途的信念,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学习的积极性。这次整党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坚决扫除这些歪风。《决定》并提出了分别不同情节,给予相应处分的规定。

关于加强纪律,《决定》指出,“加强纪律,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决定》认为,现在,在党的不少组织和党员中,仍未清除十年内乱流毒的影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还相当严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十年内乱中产生的派性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至今尚未克服,他们仍然以派性代替党性,严重危害党的团结统一,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不少党组织的组织生活

很不健全，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违犯党的纪律和其他不良现象得不到制止和纠正。有些领导干部不但不能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不良倾向作斗争，反而处处回避矛盾，以不得罪人为原则，有的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这些现象，在这次整党中一定要彻底改变。

关于纯洁组织，《决定》指出，“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决定》强调，纯洁组织是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目的。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决定》对如何判定“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在政策界限上作了规定。“造反起家的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打砸抢分子”，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决定》指出，区别是否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三种人”，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另外，《决定》还规定，至于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和问题，除“三种人”外，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进行处理。对顽固抗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在经济上和其他刑事

问题上严重犯罪的人,以及其他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都必须开除出党。

(3) 整党的步骤和基本方法。

《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每个单位党组织的整顿,也要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规定从1983年冬季起的三年内,分两期整顿完毕。

《决定》规定了整党的基本方法,即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在整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加强思想教育,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

《决定》规定了中央编印的《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和《邓小平文选》这四本书为新时期整党的学习文件。要求所有党员都要通过学习整党文件,提高对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的认识,提高对党员标准的认识,提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

(4) 整党的基本方针。

关于整党的基本方针,《决定》没有列出专题,而是贯穿于《决定》的各个有关部分。总起来说,就是既要坚决积极地解决问题,全面完成整党的任务,实现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又要审慎稳妥,不要搞乱,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决定》的第一部分在分析党的状况时,既尖锐指出党内存在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的严重不纯问题,又充分肯定党的主

流是纯洁的,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二部分,在强调必须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开除出党的同时,规定对开除党籍的人要给出路,鼓励他们改造;在强调清理“三种人”的重要性严肃性的同时,提出确定是否“三种人”要严肃慎重、对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作历史分析;对党员和党员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和问题,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一般性的错误,在整党中不再作为问题提出,对于有严重错误的人,凡属没有作出结论和处理,又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不再重新处理。

《决定》的第四部分指出,不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党的一切目的都达不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严格遵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事求是等原则,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既要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共同进步;规定走群众路线,既要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又不要重复过去“群众整党”的错误;提出整党和生产、工作两不误,坚持边整边改,整党要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发展;宣布不要求各民主党派进行作风和组织的整顿。

《决定》的第五部分,在强调保持党的纪律的严肃性的同时,提出对党员的组织处理,一般要放在整党后期进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程序,不要事先定比例,定数字。

《决定》的第六部分,在规定了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必须实行上下监督等防止走过场的措施之后,又提出注意防止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做法。

《决定》的第七部分，确定这次整党，由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党组织领导进行，上级党组织一般不派工作组，但应选派联络员或巡视员，及时向当地党组织和上级党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决定》的第九部分，提出各级党组织既要遵守本决定的各项规定，又要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提醒各级党委，这次整党决不能妨碍我们党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贯彻执行。

（5）党员登记和整党的验收。

为了防止走过场，《决定》规定了加强领导和组织处理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外，还规定了整党最后要郑重地进行党员登记和整党验收。

党员登记的标准是：①对符合或基本符合党员标准的党员，予以登记；②对经过教育，仍然基本不符合党员标准，但本人有转变的决心和表现，愿意接受党的考验的党员，缓期登记，时间不得超过两年。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也缓期登记；③党员革命意志衰退、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标准，经多次教育帮助仍无转变的，劝其退党，不予登记；④党员要求退党、自行脱党和拒绝参加整党的，予以除名，不予登记。

同时还规定，予以登记、缓期登记、不予登记，都要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缓期登记、不予登记，还要上报上级党组织批准等。

整党验收的标准是：①领导班子是不是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不是

形成团结一致的坚强核心；②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特别是“三种人”，是不是都得到了严肃处理；③党内外群众意见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利用职权和其他条件谋取私利的问题，是不是都得到了认真的解决；④党员的素质是不是提高了，组织纪律是不是加强了，是不是能够认真执行党章，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不是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是不是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⑤本组织所负责的生产和工作，是不是有了显著的起色。验收中，没有做到这五条的，要进行补课。

(6)整党的领导工作。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并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促检查，指导宣传。这次整党工作，由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党组织领导进行。

《决定》最后还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的问题，指出，整党后期，各级党组织要从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把党的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7)整党的开展和结束。

这次整党从1983年11月开始，至1987年5月26日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宣布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经历三年半时间。整党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是从1983年11月至1985年初，主要在中央、国家各部委和省、区、市一级单位以及解放军各大军区单位进行。在整党中，中指委、中央军委派出了有850人组成的90个整党工作联络小组，中指委先后发出11个通知和其他文件，指导整党工作的开展。

第二期是从1985年初至1985年底,主要在地、县两级以及相当于这两级的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进行。中指委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专门发出通知,指出,要把增强党员的党性,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政治经济形势的健康发展,作为第二期整党的突出重点来抓。

第三期从1986年初至1987年上半年,主要是在农村和区乡、村进行。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中指委也专门发出通知,对整党要求、方法、步骤作了全面安排。各省市共派出宣讲员和联络员63万人深入农村帮助整党。1986年5、6月间,中指委分片召开党委书记整党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解决农村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以权谋私和严重违法乱纪问题,并切实加强农村领导班子建设。

三期整党作为整党工作的全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上一期为下一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下一期反映出来的问题,又促进上一期单位回过头去进一步解决。它的特点是“以上启下,以下促上”。各个单位在整党中也是分期分批,选试点,再全面展开。

每个单位展开整党的一般过程是:动员学习阶段,对照检查阶段,深入整改阶段,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阶段。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清查“三种人”是整党的重点,整党中各单位把清查与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文件和清理各种“左”的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结合起来,收效比较好。

综观整党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中指委认为,整党是有成绩的,有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成绩还比较显著。主要

表现在：

在统一思想方面，首先是全党从高级干部到广大党员，通过认真和比较系统的学习，澄清了不少模糊的认识，加深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提高了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其次是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清除派性和“左”的流毒，为增强党的团结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还有普遍进行党性、宗旨、理想教育，改变了一部分党员对此认识淡漠的情况。

在整顿作风方面，首先查处了一批党员和党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案件，刹住了一些不正之风，党风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其次促进了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党员干部深入实际，解决问题，改善了党群关系；另外，农村整党中大多数都进行清理财务等工作，党员和干部带头归还长期拖欠的公物，带头为群众办实事，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在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方面，首先是清理了“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全国（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整党前已进行几次清查共处理了40万人的基础上，又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犯有严重错误的43074名。广西在这次整党中共清理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27919名（其中干部6042名）；其次是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严格党内组织生活的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党的组织纪律有所加强；再次是通过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对一批有严重问题的不合格党员进行了处理，开除党籍的共有33896人，不予登记的90069人，缓登的145456人，受党纪处分的有184071人；另外，对一批有问题的软弱涣散的领

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县级以上领导班子有一半左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充实。

新的历史时期整党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和应吸取的教训,这主要有:在统一思想方面,在集中清理“左”的错误影响时,对已经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注意不够,没有认真开展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一些党员、党员干部中有所滋长;在党风方面,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重大问题,揭露不够,或揭露后处理不够;对组织、人事方面的不正之风,有些单位触及不够;有的领导班子的软弱涣散问题还没解决好;一些单位清理“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的工作欠深入,存在偏宽、偏松现象。另外,由于个别领导同志在整党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失误,例如提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和“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的意见,干扰和影响了十二届二中全会党中央关于整党决定的方针和贯彻。

总之,这次整党没有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避免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一套“左”的做法,并始终注意了正确处理整党工作与改革、建设的关系,取得了成功。但后期在反对右的倾向方面注意不够,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这次整党,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

一、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 城市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6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肯定了特区的经济发展和中央建立特区决策的正确性。2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就对外开放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建立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放；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3月26日至4月6日联合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如何放开步伐，更好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问题。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正式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中央还指出：开放沿海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一要给前来投资和提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使其有利可图；二要扩大沿海港口城市自主权

使其有充分活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此后,这些沿海城市主要通过建立经济开发区的形式,走上了对外开放的新台阶。

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的城市改革试点,主要还是单项改革。从1981年开始酝酿,到1983年,开始了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这可作为城市改革试验的第二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1980年已在全国逐步推开,到1982年已经在全国普遍推行。但是,仅仅进行单项改革,而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企业自主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落实的。加之随着企业改革的进展,企业“小而全”、“大而全”,重复生产,重复建设,条块矛盾,城乡分割的问题也就更加突出。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理论界进行了多次探讨,并提出了发挥中心作用的问题。这个意见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1981年11月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改变那种由地区和部门互相分割,壁垒森严的现象”,“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这样,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1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湖北沙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82年3月又批准在江苏常州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但是,这两个城市都是中等城市,条块分割等矛盾不如大城市突出,为此,在198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批准在四川重庆进行大城市的综合改革试点。在3个试点城市的带动下,其他城市也积极进行了改革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经验。

第二阶段的改革试点,是围绕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开展综合配套改革逐步开展的。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企业。这个阶段企业的改革主要是推行经济责任制,这是企业改革在扩大自主权以后的深入发展。同时,大力发展企业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根据行业的特点、企业规模的大小和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实行不同的经营方式。以国有企业来说,主要的经营方式有:(1)对军工、铁路、航空、海运、电力、邮电、银行和部分骨干企业,实行“国家所有,部门或国家经营”。(2)绝大多数工商企业实行“全民所有,企业经营”。到1984年底仅国有商业改为“企业经营”的就有46589个。(3)部分企业实行“全民所有,企业承包经营”,包括首都钢铁公司等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实行的“利润递增包干”形式和建筑企业实行的招标投标承包责任制形式。(4)部分小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或个人承包或租赁经营”。到1984年底,国营商业租赁或承包给个人经营的有5917个。(5)企业间的联合经营或混合经营。1984年按这种形式经营的工业产值达到86.1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2%。此外,还将一部分国有小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1984年,国有工业企业因此比上年减少3000多个,国有商业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的有5554个。从集体所有制来说,除一小部分仍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外,大部分特别是乡镇企业都改为“集体承包经营”,“个人承包、租赁经营”,有的转为个体所有制。总之,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以适应不同经济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

第二个层次是城市。主要是解决如何发挥城市组织经济

的作用,扩大城市组织经济的权力等问题。在这方面做了如下工作:实行企业下放,对重庆试行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的权力;以城市为依托,大力组织企业的改组联合,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以城市为依托,推动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组织科研、教育和生产的联合体;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的管理体制,试行工程承包,组织住宅小区建设;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搞活流通,改革原有的封闭式、单渠道、多环节的流通体制,实行多渠道、少环节,发展小商品和农贸市场,试建批发市场和贸易中心;开始注意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如放开小商品价格,改革信贷管理办法,试行浮动利率等等。

第三个层次是以城市为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发展区域经济。1983年推开了市领导县的体制改革。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改革的地区,在城乡经济统筹安排和组织各种城乡经济网络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1983年,还先后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和东北能源规划办公室,探索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条块分割、合理组织经济活动的问题。1984年,西南四省五方(川、贵、云、广西和重庆)建立了经济协调组织。

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工业改组和企业联合。工业改组和企业联合有不同的层次和形式。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改组和联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中国石油化工工业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等。到1983年为止,国务院38个部门还组建了120个全国性公司。二是跨地区、跨部门的改组和联合。这方面做得成功的

有第二汽车制造厂、重庆钟表公司等。三是在城市范围内的改组和联合。比较成功的有上海、沙市、常州等地的专业化协作生产,有上海、南京的石化总公司的资源综合利用,有南京、天津、北京等地的工艺协作和设备维修中心的合作,有大连等地的科研生产的联合等。四是城乡经济联合,比较成功的有济南、重庆、天津等地组织的农工商联合体等。至于地区、部门、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则更多。

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这个时期在一些省还进行了撤销专区行署,由市领导县的体制改革试验。我国原有的城乡体制割裂了城乡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既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城市经济的繁荣。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在行政区划上撤销专区行署,将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市与它所在地区的县合并成一个经济区,由市领导县,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把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协调起来,以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繁荣。这项改革是借鉴了辽宁省从1958年起就试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的历史经验。它于1982年开始在部分省份推开的。首先学习吸取辽宁省市领导县经验的是江苏省常州市。该省于1982年3月将常州市所在镇江地区的武进县、溧阳县、金坛县划归常州市领导,实行城乡一体化,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常州市在试行市领导县的过程中,实行三个转变。即在指导思想上,从单纯抓市区、抓工业,转变为根据城乡结合的特点来规划经济的发展和安排人民的生活。在管理方式上,从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变为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通过建立工业经济网络、科学技术网络、商品流通网络、金融信贷网络,来协调发展城乡经济和文化。在工作方法上,从过去靠基

层向上级机关汇报,转变为上级机关为基层服务,要求市工业公司同县工业公司挂钩,指导县级工业建设。继常州市领导三个县的体制改革之后,该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徐州市等也实行了市领导县的体制改革。南通市在地市合并后,提出立足城市,依靠农村,建立以轻纺工业为主体、其他工业合理发展的工业经济网络;以粮棉生产为主体、农副工商运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结构;以港口为主体、水陆运输配套的交通枢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江海平原经济区。无锡市在接管江阴、无锡、宜兴 3 县后,加强对县社队工业领导,统一规划、组织生产,给城乡经济发展带来一派生机。徐州市在地市合并后,加强了煤炭基地、商品粮基地、建材基地、工业原料基地、副食品基地的建设,通过这些基地的建设,推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后来江苏全省确定由 11 个市领导各个县,完成了市领导县的体制改革。其他省也在若干市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从 1979 年至 1983 年进行的城市体制改革试点,是属于探索性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所要达到的改革目标来说只是良好的起步。城市的情况比农村复杂得多,因此城市继续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

1984 年 2 月 10 日至 23 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指出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的重大问题,能否坚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并取得成效,是衡量各级经济部门和企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会议提出经济战线要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节约资金及增加税收和利润为奋斗目标;继续提高企业素质,加强行业管理,搞好宏观

经济管理。5月3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认真抓好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扭亏增盈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素质、增加财政收入,实现国家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措施。

在改革的推动下,1984年工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据年底资料,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8.7%,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10.4%,实现利润和消费税金比上年增长10.5%,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下降23%,流动资金周转期由上年的108天缩短到102天。其他部门的经济效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4月16日至25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常州市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交流了近两年来沙市、常州、重庆等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情况,认为取得了初步成效。指出搞好这项工作,还需相应扩大试点城市的权力和责任,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6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正式决定在武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年内国务院又陆续批准南京、大连等大中城市进行这种试点,加快了改革试点步伐。

5月9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开展财务大检查的情况和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的报告》。《报告》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财务大检查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目前为止,共查出违纪金额42亿元,已收缴入库15亿元。《报告》还提出了进一步严肃财政纪律的意见。11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大力组织货币回笼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针对第三季度以来货币投放大量增加,已大大超过国家计划指

标的严重状况,提出了增产适销对路产品、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加强信贷管理等五项措施。

5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置、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的自主权。这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一项较大的措施。

5月15日,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农村改革,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继续改善农业结构,支持农民积极扩大商品生产。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把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起套来,同步进行。

7月14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城市商业体制的主要方面和环节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意见。7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对今后十六年旅游工作发展作出规划,并提出了加快改革步伐的八个方面的任务。9月15日,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了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9月1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并批准颁布《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从10月1日起试行)。同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

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 16 条主要改革内容，并决定成立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有关事宜。9 月 20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煤炭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决定对全国 90 个统配煤矿由煤炭部实行总承包。11 月 10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工程设计改革的几点意见》。上述改革措施大部分在本年便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8 月 6 日，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为了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信用合作管理体制必须抓紧进行改革，逐步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9 月 10 日，《人民日报》报道，本年 7 月底统计，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会组织的农民个人储蓄存款已达 434.3 亿元，仅七个月就比去年上升 12%，全国已形成了一个为广大农民服务的金融网络。

8 月 14 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最近讨论通过国家经委提出的《1981—2000 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纲要》指出，到本世纪末，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3000 亿元，比 1980 年翻 2.3 番。《纲要》制定了食品工业的发展方针，并对食品生产多样化、人民膳食营养构成及各类食品行业的增长指数提出了要求。8 月 26 日至 9 月 3 日，新中国第一次全国食品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研究《纲要》的贯彻落实问题。

9 月 9 日，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一、关于计划体制,信中说,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建议把我国计划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意思:(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二)市场调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四)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二、关于价格改革问题,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三、关于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信中提出了实行政企分开,逐步简政放权的观点。上述意见被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采纳。

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在阐述加快计划体制改革步伐的必要性及改革的方针和原则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对生产、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外汇、物资分配、商业外贸、劳动工资文教卫生计划及实行多种形式的计划承包责任制、加强国民经济平衡工作、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加强经济信息管理搞好国民经济预测、制订相应的计划法规和管理条例等12个方面的改进、改革工作作了规定。国务院在批转这个规定时指出:计划体制改革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同时强调,这是一项涉及范围很广、很复杂的工作,要本着既积极又稳妥的原则进行。《暂行规定》从1985年起试行。

三、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预示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式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其中主要是进行企业机制的改革、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

(一)1984年10月以后,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增强企业活力仍然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特点是,在试点和局部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采取措施,同时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入手,力图在改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上有所突破。

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1985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体改委《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决定》,指出搞活企业,主要是进一步贯彻国家既定的政策和赋予的权力,做好内部改革,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内在潜力;同时,相应地改善外部环境,建立、健全宏观的控制与管理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这个规定的具体内容是:

- (1)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职工队伍素质;
- (2)制订经营发展战略;
- (3)实行企业内部的分级分权管理;
- (4)提高质量管理,降低消耗,降低成本;
- (5)综合利用能源、资源;
- (6)鼓励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 (7)发展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
- (8)改进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办法;
- (9)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
- (10)调减调节税;
- (11)给部分大企业直接对外经营权;
- (12)清理、整顿公司;
- (13)部门和城市都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再次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强调凡文件规定放给企业的权利被中间环节截留的,要坚决放给企业。文件指出,根据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是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内容。对各地正在试行、推行的承包制、租赁制及股份制等各种两权分离的经营方式,文件都给予了肯定,并对有关的一些原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承包制是实行企业两权分离的主要形式。1981年至1983年,许多地区都曾在城市企业中试行过承包制(当时称为利润盈亏包干的责任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次承包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除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如首钢、鞍钢、一汽、二汽外,绝大多数试点企业都改行利改税办法。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随着其他各个方面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企业的经营环境比1984年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再次兴起并逐步推广开来,并在大面积上取得成效。

租赁制也是企业实行两权分离的重要形式,比之承包制,它更进一步斩断了政府与企业的行政经济关系,使企业自然而然地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变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婆媳关系为相互服务的伙伴关系。全面改革阶段,这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在小型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商业企业采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实行承包制、租赁制及试行股份制的同时,这一时期,还有一个从试点到有组织地向全国推开的改革措施,即在企业内部,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的领导制度,尤其是围绕实行厂长负责制,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曲折的

实践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是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下,1984年已有3000家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试点,到1985年底,这种试点单位达到27758个。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发了《全国所有制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明确规定:企业实行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代表法人行使职权;企业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是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做好企业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干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企业领导制度正式完成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厂长负责制的转变。到1987年5月,全国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达到32587家,绝大部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引进外资、建立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据1987年6月末统计,我国已批准建立的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8516家,协议合同外资金额达171.76亿美元。

(二)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价格改革从1979年就开始了,几年来的价格改革是按照“调放结合”的方针进行的。就是合理调整价格,逐步放开价格,1984年前以调为主,1984年后以放为主。价格改革的主要

情况是：(1)农副产品的价格改革。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粮油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加价由30%上升为50%，棉花统购价格提高15%，超购加价30%，生猪、鲜蛋收购价提高26%。1980年又对少数产品的价格作了调整，如棉花统购价又提高10%。1979年11月提高了猪肉、牛肉、羊肉、鲜蛋、家禽、水产品、蔬菜、牛奶等零售价格，平均提价幅度为30%左右，同时给予居民以物价补贴。1985年，粮、棉实行合同收购制，价格改为合同价。合同外收购，是参照市场价格，由国家与农民协商确定。这一年还放开了猪肉、牛肉、羊肉、禽蛋、鱼、蔬菜等副食品的价格。这次放开价格，在大中城市物价上升的幅度较大，猪肉销售价提高37.8%，蔬菜销售价提高49%，海鱼销售价提高1—2倍，淡水鱼提高30—40%。这次价格放开也给居民以物价补贴。(2)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1979年后，原材料价格改革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整部分产品价格；二是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按市场价出售。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即价格“双轨制”。实际上，一种生产资料价格往往有国家定价、地方定价和市场交易等多种价格。(3)消费工业品的价格改革。有升有降地调整了消费工业品销售价格，同时逐步放开小商品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定价。(4)交通运价和旅游服务收费也作了局部调整。综合起来看，价格改革的基本情况是：对轻纺工业品价格实行管大放小，国家管主要品种价格，放开部分一般品种和全部小商品价格；对重工业品实行“双轨制”价格，指令性计划产品实行国家牌价，指导性计划产品必要时实行浮动价格，计划外商品实行市场价格，农产品价格则兼而用之。通过价格改革，改变了

单一的国家定价方式。我国的价格形式已从基本上是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经过改革,大大缩小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比价),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市场供应。价格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物价上涨过猛,引起群众不满。

(三)改革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工资改革 1984 年以前主要是补偿性的调整工资和恢复奖励制度,扩大企业在奖金分配上的自主权。1984 年以后,对企业的工资、奖金分配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试验,大部分企业实行奖金随经济效益浮动,一部分大中型国营企业试行了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挂钩浮动的试验。1985 年 1 月 5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从 1985 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国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一般从 1984 年的实际上缴税利作为工资总额的挂钩指标。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比例,国家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以人均上缴税利为主,同时考虑国家投资比例、百元工资税利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等情况分别确定,一般上缴税利总额增长 1%,工资总额增长 0.3%至 0.7%,某些特殊行业和地区,可以超过 0.7%,但最多不得超过 1%。上缴税利下降时,工资总额要相应下浮。国家核定的企业的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比例,1985 年先行试行一年,从 1986 年开始一定 3 年或 5 年不变。企业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脱钩。1986 年又进行了新的改革探索,明确了在国家

规定的工资总额和政策范围内,把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奖金分配权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决定分配形式和方法,并把奖金税的30%的最低税率和300%的最高税率分别降为20%和200%。对集体企业也开始征奖金税。

198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三部分。

1986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对劳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企业新招收的工人开始实行合同制;(2)企业招收工人要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3)对职工实行待业保险;(4)企业可以辞退违纪职工。到1986年底,全民企业已招收合同制职工560万人,劳动制度的改革,开始打破了“铁饭碗”和“终身制”。

1986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职称改革工作会议。中央决定从1986年起改革职称评定制度,逐步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这是对专业技术干部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除上述价格体系和工资、劳动制度两项大的改革外,财税、金融、流通等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主要内容是:(1)放宽政策,积极恢复和发展个体、集体商业,使流通领域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济形式并有的局面。(2)促进了商品市场的发育,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增强。通过改革,已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开放的全国性市场。(3)冲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传统观念,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生产资料市场已在各地相继出现,生产资料的流通体制

已出现了新的变化。(4)商业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也迈出了新的步子。1986年各地普遍进行了放开小型商业企业的改革,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实行了“改、转、租、卖”。大中型商业企业多数地方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少数地方已大面积推广。总之,改革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市场交易兴旺。

部分城市还继续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到1986年底,全国综合试点城市已达74个。16个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也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此外,还有27个金融改革试点城市,5个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9个企业经营责任制试点城市,2个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城市已成为推进改革的阵地和重要力量。

四、农村第二步改革

我国农村实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步改革后,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力,农村经济的主要指标连年增长。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已达3612亿元,粮食产量40712万吨,棉花产量607.7万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商品率达53.3%。这些指标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创造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中国的农业问题实现了初步解决,大部分农村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充分肯定了农村第一步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但也清醒地意识到还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需求,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

全,商品流通遇到阻碍;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优势不能发挥,一部分地区贫困面貌改变缓慢。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在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之后,还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研究,制定了又一个“一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于1985年1月1日发出。这个文件决定,从1985年起,从改革国家和农民的经济联系形式入手,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文件规定:(一)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除个别产品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二)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和鼓励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等产业。(三)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允许山区退耕还林还牧;集体林区取消林木统购。(四)积极兴办交通事业。采取民工建勤、集资、发行债券等多种形式兴修公路、航道工程。(五)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六)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允许各类科技人员停薪留职应聘到农村工作。(七)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

益。农村信用社可以在信贷范围、存放利率上有一定的灵活性；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八）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在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家庭经营长期不变的基础上，提倡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九）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一新的决策的作出，标志着农村改革进入了以进一步扩大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为宗旨的第二步改革。

改革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使农民在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以后，又获得了生产经营上的较大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价值规律和市场情况，决定经营的品种、规模、数量，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也为农村产业结构趋向合理提供了条件。到1986年，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可喜变化。一是经济作物的比重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由1978年的18.09亿亩调整到16.64亿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由2.17亿亩增加到3.04亿亩，所占比重由9.6%提高到14.1%。由此引起种植业的产值构成发生变化，粮食作物所占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76.7%下降到63.3%，经济作物由11.9%提高到17.9%。二是一向薄弱的林牧副渔业地位加强。在农业总产值中，其所占比重由1978年前的23.3%提高到37.8%。不少地区和农户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退耕还林、还牧，更科学地配置了生产资料资源，提高了综合效益。

这项改革还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使整个非农产业比重上升。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乡镇企业利用自己的优

势,坚持“五个轮一齐转”(乡办、村办、农民联户办、个体办和其它合作形式办)的方针,继续发展。其中的特色之一,是大城市郊区的乡镇企业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与城市工业搞横向联系,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例如,上海市郊区的乡镇企业,在上海市政府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形势下,利用上海大工业的辐射能力,主动与大工业联系,既增强了自身的技术力量,保证了产品质量,又避免了与大工业争原料,争市场的矛盾,互助互利,获得了稳定发展。特别是在有些地方乡镇企业面临原料涨价、竞争困难的情况下,上海市的乡镇企业仍然连续保持年递增率为25.8%的较高速度,为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到1987年,上述四项产业产值超过4500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8%,首次超过了纯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乡镇企业等产业的发展,对于吸收农村劳动力、改善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来比较沉寂的农垦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加快了改革步伐。围绕搞活企业这个中心,先后实行了财务包干制度,农工商综合经营,双层经营体制及场长、经理负责制等,提高了经济效益。1987年,农垦系统工农业产值达212亿元,盈利11.4亿元,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分别比1982年增长82.7%和58.3%。全系统上交粮食447万吨,相当于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调入量的80%。农垦系统也是我国大中城市鲜奶的主要供应者,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

农村扶贫工作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进展。农村改革开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鼓励部分地区、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

同时,对扶持贫困地区、贫困户发展生产的工作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在全面改革阶段取得了显著成绩。1985年4月26日,国务院批转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扶持农村贫困户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请示》,指出1400万户贫困户治穷致富的根本出路在于贯彻自力更生的原则,辅之以国家和社会的积极帮助,发展生产,增强自身活力。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了全国的扶贫目标,争取在“七五”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这项工作以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为重点展开。特别是对集中连片的341个贫困县,约6000万贫困人口,国家每年增加10亿元专项贴息贷款予以重点扶持。各地采取了许多适应当地情况的扶贫办法,如帮助开发土特产品、举办科技培训班、组织劳务输出等,陕西省还组织省直单位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到陕北老区蹲点扶贫,与农民共同研究治穷致富的措施,帮助老区发展商品经济,受到农民的欢迎。各省区也普遍实行了厅、局对口帮县,地、县部门包干扶贫的办法,取得了较好效果。到1987年,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200元以下的人口比1985年减少了600多万人,150元以下的减少了约1000万人。

然而,在农村第二步改革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农村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继1984年农产品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后,从1985年开始,主要农产品连年出现徘徊局面。以粮食为例,1984年产量为40712万吨,1985年下降到37911万吨,1986年39151万吨,1987年也仅到40000万吨。

主要农产品生产出现徘徊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原因看,由于我国农业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弱，一遇天灾，必然大幅度减产。而一般规律是，风调雨顺和灾害频繁之年总是隔若干年交替出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引起粮棉播种面积下降，总产量自然会减少。从主观上看，则是由于改革措施的不配套，不合理，由于农村工作中的失误。具体地说，主要是：第一，价格政策不合理，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全面改革的阶段，国家在原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然而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幅度更大。据上海市统计，以1988年与1985年相比，农用物资的提价幅度超过了粮食的提价幅度。如8种主要农药价格年均递增15.4%，化肥年均递增13.8%，薄膜年均递增26.7%，而粮棉油同期年均递增只有5.9%。这种情况导致种植业的比较利益日趋低下，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第二，对农业的投入减少，造成农业生产条件恶化。据有关统计，我国农业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60年代为16—20%，70年代为11—12%，80年代逐步下降为3—4%。投资绝对额1979年为57.9亿元，而1987年反而减少为42.11亿元。各省支农资金也急剧下降，如福建省，1978年到1987年，基建总投资增长4.08倍，而农业投资额反而下降39.7%。到1987年，有17个省对水利的投资未达到1980年财政包干的水平，大约减少1/3。个体农民用于农业再生产的投入也明显下降。由于重产出，轻投入，很大程度上靠吃过去农业基本建设的老本，造成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日益薄弱，生产条件恶化，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第三，没有注意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家庭规模太小，无力进行用工多、耗资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就需要

在注重家庭经营的同时,注重发挥集体经营的作用,由集体兴办那些用工多、耗资大的农用水利基本建设

五、教育科学体制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一是从宏观上讲,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比较广泛的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国的科技体制是伴随经济体制一同建立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对它形成了强烈冲击,但经过拨乱反正,进入新时期以后的科技体制又逐步恢复到“文革”前的运行状态。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全部由行政机关下达,它固然便于集中搞一些大型的科研项目,但也限制了科研单位的活力。这种脱离科学研究发展规律的体制的固有弊端在初步改革开始后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科研单位缺乏必要的自主和经济上的自立、发展的能力,科研和生产建设相分离。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着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束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建设不能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当然也不能适应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便腾出部分精力着手科技体制改革的尝试和推广工作。

1985年3月2日至7日,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专门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改革科技

体制,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报告。邓小平发表了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中国共产党要更好地为发展科学技术扫清道路,更充分地发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会议对《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草稿)进行了讨论。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它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决定》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针。一是在运行机制方面,改革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其中,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独立研究机构,在国家逐步减少事业费的情况下,逐步推行技术合同制。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基金来源主要靠国家预算拨款。开拓技术市场,疏通技术成果流向生产的渠道,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克服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研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二是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变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

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协作的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技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三是在人事制度方面,逐步实行专业职务聘任制,要克服“左”的影响,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面,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决定》发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研究制定了各项贯彻措施。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行,科技界开辟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多种渠道,加快了科技成果流向生产领域的步伐,科技进步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科技与经济建设相分离的局面有了显著的改变。

按照这个决定规划的蓝图和要求,以增强科研单位活力、促进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为中心内容,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在下述几个方面展开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1)拨款管理制度有所改变。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从1986年起,对国务院归口56个部门和地方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城市所属的2680个科研事业单位,按照科技事业的特点分为技术开发型、社会公益服务型 and 基础研究型,分别实行不同的科技拨款制度。对技术开发型的研究所,逐步减少事业费,推行合同制;对社会公益服务型及其它类型的研究所,分别开始实行包干制或基金制。据对全国部委直属科研事业单位的统计,到1987年,实行技术合同制的技术开发单位已达1900个,近500个研究所不同程度核减了事业费。与此同时,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和基础研究的拨款方式也有了改

变。

(2)培育发展技术市场。早在1985年1月,国务院就作出了《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技术也是商品,单位、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区、部门、经济形式的限制转让技术,并对转让技术的有关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技术市场从此获得较为迅速的发展。1985年全国举办各种较大型的技术交易会70余次。到1987年,全国地、县以上的各类技术贸易经营机构已有5000多个,技术交易额逐年增加。比如沈阳市,自1986年6月1日实行技术合同统一登记后,至12月底,技术交易额为前5个月的5倍,全年技术交易额达2.6亿元,居全国各地之首。此外,我国的技术商品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为国家赚取外汇收入。

(3)发展科研生产联合体,促进技术开发和应用。企业自主权逐步扩大与科技体制改革的进行,使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横向联合成为可能。而这种联合又是对双方、对国家都十分有利的事情,所以得到了持久不衰的发展。据1985年统计,全国6500家大中型企业中,已有1913家拥有2059个厂办科研机构,科技人员达19.8万人。到1986年底,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组成的各类联合体已有1万多个,其联合形式也由初级发展到高级,从双边专项科技协作逐步发展到多边、多专业、多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到1987年底,它们已组织了150家技术开发公司,不少公司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发展,同时也给有关的科研机构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使其增强了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科研人员的生活和工

作条件。

(4)科技干部管理体制取得进展。原有的科技干部管理体制,封闭僵死,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技术职称评定只能上不能下,致使许多科技人才用非所学、受压受挤,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1984年10月以来,这方面的改革有一定进展。从1986年开始,普遍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虽然这项改革在不少单位有待改进和完善,但它终究在部分单位得到认真实施,对旧的体制形成了很大冲击。1986年,全国人才流动工作,在前几年探索试验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坚持以计划调配为主、社会调节、协商流动为辅的原则,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1983年《国务院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规定》,按照合理流向,即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内地到边远地区,从科技人员富余的部门和单位到科技力量薄弱而又急需加强的部门和单位,疏通渠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促进了专业技术干部的合理流动。在计划调配方面,各级组织、人事部门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新建、扩建部门、单位选配专业技术骨干,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招聘专业技术人员,为边远省区调进调出干部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一些省从省直机关选派一批年轻干部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一些省从省直机关选派一批年轻干部到地县充实领导班子,下乡下厂,加强基层工作,培养锻炼干部;有的省从机关抽调干部深入边远山区和农村,帮助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坚持计划调配的同时,还根据社会需求,致力于改变专业技术干部分布不合理的状况,采取协商流动方式,搞活干部调配,把人才流动同技

术、智力流动结合起来,为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人才流动工作中,各地相继建立了人才交流服务机构。1986年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8个地、州、市,917个县建立了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是人事部门主管的事业单位,主要从事调查本地人才资源,调剂人才余缺,协助招聘。借调、聘用兼职专业人员和培训专业人才,提供人才、科技信息和咨询服务。它们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人才交流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与用人单位直接会面洽谈,来“牵线搭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仅到1986年6月,全国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接待专业技术人员近82万人,其中登记要求流动的约45万人。有近12万人办理了调动手续,五千多人兼职应聘和借调。此外,还举办了培训班一千多期,培训近八万人,组织转让科技成果九百多项,签订技术合同一千五百多项。

(5)“星火计划”的实施。我国农村改革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对于全面改革和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乡镇企业和农村建设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落后。为了从根本上改善这种状况,1984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科委关于拟定“星火计划”的请示。这项计划旨在促进地方经济振兴,主要内容是抓一批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有示范和推广意义的、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不显眼”的适用技术项目,提高这些企业的科技水平,为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植入新的胚胎。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实施后,取得了初步的效果。到1988年,安排国家、省、地、县各级星火计划项目9655项;有40万名科技人员在中小

企业、乡镇企业和贫困地区大显身手,培养了 250 万名懂科技的能人干才,使科技火种撒遍祖国大地。据不完全统计,已完成的 2500 项星火计划项目,新增产值 74 亿元,新创利税 16 亿元,投入产出比例超过 1:5,经济和科技进步效益都比较显著,受到农民热情欢迎。星火计划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科学技术与农村生产结合、促进农村实现工业化的比较成功的路子。

科技体制改革的尝试和初步推行已经对旧的科技体制形成强烈冲击,调动了很大一部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科学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进程。然而,由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加之改革本身错综复杂,改革措施不够配套,使科技体制改革存在进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些旧的弊端尚未克服,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相当部分的科研机构尚缺乏适宜于它们特点的改革措施,一些基础研究和有长远意义的科研项目本身无法与现实生产产生紧密联系,因而失去经济创收的条件,而国家财政没有保证这部分机构的科研人员的必需的事业经费,这些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也长期得不到改善,严重挫伤了为数众多的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成了我国科研发展的潜在危机。这是深化改革需要认真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在着手对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同时,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提上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日程。

1985 年 1 月 21 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决定。9 月 10 日,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庆祝教师节,同日,李先念主席向各族教师致公开信表示祝贺。教师节的建立有助于形成尊重教师、尊重知识的社会风

尚。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也就是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两个月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与它当时所处的全国大气候相适应,主要讨论和部署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方针步骤问题讲了话。会议代表认真讨论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稿)。

会议的高潮是5月19日上午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他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也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21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邓小平对一些地方忽视教育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

化建设。各级领导要象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

5月27日,经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认真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决定》共分五个部分:一、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二、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三、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四、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五、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个文件分析了我国教育体制的现状和改革方向,强调指出了现行教育体制的主要弊端:

(1)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的管起来。

(2)在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

(3)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从小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很不够,发扬立志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很不够,生动活泼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很不够,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

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经过改革,要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使基础教育得到切实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潜力和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决定》强调,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改革,1985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1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同时撤销),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兼任国家教委主任。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成立了统一管理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委员会。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些都为发展教育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几年来,教育体制改革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取得的主要进展是:

扩大地方发展教育的权力和责任,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一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这

就明确把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交给了地方。这一改革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农村各级政策、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性,基础教育受到重视。不少地方开始把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推动了基础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许多地方的办学条件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山东省除政府投资外,还通过征收教育事业附加税、群众集资、勤工俭学等方式筹集资金,基本上完成了全省中小学校舍的改造任务。据教育部门统计,1986年全国各地通过各种方式,共筹集资金约40亿元。大多数地区基础教育的活力有所加强。

适当调整教育结构,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从宏观方面来说,除抓好正规的初、中、高级教育外,着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到1987年,全国中等专业学校发展到3913所,在校学生187.4万人;职业、农业中学达8183所,在校生267.6万人。成人高等学校1399所。另有6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举办了函授、夜大学,在校人数达185.8万人。各种形式的成人中等专业学校4742所,在校人数168.2万人。有3000多万青壮年职工参加了初中文化、初级技术课的学习,1.5亿青壮年农民接受了各级、各类文化技术培训。在高等学校内部,系科进一步优化设置。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短缺、薄弱专业得到加强。1987年同1982年相比,财经类专业在校生数由5.6万增加为18.04万人,学校数由36所增加到74所。政法、师范类学校、系科及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加。这些调整使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更为紧密,提高了教育水平和教育的社会效益。

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强高校与生产、科研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高等学校在执行国家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与外单位合作,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等。这些改革措施在各高校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进展,对各方面都产生了较好的效益。此外,一些学校进行了校长负责制试点。

其它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还有:在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方面,从1985年开始,在一些学校打破完全由国家计划分配的传统做法,进行“供需见面”的改革试点,此后逐步扩大了范围,减少了过去难以避免的“乱点鸳鸯谱”的弊病;在高校内部教学体制改革方面,从1985年开始,首批开始试办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50人。武汉大学在本科生教学中实行“导师制”,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改革人民助学金制度方面,从1986年开始,在部分高等学校的新生中试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此后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以期取代基本上是吃“大锅饭”的助学金制度,提高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强自立精神。此后,实行了教师职务聘任制,增强了教师的竞争意识。这些改革措施也都收到了程度不同的效果。

另外,在提高教师地位、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1985年初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曾建议,以后每年的新年、春节期间,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首先要去慰问教师,一定要在全社会造成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空气。也是从这年开始,在胡耀邦的倡议下,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机关每年抽调部分人员,组成讲师团,分赴全国各地培训中小学教师,或代班上课。不少省市也组成了省级机关培训中小学教师讲师团,对促进基层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教育体制改革的上述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为教育事业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教育界也发生了令人深为忧虑的问题。在大学校园,不少学生学习积极性明显下降,许多研究生中途要求退学,在博士生招考中,不少地方出现报考人数远远低于招生人数的奇异现象;在中小学校园,中途辍学、逃学者屡见不鲜,学生学习动力明显减弱,出现厌学情绪;在教师队伍中,思想动摇、要求“跳槽”者越来越多;有些地方出现研究生、青年讲师报考饭店服务员的事情。不少学校“破墙开店”,办起了小吃、服装等各类与教育事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第三产业……教育界几乎成了“大观园”。这些问题无疑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隐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还不够深入和完善,在教育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地地方;二是我国的教育经费相对缺少,教师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较低。在我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拨款在逐年增加,1982年到1987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4.02%。然而,以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衡量,我国在世界上居倒数,使教学环境和设备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从1987年10月开始,国家虽然将全国中小学教师工资提高10%,但与其他行业的收入比较,仍然偏低,大面积分配不合理,“脑体倒挂”的现象还在继续。经济地位的低下导致教师社会地位的低下。这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六、裁军百万， 推进军队体制改革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4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邓小平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建设形势的分析，论证了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根据和意义。他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会议一致拥护我国政府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并研究决定了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会议确定，搞好改革体制、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号召全军指战员顾大局、识大体，保证这一重大决策的顺利实现。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讲话。杨得志总参谋长作了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报告。会议还调整了大军区领导班子。7月10日，新华社报道，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指出，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既要坚持我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继承过去的好传统，又要不断探索现代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新路子；二是要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三是要把重点放在改善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人的素质上，并实行科学的编组，使军人和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起来；四是既要使我军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又要使我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关于军队精简整编后的前景，杨尚昆指出，人民解放军减员百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

心的表现；精简后的人民军队不但不会削弱战斗力，而且肯定会进一步提高战斗力；中国军队有决心、有能力保卫祖国安全、保卫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

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支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主动帮助解决好部队干部、职工的安置和精简整编中出现的其他问题。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和广大人民要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搞好改革和建设。

9月4日，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全军深入开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教育。通知要求全军认真学习邓小平、陈云同志的六篇主要讲话，结合军队实际，着重抓好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并强调理想教育要与现实目标相联系，同军队精简整编相结合；同时要加强遵守纪律的教育。采用启发引导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防止沿袭过去那套“左”的做法。

9月11日，《解放军报》报道，今后，我军的76种干部职务将由战士担任。

9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解放军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领导班子已经调整完毕。调整后的各大单位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64.9岁降到56.7岁，基本形成了梯队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有了进一步改善。60%的干部具有大专文化程度，75%的干部经过军队校院培训；群体素质也有了进一步提高。

12月19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已在北京成立。它是在合并原军事、政治、后勤三个学院的基础上

成立的。

12月31日,新华社报道,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改建集团军的工作已顺利结束。它标志我军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七、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

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全会认为,这个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决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战略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同时《决议》对党的建设,主要是思想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关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内容主要有:

(1)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

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2)提出了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问题。《决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并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理想，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决议》要求党员把共同理想与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为最高理想而奋斗，并善于以现实成就和群众切身经验，进行生动的理想教育。

(3)要求党员在道德建设中站在时代的潮流面前。《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历史运动，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站在时代潮流面前，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在道德建设上，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

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4)在思想政治上,进一步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决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5)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决议》指出,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并指出要研究四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决议》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认真的学习,坚持和发展就无从谈起。

(6)提出了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决议》第八节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这个责任就是:一是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搞好党风;二是以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党作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党员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做官当老爷,以权谋私,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成为党风建设中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反对不正之风的斗争是长期的,一定要坚决持久地进行下去,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建设好的党风,思想建设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必须努力改革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与工作制度,严格执行

党的纪律,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与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的监督。《决议》要求,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应当随时随地在人民群众中做模范,做两个文明建设的模范。并强调,在新形势下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全党面临的新课题。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必须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要努力摸索规律,研究政策,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不搞形式主义。同时还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有力保证,要努力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要建设好一支精干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邓小平重新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因为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邓小平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邓小平强调,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他的讲话再

次向全党敲了警钟。

这项决议和邓小平的讲话,总结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核心内容,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三节 “六五”计划的完成与“七五”计划的制订

一、“六五”计划的完成

1985 年是我国的“六五”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在抓紧完成“六五”计划的同时,于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六五”计划,讨论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在 1981 年至 1985 年的 5 年中,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5 年中,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组织下,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任务。“六五”期间规

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都已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全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与建国以来前几个五年计划相比，或同世界各国同期相比，我国“六五”计划期间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

在这5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这速度大体相当于1953年至1957年期间，而高于其它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

在这5年中，我国农业的发展更为迅速，是建国以来最快的时期。1953年至1980年的28年中平均每年增长3.5%。其中增长较快的“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4.5%，“五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5.1%，而“六五”时期为8.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迅速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稳定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4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达8146亿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口粮达786斤，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在这5年中，我国工业的发展也较迅速，1980年至1985年，我国原煤产量由6.2亿吨增加到8.5亿吨，原油由1.06亿吨增加到1.25亿吨，发电量由3000亿度增加到4073亿度，钢由3700万吨增加到4666万吨。我国有10亿人口，目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还相当低，但总产量在世界上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所占的位次也大都提前了。这标志着我国经

济的总实力有了显著的增加。

在这5年中,我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六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530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880亿元,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496个,其中交通、能源项目103个。5年内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950万千瓦,采煤能力8000万吨,原油开采能力5000万吨,铁路新通车里程1500公里、复线里程1500公里、电气化里程2400公里,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1亿吨。现有企业更新改造步伐加快,共建成投产项目20多万个。这为“七五”计划和90年代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在这5年中,我国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上升。“五五”末期,国家财政出现较大的赤字。1979年、1980年合计赤字近300亿元。“六五”期间,通过调整 and 改革,生产发展,流通扩大,效益提高,收入增加。1983年增加收入127亿元;1984年增加收入255亿元;1985年增加收入362亿元,全年总收入达到1829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

在这5年中,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重新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六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这方面的经费为1172亿元,比“五五”期间的577亿元增长一倍。5年中共取得科研成果3300项,有937项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其中一部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校在校生由1980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万人。

在这5年中,我国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六五”期间,

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2300 亿美元,比“五五”时期翻了一番。5 年中引进国外技术 1 万多项,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在这 5 年中,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6.9%,5 年合计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 3500 多万;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六五”期间城市住宅峻工面积达 6.3 亿多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 32 亿平方米;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1985 年末达 1623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3 倍。

总之,在这 5 年中,基本上解决了以往长期希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找到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市场繁荣,消费品充足,同时也使我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率降到了 30%左右。

以上成就的取得充分证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决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决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并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各种政策,这是 5 年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重要前提。这期间,在经济上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变。

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上,从片面追求工业特别是重要工业产值产量增长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

轻重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

在这转变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日益明确和深化。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制度,正在日益配套和完善。全国人民越来越相信,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当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历史性转变中,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都要有一个过程,因而在这5年的工作指导上还存着缺点和失误,前进中还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工作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进一步深入改革,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为“七五”计划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七五”计划的制定

1986年3月25日,赵紫阳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4月12日,经讨论通过决议,原则批准了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从此,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七五”计

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

“七五”计划期间,即1986—1990年的5年中,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也是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的更好发展准备条件的重要时期。在这时期中,将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遵循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执行以下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方针: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坚持社会主义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坚持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坚持恰当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规划,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加快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坚持把建设重点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坚持把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把国内经济建设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坚持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在各项事业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七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

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七五”计划的工作部署,大体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要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基本平衡;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在进一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和改善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后三年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体制改革和生产建设,全面完成“七五”计划的任务。

将在“七五”计划期间,使全国工农业增长3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4%。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677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1.3倍;国民生产总值为1.117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在经济建设方面考虑和研究的问题有: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高效益地向前发展;规定恰当的投资规模,合理地调整投资结构,努力提高投资效益;坚持把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更好地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按照兼顾生产建设和生产消费的原则,恰当地确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

一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企业和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七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成善场体系;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

但是,要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改革的进行又不能不受到经济和社会条件、干部条件的制约,所以不可能在“七五”期间完成全部的改革任务。“七五”期间只要求大体上形成新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使经济的运行走上新体制的轨道。

为完成“七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務,必須明确:经济体制改革必須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經济不可逾越的阶段,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无例外,它必須经达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必須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了我們原来的那种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僵化的产品经济体制必須要改革,也决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須符合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然而我們发展的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同,它是公有制

为基础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有计划有控制的,也就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改革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凡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思想观念、规章制度,都要坚决改变。

必须明确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旧体制的消亡,新体制的形成,是逐步的过程,需要时间,也伴随着痛苦。在新旧体制同时并存和相互作用中,新体制因素逐步地增长,但不能立即全部代替旧体制,而旧体制中还有一部分也不可能立即取消,这就决定了在改革中必然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复杂纷呈的局面,也会造成失控的现象和种种漏洞,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使人民受到损失。因此,对改革作精心指导,周密规划,全力以赴,谨慎从事,认真试点,提高预见性,力求减少失误,及时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不然,势必会造成改革中的利害冲突和摩擦,使矛盾变得十分复杂和尖锐。

必须明确在改革中必须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必要性。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否恰当和及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使国家繁荣和富强起来,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不能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必然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失控,酿成社会冲突;而要做到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只有靠政策加以合理的调整。

必须明确:改革对企业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对政府机构转变管理职能和改进工作作风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体制形成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职工物质利益的提高和增加,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能力,不然,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失利。同时也改变

了企业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后,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也要由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订指标、批项目、分资金和物资上转到主要搞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提供服务、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和检查监督上。这必然要引起机构的变化,要求政府机构改进工作作风,不然政府机构就不能适应改革的形势。

总之,“七五”期间的改革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同时存在。我们一定要发扬积极探索,开拓前进的精神,在实践中深思熟虑,瞻前顾后,把工作做深做细,以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夺取改革的胜利。

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9年至1986年 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种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不时地在社会上和党内出现,毒害人们的思想,损害党的思想建设,干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从1979年到1986年为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致有以下一些表现:

(1)1979年春天,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会议,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了积极作用。可是党内有些同

志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从右的立场出发，在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解放思想的旗号下，走到另一个极端。会议期间，党内一些同志提出不少错误观点。务虚会外，北京“西单墙”上也贴出不少反动大字报。当时主要问题有：一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党内有人提出，我国过早地搞了社会主义，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二是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否定毛泽东的光辉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三是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企图以此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否定毛泽东一生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在1981年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所表现。

(2)1981年，在文艺界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当时主要围绕电影剧本《苦恋》展开了一场斗争。这个剧本后来拍成电影取名为《太阳和人》。这部电影描述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不好。文艺领域还出现了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一些歪曲党和人民革命斗争史、丑化现实的作品。

(3)1983年春天，理论界出现精神污染的问题。当时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这个问题本来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些同志热衷于抽象地谈人道主义，揭露所谓“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不信任的情绪。在这期间，新闻界有人提出所谓“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性”

高于党性,说什么“跟着党会犯错误,跟着人民不会犯错误”,以此来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同时,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艺领域出现一种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倾向。

(4)1984年12月,在准备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时,有同志主张,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这“两个不提”的实际效果,就是对搞自由化的人的支持和鼓励。

在几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中,党内有的人直接散布自由化的言论;有的则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提供报纸、刊物、大学讲台、报告会、研究会等方面的阵地;有的听之任之,不认识其危害,不展开坚决的斗争;有的则以为这是一种学术争鸣,是“百花齐放”的反映,予以肯定甚至怂恿。这样,就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机可乘,损害群众和党员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另外,有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知名度较高的作家、理论家等,他们自视特殊,无视党的纪律,随意散布自由化言论,给党内外群众造成不良的影响,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党的建设。

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首先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

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对立面是“左”的错误和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79年3月的这次会上，邓小平就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指出：“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

1981年夏季，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谈话》中，首次将那种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概括为

“资产阶级自由化”，并点明了这种错误思潮的实质。他指出，有的人散布的错误言论，大大超过 1957 年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

以后，1983 年，针对理论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精神污染现象，他在 1983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着重论述了必须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他说，“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民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在 1985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又一次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

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他在 1979 年 3 月的那次讲话中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他在 1981 年的那次谈话中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并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的讲话中,分析了种种不安定的因素,包括“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派性分子、新生的打砸抢分子、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旗帜相当鲜明,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一定情况下,如果他们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据此,他严肃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反之,我们在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就一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可能实现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要克服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面前的软弱涣散的状态。能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能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正由于如此,邓小平多次严肃批评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在自由化思潮面前所表现的软弱涣散状态。他告诫说:“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他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问题,指出,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

和反对的意见。他说，“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他还强调，党员尤其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纪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党员和其他同志所肩负的崇高职责。他说：“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同时，邓小平严肃批评了党内有的同志不承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批评宣传工作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自由化思潮没有进行有力斗争的状况。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86年前，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的情况，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党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重要的有这样几件事情。

1979年,北京“西单墙”出现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的大小字报以后,我国的宣传舆论单位组织了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评论和理论文章,进行了反击。政法部门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鉴于魏京生在此过程中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和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行,于1979年10月16日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对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等工作,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一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允许发表与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

1981年4月20日,针对《苦恋》剧本中的错误倾向,《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剧本〈苦恋〉》,文章批评了部队作家白桦的创作思想,认为《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同年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上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认为,四月份《解放军报》发表批评《苦恋》的文章是完全必要的,指出,对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积极进行主动的、理直气壮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和引导,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文

艺家的重要任务。文章说,文艺家应该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共产党员的文艺家,更应该坚决地站稳党性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年12月18日至27日,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7日,胡耀邦到会讲话时说,白桦的《苦恋》就需要批评。白桦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苦恋》的问题就圆满结束了。

198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要求党员、团员带头遵守,违反本规定的党员干部,除依法惩处外,并按党纪、政纪从严处分。

198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一方面指将来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个正在实践的现实运动。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永远保持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1984年1月27日,针对理论界出现的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转载了中央党校《理论月刊》第2期上发表的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批评了在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中的错误观点。

1986年底到1987年初,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学潮,一些大学生上街游行,其间有人散布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学潮发生后,中央和政府立即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措施,平息了事态。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约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他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

很重大的事件。”并指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列，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以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严处理。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部分人员参加的党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议，胡耀邦检查了自己在领导工作上的失误，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要求。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

- (1) 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请求；
- (2) 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3)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4)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会议指出,全党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为了使党员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人民群众受到教育,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87年1月13日,中纪委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要求全党切实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担负起维护党章的神圣职责。并强调了党的纪律。1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主要内容是:

(一)各级党组织务必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巩固安定团结,是立国治国之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是长期的,存在于开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对此,全党同志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二)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范围和重点。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

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其他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党政军机关、城市企事业单位和人民解放军,主要是对广大党员进行正面教育。农村不搞。这场斗争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这场斗争,要始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绝大多数的方针。(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不搞政治运动。(五)要进一步稳定高等学校的局势,改进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六)新闻、舆论阵地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通知》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正是为了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是贯彻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重要步骤。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报刊上有组织地发表了一批旗帜鲜明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并阐述了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同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下属部门、安徽省纪委、上海市纪委、《人民日报》社纪委,分别作出决定,开除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理事王若望、《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协副主席刘宾雁的党籍。在此期间,2月26日至3月4日,中纪委在北京举行全国纪检工作会议,强调要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加强党内监督。2月中旬至3月间,中宣部连续召开了首都主要报刊、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及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如何坚决、健康、持久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3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地、妥善地做好报刊整顿工作的通知》。指出,端正新闻舆论阵地的思想政治方向,首先要把有关报刊及其出版单位整顿好。这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保证这场斗争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报刊整顿的重点是解决根本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问题,着重整顿在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中错误突出、后果严重的报刊,同时要求中宣部协助国务院新闻出版署迅速完成出版法的起草工作,完善报刊管理的法规和制度,以巩固整顿成果,使新闻出版管理法律化、制度化、经常化。

1987年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决定说: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滋长、蔓延,否

定四项基本原则,是违背宪法,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的赵紫阳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致使这场斗争未能深入开展下去。加上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其后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得很不得力。

四、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酝酿及总体设想的研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 1986 年前,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改革政治体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医治“文革”对我国政治体制破坏的创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80 年,邓小平发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后,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总的说来,由于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限制,邓小平上述讲话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尔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如 1982 年至 1984 年的精简机构也没有取得稳定的效果。原有体制从根本上并未受到触动。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形势下,政治体制上的许多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成为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阻碍。例如,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使执政党和国家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处于人民群众和法律的监督之下,对国家公务人员缺乏一种公正、有效的奖惩制度,立法不全,执法不严,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根据新的实际走出新的路子,并使之制度化,这一切都使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不少方面在新的历

史时期处于一种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状态,这是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也有启发。他们的经验说明,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两个主要方面,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平衡发展,才能相辅相成,取得较快进展。

对国内现实问题的思索和外国改革经验教训的研究,使党和人民在反思我国以往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同时,开始重新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发展方向、方法步骤等问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领导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还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不然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不守信用,你放权,他收权,必然会拖后腿,阻碍经济体制改革”。6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指出,“有些同志提出关于端正党风和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划分问题。其实,主要还不是这两件事怎么划分的问题,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有些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由党管理不合适。党干预太多,就会妨碍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主要是这么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考虑一下,我看到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先把这个关系理顺。如果这

个问题解决了,端正党风和纠正不正之风怎么划分的问题就解决了。”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再次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

邓小平发表的上述讲话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必要性问题,已经不只是理论家和学者案头中的东西,而是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它标志着党对中国改革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要丰富、完善这些认识,使之变为切实可行的蓝图,还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工作。

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切中了改革进程的要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层立即行动起来,理论界及一些实际工作部门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展开了理论研究和调查工作,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度成为中国改革和政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当然,这一时期各项工作的中心,都是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突破口等理论问题展开的。它为改革蓝图的总体设计打下基础。

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同时,就提出了这项

改革的目的、原则及主要内容。1986年9月13日，他在听取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比较具体地谈到这项改革的目的和内容。他说，“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还有一个内容是提高效率。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要找人理一下，理出个头绪。改革总要有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我想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尔后，他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并说这和干部的年轻化有关，他发出感慨，“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就好了。”“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他认为效率不高固然与机构臃肿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的特点，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强调“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原则。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86年9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这个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5人组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工作。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同时,组织了各方面作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人员,就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等专题组成了7个小组,进行各个专题的调查研究 and 论证工作。

与这种有组织的研讨相呼应,政治学界、经济学界、法律学界及历史、文化、哲学界的理论工作者也都根据各自学科的特点和优势,投入了政治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探讨工作,有关部门还举行了多种形式的讨论会、征文等活动,促进这方面工作的交流和发展。

在各专题研讨小组和理论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数易其稿,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

1987年10月,经中央常委同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提交了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

12月6日,新华社报道,邓小平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要大胆、要坚决,第二要谨慎。

五、两个基本点的提出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1月29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首都各界人士春节团拜会上，再一次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了明确阐述。他说：“中共中央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没有方向，没有保证。不讲改革、开放、搞活，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讲一条，不讲另一条，不符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他还指出：“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基本内容。”赵紫阳的这一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月8日至13日，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天津视察工作时再一次阐述了三中全会路线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搞好改革、开放是统一的整体。改革和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们的长期任务，两者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谈到: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两个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针不变。

3月19日,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增订本出版。增订本收入的党的十二大以来到1987年1月的邓小平的讲话、谈话,由原来的22篇增加到44篇。新增文稿中有两个突出的内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这本书所论述的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全面深入贯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然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的这段话透彻地说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国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因此,必须通过不断的改革,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日益体现,逐步缩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市场。

5月13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再次重申: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赵紫阳要求理论宣传部门,今后对两个基本点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只有牢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才能使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经济上的繁荣活跃互为条件,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5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篇讲话,并指出,这篇讲话不仅对舆论宣传工作,而且对全党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一九八七的改革、开放

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通知指出,几年来的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显现出来,现在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改革将是一个较长期的渐进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既要积极加以推动,又要注意避免社会震荡,稳步前进。为了把改革引向深入,今后要继续改革统派统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要实行长期稳定的方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2月18日至3月3日,《农民日报》连续发表12篇评论员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党中央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方

针、政策和措施。

1月22日至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会议认为,1986年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国民经济发展逐步趋向正常,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贯彻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中取得了新的进展,横向经济联合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产品结构有所调整,企业技术进步迈出新步伐。在新的一年里,既要看到经济工作的有利条件,满怀信心地去开创新局面,又要清醒地看到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当前特别注意压缩空气,把过去膨胀的预算外投资规模和过高的非生产性开支压下来,使之与国力相适应,进一步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矛盾,为深化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平稳的经济环境。会议提出,1987年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决不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部署。通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不仅要和发扬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要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探索新的路子,使之成为推进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深化企业改革,主要是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来挖掘潜力,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把权、责、利配起套来,真正落实到企业经营者身上。至于采取什么经营形式,可以不拘一格,采取适合企业经营本身特点的经营形式。

2月6日至10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86年特区工作的成绩。据初步统计,1986年四个经济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7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达68

亿多元,出口创汇近 10 亿美元,都比上年增长 20% 以上。会议提出,1987 年特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继续坚持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的方针,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在巩固、充实、完善中争取新发展,进一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和产品外销的竞争力。

2 月 10 日,田纪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家机关扶贫工作汇报会上指出,扶贫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从改革入手,从发展着眼,改变过去那样单纯救济的方式,实行新的经济开发方式。

2 月 13 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民航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出台,民航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民航局不再直接经营航空企业,全国成立六大骨干航空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2 月 20 日,经国务院批准,武汉钢材市场开业,这是我国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又一项重大改革,使钢材流通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此之后,其他地区也着手进行类似的改革。

2 月 23 日至 26 日,田纪云在贵州省进行考察期间,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谈了“双增双节”与深化改革问题。他指出,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与改革、开放、搞活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要通过深入改革,促进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2 月 27 日,经国务院批准,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3 月 2 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利电力部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提出的《关于保障农业持续稳步增长的建议》,

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正在组织落实。建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我国农业在本世纪末要达到两个目标:1、努力攀过粮食总产达 4500 亿公斤和 5000 亿公斤两个台阶,保证人均 400 公斤粮食供给;2、保证农民收入稳步提高,逐步向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接近。实现这两个目标,基本上靠深入改革,实现体制上组织上的创新,逐步加强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和增加投入,改善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准备后劲。为此,今后 10 年优先实施 8 项措施:1、调整价格政策;2、加速推广农业技术;3、整治土地一亿亩;4、鼓励扩大耕地经营规模;5、调整产业结构,从种植业转移出一亿劳动力从事农村工业、服务业;6、加强农村基层技术力量;7、加强农用工业建设;8、尽快解决贫困地区温饱和建设问题。

3 月 15 日,赵紫阳在全国政协六届常委会第 14 次会议上谈到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尽管前年经济发展一度“过热”,出现了“超高速”,但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发展速度正在逐步地趋于正常,弯子拐得比较平稳。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朝着合理的方向进行。过去多年存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这几年通过改革都有了相当变化。看来,我们确实走出条新路子来了。这不仅在当前发挥着作用,而且是今后长远起作用的因素。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入期稳定发展经济方针的贯彻落实,我们的经济形势肯定会越来越好。

3 月 20 日,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大型工业联合企业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暂行规定》。这是计划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此项规定,国家对单列企业改行计划管理和业务指导。单列企业在国家颁布的各项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

内,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自负盈亏。国家鼓励单列企业开展正常的竞争,防止垄断。

3月25日,赵紫阳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在本次人代会到下次人代会的一年间,我们要集中力量办两件大事:一是在经济领域,坚持正确的建设方针,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深入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是在政治思想领域,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3月27日,交通部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出台,部直属港口和工业企业全部下放地方,交通部行使政府职能,实行行业管理和宏观控制。

4月11日,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198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1987年的任务,总的通过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和深化改革,进一步搞活大中型企业和增强农业后劲,争取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4月17日至30日,彭真赴江西革命老区视察工作。他在视察中强调,老区要坚决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进一步把经济搞活。

4月18日至23日,赵紫阳到上海市考察了7个大型企业,在同企业的干部进行座谈时他指出,当前要普遍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并同深化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有步骤地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搞活大型企业,努力

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5月11日至18日,彭真先后考察了深圳、珠海、广州和福建等地。他称赞经济特区工作放得开、搞得活、上得快,充满新气象,办得成功,方针对头,今后要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搞得更活一些。同时,他又反复叮嘱大家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

5月13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问题。他说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现在,在经济理论工作中,脱离实践、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还相当严重,还束缚着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6月1日,应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向首都新闻界介绍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情况:1、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激发了城乡经济的活力;3、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加了生产经营活力;4、对计划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市场机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5、改革了流通体制,使商品市场迅速发展;6、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7、对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进行改革,开始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8、改革了财政、税收体制,发挥了税收的调节功能;9、改革了金融体制,发展了资金市场;10、进行了城市综

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增强了城市的经济功能;11、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同世界各国经济技术贸易关系;12、进行了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以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部分改革。

6月10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贯彻落实。

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谈到:“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6月25日,赵紫阳出访东欧归来,专程到甘肃省中部贫困山区看望干部、群众,鼓励他们坚定不移地把农村改革推向前进,从实际情况出发,把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工作落到实处。

7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并为此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指出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指出,去年和今年我们继续在搞改革、开放,但步子放得稳重了些。现在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步子太慢了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大胆搞改革、开放。

8月1日,烟台市以“提租发券、空转起步”为特征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开始起试行。烟台市的这一改革,引起了全国各个城市的关注。

8月25日至29日,国家经委、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

联合召开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今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要在明年底以前完成。

9月6日，赵紫阳邀请全国新近评选出的10名最佳农民企业家到中南海座谈。赵紫阳指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迫切需要大批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是农村商品经济带头人；农民企业家的涌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标志。

9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我国已在10个省、自治区建立起14个规模不等、项目不同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开始进行把所有改革成果制度化和探索改革新路子的实践。这14个改革试验区是：安徽省阜阳地区，黑龙江省尚志县、苇河林业局、绥滨农场，河北省玉田县，陕西省礼泉县，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湄潭县，广东省南海县、江苏省吴县、无锡县、常熟市，浙江省温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9月16日，《经济参考》据国家统计局材料报道，从1979年至1987年6月，我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金额536亿多元，实际已利用379亿多元。

9月22日至29日，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安排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在会上提出，收紧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是安排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明年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深化企业

经营机制改革的同时,进行一些方面的配套改革。计划体制改革重点是改革投资、物资和外汇分配体制,以进一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显著地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会议确定,1988年我国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其中的关键是要搞好企业承包经营,推动“双增双节”的发展。

10月1日至13日,《人民日报》陆续公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其中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值、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翻了一番。1986年同1987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总产值都增长了1.7倍;此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2.2倍;进出口总额增长2.6倍。事实充分表明,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九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只要我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贯彻下去,我国的经济实力将会不断增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七、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的召开

1987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主持了会议。全体会议之前,举行5天的预备会议。全会决定,1987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

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全会追认了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追认了198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沈图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

第四节 新时期的 统一战线与“一国两制”构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一战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的统一战线出现了兴旺发达、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得多，而且愈来愈扩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统一战线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事物不断涌现，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全国政协除参加对国家大事的协商、讨论和献计献策外，还发挥了检查督促的作用。民主党派先后都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总方针。总之，新时

期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扬憎爱分明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努力实现在 20 世纪末工农业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 80 年代以至 90 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奋斗。

因此,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左”倾影响,坚决地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继续落实各项政策,把统一战线各方面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起来。

我国的统一战线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还培育了一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主要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等。1984 年 5 月 12 日,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强调要发扬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问题。

政治协商,是我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必须经过政治协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才作决定。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各种问题,也经过政治协商进行调整和解决。这个政治协商是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不敷衍应付的,不强加于人,而是经过反复商量,充分交换意见,集思广益,真正达到政治上的一致或基本一致,要克服政治协商中的各种缺点。

民主监督,是在共同政治准则的基础上,互相提意见,作批评。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他需要来自广大群众包括各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监督。这对于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防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以及及时地发现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有很大的好处。这要做到广开言路,活跃思想,畅所欲言,使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统一战线中存在的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是好事。如果没有比较、争辩和论证,容易造成思想僵化,使统一战线停滞不前,不利于创新局面。要坚持地反对“一言堂”,坚持地反对对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使国家的民主生活更健全和生动活泼。

合作共事,是统一战线中最普遍、最经常的关系。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搞好党内外合作共事,是做好各方面工作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党内外人合作共事,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考验而形成的。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亲密的友谊,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同心协力,同甘共苦,有着坚实政治基础。搞好合作共事,要看到党外人士的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热爱祖国,希望祖国日益繁荣富强;要看到党外人士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有知识,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有丰富的政治阅历;要善于求大同,存小异,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和提高;要放手使用党外人士;使党外人士能够知情、出力,发挥所长,有职、有权、有责。

广交朋友,主要是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交诤友。这对于密切党外人士的关系,沟通思想,增强团结,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交朋友,多接触,多谈心交心,虚心听取党外同志的意见和要求,使他们敢于讲真心话,真正做到肝胆相照。

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也是统一战线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都要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地提高认识,更新知识,开阔视野,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总结经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学习讨论中,坚决贯彻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方针,切实纠正过去的“左”的错误。整党整风只整共产党,不整民主派和无党派人士。

总之,统一战线是我国新时期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一个重要法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一定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统一祖国作了一系列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重新考虑如何解决台湾和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并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书中叙述了自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相互间音讯不通,来往继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

民都受到巨大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地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炎黄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因此,殷切期望台湾早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但一定要考虑到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现在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指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应通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台湾和大陆间应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往。不久,又提出了尽早实现大陆和台湾间的通邮、通航、

通商和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的主张。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一再申明：“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这在我们的人大常委告台湾同胞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可能性半会增大。当然，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愿望，还要看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提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有不少海外侨胞写信给蒋经国，敦促他接受政府的邀请，商谈祖国统一。

1980年元旦，邓颖超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说，《告台湾同胞书》中所宣告的大政方针，是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是诚挚执行的决策，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她的讲话对消除误解起了重要作用。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说，80年代我们要做的三大件事，其中第二件“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80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8月，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些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武力统一，台

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建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统一大业;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自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益;统一祖国,人人有责。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今天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璿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函蒋经国,信中说:“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至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

实,未免自欺欺人”,“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湾探望”。但是,在这历史的契机上,蒋经国未采取果然行动,有负历史重任。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根据中央指示,认真落实了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的政策,落实了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的政策,也落实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以及宽大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的党政军特人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的报告中再一次宣布:“我们党还面临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同全体爱国同胞携手合作,为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而努力奋斗。台湾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有五千年历史、十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不可分割的伟大祖国的怀抱,是全国同胞的共同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任何党派和个人都无法抗拒。这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预。我们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督促国民党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为重,不要执迷不悟,及早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但是,台湾当局迟迟没有行动,这是违背全民族意志的。

为此,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再次阐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他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所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人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管。“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可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日益形成。到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又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同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变话时说的一番话,也是第一次最明确的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

1984年6月22、23日,7月31日,邓小平再一次论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问题。他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条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的政治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了这个政策”，“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从中国自己的情况出发考虑的，而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这个构想“是能够行得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实事求是的体现，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伟大创造。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发展，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中国政府制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1984年5月15日，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这一政策。他说：“我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坚定不移的政策。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50年内不予改变。这些政策包括：根据我国宪第31条，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将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继续同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受到照顾。”

这些政策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后制定的，是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这一政策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4月10日，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

《联合声明》。后两国政府又交换了《联合声明》的批准书,协议正式生效。在《联合声明》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从而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这是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尊重主权,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

香港问题解决后也促进了澳门问题的解决。1987年6月23日,六届人大第21次常委会批准了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于1987年4月23日签署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澳门问题也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祖国,一是用和平方式,二是用战争方式。用和平方式,更符合绝大多数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心愿。实行“一国两制”找到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最适合目前状况的方式。既可以从根本上结束台湾等分离祖国的状态,消除民族、家庭分离之苦,同时也使10亿大陆人民和台湾同胞按各自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生活,减少长期分裂后带来的苦难,这是圆满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个最理想的途径。相信它一定能实现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第八章 沿着 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三大

党的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全国人民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经过整风以后,以更崭新的面目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建设目标而工作。这一期间,我国的改革开放出现蓬勃向上的局面,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困难还很多,必须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经过努力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也存在着不少

问题。因此,如何加快和深化改革,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这就是党的十三大所要解决的课题。

党的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170人,侯补中央委员106人。列席会议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8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8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29人。大会讨论通过了赵紫阳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还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等。并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日,举行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日常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铁映、李瑞环、李锡铭、杨汝岱、杨尚昆、吴学谦、宋平、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姚依林、秦基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选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作霖、李正亭、肖洪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党的十三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年间10亿人民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创造性

的理论概括,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个理论和路线制定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基本方针,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措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党的十三大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是报告的总论。它是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近九年来的经验和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明,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和理论基础,是我党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建设。

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的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报告、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三个重要文献中都作出了明确论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对这个重要论断都没有展开论证。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系统的阐述,有了新的理论性概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主要包涵以下几方面内容: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的涵义。这有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这个阶段表明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已经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外一方面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不完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报告从我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情况、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不平衡、普遍的科学文化水平、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存在,说明了“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明确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就能够克服机械论和空想论。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机械论者不承认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那种认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而空想论则认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或发达阶段,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机械论主张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是右倾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空想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上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是“左”倾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乃是克服这两种错误思想和理论的有力武器。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主要矛盾。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

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离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五个阶段”是初级阶段的五项任务,它们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远指导方针和基本路线。长远指导方针是,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三大”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

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报告还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经过充分讨论,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三大的报告。在党的十三大,中共中央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报告从7个方面描绘了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大致轮廓:

关于实行党政分开。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到党政分开,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个历史性转变。

党政分开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处理党政关系的一个新方针。报告明确指出:“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政分开决不是要改变“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是指“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

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群众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

“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即党应该通过间接的、原则的方式实施对国家生活的领导,而不应进行直接的、具体的管理。

报告还对中央、地方、基层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方式作了设想。指出:“党中央应就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推荐人员出任最高国家政权机关领导职务,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对省、市、县一级地方党委》应在执行中央路线和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对本地区的工作实行政治领导。”“乡、镇一级的党政分开,可以在县一级关系理顺后再解决。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

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报告提出,“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具体包括这样几个措施: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

有关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织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的,要逐步撤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现在由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

报告强调指出: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才能保证做到“党要管党”;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面的作用;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

关于进一步下放权力。报告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这项改革措施的一个总的原则是,“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对于政府同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党、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等,报告也提出了处理原则。

关于改革政府工作机构。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报告强调,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适应加强决策咨询的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

关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

改变集中统一的管理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报告强调,这项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法规,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

关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报告首先阐述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际,避免失误。”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是为了密切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联系。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由于观察问题的条件和角度不同,难免在一些问题上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就可以使群众的意见、建议通过正常的渠道顺畅地反映上来。其中合理的意见,就可以及时被采纳;不正确的意见,也有机会进行说明和解释。领导机关的意图包括遇到的困难,也可以及时地为群众理解和谅解,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监督。这样有助于领导机关减少决策失误,克服官僚主义。另外,建立协商对话制度,也给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部门经人民讨论。”这个原则中,关键是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也就是,在不危害党和国家机密的前提下,各级领导机关要将群众所关心的

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让群众了解。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便于参与和监督。

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十三大提出近期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手:

(1)制定相应的法规,明确规定哪些重大的情况,通过什么形式让群众知道;哪些重大决策,通过什么形式让群众讨论;哪些问题,必须在什么范围、什么层次上征得群众同意后才作决定等等。

(2)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

(3)充分发挥现有的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同时在实践中开辟新的协商对话渠道。

(4)发挥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的作用,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十三大报告在第五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六点“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中提出了完善党同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团体的联系方面的制度。

报告指出:“人民政协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加强政协自身的组织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报告重申了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提出“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十三大报告还提出“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的问题。报告首先重申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我国地位和作用，即这些群众团体“历来是党和政府联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主义民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报告认为要理顺关系，主要应在两方面作努力，即：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自己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

十三大报告在阐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指出，这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报告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对于如何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十三大报告着重讲了四个方面较重大的实际措施。

(1)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十三大确定首先从中央做起，理顺中央领导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必要的规章和制度，解决好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问题。包括：建立中央

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十三大还确定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这样，党内民主，就不仅仅是某几个领导人的个人品格、工作作风和方法，而是稳定的制度；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随心所欲的事，而是必须严格遵守执行的党规、党法。

(2)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民主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领导人要由选举产生。选举权是党员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选举可以促使领导寻找优秀的党员成为候选人。选举也是监督干部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以往一些党的组织没有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的选举制度，或者实行委任制，或者不按期进行改选。“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了两种选举办法，即“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正式选举。也可以不经过预选，采用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进行选举”，但没有明确规定预选也必须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采用了先预选的办法，而且多数预选又实行等额选举，使差额选举形同虚设，不利于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针对上述情况，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明确规定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章部分修改中，也明确规定普遍采用候选

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选举。

(3)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所有党员,无论职务高低,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不得侵犯党员的民主权利。报告提出,要制定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条例,并且恢复和发展了“八大”党章的精神,严肃地申明:“侵犯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必须受到党纪处分。”

(4)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报告提出,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直接参与的机会”。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只有党内民主渠道畅通了,整个社会的民主渠道才能畅通。党组织既要把了解和反映党员的意见、要求、建议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又要经常向党员通报情况,同党员商量问题,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方面,加强立法工作,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法制建设又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逐步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

中共中央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划的基本蓝图和总体设计,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新的起点。

二、党的十三大后 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根据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计划,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进一步深化,并稳步地推进。具体改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推进党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稳妥地实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党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党内关系上的党内民主建设和党同外部关系上的党政分开两个方面。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根据这一精神,理顺了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与中央书记处、中央全会的关系,中央书记处成为办事机构。1987年11月14日,十三届中央政治局举行首次会议,在参考1938年11月6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和1943年3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的基础上,讨论通过了《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规则(试行)》、《十三届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试行)》,其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先后制定了与之有关的一些规则,

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步骤。与此同时，中央全会的次数也有增加，由以往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二次。党内差额选举制度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根据党的十三大规定的差额选举办法——党的十三大代表 20%和中央委员 5%、候补中央委员 12%实行差额选举，在省一级，差额选举已在省委常委选举中实行。

中央一级的党政分开，主要是理顺党中央与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七届全国人大所产生的国务院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的工作规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两套工作规则明确了党的中央机构和中央人民政府各自的职能、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为使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机构的关系按照职能分开的要求形成合理的格局和走向制度化，提供了新的条件。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机构也大都按照十三大党政职能分开的规定，相继制定了一些规则，并在具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党委不设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撤销了党委办事机构中的对口部，精简了党委机构，减少了专职干部；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有所加强。各级党委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也有所调整，党委直接干预人大工作的现象已大为减少，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开始落实。

根据十三大的要求，各地普遍抓了企业的党政分开。全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已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营企业法》，明确了厂长（经理）的地位和企业党组织的保证监督职能。此外，党与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关系，也根据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的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制定了民主党派民主协商、政治监督的规定，强调了群众团体的特殊职能。

行政改革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机构改革，二是权力下放，三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党的十三大以后，政府机构的改革也提上了议程。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组成方案。国务院的行政机构设置是：国务院部委一级机构由45个调整为41个，此外，还有直属机构19个，办事机构5个，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16个，事业单位5个，非常设机构43个，国务院各部委、直属局、工作机构共有工作人员5万多人，大体精简了1/5左右。这次机构改革，从数量上看，机构和人员精简不多，触动的主要也只是经济管理部门。这次机构改革的方案对传统管理模式有所突破，它同1982年机构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不是重在搞简单的撤减、合并，而是重在转变职能，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到间接管理为主。这次新出台的机构改革方案是经过精心的筹划、深入的调查、反复的论证之后提出来的，充分考虑到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和现实的可能性，紧紧抓住了转变职能这个关键。

权力下放措施的具体内容是政企分开、政群分开，减轻政府的工作负担，大大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分发挥群众团体、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作用。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这是一项需要较长时间认真准备的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人事部，专门负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筹备和实施。新组建的国家人事部积极组织力量，起草并推敲

《国家公务员条例》的详细内容,并开始了试点工作。筹建国家行政学院的工作,也提上了议程。

从中央到地方根据十三大提出的“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的原则,在探索各具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企事业和党政机关等行业引入了竞争机制,采取了招标、选举、考试、聘任等方式,录用和选拔人才,这种人事工作的民主化、公开化,有助于增强透明度,为群众参与干部考核和选拔创造了条件。

(2) 抓紧廉政制度建设,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1987年12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建设,提出廉政制度问题。1988年3月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提出尽可能把政府部门的办事制度公开,便于群众监督。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党和国家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提出“要同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结合起来,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持党和国家的廉洁”,同时还提到了对制度的一些要求。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指出“近几个月来,各级党委、政府已经行动起来,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尽可能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结果,建立各种举报中心,完善有关制度和纪律,查处违法乱纪案件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8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就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非常明确地提出:“根据各地开展廉政工作的经验,当前有必要突出抓好重大案件的查处和廉政制度的建设。”1989年2月上中旬,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召开了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会议提出:进行廉政制度建设,就是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提高政府部门管理工作的规范程序和公开程度,以消除

权力与金钱交易的温床；当前的廉政制度建设，可以从“两公开、一监督”入手，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推进廉政建设。

(3)增加政治的透明度，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有所增加和改善。

“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大原则。十三大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会毕即发布新闻，国务院全体会议也开始电视转播，七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一、二次会议开幕式都进行了电视报道，两会都举办了多次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企业法》这样的重大法案实行了全社会的公开讨论。新闻界对物价(如烟酒价格)调整做了及时报道。1988年3月15日，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工作报告指出，应进一步提高党务和政务活动的开放程度。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中，最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是在人大选举制度上。七届人大和28个省、市、自治区(除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外)人大在换届中有两大特点：其一，都实行了差额选举。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以及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都是差额选举产生的。其中，11个省、区、市的人大主任、8个省、区的省长、主席实行了差额选举。其二，都有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28个省、市、自治区推荐的候选人有99名列列为正式候选人，其中12人当选，即4名人大主任，2名副主任，5名副省长、副市长，1名高级法院院长，这是建国以来人民政权选举史上没有前例的，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改

进,并开始走向制度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多地参与了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也就物价、工资改革等问题多方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又专门制定了《关于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共青团、工会、妇联分别于1988年5月、9月、10月召开了各自的代表大会,并提出了一系列自身改革以发挥独特功能的设想。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更加趋于活跃,中共中央制定并调整了繁荣文艺的若干政策,“双百”方针得到贯彻实施,一些重大问题也开始了讨论和争论,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也大大增强,基层民主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有所增强。

(4)加强法制建设,以法律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形成。

法制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后盾,为了保障改革和建设的秩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保密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国务院也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经济社会生产管理的条例、规定。立法机关还加快了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有关法律的制定步伐,《新闻法》、《出版法》、《工会法》、《国家编制法》、《国家赔偿法》、《社团法》、《游行集会法》、《青少年保护法》、《妇女保护法》、《劳动保护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事务法》等已列入立法计划,有的已经数易其稿。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国家的执法工作也有了较大改善,过去那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以党纪、政纪代国法的状况正在改善。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分别制定和开始实施本系统的改革方案,

律师体制的改革也已开始。各级政府的行政、经济监督部门组织和工作制度不健全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变,人员数量和素质也有所增强。国务院还决定,在近年内抽调大批干部,加强执法和监督部门,进一步增强这些部门的力量,改善其工作人员的素质。

十三大以后,中共中央积极而又慎重地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遇到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一再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政治体制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发展,既不能滞后,又不能超前。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维护社会稳定并重,因为没有社会稳定就无法推进建设和改革事业。在改革中,一定要发挥党的政治领导的优势,要维护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权威,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的途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七届人大和 七届政协会议的召开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24日至4月10日政协也召开了七届一次会议。这两次会议充满了民主和改革的气氛,各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尖锐的批评。

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六届人大期间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认为各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一致,奋力开拓,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5年来的成绩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继续得到显著增强。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0920万亿元,国民收入达9153亿元,国内财政收入2243.6亿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进一步趋于协调,宏观经济效益有了提高。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198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3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916元,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农村改革深入发展,城市改革紧紧围绕着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继续展开。在搞活消费品市场的同时,逐步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开拓金融、技术、劳务和房地产市场。对价格体系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大力发展了企业、地方和部门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积极推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改革逐步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等领域展开,日益显示出重大的作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有力地推动着人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5年来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然而5年中获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要牢固树立建设要依靠改革,改革要促进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把改革放在总揽全局的位置上;无论改革还是建设,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尊重实践;建设和改革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断推进科技进步和加强现代

化管理；正确处理建设和改革中目标和步骤之间的关系，保证建设和改革的顺利发展；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后 5 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作了详细的规定。今后 5 年是实现新旧体制转换和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性 5 年。要加快和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制定和第八个五年计划。到 1992 年，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55 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7.5%。实现这目标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实现这目标的方针是，以改革总揽全局，把改革和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更好地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认真执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战略，更加突出地抓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进一步促进全国经济的繁荣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造成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良好社会风尚。国务院提出了今后 5 年努力实现的 10 项任务：一、大力发展生产和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二、加快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把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三、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逐步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四、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

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五、切实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严肃政纪法纪;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七、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八、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认真贯彻实行计划生育和加强环境保护这两项基本国策;九、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城乡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决议,认为报告既肯定了政府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是实事求是的;报告提出的今后5年我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是可行的,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委员宋平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决定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宋平说:“政府机构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逐步形成的。”根据政府机构改革要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长远目标,以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实现转变职能、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逐步理顺政府同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关系。

所以在方案中撤销部、委 12 个,新组建部、委 9 个,保留的部、委、行、署 32 个,转为企事业单位 1 个,改革后的国务院组成部委 41 个。

会上姚依林作了关于 198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作了关于 1987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 1988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

会议听取了陈丕显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郑天翔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杨易辰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王震为副主席;选举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有习仲勋、乌兰夫、彭冲、韦国清、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塞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荣毅仁、叶飞、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汉斌;秘书长为彭冲。

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名,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会议选举任建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刘复之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任命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李铁映、秦基伟、王丙乾、宋健、王芳、邹家华、李贵

鲜、陈希同、陈俊生为国务委员；会议任命了各部、委的部长、主任、行长等。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听取了钱学森作的六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也听取了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要求人民政协的各级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不懈的努力。

会议选举李先念为七届政协主席，王任重、阎明复、方毅、谷牧、杨静仁、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钱昌照、周培源、缪云台、王光英、邓兆祥、赵朴初、屈武、巴金、马文瑞、刘靖基、王恩茂、钱学森、钱伟长、胡绳、孙晓村、程思远、卢嘉锡、钱正英、苏步青、司马义·艾买提为副主席；会议选举周绍铮为秘书长。

上述两个会议的召开，是全国人民瞩目的大事。会议以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和开放程度，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从审议、讨论到表决、选举，代表和委员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既充分肯定政府的工作成绩，又直率地批评缺点，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了许多中肯的见解，对现存的社会积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物价、工资、教育、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直言不讳，议政参政”，成为人民代表的新风，“讲真话，做诤友”，成为政协委员的座右铭。所以这两个会议开得是十分成功的。它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促进民主团结起着重要的作用。四月的神州，春满乾坤，在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全国人民决心励

精图治,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克服艰难险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前进,为贯彻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奋斗。

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姚依林作了《关于 198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对 1987 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总结,提出了 1988 年计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1987 年,我国的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完成情况比较好,经济工作取得了新的经验。国民生产总值由 1986 年的 9460 亿元上升到 1.0920 万亿元,增长 9.4%。原煤达 9.2 亿吨,石油达 1.34 亿吨,发电量达 4960 亿千瓦小时,钢产量为 5602 万吨,粮食总产量为 8048 亿斤,棉花产量为 8380 万担。国家财政收入为 2346.63 亿元,总支出为 2426.92 亿元,赤字 80.29 亿元。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影响,一部分城市居民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全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平均上升 7.3%。其中 65% 是农副产品涨价引起的。

根据 1987 年的情况,1988 年的计划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必须贯彻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稳定发展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改革总揽全局的基本方针。通常深化和加快改革,努力增加和改善供给,同时继续控制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张,以促进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稳定增长。具体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7.5%。农业生产增长 4%;工业生产增长 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 3300 亿元;货币增发量和

信贷规模控制在适度水平,既要有利于币值的稳定,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财政赤字控制在 80 亿元,维持上年水平;城乡人民的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要比上年水平有所提高。198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大力增加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安排好国内市场和人民生活。这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所以,努力增加社会供给,繁荣国内市场,改善人民生活,是 1988 年计划安排的重点。首先抓好农业生产,保证粮食、棉花、肉类、糖类和蔬菜等重要农副产品生产的稳定增长,争取粮食产量为 8200 亿斤,棉花为 9000 万担。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要多方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的投入,要加强农业科学的研究和科技成果的推广,要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根据多种资源的开发,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支援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其次要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以适应城乡市场的需要。1988 年轻纺工业总产值比 1987 年要增长 8%。要严格市场的物价管理,要采取正确的分配政策。

第二,继续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和作用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要加强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开发。坚持以电力为中心开发和建设能源。加快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等建设以发展原材料工业。要把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道运输设施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运输效益。

第三,加强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促进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1988 年国务院着手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即确立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和设施,以利推动和加速科技进步。要

增加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经费。

第四,积极组织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促进整个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全面发展。这不仅能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建设,而且将有力地推动各方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实现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要实现上述任务,必须深化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必须继续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充分挖掘各方面的潜力。这是完成1988年经济计划的根本保证。

1988年5月30日党中央政治局第九次会议指出,目前我国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开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抓住历史给予的有利条件,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迎着风浪前进,坚决而又稳妥地把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好。这主要是物价和工资的问题。1988年五六月间,一些大城市先后调整了肉、蛋、菜、糖等四类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因而把这个问题推上了险峰。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关键时刻。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产品经济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此,必须理顺价格体系,坚决按价值规律办事。过去9年,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从改革的总体和进程上说,过去采取的措施大多是放权让利性质的改革,是浅层次的、比较容易实现的改革。而更深层次、更起决定作用的、根本上奠定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模式的措施,还未全面进行。所以,随着外层改革的深入,内层改革的问题突出了,价格改革成为制约、影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关键问题,同时也影响着全国人民的利益。

目前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农副产品价格偏低,与轻工产品和其它产品的比价处在逐年向不合理方向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实行产品经济模式造成的,同时也与过去9年中采取的政策有关。在过去9年中虽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但没有根本解决,严重地压抑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的危机日益严重,甚至被称为产粮基地的江苏省出现1987年粮食产量不能满足本省需要的状况。同时也压抑了一部分工业品生产。农村和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政府就要以价格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所以,价格问题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心问题。它一头联系着生产和流通,一头联系着工资和消费。它直接影响着数以万计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着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价格的变动,也很容易造成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生产水平下降。所以价格的变动必须与工资的调整同步进行,而且从时间上说,不宜拖得太长,使社会长期处在不安定状态中。

深化改革,加快改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是革命,它有渐进的过程,也有飞跃的时刻。在历史条件具备的时候,当机立断,把改革推向更深处,夺取改革的新胜利。

四、党的十三届三中 全会与治理整顿的实施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主持了这次全会。

全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报告。

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

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当前，我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突出的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为了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在这两方面都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必须同

努力增加农副产品、适销的轻纺产品以及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有效供给结合起来。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明后两年一定要抓出成效。明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较小。务必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明年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点。

全会指出，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不顺价格就谈不上真正确立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但深化改革又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在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中，应当特别注重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明年企业改革必须抓紧。一要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二是认真完善承包制，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试点和发展企业集团试点。通过建立在国家宏观控制下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提高经济效益。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要抓紧推进。

全会指出，为了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要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的纪律，特别强调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同时，通过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的实践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发展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以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为中心内容，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形势教育，并以此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起点。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并运用法律的、制度的、纪律的、教育的手段，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

全会强调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总方针总政策。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国十年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为国民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革,我国就不会有这十年的大发展。现在要总结经验,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艰苦奋斗,增产节约,努力完成这次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大胜利。

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

全会还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165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3 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84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67 人,不是上述三个委员会成员的有关方面主要负责同志 63 人。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为了消除价格“双轨制”造成的流通领域的混乱,借以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并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要求,1988 年,中央把物价改革推

到了前台。

1988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到物价问题,指出对现有严峻形势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提出了“闯(价格改革)关”的口号。

但在大大超出心理承受能力的宣传和部分日用商品已开始涨价面前,一股抢购风潮从南到北逐渐蔓延开来。

抢购风之初,主要是抢购肥皂、卫生纸、洗衣粉、皮箱、皮鞋、毛毯、毛线、毛衣、洗衣机、电视机,进而发展到抢购米、面、食油、食盐、火柴、肉蛋,尔后发展到抢购金银首饰等名贵商品。到了后来,凡是觉得有用处的东西,都成为抢购对象。在抢购风潮中,多年废弃不用的票证又重新发行,以控制商品外流,承受巨大压力的商店营业员和经理加班加点工作。当抢购进入高潮时,各地涨价风也卷地而起。继续涨价风潮大刮,储户提款也争先恐后,武汉、南京、长沙、上海、北京等地储蓄所前长龙涌动。因银行告急,几天之内不得不关窗暂停取款,储户意见纷纷,更增加了紧张气氛。

遍布全国的抢购风潮之后出现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改革10年的成就就很可能因对物价上涨的反感情绪而毁于一旦。更为严重的是在通货膨胀的背后大大小小的“官倒”横行,混水摸鱼。

1988年8月30日,国务院召开了第20次常务会议,作出了6条重要决定。强调物价改革是指“经过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

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作为实现 5 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并郑重宣布：“下半年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时地分析了形势，于 1988 年 9 月下旬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认为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不顺价格就谈不上真正确立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但深化改革又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把改革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步骤和方法应当审时度势，力求稳妥。

会议指出：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少，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从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更需要从工作上加强管理和控制。近几年我们在控制预算内基本建设规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预算外基建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如果 1988 年年初抓紧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更好一些。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当然，现在解决还来得及，如果再犹犹豫豫，当断不断，那就会出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坚决遏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机立断，下最大的决心，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

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否则,不但价格改革很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损害我们1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第一,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压缩500亿元,大体相当于1988年实际投资规模的20%,只能多压,不能少压。要对重点产业采取倾斜政策,对涉外项目采取保护政策,切切实实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把全社会的投资规模真正管理起来。第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在集团购买力的使用中,虽然相当部分是合理的、正常的,但其中确有严重的挥霍浪费,必须坚决砍下来。第三,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办好保值储蓄,开辟多种渠道,包括出售公房和发行股票、债券、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1989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些。这是就全国范围来说的,各地都要实事求是,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相互攀比速度。

控制投资规模和社会集团购买力,过去所以屡禁不止,教训有两条:上面的原因主要是手软,抓得不实;下面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两条教训不允许再重复。1989年要采取非常措施,要真压、真砍,而不是假压、假砍。坚决砍掉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和重复建设,砍掉集团购买力中用于铺张浪费的部分,一不会影响有效供给,二不会削弱发展后劲,三不会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而得到的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这个问题事关改革和

建设的大局,现在就要预先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打招呼,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1989年必须照办,1988年第四季度更不许突击上项目、乱花钱。

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现在流通领域中问题很多。物价上涨助长了流通领域的违法乱纪,流通领域的混乱又推动了物价上涨,两者相互助长,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此,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坚决整治流通领域的混乱。首先要坚决刹住乱涨价风。国务院已经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物价、财务、税收大检查。各地必须认真组织力量,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切实抓好,坚决制止一切违反国家规定哄抬物价的行为。非法涨价收入必须上缴国家财政,严重违法乱纪的必须依法惩处。要通过检查,进行教育,严肃法纪,堵塞漏洞,把物价、财务、税收监督制度和市场规则建立健全起来。第二要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所有公司,除极少数经国务院特别批准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的以外,都必须限期同党政机关脱钩,依法经营,否则就吊销营业执照。第三要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对流通秩序混乱的重要产品,尤其是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要一个一个排队,认真解决多头和多环节经营的问题,有的要实行专营,有的只准在国家统一市场上交易。高价抢购粮食、棉花和生丝等产品的“大战”,必须立即制止。第四要加强宏观监督体系。必须在中央集中统一指挥下,强化计划、银行、财政、税收、海关、铁路等部门的宏观控制职能,充分发挥这些部门的监督作用,同时加强对它们的监督,形成严密的监督系统。第五要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所有这些都应当

作为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工作。

会议强调：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 1989、1990 两年，首先要确保 1989 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已成为对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力和驾驭局势能力的考验。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迅速传遍了城乡，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称赞，各地贯彻中央会议指示，马上开展了治理活动。1989 年 3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报告中，回顾了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在此方面的努力，认为治理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其表现为经济过热开始降温，物价上涨势头有所减弱，群众对物价的紧张心理有所缓和，城乡市场基本稳定。李鹏的报告提到了下列具体情况：

——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截止到 1989 年 2 月底，全国已经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8000 个，可压缩今后几年的投资 647 亿元，占全部项目剩余工作量的 12%。但是，清理、压缩的目标尚未达到，任务还十分艰巨。

——控制信贷规模、增加储蓄和稳定金融。由于实行了紧缩金融的方针，信贷规模得到控制。银行两次提高储蓄利率和开展保值、有奖储蓄，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逐渐回升。现在，一方面全国货币发行量仍然过大，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和企业又感到资金紧缺，这需要在坚持紧缩金融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信贷结构等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专项控制商品由 19 种扩大到 32 种，1988 年的零售额比上年下降 9.1%。县以上单位的集

团消费比上年增长 1.8%。利用公款吃喝、请客、送礼、旅游等现象,在党政机关有所减少。但各方面的铺张浪费仍很严重,必须继续抓紧解决。

——开展了全国性的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共查出应上交财政的违纪金额 74.1 亿元,已上交 56.5 亿元。通过检查,处理了一批偷税漏税、截留利润、乱涨价乱收费和贪污受贿、监守自盗等违法案件,初步加强了税收、财务和物价管理。

——整顿流通领域的秩序。各类公司的清理整顿正在抓紧进行,重点清查了 1986 年以来新成立的公司和流通领域的公司。截至 1989 年 1 月底,已撤并不具备条件和不该办的公司 17092 个;在党政机关办的 24187 个公司中,已有近两万个撤并或同机关脱钩,约占 80%。在公司兼职、任职的党政机关在职干部和退休干部 4 万多人,已有 70% 以上辞去公司职务或机关职务,或已按规定办理了相应手续。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现象,已基本得到制止。在清理中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其中包括一些大案要案。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还要继续深入进行下去。对一些重要产品和紧俏商品加强了管理,有的实行了专营,使抬价抢购和非法倒卖行为有所收敛,对建立市场秩序和稳定物价起了积极作用。

——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在压缩社会总需求的同时,从资金、物资、外汇和运输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粮、棉、油、肉、禽蛋、蔬菜等农副产品的生产,支持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支持市场紧俏商品和出口创汇产品的生产,基本上保证了国内市场的供应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1989 年元旦和春节的节日市场,货源比较充足,商品比较丰富。

李鹏指出,为了贯彻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和部署,必须把稳定、改革和发展统一起来,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求得发展。从1989年起,我们要用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努力实现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1. 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2. 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3. 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4. 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5. 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6. 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只有实现这些目标,才能使我国经济的素质和效益明显提高,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李鹏强调: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在坚持改革总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决不会回到过度集中、管得过多过细过死的旧的经济模式上去,更不会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私有化道路。当前我们采取的许多治理整顿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搞好治理整顿,也离不开深化改革。强调治理和整顿,决不意味改革可以停顿不前。治理和整顿搞好了,就可以在宏观上为深化改革创造比较好的环境,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议和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确定了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分析了治理整顿工

作的进展和面临的问题,为治理整顿经济环境指明了方向。

五、1989 年的政治风波

党的十三大以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然而,体制改革也出现新旧体制交替中的不少难题。1988 年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消极现象,经济领域尤其是流通领域的秩序出现混乱。在这种情况下,1988 年秋天,党中央举行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任务。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济秩序有所好转,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国外称他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起开拓和决策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完成党中央领导的新老交替。1987 年党的十三大走出了重要的一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退出来,选拔更年轻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赵紫阳,辜负了全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期望,在 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犯了错误。

这场政治风波是在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西方世界的一些敌对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纳入他们的体系,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近些年来,他们加紧“和平演变”的攻势,而我们党内不

少人对这种斗争形势认识不足。另外,在国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与西方敌对势力内外呼应,妄图将改革引入歧途,走西方化、多党制和私有化的道路,我们党内的不少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性也认识不足,没有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各种因素所致,逐渐酝酿成由学潮而发展到政治动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却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以至局势越来越严重,终于酿成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保卫了人民共和国的胜利果实,粉碎了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在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以后,6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讲了话。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动乱的制造者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高度赞扬了戒严部队,说他们在生命危险面前,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邓小平还说,这次事件爆发出来,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步

曲”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如果说是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配合得不好。他要求，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号召大家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在首都已经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会上首先介绍了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学潮的发生和发展情况，说明了已经出现的动乱对北京市各方面所产生的严重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上讲话。他说，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律和纪律遭到破坏，事态已经波及到全国许多城市。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他指出，蓄意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就是要在动乱的条件下达到他们通过正常民主与法制渠道不可能达到的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违反宪法的政治目的。他强调，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对学生们提出的

合理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他们的合理批评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李鹏希望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希望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立即停止一切游行和“声援”的活动。李鹏说,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讲了话。他说,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由李鹏总理签署命令,国务院决定从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月政治动乱发生到5月中旬,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制止事态更加恶化,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从5月20日10时起,戒严令正式生效。但是,由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煽动和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难以到达警戒部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竭力使动乱

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到达警戒部位,实施戒严,平息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坚决执行中央决策,为恢复北京正常秩序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1990年1月10日,李鹏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国务院命令,决定从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6月3日起,一小撮暴徒在北京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6月4日,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和首都公安干警、武警部队一起,以勇敢无畏的精神,一举粉碎了这场反革命暴乱。但是,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局势还相当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揭露了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制造了种种暴行和进行暴乱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一伙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同时,还说明了戒严部队为什么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平息这场暴乱。指出,不这样做,就要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几千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就可能被颠覆,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全国就可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还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平息暴乱的第一步胜利,但是反革命暴乱还未完全平息,极少数暴乱分子是绝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制造种种事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务必提

高警惕，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

六、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确立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确立完全是在激烈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第三代的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开始。

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全会正确地分析了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明确地指出了极少数的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这场斗争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党中央采取的决策和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人民中是有着深厚的基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掀起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违背历史潮流、违反人民意志的反革命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全会高度评价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他们支持党中央政治局常

委多数的正确决策,力挽狂澜,在斗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前途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对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实践证明,党和政府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而采取的方针和措施,使国家和人民避免了陷入严重内乱和历史倒退的巨大灾难,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

全会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在这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受了考验,为巩固社会主义中国立下了功劳。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报告指出:赵紫阳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他的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的失误和错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地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重地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对党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了选举。全会一致选举江

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后确立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个集体是在党和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关头确立的。也是在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支持下实现的。这个领导集体的转换和交接，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不断奋进的标志。

全会根据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的实际情况，向全党提出了当前要特别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贯彻治理整顿方针，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于是，以江泽民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开始了党的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纪念，党中央作了全面的部署，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开展了以稳定社会秩序为中心的各项准备工作。

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决定性阶段。

江泽民的讲话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加强党的团结,树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威信,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夺取新的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摆在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最迫切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共和国的发展将会遇上严重困难。所谓解决经济问题,就是要进一步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这问题主要是在 1988 年暴露出来的。

198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 10 年。在这一年中,一方面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重点建设取得新成就、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是经济过热十分严重,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市场失控很突出。这就迫切地要求必须坚持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

为了解决 1988 年经济形势以及出现的严重问题,于同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确定了今明两年要把建设和改革的重点放到治理整顿上来的部署。实践证明,党中央作出治理整顿的方针是正确的。

为贯彻和落实这个方针,1989 年 3 月召开了七届人大二

次会议。李鹏代表国务院提出了治理整顿经济的具体计划。他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把稳定、改革和发展统一起来，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求得发展。从1989年起，要用两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具体目标是：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但是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后，很快受到了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冲击与干扰，使这次会议提出的任务不能如期地实现。再加上动乱与暴乱给经济带来的破坏，经济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

所以中国共产党于1989年11月6日至9日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10月30日至11月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全会认为，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采取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经过一年的努力，在治

理整顿方面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因此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所以全会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展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成长的合理需求相适应;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在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6%;改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态,力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进一步深化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动的宏观控制体系。

全会认为,治理整顿必须抓住四个重要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决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解决好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下功夫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科技水平,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路子。

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认为他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

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以实际行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对全党具有深刻的意义,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全会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会决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为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副主席。杨白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治理整顿经济和深化改革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严重影响这方针贯彻的是社会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所以在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召开的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李鹏作了《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作了决议。会议认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当前,维护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发展是基础,必须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会议认为1990年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极为重要的一年,必须把这一工作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会议还认为,坚决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清除各种腐败现象。

90年代,是振兴中华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了新的努力。各族人民为振奋精神,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实现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1990年的国内工作任务是:集中力量办好农业,争取粮

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有一个好的收成，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努力改变市场销售疲软状况，重点抓好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保持工业生产适度增长；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证教育事业稳定发展；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努力做好财政金融工作；加强物价管理，稳定国内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深化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深化企业改革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扩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坚持抓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占用耕地，节约使用矿产资源，继续加强环境保护。

为实现上述 10 项任务，各级政府必须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力量继续加强廉政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改进机关作风。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一件大事，必须年复一年地长期抓下去。廉政才能稳定，勤政才有希望。1990 年的廉政建设，主要任务是：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各项廉政规定和措施；制定和实施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个人收入监督制度，开展反贪污反受贿的斗争；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建房标准进一步作出规定，切实纠正超标准和违法违纪行为；纠正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加紧整顿执法部门和监督机构的违法违纪行为。

总之，从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治理整顿经济方针后，经济两年的努力，到 1990 年底，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可以说，已渡过了经济的困难时期，一个稳定发展的新形势已经到来。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为争取 90 年代我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1990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中央委员 171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7 人出席了会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61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67 人、有关方面负责人 78 人列席了会议。全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会上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李鹏就《建议》草案作了说明。

在《建议》中,提出了今后 10 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经济发展的产业重点和地区布局;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任务和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和健全社会保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任务和措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而奋斗。

为实现 90 年代的伟大任务,全会高度评价了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10 多年来,坚持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改革开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经济生产和社会生产生机勃勃。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一切为 90 年代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全会指出,从 1991 年到 2000 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这是由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能不能在 90 年代巩固和发展 80 年代取得的成就,大力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努力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基本要求: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 1980 年翻两番;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产资料更加丰裕,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

全会提出,今后十年和“八五”时期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加工工业;加强教育和科技事业。

全会认为,制定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全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和人民武装力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

爱国人士,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埋头苦干,为胜利地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宏伟任务而努力奋斗。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它标志着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已取得了显著效果,任务已基本完成;它标志着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实现第一个翻一番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从而开始了为实现第二个翻一番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第二节 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一、邓小平南巡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对我国南方的几个城市: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作了视察和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为我国实现90年代的伟大任务,形成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有一个基本思想:要求全党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迅速发展我国经济。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

的机会就丢掉,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还认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国际上看是一个有利的时机。

我国的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我国面临着亚太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

在1960—1970年和1971—1980年这两个时期,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分别为9.0%和9.2%。而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在同时期都低于“四小龙”的平均发展速度,分别为5.2%和5.8%,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我国有“大跃进”和“文革”的干扰破坏,加上旧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入80年代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2—1991年分别是8.5%;10.2%;14.5%;12.9%;8.5%;11.1%;10.9%;4%;5.2%;7%。尽管如此,我国的周边国家除了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较慢一些,其他国家发展也都比较快,特别是南朝鲜和新加坡的速度最快,尤其是近几年发展速度更快,而我国由于治理整顿速度放慢了。这种形势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一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亚太地区比较稳定的新形势,也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东欧和独联体的一些国家近几年经济大幅度下降,1990年东欧国家平均下降10%,1991年下降

14%，独联体国家 1990 年下降 5%，1991 年下降得更多，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当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对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换回我国需要的各种工业品。1992 年以来，国务院和内陆边境省份——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对外开放。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在 80 年中出现低速增长，有的国家在有的年份呈下降局面。在整个 80 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年平均约为 2.9%，低于 70 年代的年平均 3.4 的增长速度，接近 50 年代以来 40 年代的平均数字。总之，发达国家经济的缓慢增长，是我国赶超他们的有利时机。

1991 年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实施效果良好，例如，大幅度调整了 25 年没有动过的城镇居民粮油定量平价销售价格，这是一次重大突破。调价后市场平稳，各方面反映较好，也充分说明了广大群众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了。同时，广东、海南、福建三省的粮食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基本上实现了购销同价，开始形成了新机制。

1991 年国家对长期偏低的部分基础工业产品，钢铁、水泥、原油等价格进行了小步调整，部分产品实行计划内外的两种价格并轨或缩小差距，放开了由国家管理的食糖零售价格。这些改革措施效果较好。

3. 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我国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指标在世界上的位次名列前茅，为加快经济发展和扩大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3 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由于

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搞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9—1991年的1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97倍,国民收入增长1.85倍,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工业总产值增长3.45倍,财政收入增长2.2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5.58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到1990年我国的原煤、水泥、布、电视机、粮食、棉花、猪牛羊肉已占世界第1位,钢、发电量占第4位,石油占第6位。

4. 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加快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我们在理论上又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明确了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这就是: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明确认识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长期以来,我们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次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上的突破,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将起到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等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上说:“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等重要论断,完全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是完全正确的。这些重要论断的提出,对于我们的思想认识来说是一大解放,而且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述国际和国内的条件,就构成了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要抓住时机,现在就是好机会,不抓,遇到的机会就失掉了。80年代,我国人民抓住机遇,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大跳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大发展,就是一次又一次抓住机遇的结果。

邓小平高瞻远瞩,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发表了南巡谈话,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指出,上面我讲了加快发展经济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有利条件,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新的台阶。他举例说,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上海就有条件搞得更快一些(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到的。例如我国从1984—1988年的就是一个跳跃式的发展阶段。5年年平均工业产值增长17.6%,增长速度几乎和“一五”时期年平均

增长 18%持平,累计创工业产值 6 万亿元以上。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调整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在战后 1955—1973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9.8%,这个速度大约比同期联邦德国、法国快 1 倍弱,比英、美快 2 倍,同时也大大超过战前“明治维新”以来本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

为了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还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讲到加快经济发展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超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又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应该是多多益善。这就给又快又好地加快经济发展,扩大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站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高度看问题,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意义。这是理论上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任何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特别是由于生产关系一定

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什么叫革命？从根本上来讲，革命就是要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解放的，这叫作革命解放生产力。

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我们把它看作是发展生产力，这种提法对是对，但现在看来，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这就是1992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即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为什么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这就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具体的分析。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应该肯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上是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在发展中还要经历一个生产力从不发达到发达的长过程，与此相适

应,也有一个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从不完善到完善的长过程。

在我国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原有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弊端上。我国的原有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是在建国初期和“一五”期间形成的。但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后,虽然有过几次权力下放,但都限于调整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所以也就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框。它的主要弊端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管得过多,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和活力;实行从上到下,层层分解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当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体现,也是上层建筑在经济方面的反映。原有经济体制上的僵化和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投入多,产出少;生产增长快,生活增长慢。下面的数字很说明问题,从1953—1980年,我国在这28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值增长21倍,这个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而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加了8倍。扣除重复计算的部分,新创造的价值即国民收入增长了21倍,这个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而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加了8倍;扣除重复计算的部分,新创造的价值即国民收入只增长了4倍;而落实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收入上,这28年只增长1倍。这

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效益很不理想,这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存在在诸多弊端,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如何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即进行改革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是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特别是消除原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解放生产力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内容极广泛、影响十分深刻的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10 多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1. 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了城乡的集体经济,适当地发展了个体、私营和其它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从而改变了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安置就业等,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 合理改革了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组织形式和企业的经营形式,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上。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成功,由于改变了不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旧体制,全面推行以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逐步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与农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发挥,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又推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初步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有所扩大,在实现自我改造、自我发展方面有一定的进步。

3. 在坚持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改革了价格管理体制与形成机制,逐步发展了各类市场,初步发挥了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上有了改进,开始重视经济、法律手段的运用。

4. 在坚持中央政府必要的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通过财政、金融、计划、投资等方面的改革,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

5. 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适当采用了其他分配形式,从而较好地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6.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都有了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速度显著加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9年—199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8.8%,显著高于1953年到1979年每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1990年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

素,比 1978 年提高了 1.1 倍,平均每年提高 6.5%,比 1953 年至 1978 年平均每年提高 2.2%要快得多。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0 年国民生产总值 30.65 亿元,1990 年增长到 339.05 亿元,增长了 10 倍;1980 年国民收入 28.19 亿元,1990 年增长到 150.4 亿元,增长 4.3 倍。14 个沿海开放城市:1987 年国民生产总值约 1184 亿元,1990 年增长到 2507.26 亿元,增长 1.1 倍;1987 年国民收入 1432.22 亿元,1990 年增长到 1982.71 亿元,增长 38%。首创大包干改革的安徽省滁县地区,1990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72.05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比 1978 年增长 5.5 倍;农民人均收入 615 元,比 1978 年增长 4.7 倍。

从几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上,也雄辩地证明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这一伟大真理。钢产量,从 1949—1978 年近 30 年生产钢 3178 万吨,而从 1979—1991 年的 13 年,从 3178 万吨提高到 7057 万吨,连续上了 4000 万吨、5000 万吨、6000 万吨、7000 万吨四个新台阶。水泥产量用 30 年时间,提高到 1978 年的 6524 万吨,可是从 1979—1991 年的 13 年竟跃进到了 2.48 亿吨,上了 1 亿吨、2 亿吨两个新台阶。发电量到 1978 年达到 2566 亿千瓦小时,连续上了 3000、4000、5000、6000 亿千瓦小时的四个新台阶。煤炭产量 1978 年达到 6.18 亿吨,1991 年达到 10.9 亿吨,13 年中连续上了 7 亿吨、8 亿吨、9 亿吨、10 亿吨的四个新台阶,接近 11 亿吨。

粮食产量由 1949 年的 1.1 亿吨上升到 1958 年的 2 亿吨,用了 9 年时间,从 2 亿吨到 1978 年的 3 亿吨竟用 20 年时

间,而从3亿吨到1984年的4亿吨只用6年时间,到1991年达到4.35亿吨。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44.4万吨,到1978年达到216.7万吨,用了19年,而从216.7万吨上到1991年的566.3万吨只用13年时间。油料产量由1949年的256.4万吨,用29年时间,到1978年达521.8万吨,增长1倍,而改革开放的13年上升到1991年的1638.3万吨,净增1100万吨。

改革开放的13年,已经相当成功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所有这些改革还是初步的,只有深化改革,加快改革步伐,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7. 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发展社会化服务和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是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副产品商品率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广大农民迫切希望解决的新问题。解决得好,可以进一步促进农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登上新台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服务与流通是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牛鼻子”,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必须牵住“牛鼻子”,这两个问题就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主攻方向,也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为此必须:

(一)要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特别是加强集体统一经营的层次,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同时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农户解决自己办不了或办不好的事情,使家庭经营的活力进一步发挥。通过统一周到的服务,使部分生产素质较差的农户也能得到较好的经营成果,有利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门路,使相当一部分劳动力逐步转入第三产业。

(二)深化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因为当

前农产品价格不顺,流通不畅的现象严重存在,如不尽快加以解决,就会挫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为此,除了国家规定的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统一收购经营或部分统一收购经营外,其余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要逐步理顺价格;坚定不移地实行多渠道流通,在发挥国营和合作社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建立正常的流通秩序,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有计划地发展各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扩大商品集散,加快商品流通。

8. 在城市,深化改革的任务更为艰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我国部分国营大中型企业搞得比较好,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发展后劲不足,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主要是:宏观上经济结构不合理;价格尚未理顺;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机制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职工个人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速度,分配向个人倾斜;企业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不强;企业负担重;市场疲软的影响。

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效益,从根本上说,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和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作为企业要把着眼点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在坚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坚持贯彻《企业法》,健全内部领导体制,推进

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投身内外市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快技术进步,坚持从严治厂和加强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等8个方面下苦功夫,特别是要做好经营机制的转换工作。这是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另一方面,作为各级政府,要坚持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减少对企业进行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多为企业搞好服务,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为此决定采取12个措施:增强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逐步缩小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指令性计划;适当提高企业折旧;增加新产品开发基金;继续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对利率再做些适当调整;抓紧落实给予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继续对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实行“双保”;抓紧清理三角债;进一步做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工作;坚决治理“三乱”;逐步降低国营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

9. 以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计划体制改革,要进一步缩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投资体制改革,要按产业政策和经济规模审批投资项目,避免重复建设,实行中央、地方、企业共同参与的投资机制。财政体制改革,要实行复式预算制度,经常性预算不打赤字,继续进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试点。银行体制改革,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发放贷款,减少对贷款的行政干预。要以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重点,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完善。推进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努力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积极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制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十几年来,中国人民在这条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摆脱了长期的“左”的束缚,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正确与否以及能否长期牢固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动摇是决定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首要问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的关键,就是必然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则,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就成为一句空话。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国以来,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生产力的水平仍然较低。突出的表现是:11亿人口,有9亿在农村,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未脱离手工劳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工业虽然迅速崛起,但同时又存在着科技水平不高的严重状况,文盲、半文盲还占全国人口的1/4。这些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长时期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地把握这个中心不放,才能尽快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否则,我们就不能实现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下个

世界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更无从谈起。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也难以保证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就强调指出：“80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能耽误，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是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1957年后由于“八大”路线的改变，导致“近30年间，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不稳定、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历史雄辩地证明，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国家就繁荣昌盛，人民就富裕幸福。背离这个中心，必然会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是我们必须时刻牢牢记住的教训。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两者既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又同时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集中表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发展，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10多年来，通过改

革,革除了现行体制中的若干弊端,但是还有许多弊端尚未革除;通过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但还有许多潜在的积极性有待于调动。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很大发挥,但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改革的天地还很广,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在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的条件下,我们要不失时机地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决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以促进生产力的更大发展。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它规定了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规定了我国根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和基本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如果只讲四个现代化,而不讲社会主义,就离开了现代化的方向,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现在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或是其它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基础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削弱或放弃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而不是要背离马克思主义,取消或否定党的领导。如果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等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随时都有被葬送的危险。

二、中共十四大召开

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准备和努力,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会上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政治报告。他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会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14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14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14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14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他在报告中全面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高度赞扬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的历史性贡献。14年的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江泽民在报告中全面地概括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共有10个方面：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会议经过讨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入党章的总纲中，作为90年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针。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性功绩。中央顾问委员会向这次代表大会建议，从十

四大起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党的十四大讨论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以及选举了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2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他们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尉健行。

总之,党的十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概括,并写入了党章的纲领中,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党的十四大对90年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提出的要求和部署,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一个里程碑。党的十四大产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成熟和适应时代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了新的的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总结我国社

会主义实践的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共和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实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前。这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雏形的阶段。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起来的适应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要点,进行了概括和阐述。决议概述的这条道路的10个要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雏形。这标志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至十三大前,这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形成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阶段。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走”的战略,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十二届六中全会重申了新时期一开始党就提出“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专门作出决议指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三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阶段。1987年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勾绘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并作出了科学评价,认为这个理论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发展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十三大还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6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标志着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阐述,是我党对中国基本国情再认识的结

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中共十三大作出的 12 个科学理论观点,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成果的比较全面的概括,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构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理论框架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因此,党的十三大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十三大后,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我国又面临着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国内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等重大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中,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不断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将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 12 条原则。这 12 条原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第四个阶段:从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至 1992 年党的十四大。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确立指导地位的阶段。1992 年初,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视察了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与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关于判断改革开放举措姓“社”姓“资”的三个

“是否有利于”标准、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等等。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的胆子要再大一点,建设的步子要更快一点,千万出不可丧失时机。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大都是他早已提出并一贯坚持的,但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针对新的实际作了更为深刻的发挥,有的是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重要理论概括,是新的观点。这些观点的阐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阐发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作了新的归纳。从9个方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这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江泽民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1.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强调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

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进步。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产水平为依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

只能导致落后。

6.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同时它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

7.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远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8.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

9.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许多其他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伟大创造,是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 14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它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党的70多年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既有失误,甚至严重的挫折,更有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成功。作为这一结合过程的理论表现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标志着党的社会主义时期政治上、理论上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而实现这一结合的前提就是认清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方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认清了中国的国情,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任务:把产生于先进国家,基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运用于未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就需要共产党人全面地准确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入地系统地研究中国国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实际,特别是基本国情没有完全弄清楚,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有对外国模式的盲目照搬,还有离开一般原理的随心所欲的指导,以致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生了严重挫折。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总结了我国过去搞社会主义的教训。他说:“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了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成败得失历史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和最新成果。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继承、纠正和发展。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20多年中,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历史是有联系的,没有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败得失,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就和进步;没有毛泽东思想根本点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及理论的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就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同时,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指导作用。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反复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坚持毛泽东的好思想、好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同时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以往犯错误的经验,纠正错误。这就是说,既要纠正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又要继承和坚持被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没有这种

继承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失去我们的基本立足点,就会迷失方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消化历史经验的同时,不断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发展新原理,开拓新局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事实证明,没有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得失成败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继承、纠正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及其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驱,邓小平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

(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对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普遍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具体的答案。需要各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结合本国的实际去艰苦的探索。事实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70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在进行艰苦的探索,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就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缺乏经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较多地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结果都遇到严重的挫折。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因此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共产党人所关心的问题。我

们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的历史课题的科学回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坚持和不断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而且也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共十四大的重要决策。它标志着共和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从而开始确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的经济体制模式。

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

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 10 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

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验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作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

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要大胆探索,敢于试验,及时总结经验,促进体制转换的健康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

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将产生深远的全局性的影响和作用。

然而在 50 年代,共和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在当时来说是历史的必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只有选择计划经济的体制,才能调动国家各方面的力量,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它的优越性远远地超过了它的弊端。所以,在共和国实施“一五”、“二五”、“三五”计划时,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自从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严重地表现了它不适合改革开放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束缚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又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认识上的偏差与滞后;二是有待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和巨大威力的发挥。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变革,不经过较长时期的实践是不可能作出这个决策的。因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首创,没有一个国家提供经验。所以,中共十四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有勇气和胆略的,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当然,它也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有深厚的基础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呢?这严峻地要求中共中央在认真总结实践的基础上给予回答,指明前进的方向。

于是,中共中央在1993年11月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具有创造性的回答。

决议指出,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

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就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与上述构成内容相适应的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决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最主要的应当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为此,必须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互统一;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重视群众切身利益;要采取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法。

决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决议指出,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当前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大市场。

决议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决议还指出,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于是,决议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要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最后,决议提出了要为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的目标和任务。

由此可见,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上述决议一方面是对 15 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决议要比 10 年前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刻得多、发展得多了。所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在方针政策和基本框架、建设重点上,在全党范围内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体制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为实现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打下了基础。

四、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召开

1993年3月14日至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代表2978名。

会议听取审议了国务院总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三个附件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国家根本大法所作的修改，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这对保证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深远意义。大会还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了关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199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及其他报告，还选举和决定了国家机构新的一届领导人员。

第三节 迈向新世纪

一、党的十五大召开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正式代表2048名、特邀代表60名出席了大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江泽民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报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了一个跨世界的纲领;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十五大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江泽民的报告共分10个部分: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过去五年的工作、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国

际形势和对外政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等。在这 10 个部分中,在如下几方面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论述和概括:

对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作出科学的总结。

江泽民在报告中认为,从 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耻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 2000 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都是为着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完成这两项任务,中华民族进行了一百多年奋斗。仅在 20 世纪中,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形成了三个伟大的思想,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邓小平理论。这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然而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第二次是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共建立后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完成的,并且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领导集体领导下开始的一场新的革命。一百年的斗争历史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对中共十四大以来 5 年内党的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实现这三项决策，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七次全会，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因此，这 5 年中党的工作特点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认真实施十四大的重要决策，提出并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打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所以在这 5 年中，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 5 年中，党的工作有如下几方面成绩：

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从 1992—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1%；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展开；精神文明

建设迈出新步伐、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可喜成绩；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5.7%，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改善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加强了党的建设。

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全面的论述。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旗帜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中国共产党历来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因而在指导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放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及纲领作了较详尽的论述。

江泽民在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较详尽的新的论述。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近 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呢？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时期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在 1956 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提出来了。

从 1957 年起，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时期究竟处在什么历史阶段上的社会主义呢？共和国的建设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分析当时的形势、以什么样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呢？这是摆在

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历史证明,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社会经济的不发达,在这个时候的社会主义是政治制度上不完善、经济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后来称之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其社会本质和基本制度说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它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能否正确地认识我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党和国家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确立,对于共和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共和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伟大战略。它一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已是一个客观事实了,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新中国建立后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应有提高,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还未完成,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而进入了社会主义,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事实就决定了我国必然有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还要完成许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应当完成的任务。同时也决定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共和国有着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政治上,剥削阶级虽然已经基本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有时还会激化,剥削阶级的政治势力在一定范围内也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很严重。各种各样的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还存在,也还有一部分人总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还必须加强和巩固。当然由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已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如何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相互矛盾,就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地影响共和国的发展。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确立,我国已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还刚刚建立,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巩固,人们对新社会还不够习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对社会主义还不熟悉。旧社会的痕迹和缺陷还明显在存在。因此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不习惯,甚至留恋旧社会。政府工作人民的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探索。总之,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

第三,我国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农业还处在自然经济的状态,我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完成我国应当在新民主主义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工业

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资本主义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任务，而我国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农民又占多数，不少地区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在一定时期内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全国大多数人还为吃饭问题而奔忙。从全国说，文化事业还不够发达，文盲半文盲还不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没有完全提到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位置上。而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文盲的基础上。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日益富裕起来。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它既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取得胜利，从而在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也不同于俄国的情况。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确定的各项原则，也不能照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摆在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会成功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无疑，它也一定能够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道路。但是它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探索和努力,需要经过艰难的历史过程。在探索中也可能会出现曲折和挫折,犯重大的错误,付出相当严重的代价,也许由于主观上的错误导致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失误。历史证明,只有根据中国的实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充分地认识到中国自近代以来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胜利后,虽然经过了经济恢复阶段,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很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没有充分的发展而较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客观事实就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走其它国家的道路,只有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才能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要经过与别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即经过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才能进入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如果认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直接地进入社会主义发达阶段,这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一种空想论,是“左”倾的重要认识根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从而保证了共和国走向繁荣富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退到次要地位,而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解决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

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更丰富起来,使国家更强大起来,使人民日益富裕起来。

为解决这个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使生产力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同时也要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部分。具体说是有两方面任务:一是物质文明建设,二是精神文明建设。这两方面必须采取两手抓、同时并举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如只抓物质文明建设,很容易使物质文明建设走了邪路。因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还存在着,只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还会掀起波浪,甚至使矛盾激化起来。所以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有正确的方向。当然,如果只抓精神文明建设,忽视物质文明建设,那它也没有基础,精神文明建设也开展不起来。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的战略决策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各方面建设,是共和国迅速走向繁荣富强的惟一道路。

实践证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国家必须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迅速地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特别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开展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因此在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原则下使人民迅速地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并使国家处在稳定的发展中。因此在国家建设中既要防止右的倾向,但更重要的要防止“左”的倾向。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奋斗的事业,没有全国人民的努力,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成的。

经过 40 年的实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江泽民在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由此可见,到党的

十五大对初级阶段的论述已十分全面了。不但如此,还认为,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走完这个历史的进程。

于是,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总之,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为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和国制定了一个跨世纪的纲领。

中共十五大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作了部分修改,主要是在总纲中把邓小平论规定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修改后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1997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江泽民、副主席为张万年、迟浩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尉健行、副书记为韩杼滨、曹庆泽、何勇、周子玉、夏赞忠、刘丽英。

中共十五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央号召全体党员为实现十五大制定的纲领而奋斗。十五大指出，这次大会到十六大，将是我们经受新的考验，夺取新的胜利的5年；将是用新的实绩显示我们党能够继承邓小平遗志，肩负起人民的希望，打开事业新局面的5年；将是全面完成“九五”计划，为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奠定基础的5年。到20世纪末，我国可达到小康的目标。这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情，也是共和国5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中共十五大再次指出，这次大会的灵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从此，党在指导思想、高举旗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此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

二、为迎接新世纪而奋斗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1999年有三件大事排在日程表上。第一件是在1999年3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第二次会议，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部分的重要修改，使共和国更好地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第二件是庆祝共和国成立

50周年,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振兴和民族发达的大事;第三件是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以结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洗刷中华民族的耻辱。这三件大事决定了1999年对中国来说,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振奋的一年、胜利的一年。

1999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建设中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一)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和指导思想以及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

在宪法的7自然段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这样修改:一是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强调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将邓小平理论写入指导思想,即“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指引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四是在这段中增加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任务加以规定。

(二)关于增加以法治国的要求和条文的问题。

《建议》中提出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三)关于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写入宪法的问题。

在《建议》第三点中指出,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修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四）对农村的经济体制作了明确规定。

在《建议》第四条中提出，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中的农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五）关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规定。

在《建议》第五条中提出，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

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六)对国家的专政职能作了更明确的规定。

在《建议》第六条中提出,宪法第二十八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修改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1999年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朱镕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和修改了宪法的有关条文,从而完成了会议的全部任务而于3月15日闭幕。

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共分10个部分:一、1998年工作回顾和1999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二、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三、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四、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五、认真做好金融工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六、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有效利用外资;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八、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九、努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十、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报告约1.5万字。

朱镕基回顾了1998年各项工作的巨大成就。他指出,我们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主要是由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及时果断地作了一系列正确决策;20

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战胜巨大困难创造了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奋发进取,发挥了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朱镕基代表国务院向奋斗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以及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关心与支持祖国建设和统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与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镕基在报告中以较大篇幅全面阐述了1999年政府工作的安排和设想。他说,综合分析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左右。要实现今年经济较快增长,必须首先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仍然十分严峻,国内消费需求一时也难以有较大的增长。因此,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势在必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拉动当前经济增长,还可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朱镕基的阐述农村工作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和完善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继续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加强以水利为重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调整乡镇企业结构,推进小城镇建设;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

朱镕基指出,今年是实现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标的关键一年。当前最重要的是,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和改组的步伐;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推进政企分开,健全监管制度,整顿和加强企业领导班子。他说,要继续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要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鼓励与支持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朱镕基强调,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和世界金融市场动荡、我国经济生活中深层矛盾逐渐显现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好金融工作,对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应增加货币供应量,把握好金融调控力度,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他还强调,要继续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力争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有所增长。

朱镕基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也是本届政府极其重要的任务。当前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要继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朱镕基在报告中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政府要加强行政立法工作,强化执法监察,推进依法行政。今年要着重抓好以下三项工作:第一,依法整顿经济

秩序,严厉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第二,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特定。第三,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

朱镕基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了阐述。他最后说,综观世纪之交的形势,我们面临着历史机遇和新的挑战。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振奋精神,锐意改革,抓住机遇,团结奋斗,全面完成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推向 21 世纪。

1999 年的又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是,于 12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澳门,行使对澳门的国家主权,这是中华民族洗刷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的一个伟大行动。

澳门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而由葡萄牙人强行占有的。1557 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远航而来的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吏得以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必须向中国地方当局缴纳地租和税款。1840 年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乘清政府战败之机,遂于 1854 年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任命葡“兵头”为总督,拒绝再向当地政府缴纳租税。1887 年,清政府先后在里斯本和北京与葡萄牙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澳门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葡占澳门的界址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可见,澳门问题也是恢复中国对其行使主权问题。收回澳门,同

样是实现中国统一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 1986 年 6 月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关于解决澳门问题谈判开始以来,中国政府在这十几年中,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完成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香港问题的解决,极大地促进了澳门问题圆满解决。

1999 年 12 月 20 日,这个 20 世纪的最后岁月,终于向中国各族人民走来了!向澳门人民走来了!可以说,这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大事。能在 20 世纪中,解决如此重大复杂的难题,使国人始料所不及的。如果在 20 年代提出这个问题,那会说这是一个梦想;如果在 50 年代提出这个问题,那也会说这是一个理想,然而,弹指一挥间,把这梦想变为现实了。这是一个何等令人自豪的历史结局啊!

1999 年 10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庆典之日!半个世纪中,共和国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是,这是一条胜利之路!强盛之路!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 1999 年 10 月 1 日整整 50 年中,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奋战,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发展的方向。无疑,在这 50 年中,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有过胜利的欢乐,也有过失败后的痛苦,但是终于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航道已经打开,共和国的巨轮正在驶向更伟大崭新的 21 世纪。